

索罗斯和他的三十条秘密商规

狙击全世界

一夜之间，打垮英镑
旬月之内，震荡东南亚
国际金融界的顶级玩家
他比四十二个国家还要富有

他的作为正在给世界金融体制带来深刻影响

盛斯/编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狙击全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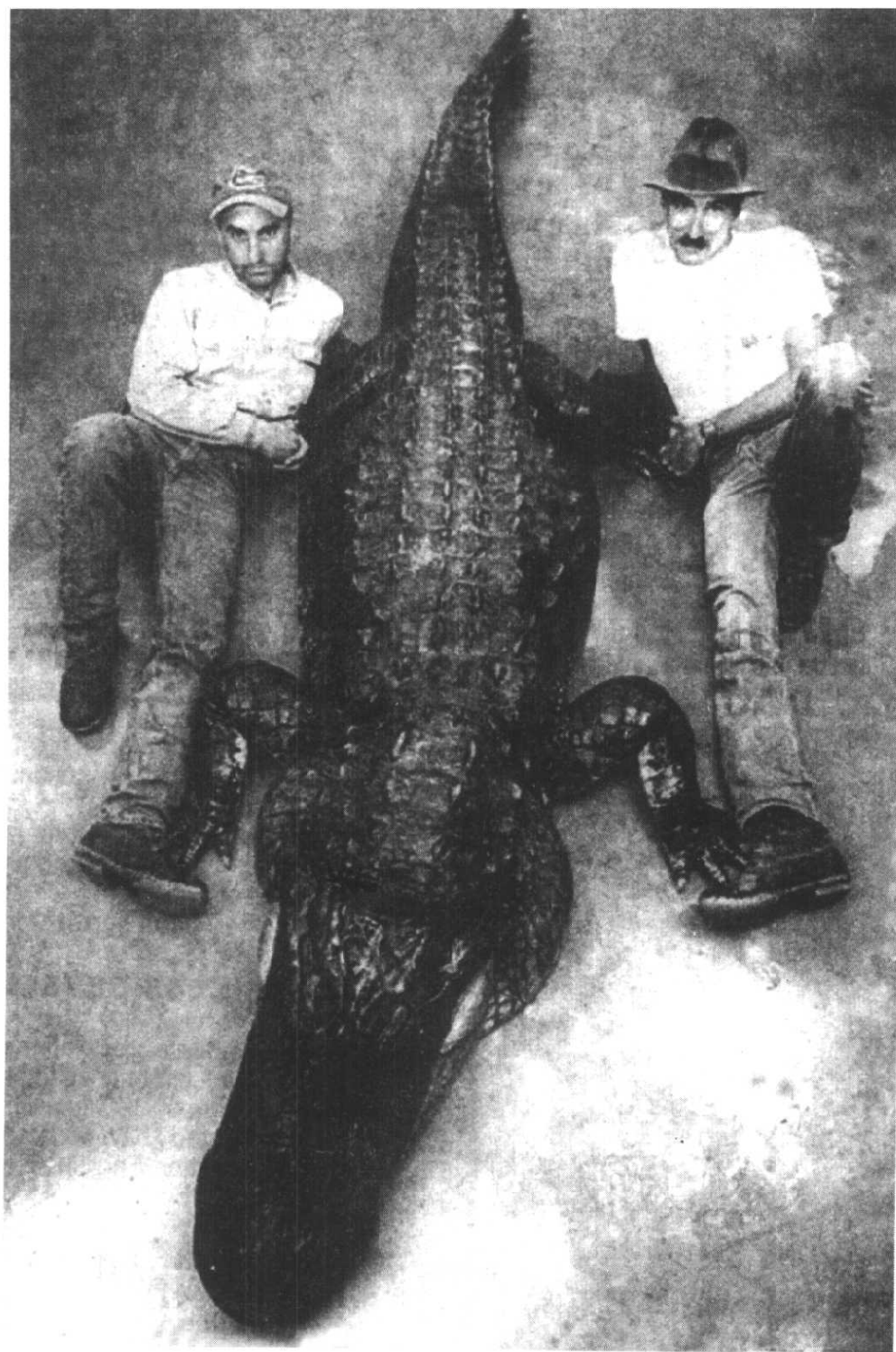
——索罗斯和他的三十条秘密商规

盛 斯 编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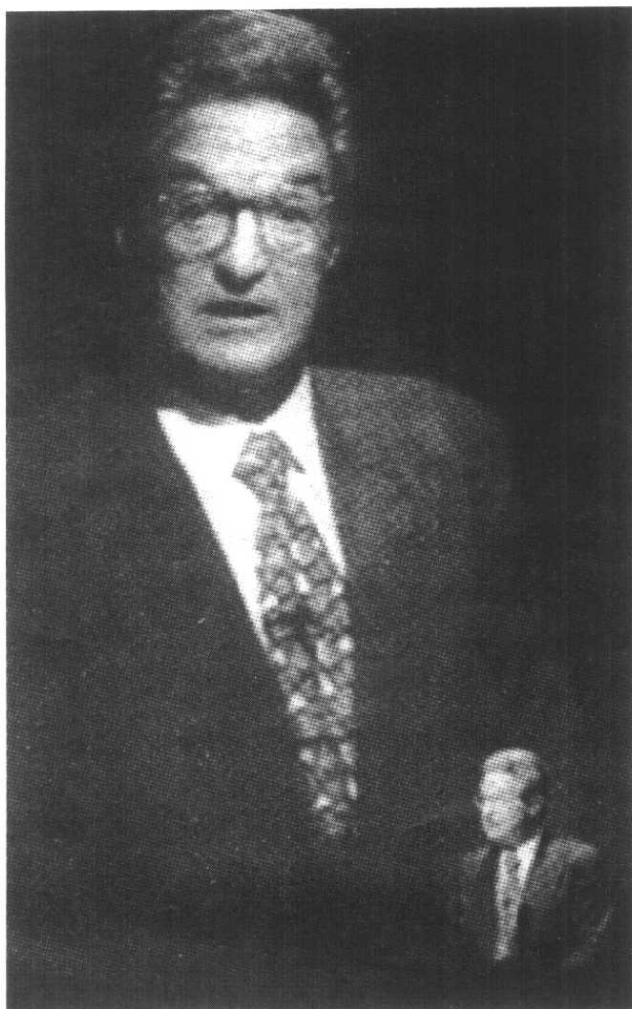


已年满66岁的乔治·索罗斯仍然是令国际金融
界望而生畏的人物



这是美国渔民最近捕获的一条特大鳄鱼，有人说这很像索罗斯在国际金融界“顶级大炒家”的形象

1997年9月在香港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由于东南亚金融风暴，索罗斯再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人物。在会上，索罗斯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分别在不同的场合针锋相对、互相指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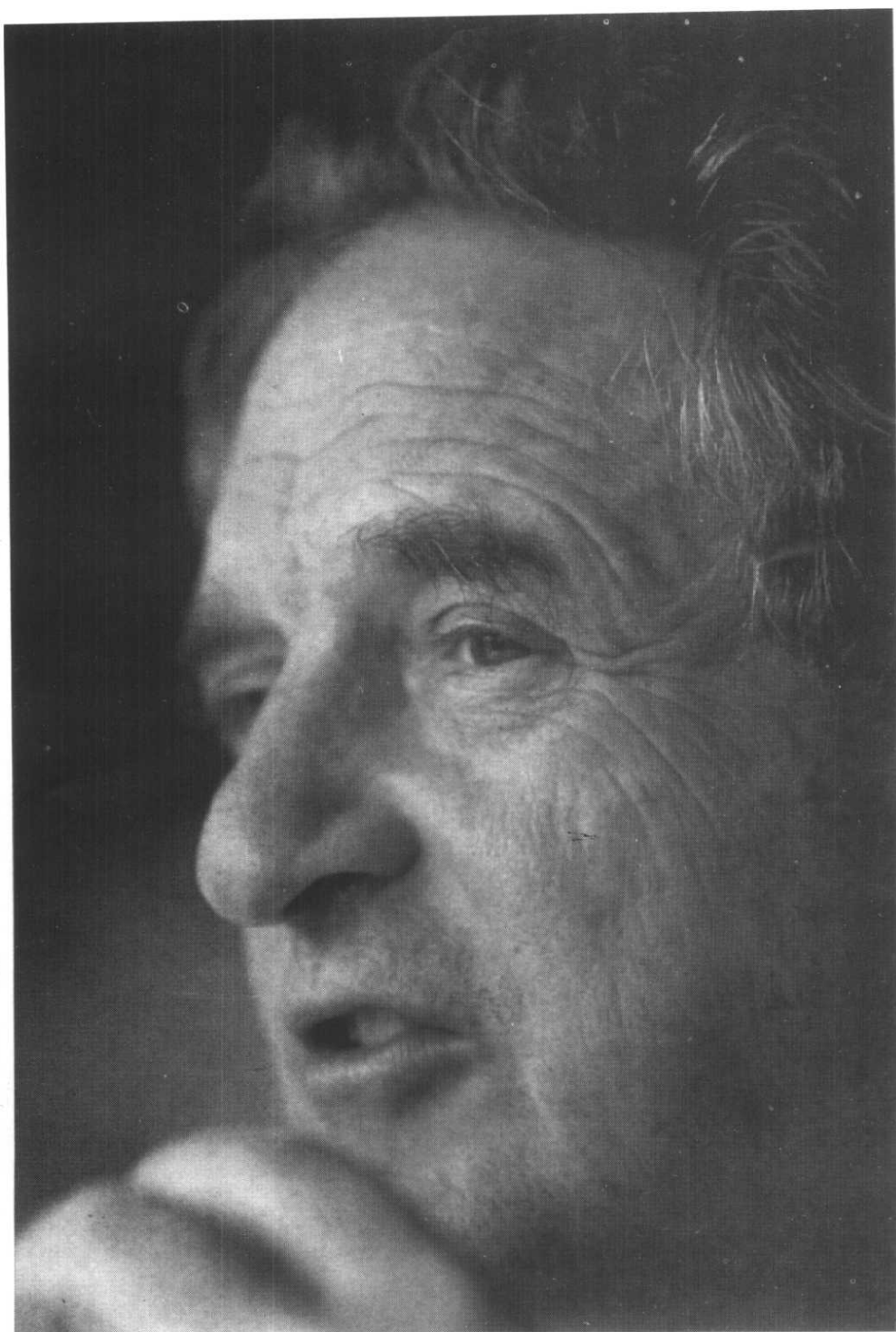
索罗斯在另一场研讨会上反驳
马哈蒂尔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危险



马哈蒂尔发言时神情激动



乔治·索罗斯在莫斯科



乔治·索罗斯经常说他挣钱比花钱容易



索罗斯和南非总统曼德拉在一起



90年代初期，索罗斯很喜欢以慈善家的身份在新闻媒介抛头露面

BusinessWee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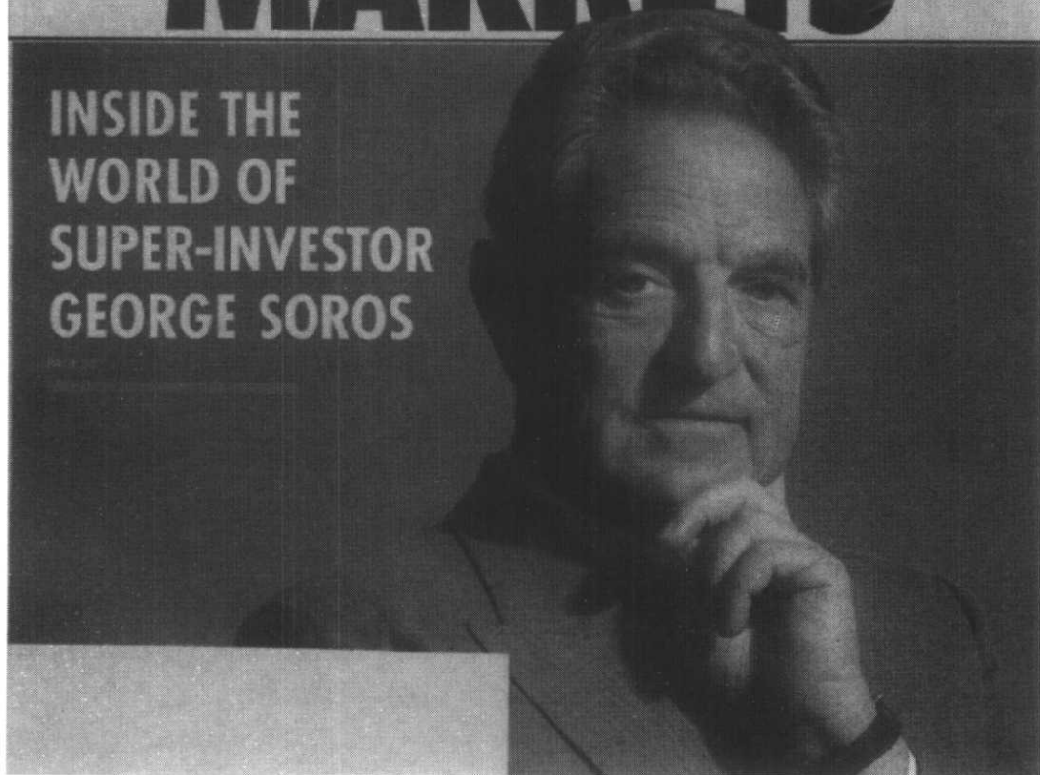
AUGUST 23, 1993

A MCGRAW-HILL PUBLICATION

\$2.75

THE MAN WHO MOVES MARKETS

INSIDE THE
WORLD OF
SUPER-INVESTOR
GEORGE SOROS



1993年，乔治·索罗斯成为《商业周刊》8月号的封面人物。上方的黑体英文意为：这是一个能改变市场的人



乔治和妻子苏珊在家中

目 录

上 篇

二十世纪金融神话的创造者乔治·索罗斯

第 一 章	大众眼中的肖像	(3)
第 二 章	三重身份	(8)
	(一) 匈牙利人	(9)
	(二) 犹太人	(18)
	(三) 美国人	(32)
第 三 章	哲学情结和哲学梦	(50)
第 四 章	成功的金融投资理论家	(75)
	(一) “反射论”	(76)
	(二) 大起大落	(92)
第 五 章	狙击全世界	(110)
	(一) 进攻英国	(111)
	(二) “广场饭店秘密会议”战役	(139)
	(三) 旁观者的胜利	(151)
	(四) 东南亚金融风暴	(166)

第 六 章	世界上最成功的基金	(197)
第 七 章	并肩作战的人们	(209)
第 八 章	花掉该花的钱	(230)
第 九 章	财富的递增	(267)
附 录	乔治·索罗斯年表	(276)

下 篇

乔治·索罗斯的三十条秘密商规

秘密商规之一

正确认识世界是不可能的	(283)
-------------------	-------

秘密商规之二

市场价格总是错误的	(287)
-----------------	-------

秘密商规之三

高效市场并不存在	(290)
----------------	-------

秘密商规之四

期望决定市场	(294)
--------------	-------

秘密商规之五

超前掌握趋势	(298)
--------------	-------

秘密商规之六

寻找市场感觉	(303)
--------------	-------

秘密商规之七

不在交易中掺杂感情	(307)
-----------------	-------

秘密商规之八

重视人们的态度..... (310)

秘密商规之九

混乱是取胜的福音..... (312)

秘密商规之十

在市场的转折处取得成功..... (317)

秘密商规之十一

宏观投资..... (320)

秘密商规之十二

不采用科学的量化方法..... (323)

秘密商规之十三

四两拨千斤..... (324)

秘密商规之十四

没有特定的投资作风..... (327)

秘密商规之十五

双面下注的秘密..... (329)

秘密商规之十六

工作量和成功恰好成反比..... (338)

秘密商规之十七

技巧是置身于整个过程之外..... (340)

秘密商规之十八

看到整个森林..... (342)

秘密商规之十九

重要的并不在于你对或错..... (348)

秘密商规之二十

学会死里逃生..... (354)

秘密商规之二十一

觉察自己的错误是一件自豪的事..... (359)

秘密商规之二十二

痛苦也是财富..... (363)

秘密商规之二十三

最重要的是人品..... (370)

秘密商规之二十四

利润比资金规模更重要..... (374)

秘密商规之二十五

最好和最坏的股票都能赢利..... (376)

秘密商规之二十六

必须严密注意某一部分股票的价格..... (378)

秘密商规之二十七

永远要留有余地..... (383)

秘密商规之二十八

低调总有好处..... (386)

秘密商规之二十九

不要忘记同大众唱反调..... (392)

秘密商规之三十

需要闲暇时间..... (398)

上 篇

二十世纪金融神话的创造者 乔治·索罗斯

“在同一时期内，没有谁取得过如此辉煌的成就。彼得·林奇没有，华伦·E. 巴菲特也没有。”

——美国《商业周刊》

第一章

大众眼中的肖像

我决不会在乎别人怎样看我，我就是我。我就是这个人。

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别人把我看成是一个自私的人，或懦弱者。尽管我这人显得有些生硬，常常表现出沉默，尤其是面对浮嚣复杂的尘世生活的时候。但我敢断定，我内心的有些秘密是别人不可能从外表上看出来的。

——乔治·索罗斯

“他是一个非常可爱、漂亮的小男孩。”

——耶胡迪蒂·西蒙（乔治·索罗斯小时候的伙伴）

“我们所说的这个儿童体格瘦削，性情温顺，他经常咬着自己的指头，既害羞又欢喜地幻想他会成为参孙，成为史泰龙，或者成为没有浓厚重音的施瓦辛格。这位少年很少离开他的家乡，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外出旅行，他希望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或者成为一名宇航员。”

——米克拉斯·霍恩（布达佩斯学校经济学教师）

“他是一名非常谦虚的学生。我写的那本关于开放社会的书，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经常来找我，向我陈述他的思想。我不是他正式的指导教师。如果他今天把我叫做他的良师益友，那是出自他的善意。”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一个眉头紧锁、下巴轮廓分明、嘴唇小而薄的热情、宽厚的人。他的头发前面翘起，他的口音有些单调，并且刺耳。”

——凯瑟琳·费希尔（伦敦经济学院学生）

“他是一个体格瘦弱，举止优雅的人，具有一种令人难忘的彬彬有礼和奥地利——匈牙利小酒店中那种常有的有节制的反讽倾向。在早些时候，人们很容易想像出他在维也纳最古老的咖啡馆中与俄国的托洛茨基分子一起喝着啤酒下国际象棋的情景。”

——英国《观察家报》

“他没有 80 年代那部经典影片《华尔街》中那位非正派主角戈登·杰科那么给人印象深刻，他看上去仿佛比他实际年龄年轻 10 岁。这也许是由于他热衷于网球运动，并且不喜欢纽约的富人们所通常过的那种奢侈生活的缘故。他既不嗜酒，也不抽烟，饮食简朴。他走在路上，给人的感觉很像一位神情严肃，且相当不修边幅的中世纪欧洲教授。”

——英国《独立报》

“尽管个头不大，但索罗斯看上去仍给人一种结实、

充满活力的感觉。他蓄着一头弯曲的短发，戴一副金属边框的眼镜。有人认为他看上去像一位经济学教授，或一名滑雪教练。尽管留有一种几乎不易觉察的匈牙利地方口音，但他仍算得上是一口漂亮的英语。”

——法国《费加罗日报》

“人们莫名其妙地认为他是一个粗野的人。他们惊奇于他看上去与绝大多数人都不一样。他无拘无束的风格和节奏分明的匈牙利口音使他颇具一种欧洲贵族的派头。他皱纹密布的前额说明他花了不少的时间来思考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同时也给人一种充满自信的学者的印象。”

——美国《商业周刊》

“相比之下，索罗斯却是个性格坚强的人。他性情冷峻，从不轻易流露感情。只有当一笔资金投下后，他才会感到满足。当投资的决定没做出时，他不会回到他最近的住处，或跑到摩天大楼去瞎逛。他具有一种冷静的、不动声色的性格。他很少笑，但也不显得乖僻。”

——奥托·德尔弗斯（纽约证券交易所同行）

“你会发现他是一个聪明的人，有能力，思想清晰，并且非常自信。你不会感觉到他是非常特殊的人。他常表现出一点羞涩。你无法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是一个优秀的心理学家，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因为他羞涩，所以他采取一种低姿态。他坚信别人不大可能弄清楚他的人品究竟如何。为了制造惊人的效果，他常常说些矛盾百出的话语，善于动用下意识的力量。有时，爱对自己自言自语。总的说来，他不是一个可爱的人。”

——埃德加·阿斯泰尔（金融投资合伙人）

“我认为索罗斯是这样一个人，半虚半实。人们必须对一些富有生机的东西表示出他们的不安、憎恶和嫉妒。他们这样认为，有人在操纵市场。他们认为供求关系不可能导致如此后果。市场自己不会在事件发生之前采取预防措施。他们想确定，这里面有一个索罗斯。”

——詹姆斯·格兰特（纽约《格兰特利率观察家》编辑）

.....

第二章

三重身份

我接受我的所作所为——包括我的投资事业和慈善事业，并将作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说，我的一生是一个漫长的努力，是一种整合我所有层面的艰难过程。

——乔治·索罗斯

（一）匈牙利人

1930年，乔治出生在布达佩斯。不管何时出版的传记资料，也不管是由索罗斯管辖的机构出版的印刷品，还是由索罗斯自己写的书中，都没有提到他出生的日子和月份。仅仅说明了他生于何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这还不甚清楚。

他出生时取的匈牙利名是德慈切达斯·索罗拉什。后来，他的名字由英语化为乔治·索罗斯。这名字在匈牙利语中被拼为索罗拉什，他的美国和英国的熟悉人很喜欢把后面的名字拼成索罗斯。

他只有一个同胞兄弟，名叫保罗，比他大两岁。

这是一个四口之家，父亲、母亲、哥哥和乔治·索罗斯自己。尽管这个家庭不大，生活的苦难与欢乐照样光顾。

父亲，特维达·索罗斯对他儿子都非常严厉。他是一名律师，在乔治出生以前，他生活坎坷，并且有一段非凡的经历。作为一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奥匈战俘，特维达在俄国度过了三年艰难的岁月——从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到1920年的国内战争。内战期间，他为了求生跑到了西伯利亚。他下定决心，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

必须要生存下来。结果，他做到了，尽管经历了无数磨难。但是特维达在战争中显示出来的一些受人赞美的性格特征，在和平时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大约到了 30 年代，在罗帕岛居民的心目中，特维达已不再是个英雄。他的形象暗淡了下来——黑头发、黑眼睛，他曾经是个漂亮的男人，体格健壮，酷爱运动。此外，他还以喜欢消费奢侈和对艰苦工作缺乏热情而著名。索罗斯后来回忆说“我父亲不工作，他只知道赚钱。”

乔治的母亲有一张小脸，容貌憔悴，长着一头浅发。伊丽莎白是个传统的家庭妇女，悉心照料着两个儿子，料理着这个与其说是犹太人，还不如说是匈牙利人的家庭。

如果说特维达教给了乔治求生的艺术，那么母亲伊丽莎白则培养了乔治一种欣赏文化和艺术的能力。乔治很迷恋他母亲。由于绘画、雕刻、音乐和文学都是构成伊丽莎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她也同样试图培养她儿子对这些艺术的热爱。乔治本人更偏重于绘画，对音乐的兴趣相对要淡些。他后来对哲学的兴趣似乎主要是来自于伊丽莎白·索罗斯夫人对这一学科的爱好的。尽管全家人都说匈牙利语，但乔治最终还是学会了德语、英语和法语。

关于自己的父母，乔治·索罗斯后来做过这样的回忆：“我很爱他们，但他们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点紧张。我把他们的人格和他们之间的张力都内化成为我的性格的一部分，而且这种张力是我

生命中一股很重要的动力。我常把内心里的第二种人像演戏一样演出来，这样往往帮助我去发现别人不同的观点。”

“父亲教我应世之道，但母亲却教我如何内省。对于父亲各方面的做法，我几乎都同意，惟一例外的是他对待母亲的方式。我用父亲的观点处世，但我的天性和母亲比较接近。我父亲很外向，爱交际，而且对他的命运有一种由衷的关注。他喜欢逗别人自我剖白，但他却不喜欢以内心的感觉示人。也许他并不愿意面对自己内心感觉，所以他才对别人感兴趣。”

“父亲喜欢点到为止，母亲却总往深处钻研。她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几乎到了自我鞭挞的地步。她有宗教和神秘经验方面的倾向，而我没有；她对存在的奥秘感兴趣，这一点我倒和她很相像。母亲深爱着父亲，所以全盘接受父亲对所有事情的判断，即使这些判断违背她的性格，她也同样接受，结果造成她内心的一些冲突。当时在匈牙利社会，反犹太人运动盛行，她为此深感难过；二次大战初期，她患了胃溃疡，也为没有自己的研究事业而觉得自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怜是她最大的敌人。由于我承继了她的人格，所以必须努力压抑这种自怜自艾的倾向。1982年有一段时间我的内心波涛汹涌，这使我联想到了我父母间的性格冲突，也解决了从母亲那里承袭到的一些苦闷；我把这些苦闷在阳光下摊开来，这些苦闷马上就烟消云散了。”

“我母亲注重亲密关系，这一点我和她很相似。我父亲则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我把他视为偶像。我知道这可能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但即使现在到了这把年纪，我仍然觉得父亲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小时候，他花很多时间陪我，常在放学时他来接我，然后带我一道去游泳。游完泳，他就会讲一点他的过去，我会一点一滴记在心头，他的人生经验也成了我人生经验的一部分。”

哥哥保罗显然在乔治生活里占据着并不十分重要的位置，而且乔治对自己的这位兄长在一段时间里印象并不是很好，他这样说过：“我哥哥是第一个让我了解什么是不公平的人。他比我年长四岁，常打我，嘲笑我，但父母并不特别护着我，我曾向父母数落大哥的种种不对，但结果总是不了了之。后来在我 24 岁那年和哥哥再度来往，感情从此变得很好。”

索罗斯同时认为，哥哥保罗是家里真正有才华的人。

“他 30 岁那年就在他的住家地下室开设一家工程公司，研究改良港口处理散装货物的技术问题，而且只花了 15 年时间就建立了世界首屈一指的企业。他得过不少工程创意奖，全世界 1/3 处理散装货物的设备都是他设计的。60 年代末期，集团公司有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我趁机把他的公司卖给奥格登公司。当时的谈判过程还蛮有趣的，我得到的价钱是他那家公司价值的一倍，原因是奥格登公司打算把保罗留在公司做活招牌，宣传他的天才，以便拉高奥格登的股价。但正如圣经上说的一样，

我为哥哥争取到的只是两盘豆子。因为他们用股票付款，而我和该公司谈判股价下挫保障时，也只能争取到股票市场一半的保障，但结果奥格登的股价竟然下跌了 3/4。最后我哥哥把公司买回来，公司就恢复了原有的独立经营地位。最近他又把公司转手，现在我们很多方面都有合作。”

索罗斯成长在 30 年代布达佩斯的中上层社会环境中，在行为举止上与同龄的孩子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他是个在其他方面表现很正常的儿童，有许多朋友，热爱体育运动。然而从小索罗斯就有一个心灵的秘密，或与众不同的特质，这就是他相信自己就是上帝。

由于索罗斯把他童年的幻想当作一个秘密，所以，他童年的伙伴没有谁记得他说过他是上帝，这也不令人感到奇怪。他们回忆说，他非常乐意去主宰别的孩子，在同伴中称王称霸。索罗斯的大多数同事都相信，当他说他认为自己是上帝时，肯定是在故意夸张，此乃他表明自己高人一等的方式。似乎他们都在为索罗斯的夸张说法辩解，他们想说明，索罗斯的幻想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回事。

有人说，乔治·索罗斯的意思并不是说他是上帝，只是他相信他能够和上帝交谈！另外还有人认为索罗斯只不过是在表示他有一种全能感：说他是上帝不外是一种把他与拿破仑相比较的带有挖苦意味的表达方式。

然而，还是索罗斯道破过自己心中的这些秘密。

他在他后来的一本书中写道：“如果真理被人们所知，从我的童年起，我心中就存在相当多的救世幻想。这些幻想，我认为必须去加以控制。另外，我觉得它们会把我引入某种困境。”

索罗斯在1987年出的一本名为《金融炼金术》的书中也有一段话，他描述说他的少年时代是多么痛苦，因为他心中怀有这些信念，这是一种不愿与人分享的无法承受的秘密。“当我承认我一直都抱有一种关于我自己极端重要的想法时，但愿读者不要感到吃惊。直率地说，我曾经幻想自己是上帝，或一个像凯恩斯那样的经济改革家，甚至更有甚者，幻想自己是一个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我的现实感非常强，以致使我意识到这些期望的确有些过分。所以，我把它们作为一种有罪的秘密隐藏在我的心中，这是一直都贯穿在我的成年生活中的巨大不幸的原因之一。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取得了成功，实现了我幻想中的现实和承认我内心的秘密，至少我对自己承认。不用说，我对我生活的结果感到非常满足。”

不论乔治·索罗斯的这些思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抑或有人说是从他的父母，或是他生活的环境。这些思想都带有惊世骇俗的成分。但是除了在几篇简短的文献中，索罗斯还不曾在公开场合说明过，他为什么相信他是上帝，以及他在作这种解释时他的意思究竟是什么。也许，如果颇费口舌，他兴许会说服人相信他只不过是在编故事，毕竟，他自己都不相信他是上帝。他甚至到处

都以一种开玩笑的口吻来谈论他童年时的感受。一名新闻记者曾经有一次对索罗斯说，他应该被选为教皇。

他说：“为什么？我现在是教皇的老板。”

教皇的老板已经和上帝差不了多少。

他控制这些幻想，尽可能少地谈论它们。在一次很少有的场合，他又谈到过它们。1993年6月3日，他告诉英国《独立日报》的记者说：“当你认为你自己是某种类似神的东西的时候，这肯定是某种病态。但自从我开始以它为生之后，我却对这种状态感到非常满足。”

在童年时代尽管他努力把自己与一般人区别开来，但根据乔治·索罗斯童年时代朋友的回忆，他们并没有把他看作是一个超乎寻常的孩子。他也许一直把自己看作是神，但在他的朋友中，并没有谁认为他具有任何特殊的品质，即使在一般的领域也是如此。根据各方面的资料，说明他并不是天才，只不过他比较聪明，并且常常表现出一种主动和进取的精神。

在这个时期乔治对所有的游戏都感兴趣。尤其对一种被称为“资本”（匈牙利人叫“垄断”）的游戏十分入迷。从7岁起，他就和其他孩子一起玩它。在这些孩子中，他是玩得最好的。其中，利特文玩得最差。在乔治的童年朋友看来，以后的事实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乔治后来成了金融投资的大师，而利特文则成了一名历史学家。

乔治每次都能在“资本”游戏中取胜，也给他带来

了烦恼。为了让这一游戏变得更为有趣，他给这一游戏引入了新的规则。其中有一条就是通过增加一种股票交易，让这游戏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当索罗斯 60 年代返回匈牙利时，这位业绩辉煌的金融投资家找到了费伦斯·内格尔。内格尔问他以什么为生。索罗斯笑着回答他：“你还记得我们孩提时玩的那种‘资本’游戏吗？好了，我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除此而外，索罗斯还喜爱体育运动，尤其是游戏、帆船和网球。在当地，每 40 户人就有两个网球场，这是一种相当奢侈的条件。他不喜欢足球，认为它是一项中上层阶级的运动。

在布达佩斯，当时人们要求 14 岁以下的孩子都得呆在学校里。

在乔治就读的学校，所有年级都被分成两个班，犹太孩子在一个班，非犹太孩子在另一个班。当时学校里一名经济学教师米克拉斯·霍恩对犹太孩子与非犹太孩子经常发生的摩擦和冲突仍记忆犹新。由于这些冲突并不是起因于那种非闪米特族人的感情，所以，霍恩回忆说，它与闪米特族孩子没有关系，这种冲突主要发生在犹太和非犹太孩子之间。霍恩说：“私下里，你也许会感觉到那种非闪米特主义的存在。实际上，这种冲突又具有一种政治意味。”

在中学阶段，乔治做事经常出格。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和米克拉斯·霍恩没有成为最要好的朋友。霍恩认

为“乔治是个非常粗犷、做事不拘小节的家伙，而我却是一个务实而沉静的人。他喜欢和其他孩子寻衅闹事。事实上，他学过拳击和擒拿。”

尽管年轻的乔治经常介入这些冲突，但他这种在校院里的暴力行为并不是针对非闪米特主义者而发起的。事实上，米克拉斯·霍恩说，他不在乎让自己与哪一班的人打得火热，以便与犹太和非犹太孩子保持一种良好关系。

尽管成年后的索罗斯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它实际上还是一个大器晚成者。他的同学回忆说，他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他们回忆不起他实际上究竟喜欢哪门学科。按照米克拉斯·霍恩的说法：“乔治当时并不是一个前程远大的学生。他在各方面都不上不下，处于一种中等水平。只是他是一个很能谈的人。”

当1939年9月开始时，乔治·索罗斯才9岁。这时候，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犹太人

只有在非常时刻或非常时期，人身上的某些特殊性质才会完全显露出来。譬如说乔治·索罗斯，在二次世界大战时，他除了是一个遭受战乱之苦的东欧国家的公民，还是一个犹太人，这注定了他要比别的人遭遇更多的苦难。

实际上，在战争的初期他的生活几乎没有发生多大改变，因为纳粹当时没有入侵匈牙利。布达佩斯居民的生活仍然显得很正常。由于战争不断向前推进，德国入侵匈牙利的危险也就与日俱增；又由于空袭的威胁，烧煤短缺，学校被迫关闭了。

在这之前，盟国军队已占领了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盟国的战斗机已可飞抵布达佩斯。就在这座城市似乎暂时没有受到袭击的威胁之时，欧洲其他地方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对于那些居住在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来说，恶梦也似乎正在进行。

大约到了 1944 年春天，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团体，绝大多数已被纳粹铲除。人们的恐惧在日益增长。人们担心匈牙利的一百万犹太人（这是东欧最大的犹太人居住区）就是下一个目标。到处都在传说纳粹在奥斯威辛的

种族灭绝行为。

在特维达·索罗斯看来，那些令人惊恐的报道肯定是真实的。自从希特勒十年前在德国获取政权以来，他一直都在关注着纳粹的动向，注意到是他们猖獗的、有意识的残暴引发了这场战争，所以，他担心这种残暴最终也会波及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和他的家庭。

由于在一战期间已经从一种暴政的形式下生存了下来，所以，特维达发誓要帮助他的家庭渡过难关，因为他在战争初期卖掉了部分房产，所以他几乎没有经济上的担忧。他表现是非常自信；他冷静沉着的表情让乔治、保罗和伊丽莎白感到欣慰。

对于居住在布达佩斯的居民来说，二次世界大战是1944年3月19日这一天才正式到来的。这一天是星期天。在布达佩斯附近的战事正在朝南部逼近，德国坦克正在沿着多瑙河的布达和佩斯两岸前进。纳粹的侵犯仍在继续。这是一次“和平”的入侵：没有枪炮声，只有坦克履带和摩托的轰鸣声。大街上空无一人，大家都在家中寻找藏身之所，直到自认为安全为止。人们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抓起话筒给别处的亲戚朋友打电话。

当时，布达佩斯的犹太人社团划分成了两派：梦想家和现实主义者。梦想家痴迷于他们的幻觉。3月19日以前，他们就坚信最终希特勒的军队绝不会开到布达佩斯。这些梦想家也坚持认为，即使纳粹的坦克已经开到了这座城市的街道上，情况对犹太人也许不会很糟，因

为有关欧洲别处的犹太人被灭绝的报道也许有可能失真，还有……不管怎么说，战争毕竟不久就会结束。现实主义者同样也相信战争不久就会结束，但他们确实坚信纳粹在奥斯威辛和其他地方的大屠杀是真的，只是他们弄不清楚，战争是否会马上结束，以使他们能从相似的屠杀中获得拯救。

结果证明现实主义者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德国人占领匈牙利后，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布达佩斯有40万犹太人被杀。

在这些恐怖的日子里，特维达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一种无形的死亡判决随时都悬在布达佩斯犹太人的头上——这是一种也可能降临到年轻的索罗斯身上的死亡判决，如果纳粹发现他也是犹太人的话。一场通向集中营的恶梦突然之间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现实。

在这种非常时期，特维达为乔治的工作做了特别安排。为了保证他儿子不被纳粹分子抓获，特维达贿赂了一名匈牙利官员，让他儿子假装成一个非犹太教的基督徒，充当一名公务员在匈牙利农业部任职。特维达为这个孩子弄到了一张伪造的身份证，乔治·索罗斯改名为贾纳斯·基斯。这张身份证对他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

为了以防万一，特维达在自己的家中开辟了一个避难所，这是一个四周被坚固的石壁围成的地下室。

它的入口在一排蜿蜒狭窄的石阶之下。在地下室中，另外还有一处藏身之所，它甚至拥有更大的空间，在一

扇上了锁的门那边。当有人来搜查屋子的时候，他们家常使用第二个内部的藏身之所。

这一年是一段担惊受怕的日子，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危险。

有一次，特维达和乔治两人都藏在同一个地方，两人都持有伪造的非犹太人身份证。他们相互说话，但不是作为父子，以便不暴露他们真实的身份。

另外还有一次，当索罗斯一家呆在地下室时，乔治·索罗斯和特维达是用玩游戏的方式来打发时光的，奖品是一块冰糖。当乔治或保罗赢得一场比赛时，他便吃下他的奖品。

在整个战争期间，乔治和他的家人前后躲进过 11 个藏身之所。他们经常在朋友的房顶阁楼或地下室一呆就是好几个星期，根本不知道他们何时会突然搬出这些地方。但是，尽管 14 岁的乔治在这段时间感受到了恐怖，但他绝不同意这一说法。

后来，索罗斯回忆起这段难忘的时光，他说：“德军在 1944 年 3 月占领匈牙利，那时我还未满十四岁。德军占领是我父亲最得意的时期之一，原因是他懂得应付局面，他对当时形势很了解，他晓得在德军占领期间，平常的规矩已经破坏，以当时的情形而论，守法已经成了一种危险的陋习。要生存，就得违法。他经历过俄国革命，因此懂得如何应付，他设法为全家弄来伪造的身份证明文件，也找到让我们生活和藏身的地点。他不但照

顾家人，也帮了不少他周围的人。事实上，他的确救了好几十人的性命。德军占领期间是他律师生涯中最忙的时期，有一段时期，我们居住在一间很特别的房子里，进出都得先经过洗手间，当时常有人在洗手间排队请他帮忙。”

那段时期可说是相当惊险刺激，现在谈起来记忆犹新，因为它已经深刻地钻刻在我的记忆中，只是我很少提起它而已。最诡秘但也最重要的一点是，1944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间。这说法有点奇怪，也让很多人不敢苟同。原因是1944年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一年。当时我只有十四岁，我有一个我敬爱的父亲，他事事胸有成竹，不但知道应该如何行事，也帮助别人。当时的局势很危险，但我却深信自己可以幸免。一个14岁的孩子总以为自己是刀枪不入的。对一个只有14岁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得上当时的局面更紧张刺激。此事对我的成长颇有影响，我从一位大师身上学会求生之道。这一点与我的投资事业也有些关联。”

乔治认为1944年的整个战争经历非常具有刺激性，后来，他把这段经历描绘成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感觉他像那位电影中的英雄伊迪拉·琼斯，他藐视危险，能够战胜其他人所难以承受的那种恐惧。由于特维达在左邻右舍很有影响，乔治很为他父亲感到骄傲，并且受到特维达自信心的感染，他也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地道的英雄。

也许是 14 岁的孩子还不能真正领会到人类的苦难，或许是战争真的没对他造成什么伤害。乔治·索罗斯对自己犹太民族所遭受的浩劫看得很淡。不知这是不是后来索罗斯一直很冷淡地对待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的原因，而在年轻的时候，他甚至认为自己与犹太教无关。

有人作过这样的评价：“乔治·索罗斯和他的父亲及其自身经历都没有使他与犹太教靠得稍近一些，甚至二战时期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个背景极其明显的事件对他的宗教情感也没有持久的影响。1944 年躲避纳粹的生活是一个极其冒险的经历，他学到了许多生存技巧，但并没有染上多少犹太人的色彩。”

“在他成长过程中，这个身份主导着他。他是犹太人，这意味着他必须逃走、躲藏。他到美国后，被归到犹太人这一类，乔治不想归入任何一类。他想让社会承认他自己这个人，靠他的才智和成就。……”

犹太教对索罗斯来说是一个负担。它并没有给他带来特殊优势，作为一个匈牙利裔犹太人只有“危险和侮辱”强加在他头上。因此，战后他逐渐丢弃了他的宗教。他的任何才识和智慧都与犹太教无关。

索罗斯自己也作过这样的叙述：

“我 1947 年前往英国，1956 年又去了美国。但我从

来就没有变成一个彻底的美国人。我已抛弃了匈牙利，我身上的犹太特征并没有以种族忠诚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没有使我去支持以色列。相反，我对处于少数民族中感到自豪，我是一个能看到其他观点的局外人。我能思考到要害之处并置身于一特定观点上看问题，只有这点能弥补我作为一个匈牙利裔犹太人给我带来的危险和侮辱。”

在索罗斯看来，犹太人对于像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屠杀这种灾难有两种逃避方式：一是超越个人问题，把它视作一种全球问题；另一则是认同于迫害他们的人成为他们的一分子。索罗斯选择了第一个逃避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一个全球全人类的问题，不必过多强调种族的色彩。他说：“我的兴趣在于全球人类的状况。我自觉身为犹太人，除非我成为它的市民，否则我无权反对以色列国。我深信，如果我成为它的市民，我会和许多以色列人一样，对他们的国家也会有所不满。事情就是这样，我自动弃权，也算是逃避现实吧。”他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我并不反对民族情绪，只是不赞成民族主义论调中的‘无论对错，它都是你的国家’这个观点。顺便提一下，这种态度是海外犹太人较会有的特色。海外犹太人在爱尔兰、希腊、波罗的海国家制造了许多不幸，遑论以色列。我个人认为民族情绪或种族认同在开放社会是弥足珍贵之物，也是社会多元化的景象。”

了解这些背景过后，也许我们才能真正搞清楚后来

索罗斯在开展自己的慈善活动时的态度。在 1986 年以前，他没有向以色列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直到那一年，在他认识以色列国际关系评论家丹尼尔·多龙之后，他才向多龙的耶路撒冷评论家协会资助了一笔数目不大的资金。此后，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戈·欧弗曾试着希望索罗斯能在耶路撒冷建立一基金会，专门援助当时涌入以色列的 5 万名前苏联犹太人。他的建议遭到了索罗斯的坚决拒绝。不久，索罗斯终止了与欧弗的接触。

为什么索罗斯如此反对资助以色列？欧弗回忆说：“因为他认为以色列如果不首先从自身进行改革，任何外来力量都拯救不了它。在他内心，他对犹太复国主义深恶痛绝，他认为犹太人应该在他们所在的地区安分守己。”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索罗斯经历了太多的纳粹苦难，他难以对民族主义产生好感。因为他自己说过：“它只能引起混乱、毁灭和沙文主义，还有战争。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如果我们能拥有民族主义积极的方面而摒弃其消极的影响和引起的政治和社会破坏性因素，那是正确的。但这是不可能的。”

1992 年 10 月初拜访过索罗斯的以色列企业家本尼·兰达也有这种印象。他和索罗斯谈论时，兰达想了解是什么使乔治否认自己犹太的根。听完乔治讲自己的战争经历，兰达似乎找到了答案。他注意到索罗斯总是把他在二战中的经历描绘为很刺激的游戏。但实际上他一

定经历过难以想象的巨大的恐惧，仅因为他是犹太人。他由此认为，在索罗斯看来，其犹太人身份是一个负担，而不是什么令人高兴的事。乔治承认只有在 80 年代初期，他才对当众说自己是犹太人感到舒服些。在此之前，他总是避而不谈这个话题。索罗斯说：“可能是生意上的成功使我最终有信心承认我的犹太人身份。”

而在 50 多岁以前，索罗斯对外界一直是不愿承认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的。

是什么引起乔治·索罗斯的犹太意识觉醒了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东欧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对犹太人身份的攻击，其次是他对犹太人身份的适应。他是商业领域巨大成功的象征，他有一种能抵挡任何攻击的感觉。他不必再担心犹太人身份会给自己带来危害。最后一个原因是，他目睹了东欧人民的苦难，尤其是 90 年代的波黑内战，这使他想起了本世纪前几十年自己的犹太同胞所经历的苦难。他援助重建萨拉热窝的供水和天然气管道线时，一名记者问他，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犹太人会同情一个伊斯兰国家呢？他很少对自己的犹太情结发表评论。这次他做了。他说：“如果你经历过一种大屠杀，而现在又目睹另一种，你也会有同感。我对发生在前南地区的大屠杀深表关切。”

与以色列企业家本尼·兰达的交往标志着乔治·索罗斯的巨大转变。兰达于 1977 年在特拉维夫附近创办了他的高科技公司，并很快发展成为世界上高品质数字化

彩印产品的先锋。索罗斯欣然同意对兰达的公司作五千万美元的投资。签字完毕握手时，索罗斯说：“你知道，我十分高兴这家公司在以色列。”兰达认为这意味着这笔生意暗藏着索罗斯的个人情结在内。兰达抓住这个机会邀请索罗斯到以色列看看，索罗斯欣然同意。

以后，索罗斯的朋友和同事开始注意到他对宗教的态度改变了，产生了新的兴趣。他开始请朋友和熟人为他提供一些书籍，包括《塔木德经》。他的一个朋友丹尼尔·多伦说：“他对犹太文明产生了兴趣。他突然明白自己不是从真空中蹦出来的。”他的转变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在布加勒斯特索罗斯基金会成立典礼上，索罗斯在众人面前站起身来大声说：“我是乔治·索罗斯，一个匈牙利裔犹太人。”观众对此大吃一惊。在罗马尼亚很少有人为公开声称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自豪。

多年来，索罗斯的犹太助手一直试图增加其对犹太国家的注意，但毫无效果。他们为索罗斯对犹太教的冷漠而感到苦恼，对他以身为犹太人为耻的做法而感到恼怒。但是他们都明白，无论他们怎样有说服力，不经过某种深刻的转变，他是不会进行这样的访问的。

他一直坚持说他远离以色列是因为以色列虐待阿拉伯人。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以色列经济过于死板，对投资者不欢迎。索罗斯把他的慈善救助目标先是放在东欧后来是前苏联方面，他认为没必要再在民主的以色列寻找立足点。他认为以色列不需要再“开

放”。

1994年1月他对以色列的访问，这是他对以色列的第一次公开访问，也是他对犹太教产生的热情的最明显标志。

索罗斯此次访问受到了以色列大多数主要政治、经济官员的会见，从总理伊沙克·拉宾到以色列银行行长雅各布·弗兰克尔（索罗斯以前同弗兰克尔共过事）。拉宾告诉索罗斯说，以色列正采取步骤把一些政府资助的公司私有化，他欢迎索罗斯加入。索罗斯在以色列有两个小投资项目，他参观了这两个项目。一个是Geotek，生产特种移动式半导体和无绳通讯设备；另外一个就是Indigo，索罗斯拥有Indigo 17%的股权，1993年价值7千万美元，1994年翻了一番。

一天晚上，以色列为索罗斯在特拉维夫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赫兹利亚城阿卡迪亚饭店举行晚宴。以色列金融界的250名代表参加了宴会。索罗斯应邀在宴会开始时致词。

索罗斯讲了20分钟。索罗斯是一个出色的公共演说家，但这次即席演说，他声音颤抖了。兰达后来回忆索罗斯的那次讲话说：“他变得很不适应，他声音颤抖，结巴，语无伦次。”这或许是他第一次在众多听众面前公开讲述自己的犹太情结。如果他一生始终以身为犹太人而自豪的话，他的讲话可能就不是这样了。但索罗斯这次诚实地承认他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掩盖他的犹太身份。他

发觉在座诸位无一不为身为犹太人而自豪，而且大多数人在屠杀中都失去过朋友和亲人。他认为那时他的犹太自我仇恨和否定的故事一定难以令人信服或吸引人。

在这 20 分钟的讲话里，索罗斯重复了许多他一年半前对兰达说的话。他说少年时期他对朋友称他为异教徒而感到很刺激，他从来没有能够适应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他这么多年一直对以色列保持沉默，因为他认为既然他对犹太国家持否定观点。他最好保持沉默。他谈到由于现在以色列似乎开始抛弃她的沙文主义并采取步骤与其阿拉伯邻居和平共处，他觉得进行这次访问是适宜的。他谈到了他的慈善哲学。他解释说以色列一直是个伸手乞讨的国家，但是他认为以色列不应该这样，以色列也应是个投资者向往的地方，而不该是慈善家施舍的场所。虽然他不想把他的慈善事业扩展到以色列，但是他现在正考虑更多的项目。

虽然以色列公众对索罗斯的讲话反应并不积极，甚至还有不少人感到很难过。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杰出人物居然还曾经抛弃自己的民族。但对索罗斯而言，这样的坦诚同样是需要很大决心的。何况这是他回归后的第一次剖白，这表明一切与原来确实有很大不同。

对索罗斯来讲，现在的感觉已与过去不一样。他后来这样说：“我以身为犹太人为傲——虽说我必须承认是竭尽此生才做到的这点。犹太人并无自尊可言，这是所有同化主义犹太人的痛苦根源。这一沉重的包袱一直到

我自认为是名成功人物时，才能够放弃。我认同自己是少数民族中的犹太人，我也相信犹太人很有天赋这回事，只要看看犹太人在艺术、科学、经济方面的成就就不容置疑。这些都是犹太人试图超越他们少数民族地位所做的努力。”

“犹太人学会从许多不同观点去看待一个问题，即使再矛盾的问题也是如此。身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他们得被迫从事批评性的思考。如果说我也拥有一分犹太天赋，充其量也就是这种批评思考能力。就这点而言，犹太血统成了我个性的基本元素，所以我对此深以为傲。

“我还知道，我的思想中同时也存在犹太乌托邦主义。我的基金会使我成为这项传统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何欧洲共同体的观念让我如此振奋的原因。在那里，所有的国家都成为少数民族，而这也是欧洲共同体观念如此迷人之处。”

现在，还是再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5年秋天，乔治·索罗斯重返学校。由于战争已经结束，犹太和非犹太孩子没有再被分成两个班。乔治当时15岁，像别的学生一样，他经历过纳粹留下的内心的创伤，其心灵的成熟也远远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直到目前为止，这种创伤仍然在这些学生的多数人心中留

下了沉重的阴影。

1945 年春天，这是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次，罗帕的居民，包括乔治和他家人一起到一座岛屿郊游。他们相互谈论战争时期的故事，回忆起他们是如何死里逃生。他们谈到了不久将来的计划，他们认为这些计划对于战后的匈牙利来说肯定是要去面对的。

这时候，乔治·索罗斯已经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他是否应该离开这个国家？

（三）美国人

1961年，乔治·索罗斯成为一个美国公民。而在14年前离开匈牙利时，他却没有直接来美国，而是去了英国。

二战结束后，索罗斯家的一些朋友对匈牙利的未来满怀希望，他们坚信情况会愈来愈好。因为与纳粹相比，苏联人也许会给匈牙利人民提供更多的好处。另外一些人对此充满怀疑，表现出一种冷嘲热讽。他们打算收拾行李袋，一有可能就离开，因为当时申请护照仍然是可能的。

乔治·索罗斯属于后一种人。他认为这正是离开匈牙利的时候，直奔西方才是上策。

1947年，在他17岁时，他只身离开了匈牙利。

索罗斯这样讲过他离开匈牙利的经过：

“我们一家安然度过战争，俄国人接着就来了。虽然仍有些惊险刺激的事情发生，但生活已逐渐归于平淡了。在那个时期下，我觉得处处受限，也开始觉得父亲对我的影响力太大了。我对他说：‘要一个15岁人的想法像一个50岁的老头子，这不是很自然的的事。’

他问我：‘你为什么不自己打算打算呢？你喜欢到哪

一个国家?’”

我说：‘英国吧。’那时我们都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英国人的公平竞争观念和客观报导带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我说：‘也许也可以到苏联走一走，了解一下这个统治我们的新制度。’”

父亲说：‘我去过苏联，可以告诉你那边的情况。’”

“这就是我决定去英国的过程，但后来我才清楚去英国其实是父亲的决定，而不是我的决定。为此，更让我觉得父亲值得敬爱。他说他在英国有一位亲戚，也许此人可以帮忙我入学，于是我写信给这位亲戚，但一直都没有回音。后来父亲对我说：‘你何不每星期都寄一张明信片提醒他一下。’我照他的建议做，果然有了回音，还附了入学通知。接着我开始申请护照。当时申请护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每过一星期，等候发照的日期就往后延一个星期，似乎要无止境地等待。父亲说：‘你去投诉，要求他们让你见负责此事的官员。’我照着他的建议去做，结果却成了发照部门最不受欢迎的人之一。当时我哥哥 21 岁，比我大 4 岁，他有一位在政治警察单位做事的同学，遂请这位同学拿着我的申请书到有关部门办手续，但也处处碰壁。护照部门主管对他说：‘我签发护照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要给那个一天到晚投诉的讨厌鬼。’但最后我还是拿到了护照。”

离开匈牙利后，乔治的第一站是瑞士的伯尔尼，但不久之后他就动身去伦敦。对这个少年来说，这地方听

起来就非常具有吸引力。他应该感谢他父亲，因为正是由于他，乔治才有足够多的旅行费用。但有一次，他必须求助于其他人来解决他经济上的困境。他向他的一位叔叔要了一次钱，这位叔叔当时已经移民到了佛罗里达。在英国的初期，尽管英国有可能给他提供一种比较幸福的生活，但他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钱太少，并且在那儿几乎没有什么亲戚熟人，以致他无法享受到这个城市所能给予他的一切。这是他生活中最艰难困苦的一段时期。他感到孤独，精神憔悴。但即使在这段黑暗的岁月中，他也仍然企图去发现一线光明。这个 18 岁的小伙子所能做的一切不外就是不断去打零工。同时，期望着他的命运最终会发生改变。他在伦敦西区上流社会住宅区的奎杰里罗饭店当过侍者，这地方经常有艺术家和电影明星出入，晚上，他们在这里用餐、蹈舞。有时，当他的薪水用完时，他就靠吃剩汤残渣来维持生活。几年以后，他回忆说，他曾经忌妒过一只猫，因为它在吃沙丁鱼，而他却不能。

1948 年夏天，他干上了农场工作。由于索罗斯努力工作，他和其他雇员挣到了更多的钱。他在萨福克摘过苹果，另外，还做过油漆工。后来，他向朋友们自夸他是一个很不错的油漆工。

临时工、贫穷和孤独，这些东西没有给他带欢乐，在随后的几年中，噩运的恐怖感觉始终伴随着他。然而幸运不能老是抛弃一个人，人总有改变自己生活的时候。

伦敦经济学院是英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在欧洲，不管人们是想谋职，还是过一种学术生活，它都是一个从事学习和研究的理想之地。该学院吸引了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人们普遍认为在这儿能学到驾驭人生、闯荡世界的本领。所以刚经历了战争的人们纷纷朝这儿涌来。

1949年，乔治·索罗斯成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在这儿，他听了不少政治类的诸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课，而且选修了像约翰·米德这位曾荣获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学者的课程。尽管后来索罗斯说“我没有从这门课程中学到什么东西”，他还是感到十分满足。因为当时伦敦经济学院中存在着两位杰出人物，一位是鼓吹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一位是著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这两个人对索罗斯的思想形成影响甚大，在他以巨大的热情踏上知识分子的道路上产生过重要的作用。

在哈耶克和波普尔中，对索罗斯影响最大的是后者。波普尔在1951年出过一本名叫《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书。在书中，波普尔提出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可能的命运。一种是成为“封闭”的社会，第二种是“开放”的社会。在这种“开放”的社会中，它的人民摆脱了混乱的民族

和部落战争，冲突的信念必须得到宽容和接纳，开放不会造成社会极度的紧张和压力。波普尔认为，不管开放社会是如何地“不稳定和不安全”，它都要比“封闭”社会优越。

索罗斯来自东欧，刚摆脱战争和压抑的阴影，处在英国这种相对宽松的自由环境中，精神上产生了丰富的渴求。他迫切地想表达自己的内心，探究许多深奥的问题，波普尔의思想和书本与他的追求一拍即合。尽管索罗斯在进校的第二年就完成了课程学分，但他还是决定在伦敦经济学院再呆上一年，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想学到更多的东西，特别是从波普尔那里。他不断地思考，写成许多文章，并亲自登门请波普尔指教。在索罗斯看来，波普尔是他的良师益友。而且，在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哲学家面前，他觉得自己能很融洽地与之对话。

波普尔的思想丰富而迷人，其内涵博大庞杂。而对索罗斯影响最大的，却是这位大师对世界运作方式的严肃探讨。波普尔经常鼓励自己的学生不断去发掘和发展那些有助于解释世界的伟大哲学主题，对尘世生活不感兴趣，更不用说要帮助人建立某种实际生活方式。在波普尔看来，哲学是无论如何不可帮助人在现实世界中赚钱的。然而索罗斯的理解却相反。

乔治是一个先天的行动者和实践家。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虽然他对很多纯属于哲学范畴的抽象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然而他相信最终他会由抽象回到现实。他

会发展出好几种关于知识的理论，这种知识涉及到为什么有些人会以某些固定的模式来思考，通过这些理论，他又会生发许多新的关于金融市场运作方式的理论。在后来的生活中，索罗斯一直把波普尔教授作为他灵感的源泉，尤其在促进社会开放的慈善工作中。索罗斯在形成他那些将运用在华尔街赚大钱的理论方面，确实很少提及波普尔所做的贡献。他还是时时处处感到他在早年学习生活中受波普尔的影响，并因此而感激不已。而当索罗斯被波普尔迷住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学生并没有给这位教授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波普尔回忆说：“我听到了他说的那些东西，但我没有问他任何问题。我对他了解得不多。”

关于这方面情况，索罗斯自己也做过叙述，对于卡尔·波普尔，他说：“影响我的是他的著作和思想，而不是他这个人。在个人方面，我和他关系很浅，在伦敦经济学院他也不是我的正式老师。当时我只花了两年时间就念完三年的本科课程，但第三年仍必须注册留在学校，否则无法拿到学位。不过学校却允许我选择导师。我选了他，原因是他的哲学很吸引我。我是一个曾经经历纳粹迫害的人，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很有醍醐灌顶的功效。但波普尔在科学方法方面的见解对我的影响更深。我写了好几篇文章给他看，我到 he 家里拜访时，他都对我鼓励有加，不过我也只见过他二次。”

大概在 1962 年前后，我写了一篇名为《意识的负

担》的哲学论文，其中重点不外铺陈他的学说。我把论文寄给他，得到他热情的回应，引发了我去拜访他的想法。他约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会面，当时很多人在伦敦经济学院等着见他，这些人知道我和波普尔有约都很不高兴，原因是这些人是他的学生，他们都希望看到波普尔的亲临。而我却好像是一个插队的人，于是我跑出房门到电梯口等他。他一踏出电梯，我就上前自我介绍，他看了我一眼，接着就说：‘原来你不是美国人！’我回答说：‘不是。’他说：‘那真教人失望，让我告诉你原因。接到你的论文时，我觉得终于找到一个明白我的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学说的美国人了，也就是说，我以为已经把我的信息广为传播。但你已经历过那么多了，所以不能算数。我觉得失望’。”

不过波普尔对我还是很支持，还鼓励我继续努力。此后我偶尔也和他碰碰面。他年纪愈大，我们碰面的机会就愈多。在他去世前的十年中，我和他建立了很深的关系，但那时他的影响力已逐渐走下坡了。他去世前不久，我们在布拉格有一次相聚。那是1994年6月，他要到中欧大学讲演，此行他觉得甚为痛快，因此还打算在九月到布达佩斯主持开学典礼，但还未成行就与世长辞了。这就是我和他的交往情形，可见影响我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思想。其他若干思想家，如哈耶克和怀特海也影响了我。”

不管是人还是思想，波普尔对索罗斯的影响是很大

的。这方面很明显的印证就是，在1952年末和1953年初，索罗斯花尽心血研究了一些哲学问题，并把主要兴趣放在观念与现实相互脱节的地方。同时，他总认为他想到的那些问题肯定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智力发现：“我得出结论，几乎所有我们关于世界的观点都是漏洞百出和被扭曲了的。然后，我便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扭曲在形成事件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上。”

他开始着手写一本名为《意识的负担》的书。在书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开放和封闭社会的概念。由于他对他写的这些东西并不满意，所以，他把这部手稿搁置下来了。大约过了10年，他试图重新完成这部书稿，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努力，因为此时的索罗斯已经投身金融界。他“无法把以前写的东西头尾连贯起来”，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哲学抽象的魔力对他的影响是何等巨大。

不管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求学热情是如何高涨，吮吸诸如像波普尔这样的大师的思想乳汁是如何惬意，他还是陷入了一种困惑和尴尬的境地。生活拮据，没有经济来源，这使他的伦敦生活存在着暗淡的一面。

为了得到学业上的经济援助，索罗斯决定去找犹太监护人董事会，但董事会拒绝了他，解释说该组织只对拿薪水的雇员提供经济援助而不针对学生。后来，索罗

斯在铁路部门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并在上夜班时摔断了腿，急需用钱，他只好编造谎话称自己是个非法打工者，隐瞒了学生身份再次向董事会求援。结果该董事会同意给他一定资助，但不久又停发了。万般无奈之际，索罗斯只好又给董事会写了一封“怪可怜的信”，带有明显的乞怜性质，这封信很快取得了效果，他每周的补贴得到了恢复。但在他治腿伤花完这笔钱后，钱又停发了，使他感到无比愤懑。这段经历给他痛苦的回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以后从事慈善事业时对慈善对象的态度。

索罗斯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大学毕业后才找到的，是在布莱克浦城的一家公司当推销员。他这样叙述自己的经历：“我的第一份工作和金融完全无关。当时我受雇于一家精品生产商，职位是实习员。这家公司生产的是新颖廉价的饰物、纪念品和订做的珠宝等。那时我大学刚毕业，很难找工作，我又是一个毫无背景的外国人，这份工作是靠一位在该公司工作的同窗工读生介绍的。”

“我当时的职称是所谓业务实习员，但公司根本没有什么训练课程，到最后我还是一名推销员。后来我跳槽到一位客户所开的批发公司任职，向威尔斯海滨度假区的零售商推销商品。那是我事业谷底之一，工作也很辛苦，和我对自己的期许相距甚远。惟一的好处是我有一辆福特安丽格亚小轿车，当时这一型号的福特汽车是在

英国生产的福特轿车中最便宜的。老板交给我的第一个差事是向伦敦的烟草零售商推销商品，但事实上这些零售商已自行组成了几个批发集团，我根本无法打进他们的市场。另一方面，在伦敦也很难找到停车位，使我觉得处处受制，不得其门而入。我被分派到威尔斯的时候，心情比较轻松一些，也终于做成几件生意。但我始终觉得，十年寒窗的目的并不在此，我父母对我的期望也与此不符，于是我决定从头干起。我写信给伦敦各家证券银行总裁，这种做法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原因是从来没有人写信给陌生人毛遂自荐的。”

索罗斯对自己的工作并不很满意。他非常想进入金融界，于是他给伦敦的所有投资银行都寄去了一封信，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结果，一家叫家拉札德·弗雷斯的公司同意他去面试，并最终将他推荐给了辛格——弗里德兰德银行。索罗斯进入这家银行当了一名实习员。

尽管从事金融投资工作对乔治充满了吸引力，市场买卖双方的业务也能给他带来某种强烈刺激的快感，辛格——弗里德兰德银行的工作却未能使索罗斯完全满意。他这样做过叙述：“我老板要我做的工作很乏味，我的表现也很差。最要命的是他们没有纪录外币往来的机器，我要用手做复式入帐。他们有一个铝制的盘子，我的工作就是把每天的贷项表、借项表和核算表放在铝盘内。每天下班时，核算表上的贷项和借项应该完全抵销，但我却没有一天能办到。我的主管每天都要重新核对一

番，自然对我没有好感。”

之后，我在套利部受训，在柜台内上班。这个部门就在股票市场隔壁，经纪人就坐在股市内等候客人下单，我的老板则每天和约翰内斯堡、布鲁塞尔、巴黎和纽约等地联络。主要从事黄金股票买卖。我在那里的表现也不好。我被送回总公司。”

“之后，有一次我趁周末赴巴黎和我哥哥碰面，但为浓雾所困，直到星期二才回到办公室。进办公室时，所有的人看到我都好像视而不见。过了一会儿，有人通知我到总裁的办公室去，结果他把我申斥一顿，但我却趁机问问他我在公司的前途如何。他说，根据我的上司所打的报告，我的表现并不让人满意。他告诉我，如果我能够拉生意，我自然前途无量，但假如我只能希望他们给我一个适当的职位，大概得等上一辈子。原因是他们还没有想到有什么适合我的具体业务。他说，他们不介意我留在公司，原因是我的薪水不多，但事实上我在哪一个部门都是多余的。”

很显然，索罗斯在辛格——弗里德兰德银行已经有了一种“多余的人”的感觉。他又一次想到要改变环境，以寻找自己的理想和人生目标，而这种机会不久就出现了。

见过总裁后，他和一位从纽约来的实习员一同去吃午饭，此人名叫劳勃·梅尔，父亲是纽约一家小型经纪行的车主。索罗斯把和总裁谈话的情况告诉了梅尔。梅

尔问他是否有兴趣到纽约去，他可以请父亲在那边找人帮忙。索罗斯非常愿意。

1956年，乔治·索罗斯动身前往纽约。

纽约使索罗斯在匈牙利人、犹太人的身份之外又多了一重身份，这就是他成了一名美国人。

索罗斯一生的辉煌成就，都是在纽约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国际大都会的孕育和庇护下取得的。在这里，他从一个只有五千美元的外国移民，成为一个私人资产达数十亿美元的世界级大富豪；从一个银行实习生，成为一个享有“世界最伟大投资家”称号的金融权威。他在这里创立了属于他自己的世界上最成功的“量子基金会”，使每个投资者的回报率在短短十几年中超过了500倍！他在这里打垮过英镑，袭击过日元，呼风唤雨震荡世界。由他插手而导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至今还影响着从亚洲到拉美乃至欧洲的证券市场……。总而言之，纽约使索罗斯成为了一个伟人。他令人望而生畏，连许多国家首脑对他都不敢小视。他的眼光投向哪里，哪里就有可能燃起烽烟，至少也要使整个市场掠过一阵颤栗和恐惧。

现在需要介绍的，便是他来到纽约以后到他事业辉煌起步，个人声名鹊起之前的这一段时期。

到达美国后不久，索罗斯通过一个英国同事的关系找到了一份工作，即在 F·M·Mayer 成了一名金融代理人。尽管金融代理在 80 年代成了一种很火爆的金融投资形式，但在过去的 30 年中，它却一直显得很不景气。没有人愿意拿出大笔的资金去打赌，以期从那些公司管理者手中赚取数百万美元。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 80 年代。在平淡的 50 年代，像乔治·索罗斯这样的商人就开始在不同的市场买卖同一种股票，通过仔细的探索，以期利用微小的价差来积累资金。他后来说：“我当时只是一个交易员，绝对不是一个投资者。我买入和卖出都很快，并且要合乎公司的严格规定。后来欧洲股价大涨，最初是因为欧洲成立了欧洲共同市场前身的煤钢共同体，美国银行界和机构投资者开始对欧洲证券发生兴趣，他们认为欧洲将要进入一个所谓‘欧洲合众国’的大楼，并且即将拾级而上。”

这时，索罗斯已成为一名分析家，经常给美国一些金融机构就欧洲的股票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忠告。就像他们预料的，在华尔街几乎很少有人对欧洲的投资趋势感兴趣。50 年代，流行环球贸易的时代还远没有来临，那时，美国还远没有意识到，只要有钱，就可以赚到另一边的“英镑”。当时，欧洲只和欧洲人打交道，美国只与美国人交谈。这种地方主义对索罗斯极其有利。西欧经济正在从二战的毁灭性打击中缓慢回升这一事实帮了索罗斯的大忙。

这段时间索罗斯生活中发生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结婚了。新娘名叫安娜莉丝，德国出生。他们结婚于1961年，生有三个孩子。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三年，他们离异了。以后在1983年，索罗斯再婚，这次的新娘叫苏姗·韦伯，比他年轻25岁。之后在1985年，苏姗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格雷戈里。第二个儿子亚历山大是1987年出生的。

1959年，索罗斯去了沃特海姆公司，这段经历使他非常幸运。他熟悉欧洲，精通业务，担任公司的证券分析师兼交易员，这使他很快变成这方面的核心人物。

“当时我们得到的欧洲资讯都非常简单，我写了一些备忘文件，完全谈不上专业水平，假如现在拿来看，肯定会啼笑皆非。”他后来说，“当时资讯取得不易，因此我们许多结论都是根据有限的资料推想的。但当时我成了欧洲投资热中的巨擘，情形犹如一群瞎子找了一个独眼的人来做他们的国王一样。当时‘德瑞富斯基金’和J·P·摩根等机构都惟我马首是瞻，他们都希望得到资讯，因为他们的投资规模很大。当时我是一位核心人物，那是我个人事业的第一个重大突破。”

而事实上，索罗斯个人的第一次成功是在1960年，也是他第一次对外国金融市场的成功冲击。索罗斯知道德国保险公司阿莱慈正在以资产值的很高折扣抛售它的股份，并意识到这家公司的股票和房地产有价证券肯定会增值。他给别的公司写了一份建议，建议它们投资阿

莱慈公司。摩根担保公司和德赖弗斯基金会欣赏他的观点，于是大量收购阿莱慈公司的股票。阿莱慈的老板们并不高兴，他们写信给沃特海姆公司的索罗斯的上级主管。信的主要内容是说，你们的人得出的结论是错的。但事实上，他并没有错。阿莱慈股票的价值确实翻了三倍。于是，索罗斯名声鹊起。

当时，索罗斯已由沃特海姆公司转到阿恩哈德公司。他说：“他们给我的业务范围是开放的，我接受了，事实上他们也一直在找人。但我开始上班时，却几乎没什么业务，原因是欧洲证券业务已经被利益平等税打垮了。不过，向欧洲出售美国机构投资人急于脱手的欧洲股票，还是赚钱的。在这方面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小故事。我发现联盟保险的股票很有潜力，我的想法见诸文字后，该公司写信劝告德瑞富斯说，买他们的股票是一记错着。联盟保险公司指出，我的分析错误，而且误导别人，让他们的股票价格被高估了。德瑞富斯不理睬这封信，只是不断地买进，后来股价升一倍，甚至两倍。利益平等税推出后，德瑞富斯要脱手，摩根也要脱手。于是我直接找联盟保险公司谈，这一回联盟保险公司又写信告知德瑞富斯，现在出售联盟的股票也是一记错着，原因是联盟的营收将大幅增加，红利也将提高，而且该公司还有许多利多措施。”

1961年肯尼迪新政府上台，索罗斯又是连交好运。最重要的是，1961年12月18日，他成了美国的合法公

民，这意味着他可以永远呆在美国。

这段时间，他仍然徘徊在是做哲学家，还是当投资家的犹豫之中。由于肯尼迪新政府颁布了《股票调节法》，使证券市场一度清淡，给了更多的时间让他思考。

从1961年开始，索罗斯花了许多夜晚和周末的时间来重写他那本《意识的负担》，想精心润色这部手稿，以便能找到一位出版商出版。但这次的感觉比他第一次坐下来写这本书的感觉更困惑。后来在1963年，他把这部手稿送到了卡尔·波普尔那儿。能够赢得这位大师的赞赏，一直是索罗斯心中最大的愿望，是他莫大的光荣。

尽管在这本书中，他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热情，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出书的念头。他向人们作的解释是，他认为这本书“不够资格”，所以，绝不让它见诸于世。

索罗斯又返回华尔街，重新从事赚钱的行道。他仍然在阿恩哈德公司工作。这是一家美国有名的从事国外股票交易的公司。公司起源于德累斯顿，早在19世纪初就创建了。在阿恩哈德工作的最重要的收获，就是索罗斯萌发了创立属于自己的基金会的思想。

他这样做过介绍：“1966年，当时我对美国证券不甚了解，于是想出一个启蒙的方法。我用公司的10万美元资本成立了一个户头，然后把钱分成16份，再把其中一两份投资在我认为特别有吸引力的股票上。每次投资，我都写一则简短的备忘说明投资这些股票的理由。每个月再撰写月报检查我的投资组合和投资组合的进展情况，

如此每月都整理出一份情况纪录。就是这样，我利用这个户头作为和机构投资人做生意的推销工具。这方面很成功，因为我可以藉此和投资界保持接触。在埋头改写哲学论文的那一段时间里，我可说是活在真空状态中，现在总算有机会把我的投资理念在可能投资的环境中试验。假如反应良好，就表示我的想法颇佳；假如反应消极，我就会认真质疑是否走错了路。所得到的回馈都是很有价值的。”

“试验想法对在金融市场操作很重要。举个例子，有一家名叫‘美国封顶’的公司。我跑去拜访他们的管理部门，他们讲了很多很好听的话，我信了他们。但我的一位客户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的确说得很动听，但此中不无玄机，任何一家公司的资方都是爱吹牛的。你看，这就是很有用的信息，这种回馈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我当时的主要投资之一是货车运输业，我把户头里1/4的钱投资货车运输业股票，结果成绩不俗，相当理想。之后，我们以这个户头的投资组合为基础，成立了一个小型的投资基金，名为‘首鹰基金’。到了第二年，就是1969年，我们用400万美元的资本成立了另一个小型基金，叫做‘双鹰基金’。这是一个避险基金，可以卖空、买超，也可以进行杠杆操作。但两个基金开始壮大后，就出现了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问题。我们也向客户推荐公司自行购入的股票，虽然我们已把所购进的股票资料公开，但问题还是无法解决，特别是在出售股票时。

于是我放弃这个户头，离开阿恩哈德公司，然后在 1973 年自行成立避险基金。”

“双鹰基金”就是“量子基金”的前身。在基金刚设立时，索罗斯自己只有 25 万美元。

自从有了自己的投资基金会，索罗斯就开始在世界金融投资这个广阔的大舞台上崭露身手了。

第三章

哲学情结和哲学梦

可以这么说，思考是我生活的重心，我是一个相当喜欢思考的人。尽管我知道有些事情并无答案，但我自认它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真知灼见。

——乔治·索罗斯

美籍匈牙利人乔治·索罗斯是因其“世界顶尖投资大师”和“成功的金融投资理论家”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的，由于他在1992年英镑危机和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在1989年东欧巨变前后所从事的一系列投资和慈善活动，他的名字在世人

听来大有如雷贯耳之感。

对 20 世纪末的世人来说，索罗斯几乎成了一个神话，一个具有回天之术的金融魔术师。也许，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金融界的坏孩子”，是一个“理财和赚钱的高手”，是一个能够洞悉金融奥秘的大师。人们知道，1993 年，他是作为“一个能改变市场的人”而成了《商业周刊》封面人物的；1994 年，他被称为“华尔街的顶尖玩家”而荣登《金融世界》的 6 月号封面。总之，乔治·索罗斯是作为一名成功商人、投资界的当代英雄，或国际慈善家的形象被人们所耳闻和心知的。也许，人们只听说过他的大作《金融炼金术》，而鲜知他的哲学作品《意识的负担》。殊不知，在索罗斯成功的金融投资家和金融理论家的背后，始终还存在着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索罗斯的影子。综观其一生，研读他的生平传记，我们发现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的索罗斯也许并不亚于当今社会一般大学里执教的二三流哲学匠人和思想陈腐的老朽学究。只是作为投资家和金融家的索罗斯其名声太过显赫，其光彩太过于照人，才使得作为哲学家的索罗斯稍显逊色，而消隐不彰。

在乔治·索罗斯的一生中，他的人生宿愿是从立志作一名哲学家开始的。尽管他说过他是一名“碰巧成了投资家的失败哲学家”，但在他整个一生中，他都始终怀有一种哲学梦想，心存一种哲学的情结。从他内心讲，他并不愿意人们把他叫做“投资商人”和“成功金融家”，

而更愿意人们把他叫做一名“实践性学者”，是一个注重思想和行为双向作用的人。1992年秋天，人们把乔治·索罗斯作为英国牛津大学主要资助人载入学院史册时，他说：“我真心希望自己能被作为‘金融与理论学者’而记录在册。不过，被别人认为是一个想当学者而没有当成的人，我也同样感到高兴。”

在他成名后，好几次接受新闻界的访谈时，他都流露出了这种想当学者哲学家而又没有当成的惋惜心情。

在我们看来，乔治·索罗斯之所以成为乔治·索罗斯，还不在于他仅仅是一个金融投资的成功典型，不在于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而在于他是一个特殊的投资家，是一个有着深厚哲学背景和功底和金融理论家。他和一般实用主义投资家不一样，他用一种最适合自己的气质和志趣的方式来投资，并且对于投资对象的价值，比对投资的时机性有更深刻、更独到的认识。

和卡尔·马克思与马丁·布伯一样，乔治·索罗斯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和他们不同的是，马克思和布伯出生在相对稳定和强大的德国，而索罗斯则出生在更为动荡和相对弱小的匈牙利，这使他从小就经历了一种不平凡的生活和更为频繁的社会制度的变迁。也许，犹太人先天就具有一种类似宗教的普世情结和救世情怀，渴望一种思想的洗礼和精神之冒险的事业。从古代的犹太先知，经近代的斯宾诺莎，到现代的现象学泰斗舍勒尔，他们无一不具有统摄全球的哲学目光和拯救世人逃离思

想迷雾的内在冲动。也许，历史上犹太民族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和被迫害、被放逐的痛苦经历，无形中磨砺了犹太人精神层面的内省能力，使他们对人类的痛苦有一种先天的敏悟，对世界来世的大同有一种比其他民族更强烈的渴求。如果联想到乔治·索罗斯的犹太身份和匈牙利背景，他具有的那种早期的哲学思想的冲动也就不会令我们感到意外和吃惊了。因为任何饱经苦难和打击的人，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一切似乎已有一种下意识的自择的保留，外在的物相似乎再也激不起他们内在的热情，而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的智慧和精力聚敛在内在的事物之上。乔治·索罗斯先天的犹太出身和二战期间少年时所遭遇的痛苦经历，使他从小就具有一种独立思考的习惯，并对世间万物秉持一种批判内省的态度。这也许就构成了乔治·索罗斯最先打算做一名哲学家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当然，从他以后的人生轨迹看，他和其他犹太哲学家所不同的是，他不单纯是一个解释世界的哲学家，也不是一个只注重改造世界的哲学家，而是一个实践性的学者，即一个既看重行动，又看重思想的哲学家。正像1994年他在接受他的一位老朋友拜伦·韦恩访谈时所说的：“我要说的是，只有观念的冒险能够深深地吸引我。基本上，思考是我生活的重心。我是一个相当喜欢思考的人。我喜欢去了解事物，年轻时就喜欢去做些哲学推论。我浪费了许多年轻时光在某些观念上，后来我发

现从行动中学习要比从思考中学习来得更迅速。于是，我变成了行动思想家。我的思考在我采取的行动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我的思考也因我的行动而有明显的长进。思考与行动的双向作用给我的哲学和生活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我们认为，正是这种行动的思想家、或实践性学者才构成了乔治·索罗斯最显著的个人特色，也是他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也许，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在昔日唯心主义沉迷至深，时下物质主义盛行的氛围之下，索罗斯的哲学及人生选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颇具参考价值的范例：即既要站在大地之上，也要目注天空的云彩；既要注重足下的实际之行，也要费心去寻求一种思想上的指南。

可以说，索罗斯的哲学有一种极其注重现实发展状况的特色。他和一般学院派和传统哲学家有明显的不同，后者只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文字到文字，从观念到观念，仅在一种抽象且自洽的阐释关系中去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只顾自己一种言说上的美学效果和过得去的自圆其说，而不大顾及其理论是否与客观现实的发展相符。乔治·索罗斯是一个瞄准现实紧紧不放的理论家。他注重反馈，注重理论认识和现实运作的双向作用。从他不多的哲学著作和别人对他的访谈中，我们得知，乔治·索罗斯的哲学继承的是另一支更为隐匿而不昭彰的思想传统。我们知道，人类近代的思想路线大体可划化为两大

脉络。一支是以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列宁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一传统认为，人类的理性可以主宰一切，完美的理论可以为人类的未来设计出毫无纰漏的宏伟蓝图，历史自然隐含着一种崇高的目的，所以，社会的发展必然遵循一种直线进化的模式。只要蓝图一定，人类发展的终级指令一确立，社会就自然会过渡到一个自由的王国。另一支则以穆勒——米瑟斯——哈耶克——波普尔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主张，人类的理性本身是大可值得去怀疑的。就观念对现实的具体效用而言，不存在任何完美无缺的理论，任何理论都仅是一种假设，它充其量不过具有一种有限的历史效用。关键不在于是否有一个完美的理论和理想的蓝图，而在于现实和理论之间的一种反馈。任何理论都应根据现实的发展而做出相应的校正。如果说人类真有什么可以值得去信赖的理性的话，这理性也不外是一种可以进行自我调整、自我修复的知性习惯。就人类本身的长远利益和现实福利而言，重要的不是理论家给出的关于人类未来大同的终级指令，即未来应该达到的某种状态，不是一种用人类的善意虚构出的理想的结局，而是执行这一指令的中间步骤和具体过程。所以，重要的不是“应该”达到某种状态，而是“怎样”抵达这一状态。理性主义传统只解决了“应该”的问题，而保守主义传统则更加注重“怎样”的问题。

纵观 20 世纪的人类历史，由于理性主义传统张扬一

种以人为中心的主观万能论，主张人定胜天，人可以征服自然的思想，所以它带有一种革命和激进的色彩，更由于它似乎提高了人的尊严，强化了人的理性而成了一门当代的显学。相比之下，由于保守主义传统的那种稳健、谦逊和更注重真理细节的风格，反倒被现实中忙碌而浮躁的人们所轻视和忽略，从而成为一种非主流的学说。直到本世纪 80 年代末，由于东欧的巨变和前苏联的解体，一场“伟大”的试验终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人们才觉察出自由主义思想的可爱和保守主义内含的那种稳健和真知灼见。

从乔治·索罗斯喜爱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怀特海、哈耶克等，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属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的哲学家。

乔治·索罗斯的哲学历程是从 1947 年离开匈牙利进入伦敦经济学院读书开始的。他在那儿遇到了世界有名的学者，卡尔·波普尔、哈罗德·拉斯基和哈耶克等。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卡尔·波普尔。正如人们所知道的，伦敦经济学院是英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不管人们是想谋职，还是想过一种学术生活，都是一个从事学习和研究的理想之地。该学院吸引一大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有社会主义的倾向，

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在这儿任教。对于乔治·索罗斯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因为他想得到经济学方面的扎实训练，同时，他又想研究一下国际政治的主要趋势。

他听过拉斯基的一些课，并且选修了约翰·米德的课程，米德在1977年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后来索罗斯后悔，“我没有从这门课程中学到什么东西。”该学院同时又是两个不赶时髦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家——鼓吹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和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栖身之地。这两个人在后来（80年代和90年代）乔治·索罗斯以巨大的热情踏上知识分子的道路上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当时，他们竭尽所能鼓励用“开放”的社会来改造“封闭”的社会。

尽管波普尔是以他科学方法论的思想闻名于世，但他1951年出的那本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却为乔治·索罗斯的知识分子生涯奠定了基础。

年轻的索罗斯准备写一本探讨人类社会性质的书。此时在英国，他初尝了民主生活的滋味。他迫切想把自己个人的经历变成某种知识的著述。波普尔的书为他提供了写作蓝本。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尔提出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可能的命运：一种是成为“封闭”的社会，第二种是“开放”的社会。在这种“开放”的社会中，人民摆脱了混乱的民族和部落战争，冲突的信念得到宽容

和接纳，它不会造成社会极度的紧张和压力。波普尔认为，不管开放社会是如何的“不稳定和不安全”，它都要比“封闭”社会优越。

波普尔的书，除了在科学理论方面所作的卓越贡献外，它还是一副对当时激进狂想思想的解毒剂。波普尔的深刻思想和理智的批判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尽管索罗斯在进校的第二年就完成了他的课程学分，但他还是决定再在伦敦经济学院呆上一年，直到1953年春天他取得他的学位证书为止。读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后，他追随波普尔，从这位大师那儿学到了更多的东西。自从他拿了几篇文章让波普尔审阅后，他们的师生关系就不那么森严了。波普尔成了索罗斯的良师益友。

1994年，接近92岁高龄的波普尔在一次谈话中，回想起了40多年前的那些日子。他说，当时年轻的索罗斯第一次出现在他的门口。“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我是经济学院的一名学生。我可以向你请教一些问题吗？’他是一名非常谦虚的学生。我写的那本关于开放社会的书，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经常来找我，向我陈述他的思想。我不是他正式的指导教师。如果他今天把我叫做他的良师益友，那是自出他的善意。”

当索罗斯被波普尔迷住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学生并没有给这位教授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听到了他说的那些

东西，”波普尔回忆说，“但我没有问他任何问题。我对他了解得不多。”

波普尔对索罗斯产生的最大影响是鼓励这位年轻的学生去严肃思考世界运作的方式，如果有可能，去发展一种有助于解释世界的伟大的哲学主题。

波普尔是一位试图用他的智慧来促进知识发展的哲学大师。他对帮助索罗斯融入实际的生活方式没有兴趣。哲学，无论是卡尔·波普尔的想法，还是其他人的想法，都不可能成为一张指导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如何赚钱的路线图。

然而对乔治·索罗斯来说，哲学却能够满足这种期望。最终，他会从抽象返回现实；他会发展出好几种关于知识的理论，这种知识涉及到为什么以及怎么样人们会以某些固定的模式来思考，通过这些理论，他又会生发许多新的关于金融市场运作方式的理论。

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期间，心中充满了一种求知的渴望。尽管他当时既贫困又孤独，没有经济来源，没有亲戚朋友，但狂热的读书却无疑有助于他消除那种孤独和贫困感。在一个夏天，他中止了他的学业，在伦敦贫民区的一个游泳馆找到了一份看门人的差事。这个游泳馆，平时几乎没有人来游泳，所以，他能抽出大量的时间去光顾旁边的那个规模很大的公共图书馆。他充分地利用了那个夏天，读了许多书，接受了大量的新的思想和观念。后来，他把这个夏天描述成他一生“最美

好的时光”。他的专业目标仍旧没有确定下来。但他很乐意在思想的天地中增长自己的见识，并且喜欢写作。也许，他会成为一名社会哲学家，或新闻记者。他仍然拿不定主意。

他经常设想自己仍然留在伦敦经济学院，并且成了一名学者，也许像卡尔·波普尔那样的哲学家。他想，要是他拥有像波普尔那样的心智，另外尤其是，如果能以弗洛伊德或爱因斯坦那样的大人物形象展示在世人的面前，那该有多好啊。在另外的场合，他又梦想自己成为一名新的约翰·M. 凯恩斯，像这位世界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一样成为一名经济思想家，攀登上同样高的荣誉的顶峰。

这就是乔治·索罗斯为取得知识成就而作努力的开端，取得这种成就也许会成为他一生中的重大主题。

非常不幸，索罗斯的学习成绩并不很理想，他的学术抱负似乎无法实现。1952年末和1953年初，他花尽心血纠缠于一些哲学问题。他真正的兴趣是在观念与现实相互脱节的地方。与此同时，他总认为他想到的那些问题肯定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智力发现：“我得出结论，几乎所有我们关于世界的观点都是漏洞百出和被扭曲了的，然后，我更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扭曲在形成事件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上。”

乔治·索罗斯开始对世界运行的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希望自己能去思

考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而且还立志对知识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乔治·索罗斯的导师——卡尔·波普尔教授对索罗斯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波普尔启发引导索罗斯去思考重大理论问题，去形成一个恢宏的哲学思维体系。这一哲学思维体系要有益于人类，也要有益于提出者本人。按照索罗斯的老朋友拜伦·韦恩的话说，索罗斯渐渐地开始相信“你对抽象理论越是能潜心研究，那你对具体实践就越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最终，索罗斯对抽象哲学理论的兴趣导致了他对资本市场如何运转这一实际问题的研究。但是，要更好地理解他的资本市场理论，最好先从他的广义的生活与社会理论着手研究。用一个词来概括他的思维理论，那就是——洞察力。

许多人都约而同地问这些相同的问题：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为什么在这里？诸如宇宙、人类等这些事物是如何运行的？

人们对这些问题思虑片刻之后，很快就会联系到他们自己的生活，于是又会从纷繁的思维中回到养家糊口、赚钱谋生这样的实际事情中。

然而，哲学家却是用毕生的精力去研究这些抽象的问题。看来，乔治·索罗斯就属于哲学家一类的人物。

实际上，仅仅是一件事激发了索罗斯对哲学的兴趣，并且他对此事记忆犹新。他在他 1987 年出版的《金融的

魔力》(The Alchemy of Finance)的序言中写道，“自从我开始感觉到我的存在之后，我已经产生了一种去理解它的强烈欲望和浓厚兴趣，并且我视我自己的理解为需要理解的中心问题。”

然后，对哲学的兴趣激进了他心灵的火花。尽管如此，年轻的索罗斯几乎在一开始就发现，要解开生命之谜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原因是再简单不过了：实际上，我们要研究“我们是谁”或者“我们是什么”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客观地审视我们自己。

然而，问题就在于“让我们客观地看待自己是无法做到的”。

这对于索罗斯来说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

对索罗斯来说，有一个理论使他记忆尤为深刻：“一个人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只是其对该事物理性认识的一部分；所以说，一个人的思想往往缺少判断它正确与否的独立参照物——它缺乏客观性。”这是他在《金融炼金术》的引言中所写的一段话。这段话后来成了他从事哲学理论分析的核心。

也正是在 50 年代初期，索罗斯形成了他最重要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人对事物的解释是欠完整的”。由于未能有这个独立参照物，人们就无法冲破自我思想禁锢，也无法用一个未变形的棱镜来认识世界。于是，索罗斯得出了一个令全哲学界颇感震惊的结论：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多多少少都有些片面或扭曲。”

关于这种思想，他曾作过进一步的表述。他这样介绍：“我的中心概念是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本来就是有颇感震惊完整的。有些状况是我们必须先行理解，而后才能做成某些决定，但事实上这些状况往往受到我们做决定时的影响。当人们参与某些事时，他们所怀着的期望本来就是会和这些事的实际情形不一致，只是有时差距很小，可以不必理会，但有时差距很大，足以成为影响这些事情发展过程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不是很容易传达的一个概念。”

“我可以把这个中心概念归纳成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理解欠完整。这句话虽然简单，但却能完全表达这个概念的全部意思，原因是这句话表达的意思不仅仅是我们的理解欠周延，也表示我们要置身其中处理及要了解的现实，也都不完整。现实是一个不断在移动的目标，因为我们的理解是可以影响现实的。”

索罗斯这种思想的基础是建立在人的可谬误性，或者易错性之上。

在一次接受他朋友的访谈中，他说：“我相信的是我的可谬误性，即我可能犯错这一点。这句话对我的重要性，就如同‘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对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重要性一样。事实上，它的重要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笛卡儿这句格言锁定的对象的只限于思考的人，但我的理论和整个居住的世界息息相关。我们做决定时，错

误观念与误解影响我们参考的事件。人的可谬误性在所有人身上所扮演的角色一如突变在生物学扮演的角色一样。这种观念对我而言至为重要。在我尚未能在别人身上发挥相同的影响力时，那我就没什么把握了。”

为了更好说明他所谓的可谬误性观念，他将我们引到了有关我们人类心智构造的问题上。他认为，除了少数几个人外，世界上绝大部分人的心智结构都或多或少地有瑕疵。我们的心智结构可能有一点真理存在，但这一点真理在过度的夸大下，可能反而扭曲了现实。

若要应付我们对事物理解不够周延的地方，其方法之一是将我们既有的知识、经验、观察力引进我们的理解力不能涵盖的范围。我们使用视觉时，就是运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涵盖我们的盲点，即使最复杂的结构也同理可循。

所谓心智结构，在乔治·索罗斯看来指的就是思维的产物，包括只停留在我们脑中、或是已通过语言或组织表现出来的事物。所谓组织包括金融市场、汇率制度、联合国、民族国家、法律结构。仍留在我们心智构造内的思维，从最简单的感觉到与这个世界有关或无关的复杂信仰体系都有。而已经表现为具体事物的心智构造则是构成我们居住世界的很大的一个部分。

他认为，解释有瑕疵心智构造的最好方法是从例外的情形着手，也就是从无瑕疵心智构造的角度谈起。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叙述句，这些叙述的句子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但却是没有瑕疵的。只要我们有能力辨别叙述的真伪，我们就能获得知识。但是心智逾越了所谓“合乎规范”的叙述这一标准时，就有了瑕疵的心智构造。

因此我们必须检视我们能做何种真实的叙述。有些具体叙述与特定事实相符，我们也可以根据某些规则，从别的叙述句引出另一些叙述句内含的真理，这种情形在数学和逻辑学最为明显。人类最大的成就是科学，在科学范围之内，我们可以把特定的叙述和放诸四海皆准的通则结合，从而做成各种解释和预测。不过，就如卡尔·波普尔所说，通则无法证实，只能推翻。因为在本质上，它们仍是假设性的论述，永远有被推翻的可能。

这些不同形式的知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可以使用事实或某些规则作为可靠的依据，以断定知识的真实性或有效性，问题只在于我们是否会应用这些事实或规定而已。这种依据是可靠的，原因是它们是独立于适合和应用它们的人之外。

如果现在你想了解我们人类，你将发现，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思考局限在超然于思考之外的事物上。我们必须随时随地为生活做决定，为达此目的，我们必须拥有一些并不足以称为知识的观点，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行事方式都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求助

于信念。既生为人，就难免如此。

他说：“理解人生这种情况不能算是知识——如果这算是知识，就会自相矛盾，不过，这种理解能提供一套信仰，而这套信仰将比其他信仰更贴切人生。至少，在我提出我自己的可谬误性时，我是这样认为的。当我提出我的可谬误性时，就是在发展一个信念，一种经过推理而产生并且适用于哲学的信念，但信念终归是信念，我无法像笛卡儿声称他能证明他的名言一样证明我的信念。我尝试过，但屡试屡败。要证明自己的可谬误性似乎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不能证明自己的可谬误性，才应该是一种比较可以自圆其说的说法。所以我很乐意把我的说法所包含的真理视为一种信念。

这其中另有深意，意指我们都要有一些信念带领我们走完此生，而不能光凭理性。理性大有用处，但仍有它的限制。如果我们坚持在理性的范围之内运作，就无法应付这个真正的世界。相反地，假如我们相信我们自身的可谬误性，我们反而能够飞得更高，走得更远，甚至终生受用不尽。

有一次，乔治对拜伦·韦恩说，尽管现时代哲学已沦为一种专业学术，但事实上它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我们若没有一套理性的信念就无法生活。问题是，在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念一定有瑕疵时，是否还能在这一点的基础上发展出信仰。他相信我们能，而且在他的生活中，他一直是由他的可谬误性指引的。但

话又说回来，他在传达他的观念，以及让他的观念普遍让人接受这两方面并不是很成功，所以，他一直自认是名失败的哲学家。

他完全同意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观点，坚信我们对我们所居住世界的了解本质上是不完整的。这种本质上的不完整，归因于我们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我们同时也在设法理解和塑造这个世界。

身为学经济学的人，他发现传统的经济理论，尤其是完美竞争理论，竟取得了知识的地位。他的数学不好，所以他宁可质疑各种假定，而不喜欢研究根据这些假定推演出来的方程式。经过思考后，得到的结论是，经济学的理论是根据错误的前提而推演出来的，这也是他的反射论的来源。反射论指出，思考与现实之间有一种双向交互作用的关系存在。

在哲学研究过程中，索罗斯不仅涉及到了逻辑学中所谓的自我指涉问题、说谎者的诡秘和哲学家罗素的类型理论及逻辑学实证论。

古希腊哲学家艾皮曼尼狄斯曾说：“克里特人永远在说谎。”如果这项叙述是真的，那么克里特人其实并不是真的永远在说谎，（因为这说话的人也是克里特岛人），所以这项叙述是假的。这诡秘来自于艾皮曼尼狄斯的自我指涉叙述。这就是所谓说谎者的诡秘。乔治曾试着从自我指涉概念中发展出他的反射论，但自我指涉概念会引起逻辑上的不确定性。他认为逻辑的不确定性和某一种

因果的不确定性息息相关，因为事件发生时，参考者曾运用他不完整的知识参考事件的过程，从而影响了事件。

要证明他们对事物了解在本质上是不完整的，是一件颇为怪异的事。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快要达到目标了，但最后总是作茧自缚。不知这是不是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还是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哲学家，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现实。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中也包含着人的思维结晶。一旦你接受这样的说法，你就必须了解思考者的思维与事情的真实状态有时其实并不相同，不过，它们也不能互无关系。两者的关系有些复杂。从某方面说，现实反映在人的思维上，他称这为认知作用，另一方面，现实又会受到人的决定所影响，他称这为参考作用。这两种作用朝相反方向运作，只在这一点上重叠：就是人在思考那些受他们决定所影响的事件。这些事件与我们研究自然科学时所谈事件的结构并不相同，必须要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索罗斯称这些过程为反射。

他认为，自然科学所探讨的事物，发生在人类思考之外，不论人对它的想法如何。因此，自然科学把事件看成一连串事实的衔接。当事件有思考者加入时，各事实之间并不因此产生直接的因果关系。只要参考者的思维扮演任何角色，事实就会引起知觉，知觉引起决定，决定又引起另一堆事实。

一连串事实与另一连串事实之间存在一种直接关系，这是所有自然现象的特征。不过，另一种较为迂回的关系也不能完全忽视，否则将引起扭曲。但当人的想法与真实十分接近时，这种扭曲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但当认知与真实大相径庭时，这种扭曲就变得很重要了。

认识之所以会和真实情况距离那么遥远，索罗斯解释说，原因是认知与参考作用两者会相互干预。这种干预出现时，无论是参考者的思维或事物的真实状态都会产生不确定因素。思维和真实不一致的程度可以是大得惊人的。他举了一个人们熟悉的例子，两人相爱的情况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当两个人产生感情时，另一方对你的感觉将深受你的感觉与反应的影响，例外的情形很罕见，像但丁和碧翠丝就是罕见的例外之一。但丁和碧翠丝之间的爱意无法传达给对方，于是才产生了“她爱我吗？她是不是不爱我？”这种情形。假如这是知识问题，这种不确定性因素也就不存在了。但这是一个所谓互动的问题，情感的交流可以引起很多结果，这些结果有些可能维持下去，有些则无法维持下去。当人们坠入爱河时，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索罗斯认为，把恋爱看作事实是不恰当的，原因是事实总是超然于参与者的信念之外。

不管在人类关系中，反射本质是相当明显的，但他感兴趣的是，何以反射作用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在经济学领域中，为什么经济学家要把它忽略掉？他认

为，部分原因是反射作用无法和分析科学相吻合。分析科学旨在提供确定的预测和解释，反射作用却提不出任何确定的答案。另外，他借用波普尔完美的分析学模式来加以解释。波普尔的整个模式是由三种叙述组成：具体的初步状态、具体的最终状态和放诸四海皆准的通则。这三种叙述可以下列三种方式组合而成：通则和初步状态结合后形成预测，与最终状态结合时，则能提供解释。具体初步状态和具体最终状态结合，则成为通则的验证。但假如要进行验证，通则本身必须是超越时间限制的。

乔治喜欢这个模式的简单结构。波普尔利用它解释从具体到通则的归纳法的问题。波普尔认为，科学方法不是定要靠归纳法，也可以靠验证。理论经过验证，才算得上是科学的理论。

索罗斯想借用波普尔的模式解说反射作用打乱了这个模式。如果反射互动作用能同时改变参考者的思维以及事物的真实状态，超越时间的通则是无法验证的。重复做实验时，我们常会发现，出现过一次的结果不见得会再次出现，于是，整个美妙结构也宣告瓦解。也难怪会如此，因为这个模式的背后假设了一个决定论的宇宙。如果现象并不遵守无时间限制的随时有效通则，前述那些定律又如何用来预测与解释现象呢？

索罗斯提醒人们注意，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不只具有真假两个层面。逻辑实证论者声称，既非真也非假的叙述是无意义的叙述，但索罗斯全然不同意这个看法。他

认为，可以对现实造成影响的叙述绝不会无意义。它们能改变世界，它们是思维能在现实世界中扮演积极塑造角色的具体表现，而我们必须调整我们对真实两字的观念才能了解这点。

索罗斯主张我们必须认清任何事物都有三个层面：真、假以及反射。反射叙述的真假值是不确定的。我们有可能再找到其他真假值也不确定的叙述，但即使没有它们，我们仍能好端端地活着，但若无反射论，人类就无法生存。所以，他没有必要再强调这个理论的重要性。他认为，在我们的思维中，真实的观念是最根本的。当然，他本人也怀疑这种说法能否经得起考验。如果通过了考验，他认为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就得彻底改变。他举了一个小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现在市场存在的普遍看法是，市场是完美的，而此观念的依据是政府的规章制度不能实现目标的这种看法。如果你引进第三类的真实——反射，就可清楚看出规章的失败并不意谓自由市场是完美的。两种安排都有缺陷，而中间的选择是反射。

反射叙述并无可供判断真假的独立准则。它的真实值是不确定的。但它们也不代表无意义。要适应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必须要有反射。而它们不只是被动地反射事物，它们也主动构成我们存在的世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我们的思考外，尚有现实存在，一个不向我们意志低头的现实。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叙述，都在这个现实之内，构成现实的一部分。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组成了两个分隔但极类似的宇宙，当叙述反映事实时，两者之间就能建立对应关系。这种想法既错误且易产生误导。它可能适用于科学方法或公理体系如数学和逻辑等，但对我们活着且能思考的人类，却是绝不合宜的。

那么，索罗斯的反射论又如何解释和预测事件的过程的呢？他说他的兴趣在于特定事物的过程。从他投资活动的经历中，他发现统计机率的价值是极其有限的，真正重要的是某特定案例的来龙去脉。同样的道理更适用于历史事件。他说他无法做可靠的预测，他所能做的只是提出一种构想。然后他能以事件实际发生的过程与假设理论做比较。这样的假设并不具科学有效性，不过它们具有相当大的实用价值。它们能作为真实生活的决定依据。

他承认他无法根据放诸四海皆准的通则预测事件的经过，不过，他能设计出一个概念性的架构，根据过去的经验，帮助人预测和调整目标。

换句话说，海森堡提出了不确定性的科学理论，但是他的架构协助他用非科学的方式处理不确定性。这是十分重要的区别。若从科学标准来看，他的理论毫无价值可言，因为它无法提供确定性或机率性的预测和解释。

海森堡是一名研究物理现象的科学家，而他的理论也是科学性的。索罗斯则不同，他是个思想参考者，试

着了解人生的意义，他的理论是非科学的。但他们各得其所，因为他了解思想参考者与科学观察者本来就不同。

1956年，迫于生计，索罗斯离开英国去美国，尽管去美国后，他主要从事的是证券和投资工作，但那个想当哲学家的梦仍留在他心里。直到1963年他33岁时，他仍然在哲学家和投资家的事业生涯间举棋不定。也许是由于这一年他去英国拜访了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尔，而后者对他的哲学手稿《意识的负担》反应极其冷淡的缘故，才使他最终放弃了当哲学家的想法。

乔治·索罗斯在有的场合说过，他赚钱的真正秘诀是：“我了解金融市场的革命性过程。”在我们看来，他之所以了解这一过程，其原因在于他有自己深厚的哲学思想，他对事物存在的实际状态有一种超乎科学的敏悟力。他的反射论思想是非常独特的，与一般学院派的僵化思想比，也许，这一理论更贴近我们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更能给世纪之交的人们提供一种有益的启示。

如果从结果反推过去，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认为乔治·索罗斯是一个失败的哲学家。更恰当的说法是：他是一个哲学家式的金融家，是一个有思想素养的投资家。正因为他具有深邃的哲学思想，他才可能在变化叵测的金融世界叱咤风云，稳操胜券。也正因为 he 既有金钱，又

有思想，他才可能去从事许许多多既不同于金钱，又超越于金钱的事，从而成为当今世界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人，一个最富有争议的人。无论从哪方面说，乔治·索罗斯命中注定已成为我们这个世纪末的神话，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关注他，了解他，理解他。

第四章

成功的金融投资理论家

不错。在金融市场，理论能够改变与它们相关的实质。举例来说，有效市场论引起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广泛应用，但衍生性金融商品也可能一举拖垮市场。我热爱追求事实，因此坚持社会科学是一种炼金术而非科学。科学的名气响亮，所以它会吸引人去冒用它的美名。由于科学名气很大，因此社会科学家可能借科学之名牵强附会。

——乔治·索罗斯

在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索罗斯的金融投资理论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这就是他的“反射论”和“大起大落”理论。索罗斯在金融投资中所使用的手段、方式和方法无不浸透这两大理论，处处都可以看见它们在他整个金融投资活动中所留下的深刻痕迹。

（一）“反射论”

“反射论”既是乔治·索罗斯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他金融投资理论的精髓。人们的思想可以反映现实，这就是所谓认知功能。但在另一方面，人们做决定，这些决定可以影响现实，然而这些决定不是根据现实做出的，而是根据人们对现实的注释而做出的，他把这种功能称为参与功能。这两种功能从相反方向运作，而且在某种情形下还会互相干扰。但它们也互相起作用，它们的互动方向，这可以称之为双向反射回馈机制。

这种机制首先注重的是思考的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的思考和他所参与的事情两者之间的关系。传统的想法是，了解是一种被动过程，而参与则是一种主动过程，两者似乎互不相干。而索罗斯认为，这两种角色是彼此影响的，所以对参与任何一件事的人都不可能纯粹只凭据一种角色做出任何决定。

古典经济理论假设参与市场的人是根据完整的知识行事，这个假定显然是错误的。参与市场者的知觉已经足以影响他们所参与的市场，且市场的动向足以影响他们的知觉，他们无法得到市场的完整知识，因为他们的思考也不断影响市场，而市场也回过头来影响他们的思考。假如关于完整知识的假定是对的，市场分析就容易多了。所以经济理论必须重新从根本反思，原因是经济过程中还有诸多不肯定因素，至今仍未得到解释。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科学永远得不到像自然科学那么肯定的结果，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我们必须对思考在影响事情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彻底重新评估。

索罗斯认为，人们习惯把事情视为一连串的事实：一个事实接着另一个，永无休止。但假如某一情境是有人参与的，事实与事实之间不一定是直接衔接的。在这种处境中，事实首先和参与者的思考接上，然后参与者的思考又和别的事实接上。

所以我们必须先了解的一点是参与者的思考并不再只是囿于事实，他们也要考虑其他人和他自己的思考。如此就会出现不肯定因素。换句话说，此时参与者的思考就不再和事实完全相符，但却可以在影响和塑造事实方面起某种作用。思考和事实不但不符，而且参与者的知觉和实际情况之间总会有差距，参与者的盘算和实际结果也会有出入。这种出入，就是了解历史过程以及金融市场动力的关键所在。错误观念和错误在人事方面扮演

的角色，一如变异在生物学扮演的角色。

以上就是索罗斯“反射论”核心概念。这概念产生了不少影响，这些影响对他人未必重要，对他却很重要，因为，他的整个理论都源自这一点。

用它来考察华尔街资本市场的现状，他认为在那里存在着种种谬误。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大部分曾竭力分析股市交易行情的人们得出结论：逻辑性在股价的确定中起主导作用。在股市交易中，过去必有逻辑。他们认为要考虑何时投资于股市交易是件令人极其不安的事，更不用说股市交易本身就是充满风险的事。

那些唯理主义的虔诚信徒们顽固地坚持：因为投资者对一个公司的状况有“相当完美”的认识与了解，所以每种股票都应是准确地根据其正确的价值来排价的。在这种唯理主义的支配下，投资者面对多种多样、门类齐全的股票进行选择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按所谓的“理性”来办事，选出最好的。同时，股价一直与对某公司的未来利润状况构成“理性”的联系。

这就是风靡一时的作为股市交易运行理论的高效市场假论。它假想了一个完美的理性世界，同时也假想“所有的股价都反映了所得信息。”

但是，在经典经济学鼓吹均衡论并假想“完美的竞争和完全的认识是可以达到”的时候，索罗斯相信在此方面他认识得更深，也最有发言权。他强调，在现实世

界中任何假想完全认识论的理论都是荒诞的；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对买卖的决定是建立在期待的基础上，而并非基于经典经济学的理想之上；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只能达到对事物的不完全认识的程度。

“一般说来，我认识事物的洞察力就是非完美认识论在行动中的作用。传统的经济学建立在均衡论基础之上，他们认为供求均衡相等。但是，如果你发现我们的非完美认识论在认识世界这一行动中的重要作用时，你就会发现你所做的恰恰是不平衡的。”

在资本市场上，确实有不少人认为经济生活是理性的有逻辑性的。他们认为资本市场总是正确的。正是这种感觉，他们相信，市场时价会导致看低或看高未来的发展潜力，即使是这种发展趋势还不清晰的时候。

然而索罗斯认为，这不是真的。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观点：许多投资者都已开始相信他们能“预料”未来市场的状况，也就是说他们能在市场的未来发展来临之前就开始考虑到未来的市场行情与发展状况。但是，对于索罗斯来说，他认为这是“胡说八道”，“无稽之谈”。他认为，“对于未来状况的任何幻想都是有偏见的，并且是不完全的。我不认为事实和信念是自发独立存在的。相反，我在阐述反射论时就强调‘片面是改变了的事实’。”

时价常是“错误”的，因为它提供的不是对未来的理性认识，而是一个片面的认识。“但是曲解总是在正反两方面同时起作用。”索罗斯强调说，“并不仅仅是市场

参预者在操纵市场交易时带有片面性，同时，他们的片面性也反过来会影响交易过程的未来发展，他们互为作用反作用。这也许可能使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先期预料市场未来的发展，并且相当准确。然而事实却是：并不是眼前的期望符合未来的事件，而是未来的事件为眼前的期望所影响。从本质上讲，市场交易者的感觉本来就是曲解的，错误的。同时，在交易者曲解错误的感觉和实际事物的过程之间有一个双向的联系，这个双向的联系导致了它们之间缺乏一致性。”他再次说：“我称这种双向的联系为反射论。”

就“反射论”看来，所有基本价值都有缺陷，而在某种状况下，这些缺陷变得十分明显。然而基本价值有它存在的必要，以维系近乎平衡的状态。如果我们知道所有价值本质上都只是反射的，因而扬弃所有的价值，就会让情况变得更加不稳定。因此，近乎平衡状态有其自相矛盾之处。不过，如果你仔细想，它又和反射论相当一致，近乎平衡状态又是稳定的，就不可能有极不平衡存在。近乎平衡必须是一个不稳定状态。就金融市场而言，如果反射论能广为众人接受，市场就变得比较具有反射性。如果投资人能以绝对表现而不是相对表现状态作为投资依据，市场会平衡许多。不过，我们必须知道，投资的目的是求表现，因此，重要的是股票的涨跌，而不是股票的根本价值。但当我们弃基本价值于不顾，只追求相对表现时，市场又会变得不稳，但我们又必须跟

着走。

若从更广大的角度来看，是制度出问题了。制度要稳定，就必须靠基本价值来维系它。

这套理论适用于金融市场，也适用于政治。当基本价值有缺陷时，会出现何种景况？更甚者，假如有人认为所有基本价值都有缺陷时，情况又如何？制度将变得摇摇欲坠，进入一种动态的不平衡状态。问题是，根据反射论原理，所有基本信仰本来就是有缺陷的，一如所有人为建树都是有缺陷的一样。在特定情况下，缺陷可能变得十分明显。当你知道基本价值可能有缺陷时，又怎么可能去依赖它，稳定——亦即平衡状态——是一种很理想的状态。但反射论又破坏了人对基本价值的信心。正是如此。它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你的信仰有缺陷，又如何继续信仰它？”如果我们能够接受我们的了解一定不完整这一点，我们就能根据这项见解建立一套价值系统。

这种在感觉与现实间的双向反应——索罗斯称之为反射论——形成了他理论的灵魂。索罗斯坚信，对资本市场表现的最佳解释不应是高效市场假想，而是一种存在于投资者片面性和他所谓的事物现实过程之间的反应关系。

根据索罗斯的观点，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片面认识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将导致股市的涨跌。而这种片面性凭“自我强化因素”起作用，与“潜在的趋

势”相互作用影响投资者的期望值。因之而产生的价值波动可能有引导投资方去购回股票或者着手合并、获得或全部购买股权，这又反过来影响股票的基本原则。

股价并不是由人们对可得到的信息的敏锐反应所左右。相反，它却是感觉的结果。在产生这结果的条件中，人们的情感和冰冷的数据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正像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一书中所写的：“当（股票）活动拥有能用头脑思想的人时，那么交易活动的主要内容就不只在事实的范围内，而且，还包括交易活动参预者的感觉。那么这一活动的因果链也不是直接地从事实到事实，而是从事实到感觉，从感觉到事实。”

在索罗斯的理论中包含着一种概念性的论点：投资者所开付的价格并不仅仅是对价值的被动反映；相反，这些价格却是对股市价值进行估价的积极因素。

索罗斯理论的第二个主要观点抓住了“错觉在引导交易活动中的作用”。错觉——他有时这么叫——就是指参预者的想法与活动实现状态的间接偏差。在整个交易中，这种偏差象一种幽灵，无时无刻不在。

有些时候，这种偏差是合理的并且很小，使得它能自我修正。他称这种现象为近均衡现象。

但是，当这种偏差非常大时，感觉和现实之间相距遥远。那么，就没有任何手段能使它们再接近一点。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排斥力，使它们保持距离。

那么，这种偏差显然很大，也无法自我修正。索罗

斯称这种偏差为远均衡现象。

这些远均衡偏差现象无非属于两种形式的其中之一。一个极端是，尽管感觉和现实相差遥远，但状态是稳定的。这种稳定的状态并不合索罗斯式的投资者的口味。另外一个极端是，状态是不稳定的，交易活动变化飞快，使得参预者的观点对此望尘莫及，兴叹不已。这一不稳定状况恰恰符合索罗斯这种投机商的兴趣。

在金融投资市场上，反射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索罗斯 1988 年曾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当人们对某种货币丧失了信心后，它的下跌贬值容易加深国内的通货膨胀。当投资者对某公司的管理状况充满信心时，该公司股价的上涨使得管理者们更容易达到投资者期望值。我最初称这种现象为自我强化，而最终之为自我拆台的连锁反应。”

反射关系在使用信贷时也同样明显。索罗斯曾这样说：“借贷是建立在贷方对借方还贷能力的估计基础之上。附属担保品的估价应该独立于贷款行为之外的；然而，贷款行为又能影响附属担保品的估价。这无论是对于某个具体事件还是对于经济整体都是千真万确的。”

在另外一个反射的例子中，这个例子在本世纪 80 年代的中后期屡见不鲜，就是说，在（对企业的）接收出价/盘进出价后提供的价值导致了对公司资产的重新评估。这使得银行家们愿意把更多的款贷给投标人，这一行为又导致了更高的买价和卖价。最终，股价越爬越高。

根据索罗斯的反射论，暴跌变得不可避免。

有些情况是，索罗斯没有对某个资本市场的运行情况进行全面分析、权衡得失，就贸然投资——也就是说，他没有考虑好是否出现了反射活动，就去投资。但是，索罗斯毕竟是个投机天才，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反射活动这一投机良机。当他发现一个这种情况，并认为能够利用，他会果断出击，赢得巨大的利润。

尽管索罗斯对市场问题有着独到见解，并提出了他的“反射理论”，然而，分析投资秘密也没有保证索罗斯总是赢利。有时候，资本市场中的有些问题和他的投机天赋毫不相干，使他感到无法插手，无用武之地；有时候，有些情况就跟他的投机天才密切相关，使他任意发挥。

比如说，有些时候，反射过程根本就没有在某些活动阶段出现。或者说，反射活动是出现了，但是索罗斯由于阴差阳错却没有及时发现。最糟糕的是，也有些时候，当索罗斯千方百计地寻找反射活动时，尽管他发现了，他却错误地进行了鉴别。

实际上对索罗斯反射论的反应也不一样：有些人认为他的理论太复杂，太困难，使人难以理解领会，有的人却认为能理会理解，并能从中受益。对索罗斯理论有困惑的人之中，有些是曾和索罗斯一起工作的人。其中之一是罗伯特·米勒，他曾在 60 年代跟索罗斯一起工作，现在任阿恩哈德公司的高级副主管。

威廉·道奇，是纽约 Dean Reynold 公司的负责股市研究的高级副主管，也是投资战略专家。他承认他并没有读过《金融炼金术》这本书，但他相信，索罗斯的反射论绝对合情合理，使人受益。

索罗斯自己却对“反射论”持一种异常谦虚的态度，他甚至承认他的反射论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但他暗示说，他的理论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解释在资本市场赚钱的可能，并且更加清晰明了地解释了世界是怎么运行的这一课题。

对索罗斯“反射论”的这些反应都是正常的和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理论本身就很特殊，其思想背景和产生渠道也很复杂。在《金融炼金术》这本书里，索罗斯写道，“我提出了反射论，仿佛是这个理论在任何时候都是恰如其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反射标志的双向反馈作用过程在某种情况下会对资本交易活动起作用，这是对的。但是，要说它在整个过程中始终起作用，它就是错误的。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它软弱无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同时，索罗斯阐述第二个观点，“常常是有人总结我这本书时说，参预者对价值的判断总是具有片面性，并且，起支配作用的片面性认识会影响市场价格。”如果说，

他要写的东西仅仅是这些话，他说这不值得成为一整本书。“我的观点是：有些时候，片面性的认识影响的不仅是市场价格，而且还有所谓的市场规则。这只是在反射变得十分重要的特定时刻，而并非所有时候都发生这种情况。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市场价格会伴随着一个不同的形式，反射也起不同的作用。反射不仅会影响所谓的市场规则；当反射影响价格演变过程时，自己也成为了一条市场规则。”

要正确而深入地了解索罗斯的“反射论”，应当还有更重要的渠道和途径，这就是它深层的思想来源和哲学背景。在谈到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时，索罗斯这样作过表述：“这是一条漫漫长路。我受卡尔·波普尔的影响很大。不只是他所写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他的科学哲学影响我更大。我同意他的观念，也就是我们对我们所居住世界的了解本质上是不完整的。这种本质上的不完整，我归因于我们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我们同时也在设法理解和塑造这个世界。”

“身为学经济学的人，我发现传统的经济理论，尤其是完美竞争理论，竟取得了知识的地位。我的数学不好，所以我宁可质疑各种假定，而不喜欢研究根据这些假定推演出来的方程式。经过思考后，我得到的结论是，经济学的理论是根据错误的前提而推演出来的，这也是我的反射论的来源。反射论指出，思考与现实之间有一种双向交互作用的关系存在。”

“在研究过程中，我不仅涉猎了逻辑学中所谓的自我指涉问题、说谎者的秘诡，最后透过哲学家罗素的类型理论以及逻辑学实证论归结到我本人的反射论。”

索罗斯认为，反射性作用无法和分析科学目标吻合。分析科学旨在提供确定的预测与解释，反射作用却提出了不确定因素，搞得天下大乱。这部分的解说可能是要费点唇舌的，必须借助波普尔完美的分析学模式。波普尔的整个模式是由三种叙述组成具体的初步状态、具体的最终状态和放诸四海皆准的通则。这三种叙述可以下列三种方式组合而成：通则和初步状态结合后形成预测，与最终状态结合时，则能提供解释，具体初步状态和具体最终状态结合，则成为通则的验证。但假如要进行验证，通则本身必须是超越时间限制的。

索罗斯很喜欢这个模式的简单结构，波普尔也利用它解决从具体到通则的归纳法的问题。并指出，科学方法不是定要靠归纳法，也可以靠验证。理论经济验证，才算得上是科学的理论。索罗斯想借用波普尔的模式解说反射作用打乱这个模式。如果反射互动作用能同时改变参考者的思维以及事物的真实状态，超越时间的通则是无法验证的。重复做实验时，我们常会发现，出现过一次的结果不见得会再次出现，于是，整个美妙的结构也宣告瓦解。也难怪会如此，因为这个模式的背后假设了一个决定论的宇宙。如果现象并不遵守无时间限制的随时有效通则，前述那些定律就不可能用来预测与解释现

象。

现在市场存在的普遍看法是，市场是完美的，而此观念的依据是政府的规章制度不能实现目标。如果你引进第三类的真实——反射，就可清楚看出规章制度的失败并不意谓自由市场是完美的。两种安排都有缺陷，而中间的选择是反射。反射叙述并不是供判断真假的独立准则。它的真实值是不确定的。但它们也不代表无意义。要适应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必须要有反射。这不只是被动地反射事物，而是主动构成我们存在的世界。有一点可以确定，在我们的思考之外，尚有现实存在，一个不向我们意志低头的现实。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叙述，都在这个现实之内，构成现实的一部分。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组成了两个分隔但极类似的部分，当叙述反映事实时，两者之间就能建立对应关系。

波普尔认为相同的方法与准则也适用于社会与自然科学，并称此为方法统一学说。索罗斯对此一学说存有若干疑点，他的作品《金融炼金术》的书名就表明了这一点。他认为“社会科学”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反射现象是无法用放诸四海皆准的通则加以解释或预测的。他的论点也许走过了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准则或许能运用于社会现象上，且能在它们的研究范围内得出有价值的结果。但索罗斯认为，反射现象不在其研究范围之内。举例说，经济理论作为一种假定了反射现象的假

说，是有效的。但当你将经济理论的结论运用在真实的世界时，就将得到一个扭曲的图像。这在金融市场尤其如此，因为反射现象在金融市场起很大的作用。

经济学理论试图模仿物理学。古典经济学惟牛顿马首是瞻，但这一派学者他们忘了牛顿曾在南海泡沫（编者按：南海泡沫是一项投机骗局）中损失大笔金钱。经济学能模仿物理学的惟一途径是从研究主题中剔除反射，于是他们假设知识是完美的，后来又改而假设资讯是完美的。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里诺·罗宾斯那儿发现了完美的遁辞。罗宾斯说经济学关切的既不是方法也不是目的，而是方法与目的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方法与目的都要被视为是既定的。这种方法论上的遁辞使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机会研究反射的互动现象。波普尔曾攻击马克思主义与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这些理论声称合于科学，但又无法证明其对错，因此，它们声称合乎科学是错误的。索罗斯同意这种说法，但希望能更进一步阐明。完美竞争理论声称在某种特定的前题下，不受限制的自我利益追求可导致最有效的资源分配。索罗斯无意推翻经济学，认为它是十分优雅的理论建构，但的确怀疑它在真实世界的适用性，也怀疑它是否能够通过金融市场的考验。索罗斯相信单是量子基金会的表现，就足以证明这些理论是错误的。

从思想影响上说，索罗斯的“反射论”不仅与波普尔有关，而且与海森堡的量子物理学中的许多理论也有

关联，不过索罗斯以为两者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他所主张的不确定性与海森堡的有所不同。他的不确定性不单会影响主题，连相关理论也会受波及。海森堡确立了不确定性原则，量子物理学根据此一原则推出了若干很有预测和解释力的统计通则。不确定性原则主张观察量子现象能够影响它们的行为，但是不确定性原则或其他量子物理学的理论并不影响量子现象的变化。因此这些现象可以作为一个可靠的准则，用以判断理论的有效与否。假设现在提出一项预测股市变化的理论，当然它会影响股市的变化。它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与量子物理学所谓的不确定性截然不同。它会影响用来判断叙述的真假或是否为有效理论的标准。

索罗斯继续着他的表述，他认为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侧重于统计机率。它无法决定特定分子的行为，不过却能对某种特定的现象做出相当可靠的预估。相形之下，索罗斯的兴趣在于特定事物的过程。身为投资人，他发现统计机率的价值相当有限，真正重要的是某特定案例的来龙去脉。同样的道理更适用于历史事件。但他无法做可靠的预测，所能做的只是提出一种构想，然后以事件实际发生的过程与假设理论做比较。这样的假设并不具科学有效性，不过它们具有相当大的实用价值。它们能作为真实生活的决定依据。索罗斯认为他无法根据放诸四海皆准的通则预测事件的经过，不过，他能设计出一个概括性的架构，根据过去的经验，帮助预测和调

整目标。

换句话说，海森堡提出了不确定性的科学理论，但是索罗斯的架构协助他用非科学的方式处理不确定性。这是十分重要的区别。若从科学标准来看，也许这种理论毫无价值可言。它无法提供决定性或机率性预测和解释。海森堡是一名研究物理现象的科学家，他的理论是科学性的。索罗斯认为自己只是个思想参考者，试着了解人生的意义，他的理论是非科学的。但他说：“我们各得其所，因为我了解思想参考者与科学观察者本来就不同。”

其实，照索罗斯的理解，“反射论”不仅与深奥复杂的哲学物理学有关，在人类生活中也普遍存在。他认为，人类关系中的反射本质就十分明显。问题只是这种反射作用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经济理论也常常把它忽略掉。

（二）大起大落

索罗斯对世界、对人生和金融投资事业的深刻理解形成了他的“反射论”。而对交易市场而言，“反射”最外在的市场形态表现就是行情的波动、价格的涨跌。照索罗斯的理解，这当中是不应该靠理性去寻找它的规律的。然而，掌握市场的“律动”和“趋势”则是另一回事，值得人去深入探究。在“反射论”的基础上，索罗斯又得出了他对市场“大起大落”的深入理解，也即是暴涨/暴跌现象的独特认识。

长期以来，索罗斯对资本市场的活动规则极为感兴趣，他尽力了解为什么那些规则将会发生变化。因为当那些规则发生变化时，他们会导致发生一种反射关系，这种反射又会导致暴涨/暴跌交替现象的产生。可以说索罗斯关心资本市场规则的举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变”。

索罗斯紧密跟踪并窥视资本市场，寻猎出现暴涨/暴跌交替的局面。他知道，资本市场有时会具有反射关系的特征，所以他在投资市场中常常战胜对手，他显得胸有成竹，稳操胜券。

索罗斯对暴涨/暴跌现象的认识总是立足于对市场

种种错误看法的批判上。

流行的看法之一是，金融市场是在均衡的状态中。但这其中必然有分歧，原因是市场是不完善的，它们的性质有如随意散步一样，终究会受到其他随意事件的调节。索罗斯认为这种错误看法的来源在于错误地引用牛顿物理学定理。

而他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认为，分歧的地方本来就是来自我们不完整的理论，金融市场的现象之一就是参与市场者的知觉本来就和实际情况不相符，有时这种分歧是可以不予理会的，但有时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种分歧，我们才会有正确的答案。

必须承认，感觉与现实之间有一条鸿沟，因为活动失去控制之后，资本市场就会出现一种暴涨/暴跌交替现象。索罗斯认为这是股市疯狂现象，他说：“交易过程在初期是自我强化的，但这个情况只是昙花一现，逝之即然，所以最终只有颠倒过来。”

潜在的投机就存在于这种暴涨/暴跌的交替之中。索罗斯的投资哲学主张：由于市场总是处于波动无常的状态中，暴涨/暴跌交替现象就易于发生，成为资本市场中司空见惯的现象。那么赚钱的途径就在于寻找时机并在不稳定的市场中投资、投机，去达到意想不到的发展。

在所谓正常情形下，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别并不是非常大，其间也有别的力量在起作用，使两者的距离更趋接近。其中部分原因是人从经验中学习，另一原因则

是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或塑造社会状况，这就是被索罗斯称为所谓的近乎平衡状况。

但有时人的想法和现实距离很近，而且并不会互相趋近，这就是所谓的极不平衡状况。这种状况又可以分成两类。其一是所谓动态不平衡，动态不平衡出现时，流行的偏见和主导的潮流会互相强化，直至两者之间距离大到非引起一场大灾难不可；其二是所谓静态不平衡，但事实上静态不平衡在金融市场非常罕见。静态不平衡的特色是极端僵化、极端教条化的思考方式，加上极端僵化的社会状况，使双方都不会改变，于是教条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一直都很大。假如社会改变了，而教条不针对这些改变做出调整，那么，即使这些改变的速度非常慢，思想和现实之间鸿沟也会愈来愈大。这种情形可以维持很大时间，索罗斯举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前苏联。相形之下，苏联解体则可视为一个动态不平衡的实例。

索罗斯说，我们可以把动态不平衡和静态不平衡视为两个极端，而近乎平衡则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种状况。“我喜欢把三种状态比拟为物质的三态：气态、固态和液态。这三态性质很不一样。以水为例，水在这三种状态中都有不同的特点。同一原则也可应用在市场参与者的思考身上。在所谓正常状态中，我称为‘反射’的双向反射回馈机制并不重要，是可以不予理会的，但当这些人趋近或达到所谓极不平衡状态时，反射就变得重要了，大起大落就会接踵出现。”

“这当中，界线与指导人类行为的价值有关。再以水为例，水会结冰或变成水蒸汽是因为压力与温度的关系，但在经济学方面，它则是价格观的问题。问题是，价格无法像温度一样量化，因此我们必须找寻一个能够计算的方法，这就是我没把握的地方。我发现我对价值的了解实在极为有限。我念过经济学，但经济理论把价值视为理所当然。我研究哲学，但我只专注在知识论而忽视伦理学，话虽如此，我还是十分了解两者区别所在，只是没把握能否将其解说清楚。”

仔细检视静态的不平衡状态与近乎平衡状态的界限，索罗斯认为在接近平衡的状态中，人类思想和现实存在差别，两者常常无法一致。人类愿意从经验中学习，且努力自我实现，这些努力使他们不至于太脱离现实。相反地，在静态不平衡中，人类知道无法区别主体与客体，或是接受任一教条为至高真理。例如原始人类对鬼神精灵的信仰，或是前景的教条，就是这种情形。

不过，在动态不平衡上，索罗斯感到自己无法适当地划清界限。思想与现实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但是这回却是因现实过于不稳定，无法像平衡状态般受到尊重，它同时变得太具威严、太可塑了。这现象不会自行发生：原因是参与者的价值系统也脱节了。这是人类的价值观与事件互相强化作用。这是个老问题，也即是大起大落过程。

区别失控与中途停摆的大起大落过程，才是真正重

要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若以实际的金融市场为例，会比纯粹的抽象的解答方式来得容易。假如人们还记得前面所举过的不同例子，便会发现所有失控的过程，都是因为流行的价值观有瑕疵。最常见的瑕疵是原来被视为最基础的价值其实是反射现象。组成集团公司的热潮即为一例：股民相信，每股的平均收益和股票的市价无关。国际借贷热潮也是同样的例子：银行业者相信，他们拟以决定借贷国借贷能力的债务比例和他们自己的放款活动无关。但是还有一个从未提及的不稳定源头。人在缺乏根本价值状况下运作时，当他们了解市场是反射的，市场的确会变得不稳定。货币市场的自由情形就是这样。就如同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中所说，追随趋势的投机行为会使得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变得不稳定，并且这种不稳定性还在不断累积，这种投机行为持续得愈久，市场就愈不稳定。从金融市场回到一般的历史过程，为了维持近乎平衡的状态，人类必须认同某种根本价值，也就是说，必须要有共同的是非观念。一旦失去这项共识，每个人任由他们的权宜手段牵着走，局面就会变得不稳定。

在索罗斯看来，这个不稳定来源目前特别重要。以股市而言，大部分玩家都是法人，他们不关心基本价值，只在乎相对表现。而在表现的竞争中，则是一味地人追人，这反而助长了一窝蜂跟着趋势走的行为。

另外，这种不稳定的来源和政治体系的关系更大。政

治人物只在乎一件事——如何当选。这种想法破坏了我们

的开国元老构想中的民主基础。民主政体的基础是候选人发表政见，再由选民从中选择。然而如果参选者先研究出选民的要求，再根据选民的要求设计政见，挑选民爱听的话说，如此的做法会出现短路，整个过程也会开始变得不稳定。而电视竞选广告的泛滥，使得选举的不稳定更变本加厉。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两者之间的划分是很模糊的。常常有一些力量和作用，把我们推进极不平衡状态。但也有抗衡力量与之对抗，抗衡力量一般都会赢，但有时这种抗衡力量也会抵挡不住，于是就会发生改朝换代或革命之类事情。索罗斯说：“我对这种情况很感兴趣，但不能说我已经掌握足以解释或预测这种情形的成熟理论，我还在摸索阶段。我对金融市场情况掌握得比较好，在政体方面就比较差了，原因是金融市场的时空界定比较清楚，而且还有可以公开得到量化的数据。”

拜伦·韦恩，是在纽约的摩根·斯坦利信托机构的股票投资战略专家，他也是索罗斯的知心朋友。他用如此简单的语言来解释索罗斯的理论：“他的理论是开始时事情做得特别好，然后就特别坏。你应该知道什么时候事情做得好，而什么时候事情将变坏起来。重要的是承认趋势变化的不可避免性。关键点在于确认回折点。”

当索罗斯发现“自我强化”移入到股票和股票集团时，他就会获得可观的利润。投资者突然改变对某企业

的态度，大量买股。当这一企业轰轰烈烈的购股热潮加强了这一企业集团的财力，一个自我强化现象就悄然而至，笼罩在该公司的头上。因为这些公司会通过借债、发行股票和以股票手段获得资本等方法来夸大他的收益。这就是暴涨/暴跌交替的暴涨部分。

当市场饱和和愈来愈激烈的竞争打破了企业集团的前景并且股票变得估价过高时，这一活动就该结束了。此时卖空者就可以到了获得意外成功的日子。本世纪 60 年代的联合大企业集团就是一个例子。联合大企业股价居高不下刺激着这些联合大企业去购买更多的公司。这一政策使得他们把股价推得更高，直到股价暴跌。

当然，鉴别一种暴涨/暴跌交替是困难的事。要鉴别这种现象，投资者必须去了解其他同行是如何洞察经济规律的，以达到知此知彼、取长补短的目的。要知道，市场是投资者的总和，要确定市场在特定的时刻并去把握它，这是乔治·索罗斯投资技巧的精髓。

市场总是处于波动无常的状态中，使得暴涨/暴跌交替现象在资本交易中司空见惯。

一个投资者一旦认识到“市场”的动态会发生什么变化，那么朝另一个方向逆转跟踪就成为可能。在出乎大众意料的发展中下赌注，赌一赌暴涨/暴跌循环将要发生或者已经发生。

如何把握暴涨/暴跌交替现象呢？

1994 年 4 月 13 日，索罗斯出现在国会银行委员会

的金融与城市事务部，他向该委员会提供了一个简短的解释，他声明他不同意目前所谓的“盛行看法”。尽管大多数人都相信资本市场趋于均衡，并能精确无误地预计到将来发生的事，但索罗斯却一鸣惊人，臆断“资本市场由于它不可能预计未来发生什么事，而是去塑造影响未来，所以它不可能准确地预计未来的事。”

他说，尽管资本市场只是反映经济规律，可是有些时候也可以去影响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市场就会进入一个动态的不平衡状态之中，它的表现跟“高效市场理论”所标榜的正常现象极不一样。”

但是，这种暴涨/暴跌交替现象绝不会频繁地发生。因为这种暴涨/暴跌交替会直接影响经济的基础，所以它一旦发生，会带有灾难性的破坏。然而，事实在只有市场被一种“随趋势”行为支配时才会发生这种暴涨/暴跌交替现象。所谓“随趋势”行为，是指人们发现价格上涨就去大量进股，而发现下跌时又去大量抛出。

不对称或一边倒式的随趋势行为对于产生一个激烈的市场冲突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导致这种结果来讲是不合算的。那么人们需要搞清楚的主要问题就在于——是什么导致了随趋势行为？

乔治·索罗斯的答案就是：曲解的认识导致了市场以己为食。换种说法，以己为食就是指投资者使他们自己进入到一个盲目狂乱或者是类兽性的心态。

那种以己为食的市场容易产生过激的反应，并总是

最终走向极端。那种过激的反应趋于极端，就导致了暴涨/暴跌交替。

所以，投资成功的关键在于确认市场开始以己为食的点，当这个点被确定之后，投资者就可以知道一个暴涨/暴跌交替的市场阶段即将开始或者已经开始了。

正像索罗斯解释的一样：“市场越不稳定，越多的人们被这种趋势影响；这种随趋势投机的影响越大，市场形势就越不稳定。”

典型的暴涨/暴跌交替的主要阶段是：

- (1) 尚未被确认的趋势；
- (2) 自我强化过程的开始；
- (3) 对市场方向的成功检验；
- (4) 进一步的确认；
- (5) 现实与感觉之间的偏差；
- (6) 高潮；
- (7) 最终，朝相反方向的真实的自我强化交替开始了。

索罗斯还主张说，当一个趋势继续时，投机交易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再者，片面认识随趋势应运而生，于是趋势发展更快，更加明显，那么片面变得更强烈。最终，趋势固定之后，最终进入了相反过程中。

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书中也试图解释这个理论，他认为。大部分人得到的印象是市场价格会受到市场参与者的偏见所左右。假如这就是理论的全部内涵，还需

要研究吗？答案不是太明显了吗？有一些所谓基本元素的东西，一般以为，市价是可以反映的，只有在市场价反过来影响这些基本元素时，大起大落才会接踵出现。

我们可以看看《金融炼金术》书中的例子。集团企业成为一股潮流时，企业集团使用他们这些价钱高估了的股票去买业绩，这些业绩又反过来把高估了的股价变成合理。在贷款热潮期间，银行使用所谓负债比例评估负债国的举债能力，这些所谓负债比例包括未清偿债务和国民生产总额之间的比例及偿还债务和出口额之间的比例等。银行认为，这些负债比便是客观的标准，但事实上这些标准都受到银行本身活动的影响。举例言之，只要银行一旦停止贷款，国民生产总额就会下跌。所谓基本要素及其价值评估之间不常发生“短路”，但一旦“短路”出现时，就会启动一个始于自我加强而终于自败的过程。

价值评估行为往往会发生误差。最常见的误差是，进行价值评估的人察觉不到所谓基本价值并非可以置身于评估行为之外的，这就是集团企业热潮最盛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当时的企业并购，抬高了股票的价格，在银行贷款热潮期间，银行的贷款行为改善了负债国的负债比例，而这些负债比例是银行用以指导贷款活动的指标之一。

不过这也不是必然的。例如日本土地投资热潮就不能视为误差，这是蓄意行为，是很有远见的一着。目的

在鼓励储蓄，压低生活水准，以为日本争取更大的成就。日本人似乎把“反射”作为一种政策，原因可能是他们的思想传统和我们不一样。操纵所谓基本因素似乎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能力，而我们则比较相信冥冥中的主宰，现在日本人快要被自己做出来的茧缚住了，但我们却要仿效他们。

索罗斯应用他的大起大落理论把握市场获得成功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随便列出几件便可见一斑。1969年，他指出用新手段投资就是房地产投资信托，并因此建立了广泛的可靠信誉。由于他认为市场是具有暴涨/暴跌交替的特征，他把房地产投资信托比作一个三幕剧。他预言：房地产投资信托将经历暴涨，然后再暴涨，最后走到倒闭崩溃的顶点。他曾以预言家的魄力得出结论：“因为第三幕即崩溃是三年以后的事，我可以安全地买股票。”他又是正确的，为此又赢得大量的利润。正像他预言的那样，1974年，房地产投资信托变得过盛起来，于是索罗斯又干起了卖空投机，靠跌价获利，为此他双赚100万美元。早期的市场理论验证的尝试极大地鼓舞了索罗斯。

在60年代后期，他又把他的理论运用到联合企业暴涨现象中，他又成功地赚了一大笔钱。起初，他看到高科技公司纷纷地成立起来，相信这些进行股票投机的投资公司的经营者将会大大提高联合大企业的股价，并大量地买进。后来，他开始卖空，牢牢地捞了一大笔。

1981年元月，罗纳德·里根宣誓就职而成为美国总统，索罗斯着迷于看这位有保守倾向的新总统着手进行一个旨在加强美国军事力量的行动——不增税收，以作为一种努力去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里根的这一项新政策会如何影响美国经济？这能否成为新一轮暴涨/暴跌交替的开始？

是的，索罗斯相信，肯定会这样。

电视评论员亚当·史密斯请索罗斯解释这种暴涨/暴跌交替现象什么时候开始。“当你读早报时，钟是否响了？”史密斯问这位投资商：“它是如何运行的？”

索罗斯说，首先，这种现象并不是每天都发生。被他称为“里根的帝国循环圈”的新里根政策，可望已经开始运转，他写道，“世界范围的体系以坚挺的美元、强劲的美国经济、增长的预算赤字、增长的贸易赤字和房地产业的高利率为基础，帝国循环圈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心是个温和的圆圈，在世界体系的边缘是个烈性圆圈。”索罗斯说：“你有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不持续的，最后就要反过来。所以说，这是一个暴涨——崩溃的过程。”

正如索罗斯所预想的那样，里根的政策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1982年夏天，美国的金融市场呈现出牛市，银行利率下降，股市价格上涨。暴涨/暴跌交替中的暴涨现象清楚可见。那年底，量子基金又上升了56.9%，增加了1.933亿美元，从而使它净资产额达到了3.028亿

美元。

为了清晰地表明自己的见解，索罗曾经为大起大落过程建立起一套模式。

他的根据是观察和逻辑思考。这个模式是这样的，首先，整个过程可以在任何阶段打断；第二，这个模式只单独描述整个过程。在现实层面，有太多过程交互作用、互相干预，于是大起大落的序列遭到外来震荡而被打断。因此在实际上，它和孤立模式符合的情况是不常出现的。但模式仍然代表了某种顺序，其中包括若干阶段。假如各主要阶段不是顺序出现，大起大落的过程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不是按照一定的具体模式发生的。

在一般情况下，整个过程开始时是一种不为人所察觉的趋向，到了人们开始察觉这种趋向后，这些警觉就会开始加强这种趋向，这就是最初阶段。在最初阶段时，流行的趋向和人们的偏见会互相作用、互相加强。在这个阶段，我们还不能说极不平衡的状况已经出现，要等到整个过程进一步演进，极不平衡状况才会出现。潮流逐渐变得依赖偏见，偏见则变得愈来愈夸张。在这段时期，偏见和潮流都受到外来震波的考验，假如这潮流中偏见都经得起考验，它们将变得更巩固，几乎无法动摇。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为加速阶段。到了这个时候。假如信念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很大，参与者的偏见就无所遵从，这可称为关键时刻。但由于惯性关系，潮流趋向仍然可以持续下去，但信念再也不会加强，于是便开始走

下坡，我们姑且称此一阶段为黄昏时期或停滞期。最后，信念尽失，使变得依靠更强偏见的潮流趋向产生大逆转，这个逆转可以称为更迭点。相反的偏见则酿成相反方向的潮流趋向，并进而引起灾难性的加速运动，这可以称之为大崩盘。大起大落并非是一个对称的模式。一开始时步伐是很慢的，后来逐渐加速到离谱程度，于是黄昏时期出现，跟着来的就是大崩盘。整个过程结束后，偏见潮流趋向已经不是本来面目了，这种过程会重演，原因在于这是一种体质的转变。

这种现象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中至少观察到过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是美国的银行业。美国的银行业也经历了极端僵化到极端可塑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是反向的，以大落开始，以大起终结。美国的银行制度在 30 年代没落，此后开始受到高度限制，法规几乎冻结整个行业的结构。当时银行不但不在别的州发展业务，有些州更把银行在别州设立分行视为非法，不少银行的资方深受打击。银行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安全，利润和成长反而退居次要，银行业变成了沉闷的行业，只能吸引一些了无生气的人。整个行业死气沉沉，根本谈不上创新，投资者也忽视银行股票。

这种情形持续到 70 年代初期。当时，在银行业平静的表面上，已经有改变在酝酿中。在大学受过企业管理训练的新一代银行家，已经开始冒出头，他们关心的只是结算盈余的问题。当时孕育这种想法的大本营主要为

纽约市第一国民城市银行。在第一国民城市银行磨炼过的人后来在银行界各奔前程，其中不少在别的银行成为高级主管，推出了新型的金融业务。于是有些银行就开始更进取地使用他们的资金，大幅改善了营收表现。

当时也有一些在本州范围以内的并购，于是规模较大的银行开始出现。银行一向的杠杆比率约为资产值的14~16倍左右，但美国银行竟高达20倍。当时业绩比较理想的银行，总资产报酬率约为13%左右。在其他行业，假如有这样的表现，再加上10%以上的股票收益成长率，股票可以大幅溢价。但当时银行业的股票只有一点点溢价，甚至没有溢价。银行证券分析师也知道银行股的股价是相对被低估了，而且当时的计价方式也太稳定了，但许多银行已经开始向所谓“审慎杠杆率”的界限挑战。假如他们要继续成长，他们必须另行筹措额外的资金。

索罗斯说：“1972年有一个晚上，第一国民城市银行招待证券分析师晚宴，这是银行业史无前例的事，我不在被邀请者之列。但这事件促使我发表一份报告，主张买进一些经营比较积极进取的银行业股票。我的论点是银行股将重现生机，原因是银行业将有利多消息，而且他们也会把利多消息传开。当时我在文中说，‘成长’和‘银行业’似乎是两个相反的词语，但这种对立即上要化解了，银行股股价快要起涨好几倍。”

银行股股价在1972年果然有成长，我购进的银行股

赚了50%。有些比较先知先觉的银行也筹到了额外的资金。假如根据帐面资产溢价筹措资金的过程得以成立,银行界就可以在稳固的基础上扩张,并遵循近乎平衡的轨迹演进。但不幸地,整个过程还未真正开始就发生了1973年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于是通货膨胀加剧,利率攀升,同时13%的资本利润率并不足以使银行溢价出售股票。第一次石油危机过后,流往产油国的资金大幅增加,这就是所谓油元再循环的开端,所谓国际贷款热潮也从此开始,直到1982年的墨西哥危机发生后才结束。从中可以看到,美国银行体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竟然在1972年错失了安然进入近乎平衡成长的机会,美国银行业的盛衰也就是苏联盛衰的写照。”

在索罗斯看来,苏联的盛衰则是大起大落过程在历史中的例子,欧洲的统一和分裂从日后看也是这样的例子。

他认为,所谓苏联模式其实是一种无所不包的个体,它既是一个政府、是一个经济体系、是一个地域上的国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苏联几乎是完全孤立,和世界隔绝的,因此大起大落的模式可以应用在苏联身上。但苏联是僵化的,不但主导的偏见,整个制度也是僵化的。所以在加速阶段,当偏见和趋向是几乎不可动摇的时候,整个时期就表现为过度僵化。苏联在斯大林掌权的时期就正处于这个阶段,特别是在苏联制度经过二次大战的严厉考验之后。斯大林死后就是苏联的关键时刻,特别

重要的是赫鲁晓夫向苏共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演说。最后苏共政权重振旗鼓，但黄昏时期接踵而来。在这段时期，苏共用行政手段维持教条于不坠，但教条已经得不到加强，得不到人们对教条有效性信仰的加强。但有趣的是，整个制度愈趋僵化，过去只要有专制独裁的人继续掌权，苏共的路线还是会按照其意愿而改变，但是现阶段，这种弹性已经消失，而恐怖的氛围也稍缓和，腐化的过程于此开始，每一个机关都设法“卡位”。而事实上这些机构并不能享有真正的自主，他们只有彼此进行“交易”。

于是一种相当复杂的交易制度开始取代所谓的中央计划。同时，一个非正式的经济体系开始发展，弥补了正式经济体制不足的地方。这一黄昏时期就是现在所谓的停滞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制度本身的不足日益明显，要求改革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就是更迭点。改革加快了解体的步伐，原因是改革提出了别的选择或使选择合法化，而原来的体制赖以生存的一点就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经济改革显示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戈尔巴乔夫提出重建改革和开发的主张后，苏联解体过程进入最后阶段，而且爆炸性地加快步伐，然后以苏联制度的完全崩溃作为了结。

这过程最引人入胜的特色是，整个过程并不是从近乎平衡走向极不平衡状态，而是从极端僵化走向另一极端——革命性的转变。

索罗斯认为针对所谓不平衡的情况，经济学家往往谈震波、外来影响，证明了孤立的大起大落事件大致是存在的，并已经证明了不平衡未必是由外而内产生的。换言之，金融市场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认为理论上的平衡可以占上风的想法，其实只是我们欠周延的理解带来的错觉。

而现实世界中，是很难找到孤立的大起大落过程的。苏联制度和美国的银行体制有足够的重要性，孤立的程度也很高，因此他们可以展现完整的大起大落过程的特色，这就是他们相似的地方。这两个例子是极有意思的理论样本，原因是他们不但展现了大起大落过程并不仅仅从近乎平衡走向动态不平衡，而是还包括了静态不平衡的内涵。假如出现了静态不平衡，所谓加速阶段就会以僵化、恶化的面目出现。但千万不要以为完整的大起大落过程俯拾皆是，事实上它们是难得一见的。制度系统并不在孤立中动作。每一种制度、每一种系统，都有所谓次系统，而各种制度系统也只是现实的一砖一石而已。各种制度系统和次制度、次系统之间也是互相影响的。总而言之，这就是在理解和掌握“大起大落”理论时必须注意的几个要素。

第五章

狙击全世界

经商并不复杂。中等智慧的人就能过衣食不愁的生活。但真正聪明的人才能积累大财富，如果他们想要的话。你的问题在于只做你感兴趣的事。想发财就不能考虑所做之事为何，只能死守底线，整天只能想着要赚钱这一件事。如果这需要他多设几个擦鞋摊，那他就得立刻采取行动。

——乔治·索罗斯

（一）进攻英国

1992年9月，乔治·索罗斯取得了自他投身金融投资市场以来的最辉煌的成功。由于他押下对抗英镑的巨额赌注——有人说这是人类金融史上最大的一笔赌注，在9月16日（星期三）短短一夜之间，他赚到了9.58亿美元的利润，这次成功使他得到了“世界最伟大的投资家”的美誉。

而在这之前，促使乔治·索罗斯能够取得成功的种种必要因素已经形成。

为创建单一欧洲货币，欧洲国家于1979年组建了汇率机制系统(ERM)，该系统可能会成为实现这一目标扩大经营项目的首家机构。单一货币将对欧洲的商业起到巩固作用，同时也将削弱对商人和投机商的影响，他们可能会使政府的银行日子不好过，尤其是当这些政府在货币联盟里各行其是的时候。汇率机制(ERM)一旦运作，西欧国家将被联结在一起，他们的货币与黄金或美元脱钩，与另一种货币挂上了钩。每一种货币将在一定限度内进行交易，这个限度叫做段。如果哪种货币上涨至段的高峰或跌落至段的底谷，这种货币国家的央行有责任和义务在高峰时抛售自己的货币，在底谷时买进货

币，将价格稳定回原来的水准。而在这些范围段内，这些成员国的货币可以根据其他成员国货币以及央行德国马克的汇率上下浮动。为了建立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欧洲，使该地区的货币经济体系逐步实现全面一体化，1992年7月欧盟12个成员国签署了《马斯里赫特条约》。该条约的目标是到2000年建立一个中央银行和单一的货币，设想推动欧洲向政治一体化迈进。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愿望和构想，但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幻想。

建立一个中央银行和单一货币体系，对建立统一而强大的欧洲非常必要。然而这需要一个重要前提：所有欧洲国家必须一致行动，在经济政策上密切合作，为了维护联盟的团结，在必要时抑制乃至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在索罗斯看来，这是西欧各国的政治家们做不到的。这是源于他的直觉，更是源于他的金融投资理论。

索罗斯是一名伟大的金融投资理论家，他喜欢在股票、债券和外汇市场的实验室中去验证他的理论。这是一个完美的实验室。其中充满了动态的美感，绝没有任何死气沉沉的东西，无论哪种情况都不会出现使人百感无聊的东西。一种股票不是上升就是下跌，否则它就会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上。任何一种关于如何操作股票市场的理论都可以根据逐日的行情变化得到验证。

大多数投资家都相信金融领域是充满理性的，并坚信股票价格建立在一种逻辑的基础之上。只要理解这种

逻辑，你就能发财致富。但索罗斯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金融世界是不确定的，其中充满了许多混乱的因素。索罗斯认为：只有理解混乱，你才能变得富有。试图彻底弄懂金融市场的变化莫测，就仿佛它们的波动完全会符合某些数学图表所揭示的规律，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索罗斯确信，数学并不能控制金融市场瞬息变化的各种因素。

心理本能，更准确地说，在整个金融世界中，是大众的本本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对一个投资家来说，重要的就是弄清楚大众在何时对某一种具体的股票、货币或商品是作何理解的。概括这种理解，成功的投资家就会提前做出决策而采取行动。这一次，事实证明了索罗斯理论的正确性。

1989年11月9日，在欧洲发生了一件在现代史意义上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世界大事：柏林墙推倒了，这意味着德国将重新统一。一个新的统一的德国将会崛起并日益兴旺，这将对整个欧洲乃至它的货币体系带来好处。但索罗斯不这样认为。他意识到新德国试图想取得财政上的统一，将会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此外，他还意识到德国将会把它的注意力转向自己内部的建设，为它自身的经济问题担忧，而对其他西欧国家的经济问题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显而易见，一个目光内向的德国势必给整个欧洲经济的方方面面带来连锁式的影响。当然，其中也包括其他国家的外汇交易。索罗斯坚信情况

会如此。在整个事件过去以后，索罗斯在一个场合曾经详细地表达了他当时的看法。他是这样说的：

“欧洲汇率机制在近乎平衡状态中运作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事实上，欧洲汇率机制是一个很高明、很复杂的制度，可以容许频繁的调整，但这些调整又不会太过分，以避免像我这种投机分子趁机发大财，所以这是一个近乎平衡的制度，汇率机制最了不起也只能这样了。”

“后来，苏联解体，德国统一，于是整个制度陷入动态不平衡。根据我的理论，所有汇率制度都是有缺陷的。欧洲汇率机制也难免有潜在的缺陷，但这些缺陷要等到德国统一后才变得明显。这缺陷就是西德中央银行在此统一制度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其一是欧洲汇率制度的中流砥柱，其二就是西德宪法规定的西德马克稳定守护神作用。在近乎平衡状态中，西德中央银行扮演这种双重角色，一点也不困难。但德国统一后，东德货币以过高的汇率兑换西德马克，于是与西德中央银行的双重角色发生抵触。

这种双重角色如何发生矛盾？最终又如何影响到整个欧洲的货币体系？索罗斯作了如下说明：

“一点也不错。西德向东德大规模注入资金，在德国经济之内造成了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西德宪法——不仅仅是西德法律——规定中央银行要提高利率，以抵销通胀压力，中央银行果然如此做，而且做得还满尽力的。

但在当时，欧洲——特别是英国——还在经济衰退的深渊中，德国的高利率对当时英国的经济状况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在德国宪法下，德国中央银行发生角色冲突，两种角色何者应该优先，我想这个问题根本问都不用问了。于是，德国在整个欧洲进入经济衰退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遂失去成为欧洲汇率机制中流砥柱的资格，于是一直在近乎平衡状态中运作的欧洲汇率机制，顿时就陷入动态不平衡的状态中。”

“其他冲突也使当时的局势恶化。德国总理科尔和德国中央银行在东德马克兑西德马克的汇率问题上也起了齟齬，双方对如何弥补政府财政赤字问题也意见相左，但这些冲突有更深的根源。苏联解体之际，科尔找了法国总统密特朗商量，他告诉密特朗，他希望德国的统一是以整个欧洲为背景的。他们也同意，欧洲共同市场的结构必须加强，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却不同意。于是各方开始了艰苦的谈判，结果促成了（规范欧洲统合的）马斯里赫特条约。马斯里赫特条约规定建立一种机制，以便日后实行欧洲单一货币制度，但这个构想其实是很有缺陷的。”

“建议中的欧洲单一共同货币(EMU)为德国中央银行敲响丧钟，原因是日后还有一个欧洲中央银行凌驾于德国中央银行之上，也许可以这么说，欧洲中央银行继承了德国中央银行的精神，但对德国中央银行这种很有影响力的结构来说，这说法谈不上是什么慰藉。大机构

似乎都与生俱来地希望永续存在，比起其他组织，大机构似乎更有寻求永续经营的意志，但马斯里赫特条约威胁到德国中央银行的生存。”

索罗斯认为，所以当时引起冲突的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三个问题。其一是德国要实行和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货币政策；其二是德国中央银行实行的并非是德国总理科尔选择的财政政策；其三是德国中央银行要为生存而战。理解第三项冲突的人最少，但这些冲突却是最有决定性的。在静态的表面下这些冲突慢慢升温。德国在1990年统一，但危机到了1992年才爆发，不过，注意此事的人即可能看到危机逐步展开的过程。

聪明的索罗斯在当时就已看出，为了自身的利益，德国中央银行在关键的时刻不会出面支持其他国家的货币，其中当然包括英镑。

在欧洲多国的货币中，索罗斯打上英镑的主意绝不是偶然的，凭着他猎人一般的嗅觉，他早就从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中闻到了一股很诱人的香味。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英国经济处于一种恶化状况，是一种典型的泡沫经济，使英镑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压力下。随着经济陷入困境，英国要想再保持它的高利率是不可能的。对于英国人来说，惟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只有降低利率，但降低利率会使英镑贬值，这将迫使英国退出汇率机制。但如果英国人将坚持留在这个机制里，似乎永远也不会那样做。

这种困境，索罗斯早就有所预料。1990年，他注意到英国采取了加入新的西欧货币制度（ERM）的重大步骤，新西欧货币制度，也叫做货币汇率体制。索罗斯认为，英国参与进去是一种错误的决策。因为英国的经济势力不强大，由于加入货币汇率体制，英国实际上就把自己和西欧最强大的经济势力——新的统一的德国拴在了一起。因为英国想改变它的货币政策，但它又没有能力实现这种改变，所以它只好让这些政策向占有优势的德国货币政策靠拢。

这是一种利弊共存的联系，这种联系会使英国最大限度地依赖于德国。作为这一地区具有最强经济实力的代表，德国完全有力量来决定针对西欧其它国家来说什么才是经济上有利可图的举措。索罗斯认为，这种对德国的依赖实际上会给英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因为为了渡过经济难关，英国想调低自己的货币汇率。而德国人出于他们自身的考虑却不愿意降低汇率。他们深怀恐惧，担心在德国再次引发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他们对20年代爆发的那次通胀仍怀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当时那次通胀几乎给德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德国不打算降低汇率，那其他欧洲国家也不可能降低它们自己的汇率。要是它们这样做了，那就可能使它们国家的货币遭到贬值的危险。一旦贬值，这些国家的货币就有可能成为投资家的牺牲品。所以，英国一直都处于这样一种两难的困境中。

然而，像索罗斯这样卓有预见的投资家，早已开始行动。他们把宝毫不犹豫地押在了英镑最终必将贬值上，而事情也在一步步地朝着这个结果发展。

对于一心企望德国利率能降下来从而缓解自己所面临的经济困境的英国政府来说，随着1992年时间的不断向前推进，它所受到的压力越大。英国将固定其政策，梅杰政府决心坚持到底，在汇率机制的框架内维护英镑的价值。政府作了种种努力，想寻找到一种快速补救措施，但又顾虑重重。因为这样做需要在政策上做某种倒退，而政策的逆转则有可能动摇政策的根基，甚至可能导致政府垮台。而这时情况已变得十分不妙，梅杰首相誓死保卫英镑的政策遇到了相当压力，此时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已跌到1:2.85以下。

在1992年7月份，情况进一步变得不妙。英国商业领导人要求在汇率机制内对英镑进行改组，要求中央汇率在1:2.60马克左右。他们要求利率也进行至少3%的削减。但他们的动议没有一个能说动政府。政府不愿意无奈地降低利率，那会使它的货币贬值。贬值了的货币对于投机商和货币套保者将是极有诱惑力的。如果德国人比他们以前更甚地削减他们的利率，英国人才可能降低自己的利率。然而，自主性很强的中央银行坚持施压，

要求降低利率。6名主要的金融界人士致函伦敦《泰晤士报》，强烈要求英国从汇率机制撤出。在这封信里，他们提出政府可以降低利率以帮助英国克服经济衰落的困境。批评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伦敦金融专家对政府的政策产生了疑问：面临英国经济的持续衰退，梅杰和拉蒙特是否具有坚持实行这一政策的基础？

面对各界要求降低利率的呼声和各种议论，在1992年的夏季和秋季，英国财政大臣拉蒙特作了顽强抵抗。他是这样说的：“正如某些人提出的那样，如果我们从汇率机制走开，大幅度削减利率，情况就会更糟，英镑就会下泻，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的爆发。所以，我们不打算降低英镑的价值。我决不能抹杀我们已经取得的进步。”

拉蒙特重复着近日来唐宁街常常听到的话：“我们将做出我们需要做的一切事情。”这表明如果需要，政府对提高利率不表示任何担忧。他避开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离开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正在采取行动。”

拉蒙特把英镑贬值的可能性排除在外，希望能使金融市场平静下来，希望能避免利率的上升。他一再坚称英国将不会离开汇率机制。这位大臣坚定地说，他“仅仅是想彻底阐明政府的态度。英国将不会出现货币贬值，不会离开汇率机制。我们完全致力于汇率机制的事业，这是我们的政策的核心。”

为了使大臣的话加以证实，英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行动；为了阻止投机商们打压英镑的活动，英格兰银行开

始介入积极购买英镑，并且购买了大约 3 亿英镑。

拉蒙特的信誓旦旦，英国政府的积极行动，应当说能够起到相当积极的影响。然而细心的人们已有新的发现，并有理由心存疑虑。一位颇谙心理分析之道的名叫凯瑟琳·查尔顿的女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是一个心怀巨大疑虑的人。”在查尔顿看来，拉蒙特的眨眼率泄露了他的秘密。据她称，大多数人每分钟眨眼 6 到 8 次。可是拉蒙特 45 秒钟就达到 64 次。“通常情况下，要是你在说实话，或者说话的态度很真诚，你的眼睛平静而安详。”拉蒙特演说时的身体行为，眨眼比率，急切的心情，都使投机商们感到一个问题：政府正在变得软弱，摊牌的时间正在到来。

其实，乔治·索罗斯早已看到了不祥的征兆。对于梅杰和拉蒙特的话，他这样说道：“根本不能令人确信，因为现实形势相当为难。”

在索罗斯看来，现实情况是很清楚的。英国人要保持其货币的高价将处于十分窘迫的困境，他们的经济将保持在不景气的地步。事后一位电视台记者问索罗斯，为什么他没有被诺尔曼·拉蒙特的话所说服。索罗斯一下子欢快起来，然后笑道：“我所能说的还是以前我说过的一句话：它不能令我信服。”

他说：“我私人没有预见到汇率机制的崩溃，我只是看到权力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后来形势变得很明了，那种紧张压力太大了，那种裂隙太大了。联盟银行的总裁

施莱辛格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访谈，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那实际上是对每一个人发出的响亮口号，即从英镑里摆脱出来。”施莱辛格提出，那个要求意大利人在外汇兑换中对里拉进行贬值，要求德国削减利率的协议，远远没有达到解决欧洲货币市场危机的效果。然后他暗示说，只有通过贬值才能避开混乱。这篇访谈成了向投机商们发出的抛售英镑的一份邀请。

索罗斯从施莱辛格那里了解到，德国人决不会做出损害本国经济的事情。施莱辛格不情愿放弃英国和其他几件事，使梅杰与拉蒙特让英国保留在汇率机制内更不可能。观察到造成灾难的诀窍，索罗斯开始相信，进行一次大的投资活动已成为可能。“我们近乎为一次考试准备了足足6个月，”索罗斯的一位不知名的发言人说，“现在终于要参加考试了。”

对索罗斯而言，考试便是采取行动，为了这次行动他已准备了很长的时间，他所玩的这场游戏是复杂的。说它复杂，因为他相信汇率机制的崩溃，现在已在不可避免，将会带来一连串的变化。第一，欧洲货币的主要部分的重新组合。第二，欧洲利率的急剧下降。第三，欧洲股票市场的跌落。因而他决定卖空贬值的欧洲货币，而把赌注押在利率和保险市场上。在一步大胆的行动中，索罗斯和他的伙伴一下子卖出了大约70亿美元的空头英镑，然后他们买进了价值6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他们的小范围内也买进了一些法国法郎。

同时，索罗斯购进了价值 5 亿美元的英国股票。他的根据是，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以后，该国的普通股常常会往上涨。在另一步行动中，索罗斯在德国和法国债券方面做了多头。与此同时，他卖空了德法两国的普通股。索罗斯的考虑是，既然德国将要调低利率，增值了的德国马克就会损害普通股，而对债券有益。索罗斯有坚强的信心。因而他能以仅仅 10 亿美元的担保保持了这些头寸。为了赢得 100 亿美元的赌注他已经借贷了 30 亿美元。

在纽约，索罗斯也投下了最大的赌注。“我们拥有 70 亿美元的普通股，我们整个的头寸有 100 亿美元的规模。所以说这是我们全部资产的 1.5 倍，”索罗斯评论说。以量子基金作抵付，他借贷了 50 亿英镑。然后他以汇率机制 1: 2.79 的汇率将英镑兑换成德国马克。现在他手中掌握的是坚挺的德国马克。

量子基金的另一位负责人，索罗斯的助手德拉肯米勒在发起实施对英镑的攻击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像往常那样，索罗斯给予了他极大的自信，鼓励着他敢于押如此巨大的赌注。“我告诉他要封杀对手，”索罗斯说。“就像桶中杀鱼，只要桶能够支撑住你，你就要继续不停地杀它。”

德拉肯米勒这样评述这次行动：

“真正的决策不是我们是否占据了一席之地，而是我们走进去多深。起初，我考虑投入 30 或 40 亿的规模。那

是乔治的天性所在，这天性是他的第6感觉或别的东西，正是它使他成为一个如此伟大的投资商。在他看来，这种天性并非你是对还是错，而是一旦你知道自己对的时候，要保证你最大限度地施展你的才华。实际上，他——我们——应该再多押些赌注，但我们错过了时机。”

押下百亿美元赌注，事后证明是净赚十多亿美元，但还称是“错过了时机”，这是何等的胃口和气概！而此时，参与攻击的已不止索罗斯一家。世界各地的投机商们都纷纷行动起来，他们都在打赌：英镑不可能再保持住原来的价值了。

事情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虽然梅杰和拉蒙特态度强硬，坚持不改变现行的货币政策，但看起来英格兰银行好象越来越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英镑。

进入9月后，英国政府进一步采取他们认为尽可能采取的有效措施。

拉蒙特宣布，政府计划从一系列国际银行借贷75亿英镑。这项史无前例的举措意味着政府要复兴英镑。伦敦城里出现了兴奋的高涨情绪，人们如释重负地得到了片刻的宽慰。因为，拉蒙特已经变戏法似地找到了解决英镑危机的办法。

而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尽量设法使英镑保持坚挺，使它能留在汇率机制里。拉蒙特再一次排除了英镑贬值的可能性。约翰·梅杰在格拉斯哥向英国苏格兰工业联盟作演讲时，使用强硬语言。他的一个手指向空中一刺，然后声称说：“举棋不定的选择，贬值论者们的选择，通货膨胀的选择，依我看，那只会是未来的事情。我明确地告诉大家，那不是这届政府的政策。”

约翰·梅杰首相原计划 9 月 15 日要前往西班牙进行访问，为了妥善处理这次汇率体制危机，他不得不取消了这次访问，而专心致志地面对严重事态。当一个国家的货币面临威胁时，其财政官员常常备有几套应急方案。其中之一便是强行干预外汇市场，购进自己的货币。如果此方案不起作用的话，下一道防线便是提高利率，一般认为高利息会把资金吸引回自己的货币，从而达到稳定的目的。但是，为了不削弱经济发展，英国政府不愿意提高利率，显然，他们对渡过这道难关还心有侥幸。

整个事态却在往进一步恶化方面发展，9 月 15 日上午，意大利里拉开始下跌，这对英镑来说是一个信号，交易商们已开始做大笔的英镑对马克的交易。下午，英国货币的汇率已降到了 2.8 马克兑 1 英镑。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有消息说英格兰银行收购了 30 亿英国货币。英镑没有作出反应。

在伦敦，英镑的收市价只高于其汇率体制中规定的最低额 1/5，这是英国加入欧洲汇率体系以来的最低点。

白厅（英国政府）的忧虑不断加剧。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否则英国货币将遭受 1967 年以来的首次贬值。这次，英国人仍然寄希望于德国人。

在 9 月 25 日这一天，拉蒙特不断打电话给德国邦德斯银行的官员，请求他们降低利率，帮英国人渡过难关。如果拉蒙特能成功说服德国人，帮助缓解英国的压力，或许大英帝国就可以平安度过后面几天，其金融体系也会暂时逃脱严重混乱的命运。但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邦德斯银行拒绝作出丝毫让步。这对英国人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

人们注视着英国财政部与德国中央银行的争吵。投机者们预计英国将最先作出反应。英国政府最有可能采取的步骤——无论从长远利益看这会给经济带来多么大的灾难——将是提高利率。因此赌博继续进行。

与此同时，为了应付危机，拉蒙特召集英格兰银行的官员们在财政部举行紧急会议。他们计划明天英格兰银行开始大规模地与公开干预。此外，作为最后的保留方案，在需要的时候将提高利率。

当天晚上 8 点钟左右，财政部会议结束了，当官员们走出会议时，他们还企盼着会议的决定足以结束这场危机。但是局势瞬息万变，他们的计划落伍了。因为在 4 个小时前，德国邦德斯银行的总裁赫尔穆特·施莱辛格接受了对他来说颇具争议性的一次采访。采访结束时，他要求不能公开发表他的评论，但采访内容还是很快传

播开来。英国人事先并不知道这次采访，但消息传来无异是爆开了一颗重磅炸弹。

索罗斯事后对此事进行过如此介绍：“德国中央银行总裁施莱辛格向一群名流发表演说，我从他的演说中得知内情一二。他说，假如投资者认为欧元是一篮子固定的货币，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当时话中有话，他针对的是意大利货币里拉的积弱不振。事后，我问他喜不喜欢使用欧元作为一种货币，他说，他喜欢欧元的构想，但他不喜欢欧元这名称，假如欧元称为马克，他会比较喜欢。”

“这透露了一些端倪。换言之，我们最好抛空里拉，而且事实上，里拉果然在不久之后就被迫退出汇率机制。这一点也透露了另一种消息，就是英镑也是脆弱的。我们在抛空里拉后赚到的钱也让我们在英镑方面冒风险时获得一点保障。压力不断升高，整个局面也变得紧张刺激。高潮是英国政府决定把利率调高二个百分点，以捍为英镑，但这只是英国的孤注一掷，说明了英国的做法站不住脚，也鼓励我们更积极地抛售英镑。最后，英国在中午调利率，晚上，英镑就退出汇率机制。”

英国政府调高利率和英镑退出汇率机制都是后来发生的事，而这时，施莱辛格的采访内容一经披露，交易商们就开始向英镑、意大利里拉及其他软弱的货币展开攻击。他们复仇般地抛出它们，转购马克，对这些软弱的货币形成冲击。而此时，索罗斯正坐在远在纽约市中

心曼哈顿的办公室里。这个办公室在一座摩天大楼的 33 层，正对着中央公园。他觉得信心很足，踌躇满志。这一切他都作了预料，并亲眼看到事件的来临，他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事情正在发生，他对一件事丝毫不感到怀疑——他要赚大钱了。后来，在第五大街他的寓所里，他享用了厨师专门为他烹制的简朴的晚餐。餐后，他上床休息。虽然他刚做了 100 亿美元的赌注，这也许是历史上最大的赌注，而现在，他准备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 7 点钟，索罗斯家的电话铃响了。那是斯坦利·德拉肯米勒报告消息的电话。索罗斯在电话里听见这位助手说，情况太妙了。实际上，就在索罗斯那晚熟睡之际，他净赚了 9.58 亿美元。

9 月 15 日这一天，也即是英镑被迫脱离欧洲新货币制度的这一天，英国人称之为“黑色星期三”，而索罗斯称之为“白色星期三”。这次行动让索罗斯成了世界著名的风云人物。作为一个投资家，这是他所取得的最令人瞩目的成就。

就在索罗斯在远离伦敦的纽约曼哈顿家中熟睡时，英镑正一步步走向它命运的终结。

从星期三早上 7 点开始，英格兰银行召集了八名外汇交易人员开始干涉市场。他们动用 20 亿美元，分三批

收购英镑。但不管他们收多少，卖盘还是疯狂涌出，抛售英镑的人太多了。成百上千在英国设有工厂和办事处的公司，数以千计的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以及其他拥有以英镑为主的股票和债券的投资商都拼命抛出手中所有以英镑计算的财产，使这次演练令人恐怖地失败。一时间英国金融界笼罩在沮丧的气氛里。

财政部危机反应小组在财政大臣诺尔曼·拉蒙特的办公室。人们都面色严峻。拉蒙特刚同英格兰银行负责市场的助理行长伊恩·普伦德莱恩以及英国首相梅杰通了电话。放下电话后，拉蒙特下令动用银行外汇储备进一步干预市场。随后不久，诺尔曼·拉蒙特拨通了令整个英国金融界恐惧的电话。约翰·梅杰找了个借口步出会场，走到一部保密电话旁边，听拉蒙特讲述英镑继续下跌的消息。德国利率保持原地未动。德国人不打算提供救援。必须不惜代价阻止英镑贬值。政府的信誉面临着最大的挑战。拉蒙特要求首相同意将利率提高两点，提到12%。没有其他选择，梅杰只好点头同意。

英国宣布提高利率，标志着英格兰银行的种种干预失败。为了这次行动，英格兰银行用了其全部外汇值储备440亿英镑（合788亿美元）中的150亿英镑（合269亿美元）来收购英镑以挽救自己的货币，但最终宣告失败。

提高利率的声明是11点发布的。但最糟糕的是，尽管拉蒙特发布了提高利率的声明，英镑的状况还是不见

好转。以美国为例，外汇市场在下午一开市，英国货币被抛售，用一位交易商的话来说：“如同洪水泄闸一般。”

英格兰银行再一次试图挽回局面。它再一次提高利率——一天之内第二次。现在的利率是 15%。英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天之内再次提高利率的先例。现在的利率水平和两年前当时的财政大臣约翰·梅杰把大英帝国带入欧洲外汇体系时的利率水平一致。

市场目睹了英国利率一天之内从 10% 升到 12% 再到 15% 的全过程。人们都明白，英国是不可能长久保持这样高的利率的。因此，英镑继续下跌，英格兰银行继续回购。但投机商们并没有被说服。英镑仍徘徊在欧洲外汇体制规定的最低限额 2.778 德国马克的水平线下。事情变得十分明显，政府的政策在政治上是无法维持的。

最后这一天的努力都失败了。很明显，英国将脱离欧洲外汇体系。英国货币将被迫贬值。

首相约翰·梅杰又一次拿起了电话，这次是打给法国总理皮埃尔·贝雷戈沃伊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梅杰的消息很残酷，他宣布英国将被迫退出欧洲外汇体系，别无选择。

事实证明，在这场非同一般的争斗中，索罗斯同全英国最令人望而生畏的两种规制进行了较量。

在 200 年时间里，英镑曾经是一个万能的，一直是

世界上的主要货币，它与黄金挂钩，和英国海军一样成为英国支配地位的象征。另一个索罗斯与之较量的是英格兰银行。多年以来，该银行代表着繁荣和力量，是英国金融界地地道道的一块坚不可摧的柱石。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它从整个国家应付市场混乱的最坚强支柱的位置上移开。

在这场争斗之中，索罗斯成了胜利者。从某种程度上讲作为英国象征的这两种神圣的东西都宣告失败。

这场胜利，成为乔治·索罗斯事业的转折点。

如果以前新闻界对他只有片刻的兴趣，如果华尔街和伦敦城外的人很少提起他的话，从此以后，情况彻底改变了。

现在，每个人都想知道这个一手策划了导致英镑崩溃的家伙到底是谁。从乔治·索罗斯成功行动的消息传开起，他便成了“击垮英格兰银行的人”。当然索罗斯并没有击垮英格兰银行，但他让该银行大吐血，倾倒出宝贵的资金。

10月24日伦敦的《每日邮报》报告了《福布斯》即将公布的一条消息，公开了索罗斯所做的赌博。它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整个故事，并冠以醒目的黑体大字标题：《英镑崩溃中我赚了10亿》。《每日邮报》随后又登出索罗斯的一幅照片，他面带微笑手持酒杯。导文是：“这位国际金融家在上个月的货币危机中赚了将近10亿英镑，这是昨天夜里的消息。”

自此以后，一层日益厚重的神秘的面纱开始笼罩在索罗斯身上就毫不奇怪了。他成了人人议论的人物，而且是一个值得人人去效仿而决不会出错的人物。

在他对英镑采取明智举动的两个月后，一个记者在1992年12月拍摄了一部关于索罗斯的电视记录片，该片给人的印象是，就仿佛索罗斯有能力改变市场：“由于你投资黄金，所以每个人都认为他们应该投资黄金，于是，黄金的价格就上涨。你写过一篇置疑西德马克币值的文章，于是，西德马克就真的出现了贬值的现象。你在伦敦的房地产做过了一次投资，并且那种房产价格跌落的趋势似乎在一夜之间便得了根本性的扭转。难道一个人真的会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

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他能改变市场：他对某一种如黄金那样的商品，或如马克那样的货币所说的某一句话似乎就能导致市场交易行为的改变。似乎价格的升跌完全依仗于他所说的话。

而索罗斯本人对此却保持着一种超然态度。曾经就此事采访过索罗斯的凯莱茨基说，他对这位投资家表现出来以无动于衷感到十分震惊。

“看上去他对于赚钱完全是一副超然的态度，精于理论。当然那时我没有注意到……这对于他在情感上有什么重要意义。……在这件事上，看上去确实仅是一种记分的手段。……很显然他对于能策划成功这一行动感到十分自豪。因此他决定接受我的采访，详谈此事。……

他十分得意于自己的聪慧，能估算出未来。能对抗英格兰银行当局并获得了最后胜利。”

在必要的时候，索罗斯也乐于解释一下他的种种做法，当凯莱茨基这样问他，如果梅杰首相早于黑色星期三决定提高利率的话，结果是否会好些？索罗斯回答说：“完全错误，一派胡言。利率的提高只会刺激我们加快进行交易，这只会加速整个过程。实际上，我们最初的估计是拖到周末英镑才会贬值。但是在黑色星期三利率提高时，我们认识到不能再等了。我们必须加速抛售来增加我们的头寸，机不可失。”

凯莱茨基问他为什么要把全部财产押在一项政策的失败上，而此政策却是英国政府坚持奉行不变的。索罗斯说他坚信德国邦德斯银行想让意大利和英国货币贬值，而不是法国。他说：“我感觉随邦德斯银行押注很安全。很明显，邦德斯银行希望里拉和英镑贬值，但它准备保护法郎。最后成绩是，邦德斯银行 3：0，投资者 2：1。由于站在邦德斯银行一边下注，我的获利要比其他投资者高。”

索罗斯对凯莱茨解释他在黑色星期三之前的行动说：“我确实卖空了大量英镑，确实赚了许多钱，这是因为我们的基金太大了。在欧洲外汇体系分裂之前的一段时期里，我们是市场上最大的独家投资者。在黑色星期三那天，我们的总头寸将近 100 亿美元。我们计划卖的数额要高于此数。实际上，当诺尔曼·拉蒙特在英镑贬

值之前宣布他将借入将近 150 亿美元来保护英国货币时，我们哑然失笑，因为这正是我们想卖出的数额。”

在采访的过程中，有时索罗斯不再像投机商那样三思而后言。他担当起金融分析家的角色，说投机活动十分有害，尤其是在外汇市场上。“但是，如果采取措施来阻止投机，如进行外汇控制，这样做危害更大。固定汇率制度都存在弊端，因为它们最终将崩溃。实际上，任何一种汇率体制都存在弊端，其存在时间越长，弊端越大。惟一的出路是不采用任何一种汇率体制，而是采用欧洲单一货币，像美国那样。这将会使我这样的投机商失业，但我很乐意做出牺牲。”

索罗斯的话显得轻松自如。对于他们胜利，外界却显出褒贬不一。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大多数英国公民眼里，索罗斯成了民族英雄。凯莱茨基回忆说：“这里没有出现恐外敌对思想——有人可能会这样认为——相反，英国公众以一种典型的英国方式说：‘他太棒了。如果他真能利用我们政府的愚蠢赚了 10 亿美元的话，他一定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

乔治·马格努斯是伦敦 S·G·沃伯格证券公司的首席国际经济学家。马格努斯认为：“新闻界的一些看法似乎是说，这是一个有眼光的金融家，把他的钱投到嘴巴能够得着的地方……但是，英格兰银行和联合王国政府却被指责为依然生活在黑暗时代，看不清当前正在发

生的事。……在新闻报导中，索罗斯……也被举为实例，证明投机家们在如何不知羞耻地从政府手中赚取利润。因此这可谓是一箭双雕。”

理所当然地，索罗斯也成了为英镑感到痛苦和为英镑感到难过的人们发泄仇恨的对象，他们必须要寻找替罪羊。

法国前外交部长罗兰·杜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投机商——这是指索罗斯这样的英国和美国外汇交易商——破坏了欧洲的理想，他说：“你必须看清是谁从犯罪活动中获取利润。”

人们的仇恨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损失太大了。英国一名电视记者称：“人们认为我国政府对欧洲汇率体制的保证如同英格兰银行那样完全可靠，但事实并非如此。当英格兰银行动用外汇储备来保卫英镑时，其损失巨大。政府不愿意透露损失数额，但它可能超过几十亿英镑。换个说法：今年秋天英镑保卫战中我们的损失要超过海湾战争中我国的费用。”

但是，如果有人想使索罗斯为他的获胜赚钱而感到后悔或内疚的话，那也是决不可能的。因为他认为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当的，而且有益，他把相当一部分钱财用于援助东方，尤其在西方没有人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对英镑贬值这件事，他承认对英国是损失。“在这件事上我没有异议。因为我知道我的对手是谁。任何交易，总有人赢，有人输。但在正常情况下你不会知道对手是

谁，你不知道他损失了还是获利了。在这件事上，很明确我的对手是英格兰银行。我敢保证，我绝对没有丝毫的内疚，因为我不是故意的，有人是故意的。”

“我对于从英镑贬值中获利不感到丝毫的懊悔。事实似乎证明，贬值可能会成为好事。但问题在于：我不是为了救助英格兰才投机对抗英镑的。也不是为了伤害英格兰才这样做。我知道这肯定会导致一些消极的后果。……但这并不在我考虑之内。我不能。如果由于道义上的指责我便停止某些行动的话，我便无法成为有效的投机商。”

他提醒大家说他也可能会有损失：“虽然损失不会像我们赚得如此多。当然这是一个赌博——人们都这样说（他微笑着双手致意），一注赌到底，因为它风险小，可能的损失很少而利润却非常巨大。”

从公正一些的角度看，索罗斯在赌博对抗英镑的行动中并不是单独行动的，英国一家主要证券交易所的一位外汇交易人评论说：“乔治·索罗斯的投资金额巨大，但总体上看，外汇市场的日成交额可以高达1万亿美元，这是个天文数字。与此相比，乔治·索罗斯的100亿美元要小得多。若所有资金都下注倒戈一种货币的话，这会很有效。但这并不只是乔治·索罗斯……击垮了英格兰银行，是针对英国货币的市场投机击垮了它。乔治·索罗斯只是主要负责人而已。”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这次事件的最后一些场景和片断。对于胜利者，这只不过是凯旋乐的余音；而对于失败者，则是最难以忍受的伤心的时刻。

镜头一：

9月13日下午4点，英国人终于彻底屈服了，宣布脱离欧洲汇率体系。消息一经宣布，英格兰经济官员便着手准备与欧洲其它中央银行举行电话会议，传达英国货币与欧洲汇率体系脱钩的消息。与此同时，英镑兑马克的比价下降了2.7%，远低于以前欧洲汇率体系中英镑的最低限额。

约翰·梅杰召集内阁会议，就英国脱离欧洲外汇体系达成一致意见。意大利明确表示也将仿效英国的做法。现在，英国和意大利货币将自由交易。它们的中央银行无需要在公开市场上收购它们以保护其稳定了。

下午7点，公开宣布的时刻终于来到，财务大臣诺尔曼·拉蒙特的整个表现像个遭受重大打击的极其不幸的人。他双手倒背，面色疲惫、沮丧、憔悴。说话时只能勉强挤出一丝微笑。他只能这样说：“今天是充满艰辛与动荡的一天。大量资本的持续流动破坏了欧洲外汇体系的正常运转。……同时，政府作出结论，只有脱离外汇体系才能保证英国的最大利益。”这标志着，政府允许英镑自由浮动。英镑当天下跌了3%，第二天，英国货币

利率下降到 10%。

紧随英国之后，意大利也宣布脱离欧洲汇率体系。英镑马上跌到了 1：2.70 马克，然后稳定在 1：2.65 马克，低于其原先的最低限度的 5%。最终将比黑色星期三那天的汇率低 16%。并非只有英国货币贬值，西班牙货币贬值 28%；意大利贬值 22%。英国脱离欧洲率体系的消息传来，纽约市场大英镑的交易价降为 1：2.70 马克，比其 1：2.7780 马克的最低汇率限度低 7 芬尼多。而到第二年的夏天，它的下跌幅度将达到 15%。

镜头二：

对于英镑贬值，拉蒙特并没有为此致歉，反而为英镑的浮动决定辩护：“我昨天的所做所为只是面对狂热旋风的合理反应。”

拉蒙特试图解释说浮动汇率不会导致英镑贬值。梅杰的保守党对首相表示同情，转过来指责德国邦德斯银行把英镑推上了绝路。

而乔治·索罗斯开始着手分析这场旋风所带来的破坏，他说：“它的直接后果是汇率体系的崩溃，经济的动荡及其他消极影响。我不清楚其破坏程度，但可能会是非常严重。我的意思是，欧洲将进入一个严重的衰退期。德国的企业正在走向崩溃，法国也不容乐观。……动荡永远是危害无穷的。它可能危害无穷——也可能对一些人有益，比如我这样的动荡分析家，但对于经济，它确实危害极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事件对英国也未必全是坏事。实际上，1992年9月的英镑危机似乎促进了英国及其他受该货币困扰的西欧国家的发展。他们不仅增强了竞争力，而且他们的利率也大幅下降，几年后，他们的出口业兴盛起来。

而对那些刚刚获胜的人来说，好处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有许多人从英镑贬值中赚取了大量金钱，但没有报导他们的巨大利润。卡克斯通公司的希鲁斯·科夫纳和琼斯投资公司的保罗·图德·琼斯都是大赢家。科夫纳基金赚取了大约3亿美元；琼斯基金赚了2.5亿美元。从事大规模外汇交易的主要美国银行——尤其是花旗银行、J·P·摩根银行、化学银行——都赚取了大量利润。总之，第三季度各银行从事外汇交易的总额比正常季度收入高出8亿美元。

索罗斯是其中的突出者。英镑危机过后，索罗斯与他的办公室核实了一下，得知他的英镑头寸的利润接近9.5亿美元，而且还有不断增涨，因为他还用英镑以外的货币进行了交易。在这9.5亿美元中，索罗斯的个人所得占1/3。另外，在针对英国、法国和德国利率进行的多头买进与卖空意大利里拉的交易把他的利润迅速增加到大约20亿美元。

（二）“广场饭店秘密会议”战役

毫无疑问，乔治·索罗斯是一个不相信市场具有理性、行情变化有规律和逻辑可循的人。基于他认为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是欠完整的哲学观点。他认为市场是以大众的“期望”和“随潮”行为为影响力。市场是混乱的，惟有崇尚混乱、理解混乱从而把握混乱的人才能取胜。从中他悟出了市场的“大起大落”特征并形成了他的“反射理论”。以此为指导，索罗斯在金融投资市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92年9月他投下100亿美元的巨额赌注在英镑危机中一夜之间净赚10亿美元的著名战例，就令当世人叹为观止，而在这之前和之后，他还有过多次令同行业人士羡慕不已的成功杰作。

1969年，索罗斯开始设立双鹰基金。这个基金设立的方式使索罗斯能够利用股票和债券作为附属担保品来购买包括股票、债券和货币在内的各种金融证券。也就是说，为索罗斯提供了运用“杠杆原理”进行操作的舞台。而在基金刚设立时，他只有25万美元。25万美元，这就是索罗斯基金起家时的全部资产。

然而，索罗斯从来不只重视资金的规模，而注重利润的多少。要赢得利润只能靠成功的操作。当时索罗斯

为双鹰基金看准的第一个投资行业就是房地产投资信托。

1969年，在他的一个广为流传的备忘录里，他指出用新手段投资就是房地产投资信托，并因此建立了广泛的可靠信誉。由于他认为市场是具有暴涨/暴跌交替的特征，他把房地产投资信托比作一个三幕剧。他预言：房地产投资信托将经历暴涨，然后再暴涨，最后走到倒闭崩溃的顶点。他曾以预言家的魄力得出结论：“因为第三幕即崩溃是三年以后的事，我可以完全地买股票。”他又是对的，为此又赢得大量的利润。正像他预言的那样，1974年，房地产投资信托变得过盛起来，于是索罗斯又干起了卖空投机，靠跌价获利，为此他又赚100万美元。早期的市场理论验证与尝试极大地鼓舞了索罗斯。

在60年代后期，他又把他的理论运用到联合企业暴涨现象中，他又成功他赚了一大笔钱。起初，他看到高科技公司纷纷地成立起来，并膨胀了他们的收入，打动了投资者们。但是冷静的索罗斯相信，这些进行股票投机的投资公司的经营者将会大大提高联合大企业的股价，他大量地买进。后来，他开始卖空，牢牢地捞了一大笔。

进入70年代，索罗斯的投资技巧更见娴熟。这时，索罗斯基金得意的技术是卖空。他承认他通过卖空那些公共机构喜爱的股票而赚钱，并从中获得乐趣。双鹰基金曾跟那些公共机构赌，卖空他们喜爱并看好的股票。最

后，这些股票就暴跌，使他人从中渔利。

索罗斯当时的好朋友罗伯特·米勒说：“索罗斯具有一个技巧，他能在某一思想被大家所知之前而发现它，他能透过表面看到问题的本质。他能确切地知道，他为什么要买或为什么不买某种股票。他另外一种高超的能力是他发现自己处于不利于自己的形势，能够及时拔出脚。”

索罗斯对埃及公司的做法视为他通过卖空而赢利的典型事例。为了卖空，索罗斯基金以每股 120 美元的市价卖空 10000 股埃及公司的股票。然后，该股票开始骤然下跌。两年后，索罗斯再把这些股票买回来，每股 20 美元。这样每股就获利 100 美元，他共赚 100 万美元。

索罗斯后来高兴地解释说：“在埃及公司的情况中，银行没有认识到战后化妆品行业的增涨已经结束。市场已经饱和，他们忽略了这个情况。”

索罗斯能预料到美国铁路业的合并。并且，当其他人预料，纽约市将出现破产，但是索罗斯却从与纽约市相关的股票和债券中获得鸿运，大发其财。这种独特性既显示了他的眼光，又成了他获胜的根本。

在 1977 年底和 1978 年初，他和罗杰斯又决定投资技术和军工企业的股票，这跟大多数人的观点又相反。当时，华尔街的大多数交易者都不会触及此事。摩根·斯坦利集团的巴顿·贝格斯说：“记住，你曾让吉米·卡特以总统身份谈论人权。乔治比华尔街上的人早 18 个月谈

这些股票。”索罗斯指责自己搞这些股票下手晚了些，因为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并大获其利。他仍然是独家。

1973 年到 1974 年间，一些大的公共机构绝望地看着它们的股票降了一半。然而，索罗斯却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光景。1973 年，他的利润上涨 8.4%。1974 年，上涨 17.5%。

1976 年，索罗斯基金又上升了 61.9%。1977 年，道·琼斯指数下降了 13%，而索罗斯基金还是上升了 31.2%。

1978 年，他的基金获得 55.1% 的复利资本，拥有资金达 1.03 亿美元；第二年，即 1979 年，基金的资本又增加了 59.1%，达到 1.78 亿美元。他的高超的战略仍然非常起作用，没有任何过时的迹象。

到了 80 年代，索罗斯的事业愈发呈现蒸蒸日上的景象。而其中最辉煌的要数 1985 年，这一年对索罗斯来讲的确是了不起的一年。

索罗斯曾经总结性地告诉过一个友人，他之所以能在 1985 年取得很大成功。主要是抓准了三个方面：

1. 大量购进日元和德国马克；
2. 在金融债券上的投资；
3. 在外国股市中的投资。

比较起来，索罗斯在美国股市中所取得的成功并不太大，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对于流行的游戏，我一贯不在行。”他于 80 年代中期对迪斯尼的断断续续的投资

似乎证实了这一点，不过他最终还是赚到了钱，虽然这期间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败。

1984年，量子基金会是迪斯尼家族之外最大的迪斯尼股票持有者。当时，社会上盛传有人准备大规模购进迪斯尼股票，以收购迪斯尼公司，结果，迪斯尼股票被越炒越热。最终，当兼并者艺术家萨尔·斯泰因伯格将他的目光对准了迪斯尼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迪斯尼会被人兼并。然而，这的确发生了，迪斯尼股票狂跌至20美元一股。索罗斯和众多的投资者一道，都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索罗斯毕竟与众不同，他相信，在遭受股票讹诈的削弱之后，迪斯尼股票一定会反弹。他的助手拉斐尔也感觉到了迪斯尼股票反弹的兆头。马盖茨对索罗斯的洞察力很是钦佩，他说：“当我们中许多人都认为迪斯尼股票已经是江河日下，回天乏术的时候，他却很快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一切。他认为，迪斯尼并未受到什么致命的打击。它的雄厚的基础将保证它终有一天会重新崛起。”

量子基金会最后在迪斯尼股票所赚的利润达到500%。

1985年，索罗斯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便是操作了可以称之为“广场饭店秘密会议”战役。这次战役可以简单化为这样的表述：索罗斯投下赌注，赌美元兑日元会贬值，事实果真如此。

1985年9月22日，新上任的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

• 贝克尔终于决定让美元自动贬值，以保护国内工业发展。同一天，贝克尔和西德、日本、法国和英国的所谓“王国集团”的财政部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秘密会议。索罗斯听到了这次会议的消息，他马上意识到财政部长们将要采取什么措施。他当即立断，22日一夜，他就购进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日元。

不出索罗斯所料，五国财政部长最终的决定是同意美元贬值，共同签订了所谓的《广场协议》。协议指出“建议进一步加强彼此的合作，使非美元货币合理增值。”这几乎明显预示着中央银行将很快让美元贬值。

协议正式签订的第二天，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即从1美元兑换239日元降到1美元兑换222.5日元，相当于又降了4.3%，这已经是历史上最大的跌幅了，这同时也意味着索罗斯一夜之间就赚了4000万美元。第二天早晨，当拉斐尔见到索罗斯时，由衷地向他祝贺：“乔治，干得太漂亮了，这令我终生难忘。”

对于这次漂亮的出击，索罗斯自己也不无得意，他在1985年9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一笔……上个星期所赚的钱已大大超过了过去四年我在货币交易所受到的损失……”

斯坦利·德拉肯米勒回忆说，1985年秋天，基金会中其他投资商都紧跟着索罗斯走，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前大量购进日元。结果星期一早上，日元就上涨了800点。他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已赚了这

么多的钱。”

事情当然不会如何简单，在长达好几个月的时间里，索罗斯不断地在进行思考，并采取了一种又一种措施，今天只不过是这些的一个结果。

80年代初，里根政府发誓要维护美元的坚挺地位。他希望通过允许进口廉价商品，吸引外国投资者到美国投资的政策来抵消贸易赤字，从而降低国内的通货膨胀。不久，里根又决定削减税收，加上年度费用开支的大幅度增加，导致了美元空前强硬和股市的极度繁荣。外国资金被吸引到了美国，大大增强了美元资金市场的生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这也是美元坚挺的因素之一。

然而，也有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60年代，热衷于消除全球货币壁垒的人们期待着世界各国的货币能缓慢而合理地相互调整彼此的价值，经济实力弱，出口能力不强的国家使他们的货币贬值，直到他们的产品变得富有竞争力。美元、日元和英镑都能准确地反映各国的工业实力。当尼克松总统1971年下令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开始独立运转时，它也许会出现的混乱。每一个传闻都会使货币产生浮动，对换比率看起来已和出口毫无牵连。”

这种观点很合索罗斯的口味。因为进入到1985年，索罗斯担心美国经济有崩溃的危险。8月份，他深信，这个“帝国循环圈”已发展到了衰退的一环。为了刺激美

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了应付日益沉重的军事支出负担和信贷膨胀，美国政府必将调整它的经济战略。

索罗斯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提前发现了这一未来的事实，从而可以从容地寻找到机会。他坚信，当美国以及世界上其它几个主要经济大国发现货币市场已变成了一个损害他们利益的魔鬼时，这种调整势必将出现。

美元的价值在 80 年代初经历过一些曲折和波动，所造成的结果是整个世界在依赖着它时，不得不全神贯注而且提心吊胆。通过对 80 年代中期形势的深入研究，索罗斯重新树立起了自信。他深信美元对日元、对德国马克的对换比率必将成为金融界的焦点，他时刻关注着这方面的信息。

应该说，索罗斯的这种担心并不是凭空而起，是源于他对市场的理解和日渐成熟的投资理论。

1981 年元月，罗纳德·里根宣誓就职而成为美国总统。索罗斯着迷于看这位有保守倾向的新总统着手进行一个旨在加强美国军事力量的行动——不增税收——以作为一种努力去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他做出这种考虑：里根的各项新政策会如何影响美国经济？这能否成为新一轮暴涨/暴跌交替的开始？

索罗斯认为，首先，这种现象并不是每天都发生。被他称为“里根的帝国循环圈”的新里根政策，可望已经开始运转，他写道，“世界范围的体系以坚挺的美元、强劲的美国经济、增长的贸易赤字和房地产业的高利率为

基础，帝国循环圈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心是个温和的圆圈，在世界体系的边缘是个烈性圆圈。”索罗斯说：“你有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不持续的，最后就要反过来。所以说，这是一个暴涨——崩溃的过程。”

正如索罗斯所估计的，从1985年开始，美国的贸易赤字以令人瞩目的速度爬升。美国的出口由于美元的坚挺而日益恶化。美国国内工业由于受到来自日本的廉价商品的冲击而面临危机。索罗斯自始至终关注着事情的发展，他察觉到了表面繁荣之后掩盖着的危机。

另外，在索罗斯看来，一切情况表明，石油输出组织（OPEC）即将决裂，石油价格在此之后将下跌，这又会给美国政府施加额外的压力，促使美国让美元贬值。石油价格在当时为40美元一桶，许多人相信价格最高可涨到80美元一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决裂无疑会降低全球通货膨胀率，而通货膨胀的降低势必会引发利率的降低，作为一系列连锁反映的结果，美元的坚挺地位也就坐不稳了。

对于索罗斯的战略意图，拉斐尔是这么解释的：原油价格的下跌的结果是美国利率的降低而日本由于是完全依赖石油进口，它的利率只会调高。因此，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的汇率必将下滑。由于货币市场无论是在规模还是数量上都要比股票市场大得多。因此，一个投机商在这里很短的时间内就有可能获取巨大的收益。此外，由于货币市场相对来说需求量非常大，可以充分进

行杠杆交易。因此，虽然当时量子基金会只有 4 亿美元的资金，但它的可用能量是巨大的。”

索罗斯深信里根对美元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只能导致失败的结局。作为总统，他也许有很好的理由去维持美元的坚挺，但其实他应有更好的理由使美元贬值。80 年代中期，短期利率高达 19%，黄金价格达到了一盎司 900 美元，通货膨胀率到了 72%，美元却不适宜地强硬到一美元兑换 240 日元，或 3.25 德国马克。

当一些分析家还在喋喋不休地大谈股市的周期性时，索罗斯已经开始行动了。出于他一贯的对立特征，他大量购进股票以及其它的金融债券。例如，当花旗银行决定全面收购 ABC 电视网时，量子基金会已拥有 60 万股份。3 月份的一个下午，花旗银行宣布以每股 118 美元的价格购进 ABC 电视网。仅此一项，量子基金会就赚了 1800 万美元。

只不过，在最后胜利之前，索罗斯还必须经受考验。

对索罗斯的预测能力的第一个考验是在 1985 年的 9 月。9 月 6 日，索罗斯预测马克和日元将会升值。而当时的情况是，市场上这两种货币都处于贬值状态，没有任何起色。索罗斯开始对他的“帝国循环圈”的理论产生怀疑。此前，他对这两种货币下的赌注达 7 亿美元，这个数字已超出了量子基金会的资产净值。尽管他已损失了一部分钱，但他仍坚持认为他的预测最终将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不但没有退出，反而把投资额增加到

8 亿美元，比量子基金会的资产净值高出约 2 亿美元。

后来，就发生了“广场饭店秘密会议”事件，美元果然贬值，日元大幅上升。在奇迹面前，许多人都抵挡不住成功的诱惑，开始抛出日元。然而，索罗斯在这时更体现出了他经受考验的能力。他看到的是更远的将来，他所期待的胜利远不止于此。他在继续购进日元。

斯坦利·德拉肯米勒说：“索罗斯告诉其他的投机商不要抛售日元。说他可以担保他们赚得更多。因为政府方面刚刚向他透露美元将在明年继续贬值，所以为什么不购进更多的日元，抓住大鱼呢？”

确如索罗斯所料，在接下来的 6 个星期，中央银行一直在不断地使美元贬值。到 10 月底，美元共贬值了 12%，变为 1 美元兑换 205 日元。到 1986 年 9 月，降为 1 美元兑换 153 日元。外国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平均上涨了 20% 到 28%。

索罗斯抓住了这个机遇，他总共投入了 15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购进日元和马克。结果证明了他的预测是何等准确，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杠杆交易中，他总共赚了 1.5 亿美元。

他有着常人难以想像的自信心。早在 1985 年 12 月 8 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当我确信一件事时，就如同我曾经亲眼目睹过它的一切。仅仅局限于我愿意去看到多少。”

截止 11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量子基金会的资产净额

达到了 8.5 亿美元。索罗斯手中握有价值 15 亿美元的日元和德国马克，几乎相当于量子基金全资产的 2 倍。在他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我之所以一直坚持增加投资，是因为我始终认定这一趋势已没有回转的可能。关于货币交易，我的现金就是在关键的转折点全力以赴，而当总的趋势开始固定下来时，再逐步撤出。”

1985 年底，索罗斯在英镑上有 8700 万美元的空头，在石油方面有 2 亿美元空头，在股票和期货中投资了 10 亿美元，债券方面投资了 15 亿美元。总共，在各个不同的市场，他总共掌握着达 40 亿美元的资金。

虽然，此时的索罗斯也认识到美元总的趋势已固定下来了，他不用为出现意外而担心。但他并没有像一些人那样因此而感到满足，他还要不停地赚钱。

就以美元兑日元的汇价而论，十年过后索罗斯又重操此道，不过这次刚好相反。这次，索罗斯又独具慧眼，看中美元兑日元汇价会重返上升轨道，便大量投资，结果当然异常简单，他又净赚了好几亿美元。

（三）旁观者的胜利

索罗斯不仅是一个实践家，同时也是一位预言家，分析家，是一个可以用语言影响市场的人。

他自己也这样说：“经过英镑危机后，很多人称我为‘打垮英镑的人’，这也就是何以有人认为我可以左右市场的原因。但在英镑危机过程中，我只是一群中的一员而已，也许我比别人更有分量和更成功，即使到现在，认为我有影响力也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也许某一市场动向会和我的名字挂上钩，就好像以前和黄金挂钩一样，但假如我们企图违逆市场行事，我们就会被打倒。事实上，市场确实对我的一言一行都很注意，但我们的真正行动却往往被谣言埋没了。由于我的言论有可能影响市场，我现在的处境就有点独特，我讲话必须很小心。这使我的生活变得有点复杂。”

他又说：“由于我相信金融市场本质上是不稳定的，所以我更要小心不要制造不稳定。举例言之，当法国法郎遭到压力时，我的确相信我也可以把它打垮，假如我加入战局的话，但这种想法却使我做了一件蠢事：我决定不针对法郎进行投机，同时还得罪了法国当局。假如我投机，他们还不至于比听到我的建议更感不快。于是

我得到了这样的教训：投机者不要多话，一心投机就好了。”

在英镑危机后，法国法郎也遇到麻烦，索罗斯把法郎问题分析得非常清楚，曾预言法郎也会贬值，结果事实如此。法国政府不仅事先没听劝告，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反将此事归罪于索罗斯。其实索罗斯并未参与此事，只是作壁上观，甚至还为此后悔不已。

“我们也许会以为法国会把英国的经验作为后事之师，但结果法国比英国更缺乏弹性。法国努力守住所谓法郎堡垒，这一点也许会引来别人同情，原因是这所谓法郎堡垒是几经艰辛才建立起来的，而且法国当时也快要可以享受到成果，在竞争力方面赶上德国，但最后这些成果却在法郎轮番遭到攻击下被硬生生地抢走。但在法郎堡垒显然已经守不住时，法国政府就要评估时势，调整策略以为应对。但法国并没有这样做，反而自愿死守汇率机制加诸他们身上的制度，结果要承担极严重的后果。我想我能够理解法国的动机：他们的目的是要重建外汇存底，以偿还法国中央银行为维持法德两国货币平价而向德国中央银行借下的债务。但法国却把事情的先顺序搞错了。这就是八月危机的起因。用高利率政策使法郎紧贴着德马克是自败的一着，要使法郎强大，惟一的方法就是使法国经济强起来。”

应当承认，有时候预言也是一种胜利，分析也是一种胜利，哪怕人并没有介入行动，这可以叫作旁观者的

胜利。因为这种胜利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大师式的指点迷津或内行高手的战略演练。

有时候，这种成功的预测和分析不可避免地会掺杂进失败和挫折。但这种失败和挫折不能掩盖其中的真理，因为大的趋势预测到了，问题的就里也进行了思考分析，只是某些局部出现了意外，而导致了失败和挫折。人非圣贤，但圣贤就在人中，就在这些失败和挫折之中，道理就是如此。

1987年，索罗斯对日本股市的分析预测而最终遭遇受挫折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80年代中期，世界股票市场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繁荣景象。道·琼斯平均指数稳步增长，从1982年8月的776.92点上涨到1987年8月的2722.42点。按照索罗斯的反应理论，股市将会持续上涨。投资者的坚定信心及狂热，将使股市扶摇直上。同时，在索罗斯的内心，他非常清楚如果他的反应理论的确没错的话，如果股市从繁荣到萧条的循环理论成立的话，那么迟早股市都会走到萧条的地步，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索罗斯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谈了自己的看法：“股市不断地上涨、上涨，已经脱离了其应具备的基础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股市会垮掉，因为估价过高的市场仍然会支撑下去。如果你想了解美国股市最高估价会达到多少，看看日本的情况你就会明白了。”他后来在《华尔街周刊》上重复了这种观点。

1987年10月份日本股市的利率达到了48.5点，而与此同时英国只有17.3点，美国为19.7点。在索罗斯看来，这是东京股市的不祥之兆。他知道东京地价在狂升，货币与房地产已失去了平衡，同时他也坚信高利率与低红利难以维持下去。

他还了解到许多日本公司，尤其是银行和保险行业的公司，把大部分资金都用于购买日本其他公司的股票，有些公司甚至借债来增购股票。虽然由于东京股市的繁荣，这些公司的财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但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一旦出现风吹草动，一场大的灾难就会降临。参照自己的反应理论，索罗斯敏锐地感觉投资者的狂热已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他感觉到日本股市将要崩溃。由于日本股市的成交量占了全世界成交量的36%，这种灾难必将波及整个世界。索罗斯对东京股市越来越悲观了：“东京股市不可能再有转机了，人们对市场的股价已远远高于它本身的价值，是即使缓慢的回落也已不可能了。一种大崩溃很可能就要降临了。”

不过，据索罗斯估计，如果日本股市崩溃，对美国股市的影响不会太大，因为公众对美国股市的估价还没有达到像对日本的那种离奇地步。不久，他就将他在东京股市的几十亿美元的资金转入了华尔街，对于美国股市，他始终很乐观。他说：“美国股市只是近期才出现盲目乐观的势头，它仍能够以一种温和的、合理的方式遏止住这种势头。”

他这次的错误并没有犯在对日本股市的预测上，他对日本股市的分析是正确的，但美国股市却出现了意外，接下来一个星期的情况变化极其富于戏剧性。

此时索罗斯在股市的投资额非常大，尽管如此，他仍显示出惊人的镇静。他很轻松地对别人说：“事情的实质与 1929 年时一样，但别忘了事情是发生在今天。”索罗斯认为这次金融市场极度衰退都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但不久，纽约股市全面崩溃了。那个星期一，股市下跌了 508.32 点。按索罗斯的预测，日本股市市场将下跌得更厉害。可事实上，它挺过了星期一。华尔街股市的崩溃标志着 5 年股市繁荣期的结束。

星期二，即 10 月 22 日，股市反弹了 300 点，但很快又开始连续下跌，与此同时，国外证券正也开始下跌，索罗斯决定把手中的大部分股票抛掉。《权威》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记述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其他的交易商一个个歇斯底里地叫喊着，他们激动不安，他们在等着，等待着获得战利品的最佳时机。拍卖价格从 230 点降到 220、215、205，直到 200，之后，交易商开始出击了。索罗斯的股票报价从 195 点上升到了 210 点，也正是索罗斯的股票促使股票交易以低于普尔股市的 50 点，即 205 的现金贴现率进行，5000 宗贴现交易代表了 2.5 亿美元，股票交易主管人员掩盖了这一切，当地的一些交易商就在这价格回升的短短一瞬损失了数百万美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索罗斯的股票相继出售之后，普尔股

市很快开始反弹，以 224.50 点收盘，索罗斯一天内损失 2 亿美元。

电视经济评论员埃当姆·史密斯曾问索罗斯为什么他预见到了危机，却仍旧没有逃脱掉危机。索罗斯很坦白地告诉他，“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我预测这次崩溃会发生在日本。我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可出乎我的意料，它却在美国发生了，在华尔街发生了。这让我措手不及，没能做出任何补救措施，所以说这次我错了。”

他事后承认自己在判断上出现了问题，“我本来是希望股市能出现转机的。但回想起来这种转机很显然从证券市场开始的，尤其是日本的证券市场在今年早期的短短几个星期之内，就获得了 22 倍的利润。”这一结果导致了美国证券市场 1987 年春天出现了混乱局面。而索罗斯却没有看出华尔街的下降趋势，仍旧期望美国股市能够出现繁荣。

而不管怎么讲，索罗斯运用他的大起大落理论预测到了世界股市会发生一次巨烈震荡，并认为发难点在日本。他猜错的是崩盘的时间，对美国股市的变化也估计不足。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对日本股市的准确分析。他早就这样认为：

“日本的储蓄率很高，日元也很强势，通货膨胀率和利率都很低，股票票面价格却很高，于是日本企业就可以以很低的成本筹措资金，这成为他们的竞争优势之一。当时日本土地供应有限，而且严格的法规——例如限制

兴建高楼层建筑物的阳光法案——使土地供应不足的问题日趋严重，于是房屋价格上升的速度比薪水调高的速度快。人们为了买房子，只好把更大一部分的收入储蓄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自我加强的过程。这个过程把储蓄率提高到极致，又把生活水平压到最低。这是一部机器，其作用在使日本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龙头老大，但同时使日本人不断努力工作，几乎不问生活的报酬。事实上，这是很有效的一部机器，使日本在每一方面都有竞争优势；但一如其他自我加强的过程一样，这部机器也有缺陷，就是拉大了有房子的人和没有房子的人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成为一股分化社会的力量。对现行制度的不满不断累积，终于引起政治动荡，自民党的主导地位也不保，改朝换代的过程也启动起来。在这种情形出现前，房地产暴涨情况比股票上涨情况还要惊人。结果这个泡沫被戳破了，房地产市场崩溃，崩盘的严重程度也比股市的下跌厉害。”

对于后来估计出现偏差，他说：“这是一个很沉痛的问题。在 80 年代中期就看到日本的金融泡沫发展起来，当时我猜这个泡沫会破灭。于是我在股市卖空，原因是我认为一九八七年的崩盘会从日本开始。但结果崩盘从美国开始，我在日本卖空了，在美国却超买，当时可谓受挫不轻，但这大起大落的性质还是很鲜明的。”

不管怎么说，整个事件的发展还是符合大起大落的理论，索罗斯为此感到高兴。《时代》杂志的一位记者问

他对这次受挫的看法，他回答“我感到了其中的乐趣”，“我仍感到很愉快”。并且，他坚持对市场作进一步的预测。

索罗斯坚信萧条期并没有结束，他坚持认为众多的投资者将很快会发现股票投资的这场游戏是多么的复杂，他说：“许多人都很容易地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但别忘了正是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经济大繁荣引发了 60 年代与 70 年代的衰退，下一场危机也必将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刻到来。”

在索罗斯 1988 年早期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到了 1987 年这场灾难与 1929 年经济危机两者之间的类似之处。

“事物的内部联系并非时时刻刻在每一种市场都以相同的力量互为作用。但其中的典范却常常能显示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1987 年的灾难与 1929 年的经济危机之间更是存在着不可思议的雷同。美国的过甚发展势头，不论是上升还是下降，都同样是非常显著的。在货币市场过度的对换比率波动与目前越来越盛行的国际资本流动本身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彼此调节的联系……

“而在股票市场，人们往往怀着一种严重的错误的偏见，正是这种偏见使人们产生了错觉……当一个人对股市进行判断时，他很难独立于股市流行趋势之外而保留自己的判断不受这种趋势的影响。

“最终，这种随波逐流对股市流行趋势的依赖越来越

大，大到超出股市所能容纳它们的能力，于是股市开始下滑，下滑的速度将会越来越快，甚至最后乱成一团，而一些原以为可以自动调整的方案无法得以实施……

“许多关于股市流通渠道及其匮乏的争论都是错误的，真正起作用的是买卖双方的平衡与否。而恰恰是股市趋向分析（如指数、技术数据分析、评估报告等）破坏了这一平衡。不错，金融市场是需要流通措施来保证买或卖命令的顺利执行，以省去中间不必要的交换成本，但同时过度的流动性也是有害的，因为它会使股民摇摆不定，最后做出跟随股市流行趋势走的举措。”

照索罗斯看来，他的“大起大落理论”其涵义覆盖整个市场，并不局限于某些孤立的现象。他这样进行过表述：“大起大落的过程很少孤立发生，我在《金融炼金术》书中指出好几个大起大落的过程，但其实这些大起大落过程发生时，还有别的过程在同时进行，且和这些大起大落过程互相影响。不过一般只是把这些过程视为外来震波，但事实上他们可能都是对方的一部分内容。举例言之，对新兴市场的狂热也是墨西哥市场暴涨的部分内容，但反过来说，这股狂热后来消失，墨西哥危机却是必然因素之一。假如墨西哥不出事，也许会有别的事情发生，当然事态的发展过程就会完全不一样。同样地，

墨西哥危机也许可以阻止某些足以影响麦哲伦基金的事件发生。加拿大和意大利债务过于沉重，根本是难以为继的，但假如墨西哥不偿还欠债或延期还债，这些国家的危机就会更快发展。目前的形势是很不寻常的，原因是竟然有那么多动力不平衡同时出现。”

“我们谈到了新兴市场的大起大落、墨西哥的大起大落、拉丁美洲国家、日元和日本市场、欧洲的紧张局面等。在这些现象背后，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这过程还涵盖了安全、经济和金融等方面。现在货币机构之间的合作远不如签署广场饭店协定时，虽然应该讨论的问题还真不少，但你很少听说七大工业国会举行什么紧急会议。现在国家忙国家的利益，机构忙于机构的利益，对公益的兴趣淡薄。但金融市场本质不稳，随时可以崩溃，除非政府把金融市场明文列为政策目标之一，否则问题很难解决。”

索罗斯提到的“墨西哥危机”，也是一个典型的“大起大落过程”。不过在墨西哥问题出现时，索罗斯纯粹只作壁上观。但他还是运用自己的理论把整个问题来龙去脉和结症分析得很清楚。

索罗斯认为，1994~1995年墨西哥危机之所以能造成巨大影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投资墨西哥的人中，很多对墨西哥比索的币值过高这一点懵然不知。而在索罗斯看来，在1994年初问题显然已经暴露出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敦布希在当年2月已经很清楚地指出墨西哥必

须让货币贬值，敦布希还是当时在墨西哥撑权的一些技术官员的老师。当时墨西哥希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付诸实行，遂欲争取美国国内民众的支持，要争取美国国内支持，最佳途径莫如出现巨额贸易赤字。之后，墨西哥举行选举，在选举之前，墨西哥的民主程度已经有所提升，因此选举结果就变得很难预料。前任总统马古尔在把权力移交给总统当选人萨林纳斯之前，本来可以采取任何不受欢迎的措施，原因之一是很多人认为萨林纳斯是靠选举舞弊当选的。但在萨林纳斯任内，墨西哥民主抬头，萨林纳斯担心假如在选前宣布货币贬值，他的继任人当选希望就会大打折扣。1994年1月，墨西哥总统候选人柯洛席欧遇刺身亡，嘉巴斯州印地安人又发动暴乱，当时墨西哥政局非常不稳，不少人认为货币贬值将对选举产生不良后果。选举过后，权利尚未移交之际，萨林纳斯本来还可以宣布货币贬值的，但他当时又要角逐世界贸易组织首脑，所以 he 不想把他的政绩弄得不好看。最糟糕的是，那些表现杰出、借助外来投资把墨西哥的地位从第三世界提升至第一世界的技术官僚，竟然开始相信他们自己的法力了。魔术师最糟糕的事，就是相信他们本身的法力，但他们还是继续支撑这股热潮。投资者开始对持有比索面值的债券不放心，因此墨西哥的形势就更加脆弱。终于，比索贬值了，但也已太迟，墨西哥当是的外汇底已经荡然无存；墨西哥积欠的债务以美元计算没有变动，但以比索计算数额就大幅膨胀，外界

遂对墨西哥政府及私营部门的财政状况和信用信心动摇。比索贬值 15%，使外资仓皇撤走，整个汇率制度在一天之内完全失守。结果比索在失去支撑之后，币值下降了 25%，于是危机出现。

墨西哥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有其长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之内。墨西哥问题的损失难以估计，而且肯定对整个世界和金融市场都影响甚大。索罗斯认为墨西哥问题不但可以使国际金融制度解体，也可以使国际贸易制度崩溃。

在对墨西哥危机所代表的意义的理解上。索罗斯也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墨西哥危机所代表的意义比 1982 年的危机更难掌握，原因是 1982 年时，债权人是银行，当时国际货币机构可以向墨西哥的银行施压，要他们放弃欠债者尚未缴清的利息。换言之，国际货币机构要求墨西哥的银行继续提供贷款，让欠债的人有钱偿还利息。于是，自主的贷款行为被所谓的“集体贷款体系”取代，而此举的确有效。但现在根本不能向市场的投资者施加这种压力，原因是他们收到钱以后，就很难指望他们继续投资，所以市场债务比银行债务更难处理。而墨西哥政府在对待危机的态度上，也是不可取的，照道理，在外国压力下，只好吃点苦头，但他们一直抗拒。他们将利率提高到 50% 至 70% 之间，可见这种对策是自败的，日后墨西哥经济严重衰退，引起了无法估量的政治和社会后果。

在索罗斯看来，最理想的做法应该是，让墨西哥把美元面额的国库券转换成长期的债项，然后再提出营救方案，这样墨西哥的银行体系仍可继续生存。美国根本不应该挽救冒风险赚大钱的墨西哥国库券持有者，他们本来就有义务自行承担后果。假如这样做，营救墨西哥所需的钱反而会少很多，而国际货币机构就可以有更多资源营救其他国家。不过，话说回来，这种行动是很难协调的。问题是假如美国投资者的利益受损，财政部有可能支持墨西哥吗？墨西哥决定延期偿还欠债后，墨西哥的银行可以继续提供贷款吗？如此可以避免其他市场也出现恐慌吗？这样与其进行一项失败的营救行动，不如面对这一连串的问号，这些问题都是很伤脑筋的问题，不论当局采取哪种手法，他们都很难以避免受到批评。

索罗斯认为，美国和国际货币机构解决墨西哥危机的做法许多是不得要领的。问题是能不能解决“根本”。美国和国际货币机构觉得，假如墨西哥不偿还或延期偿还债务——事实上，这在1982年也发生过，整体国际市场就会出现动荡，于是他们展开营救，但他们的营救方案是很拙劣的。他们的行动太过缓慢，他们各自为政，没有很好的配合，动员的资金也不足。假如他们动作快一点，而且行动也够果断，根本不需要那么多资金，但他们错失了稳住市场人心的机会，无法强力稳住比索。要制订一个营救方案得花时间，美国财政部觉得要征求国会同意，但国会犹豫不决，于是财政部只好乞灵于汇率

稳定基金。但事实上，财政部早就该动用汇率稳定基金了。他们也没有寻求欧洲和日本的支持，以致局势不断恶化。比索的贬值是不断增加的，原因是币值愈下跌，墨西哥银行体系的地位就愈岌岌可危，外资也逃得愈快。最后国际货币机构也紧张起来，忙不迭煞车，520 亿美元的营救方案，到后来数额就可能减少很多。

从墨西哥危机中，索罗斯进一步看出“海外投资和大起大落过程的紧密联系”。他说：“海外投资一般都和大起大落过程结下不解之缘，我从一开始就做海外投资生意了，因此看过不少循环。我很早就认为，假如在海外投资的人一窝蜂上，往往都是错误的。在 50 年代末期和 60 年代初期买进欧洲证券的投资者是这样，结果他们被 1962 年的利益平等税害惨了；在 70 年代初期进行海外投资的日本金融机构，也逃不出这一原则。不过，日本撤回海外投资倒是日元在 1994 年强势的原因。1994 年达到高潮的全球投资热潮是我见到的最厉害的大起过程，我想日后的大落也会同样严重，这是我一生中最接近 1929 年大崩盘的一件事。”

在墨西哥金融危机最深重的时候，索罗斯对整个事件的未来发展也做了预测，他认为：“目前是有高利率可以煞住外资撤走的恐慌，但高利率也对墨西哥经济和银行体系造成很严重的损害，而这一点只会鼓励外资赶快撤退。假如这个金融危机最后成为过去，政治和社会的后遗症将达到最高点。届时人们就开始感受经济衰退的

效应了。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工人可以得到3个月的薪资。假如墨西哥经济赖以生存的是对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美国就反受其累了。这对美国股市和债券市场有点正面作用，可以使经济稍稍冷却，同时把部分物价压下去，但政界人物注意的往往是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就业机会减少和不公平的劳工竞争问题，这将成为1996年选举的重要话题，假如美国再朝保护主义方向走，1930年的大衰退就会重演。”

对受墨西哥危机影响甚大的巴西、阿根廷以及那些负债比例很高的西欧国家的金融市场形势，索罗斯根据自己的理论均进行过鞭辟入里的分析和预测。

（四）东南亚金融风暴

1997年7月，这个原本就已多事的世界重又陷入于一场金融纷扰之中。

这一次，麻烦产生于亚洲的东南部，也即是世人所称的东南亚。

没有人做过预测，也没有人发出警告，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这里便骤然掀起了一场几乎席卷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金融风暴。

泰国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便发觉自己明显地变穷了，他们的货币铢在一夜之间丧失了1/5的国际购买力，在国外负有高额债务的企业在其结算中也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据统计，由于货币贬值，29家最大的企业不得不筹措约12亿美元支付利息和清偿债务。伴随抛售泰铢、抢购美元的狂潮，大批工厂开始倒闭，公司纷纷裁员，物价大幅度上涨，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在这一危机的猛烈冲击之下，7月29日，泰国中央银行行长宣布辞职，而此前，泰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已黯然下野。

随着泰铢的大幅贬值，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的货币在外汇市场上很快出现了相继贬值的“多米诺骨牌”现

象。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新加坡元……莫不如此。尽管这些国家的政府纷纷采取措施并竭力寻求国际援助，但也于事无补，各国货币与美元的比价纷纷下跌至历史低点。就像每年这个时候前来光顾的台风一样，一场来势迅猛的货币危机横扫东南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泰铢贬值 25%，菲律宾比索贬值 11%，印尼盾贬值 8%，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 5%，新加坡元贬值 1.5%……，不久又传来消息，韩元兑美元亦跌至历史最低点。毫无疑问，这是自 1995 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上最严重的金融风暴。事实已经证明，曾经创造过经济奇迹的东南亚“小虎”们看来并不是不可以伤害的。

这场风暴究竟由什么原因引起？它为什么来得如此突然？如此猛烈？一直为世人所看好的东南亚“小虎”们在这场风暴中为何表现得如此不堪一击？人们在做各种的分析和猜测。而在国际舆论界的一遍嘈杂声中，有一个人的名字被提到的频率最高，次数最多。他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乔治·索罗斯。

有人甚至说，所谓东南亚金融风暴，不过是索罗斯倚仗自己的资金来对付一个国家及其货币的结果。

乔治·索罗斯再次被冠以“国际大炒家”、“黑手”、“大鳄”或“世界顶级玩家”、“金融神话的创造者”而声振寰宇。尤其是对于亚洲地区的人们来说，原来他们对他并不熟悉。

按理说，乔治·索罗斯已经老了，1997年他已经66岁。看上去，他也差不多像这样的年纪，满头银发，一脸皱纹。然而，他眉宇间豪气长存。这时候，与其说他像个老人，还不如说更像个步入老年的哲学家或思想家。在他脸上每一缕皱纹里，似乎无不透露着机智、敏捷和狡黠。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已由球手变成了教练”，即已由前台退居于幕后。但是，由他一手建立的庞大的金融帝国仍在无时不刻地按照他的思维运转，其投资态势仍保持着昔日的锋芒。只要他把目光集中在一个地方，那地方就注定会不得安宁。只要他动起手脚，那地方就会掀起狂澜。

索罗斯历来是个令人敬佩、令人畏惧、令人胆寒、令人仇恨的人物。他用自己独特的眼光打量世界，其思维之网凌驾全球。而这次不知为何，他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东南亚。

其实，乔治·索罗斯觊觎东南亚已经很有一段时间。

不管是报复也罢，帮美国政府的忙也罢，这些都不可能作为索罗斯在东南亚发难的真实动机。在这次事件中，有不少媒体都认为他在东南亚动手是因为对东盟接纳缅甸为成员国极端不满，是为了帮助美国政府发泄对缅甸不愿引渡大毒枭坤沙的怒气。甚至马来西亚总理马

哈蒂尔在公开发表的演说中也进行过这种指责。其实，问题应该有它更为本质的一面。

资本是以追逐利润为最大目的，只要有利可图、有机可乘、有缝子可钻，资本操纵者便会决策，便会下手，便会进行周密谋划和疯狂角逐，而不会限囿于政治、宗教、道德或观念。也许，东盟接纳了缅甸只是事后索罗斯对东南亚发难的一个借口，谁能说得清呢？但我们应该知道，要是在东南亚地区无机可乘、无缝可钻，白扔大笔金钱而赚不到一个子儿，就是那里爆发了反美大示威，索罗斯也是不会动一个指头的。否则，他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精神病患者。

东南亚地区确实存在着自己的问题，存在着可供外人来投机发财的机会。或者像德国《经济周刊》的一篇文章所说，那儿的某些状况“简直就像向金融投机者们发出的邀请书。”

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80年代以后，亚洲地区也出现了高速发展，以亚洲“四小龙”等一批国家的经济增长尤为迅速。但是，增长必然伴随问题，成就也会埋藏隐患。而对索罗斯这样的人来说，他研究和利用问题的兴趣显然大大超过对成就的赞许和歌颂。在他的眼中，东南亚地区的金融状况并不是一只坚硬无比的钢球，而是一个已经出现裂缝可供叮咬和下蛆的蛋。

早在今年5月份，德国《商报》在分析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状况时就指出，由于泡沫经济的恶性膨胀，这

里很有可能发生墨西哥式的经济危机。东南亚一些国家这段时间的经济恶化问题，认真分析起来可以归结在三个方面：

一、经济结构不良，国际收支恶化。在许多东南亚国家，出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它们的出口产品大多数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几年由于劳动力和房地产价格迅速上升，出口电器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又出现萎缩，加上美元汇率持续走强，出口增幅显著滑坡。如泰国出口增幅已从 1995 年 22.5% 猛降至 1996 年的 3%。这对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东南亚经济是一个沉重打击。泰国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刺激出口的措施，但未取得明显改善，以致经常项目赤字越来越大，1996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5%，比墨西哥金融危机前的 1994 年的 7.2% 还高。经常项目赤字扩大，使外债增加。泰国外债已高达 900 亿美元，其中约半数即 440 亿美元是短期外汇债务，这就使泰国本来不佳的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这是泰国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地产泡沫严重，呆帐坏帐剧增。在 80 年代，东南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金融机构的贷款大量投向房地产业，致使房地产业一哄而上，盲目发展。后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楼宇大量过剩，空置率攀高，银行呆帐、坏帐剧增。在泰国，金融机构贷款的近半数投向房地产业，房屋空置率高达 20%，银行的呆、坏帐 1997 年约达到 400 亿美元。马来西亚、印尼、

菲律宾等国也同样存在着房地产供过于求的问题，银行向房地产的贷款亦占贷款总额 20% 以上，房屋空置率亦达到 15%—20%。目前银行的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泰国为 7.9%，马来西亚为 6.4%，印尼为 17%。这种情况使银行运作困难，动摇了人们的信心，频频引发挤提风潮，以致数十家金融公司濒临破产。这是造成这些国家金融动荡和经济不稳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三、货币政策不当，金融调控不力。首先是对大量流入的外资缺乏有效管理。泰国等国对吸引外资普遍缺乏节制，敞开大门，目前泰国的外债已达到 900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50% 以上；印尼为 1000 亿美元，马来西亚为 290 亿美元。美元汇率越高，债务负担就越重。而且外资结构也不合理，一年内为期的短期贷款占了多数，如何还债成了大问题。其次是在美国汇率不断上升、经常性项目赤字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缺乏弹性的联汇制，使央行难以用政策有效地调节经济，而只能提高利率，从而导致以营利为目的的国际短期资金大量流入，加重了外债负担，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

在东南亚诸国中，以泰国经济中暴露的问题尤为典型。

过去的 10 年对于泰国人来说，到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大把大把的外资潮水般涌入这方乐土。

泰国人拿着这些钱盖房子、买汽车，超市里全是来自美国、日本的高档生活用品。泰国人开的车是本田牌；

泰国人有病住院，进的是设备先进、服务周到的私人医院；泰国的酒店是用兰花装点，大理石镶面。市中心的豪华公寓是为单身贵族准备的。到处是大工业园、大办公楼、大酒店、大购物中心、大娱乐场所。所有这些都是10年内冒出来的。泰国成了“东亚四小龙”之后的第五只“小虎”，泰国模式成了经济学家争相研究的对象，近10%的年增长率则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

1985年，日元升值，土地劳工都变贵了，所有在日本本土的制造业成本大增，于是日本的制造商把目光投向了东南亚，泰国成了这些国家中最具吸引力的地方。1986~1989年间，泰国的外资总量增长了400%。到了1993年，泰国成立了曼谷国际银行，使得泰国国内的企业和银行向国外贷款更为便捷。泰铢始终盯住美元，而且泰国施行的是高利率政策，差不多是12%左右，吸引了大量的银行家迫不及待地把资金从世界各地转移到泰国。

这个帐傻瓜都能算得出来，如果把100美元投向美国，一年大概只有不到5%的回报，而如果投向泰国，甚至无需直接投资，只要换成泰铢，存入银行，一年起码有超过10%的回报，何乐而不为呢？1993~1996年，涌入泰国的贷款约为500亿美元。目前，泰国全部外债高达900亿美元，人均负债1560美元。而且，在全部外债中，属于一年以下的短期外债就占了400亿美元。

借来的钱总有要还的那一天。曼谷市中心大厦高耸

入云，可那下面的基石是人家的。短期投资说撤就撤，有朝一日，人家要走了，那大厦还能稳固吗？

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和一个监控能力较强的中央银行，绝对应该把握住这巨额资金的用途。本来，泰国首先应该对制造业进行技术改造，以降低出口产品成本；泰国还需要修建更多的道路，因为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远不能适应经济的高速发展；泰国更应该提高它的人民的受教育水平，然而，它的大多数的青年甚至没有读过高中。

但是，无论是工业、修路，或是办教育，都不可能承受高达 12% 的贷款利率，因为这些行业来钱太慢了。惟有房地产业被投资者看好，或许还有汽车制造业及钢铁业。约 60% 的外资被抽向了房地产业，所以，尽管在曼谷已经有了两座国际会议中心，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座国际会议中心又在建设之中。曼谷市的豪华公寓像韭菜似的长出了一排又一排，现在大约有 35 万套住宅闲置。私人小汽车如同车展一般占领了曼谷的所有道路，交通却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

关于泰国的交通，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

其一：目前全世界城市车速最慢的要属泰国首都曼谷，平均时速为 5 公里，相当于人步行的速度。

其二：由于曼谷堵车现象严重，曼谷的出租汽车司机必须接受为孕妇接生的训练。据统计，约 2/5 的曼谷出租车司机都曾因为来不及到医院，在车上就为孕妇接

生。

还有，年均 8.1% 的高速增长几乎全部集中在首都曼谷，85% 的泰国人民并没有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好处。

到了 1996 年，大厦的地基出现了第一条裂缝。由于房地产业严重过剩，房地产公司还不起贷款，曼谷商业银行 70 亿美元资产中，收不回来的呆帐超过了一半，银行严重亏损，濒于倒闭。为了防止连锁反应，泰国政府不得不向该行注入 20 亿美元资金。这 20 个亿虽然救了银行，但只是暂时的。据行家估计，因为房子卖不出去，还不了贷款，泰国金融机构的呆帐已经超过了 20%。坏消息被披露后，客户立刻挤提了 100 亿泰铢。

人们对泰国金融体系的信心开始动摇。

同是在 1996 年，泰国产品的出口增幅仅为 3%，大大低于上年 22.5% 的增幅。

泰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出口劳动，尤其是电子产品。这一年，美国电子市场疲软，而泰国工人的工资却大幅度上扬，于是中国的成本更为低廉的产品直接威胁着泰国的出口。由于出口下降，进口增加，泰国的外贸逆差在 1996 年达到了 162 亿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出口的增长，泰国本来可以采取的一个办法就是降低泰铢的汇率。但是原来 900 亿美元的外债，一旦降低汇率，岂不是自己把负债额生生提了上去？如果买一个美元得花更多的泰铢，泰国银行和其他向银行进行美元贷款的公司就会出现收支平衡

的问题，政府担心这可能会导致泰国的金融体制崩溃。于是政府继续提高利率，来保护泰铢不致贬值，这等于是鼓励国内企业继续向海外举债。《德国经济周刊》的一篇文章说，这“简直就是向金融投机者们发出的邀请书”。

饮鸩止渴无异于自杀。投资者在泰国的金融市场上已经感觉到山雨欲来的风声，于是人们开始卖泰铢、买美元，生怕一旦泰铢贬值，手里的钱就得打折扣。

这一切，均没有逃脱“赋闲在家”的索罗斯的眼睛。他料定，东南亚各国货币贬值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他要做的事便是，确定它何时发生，或促使它早一点发生。还有就是，选准一个突破口。理所当然地，这一次，他首先瞄准了泰国。

索罗斯把泰国列为最先“狙击”的目标。他采用的方式是直接冲击泰国经济的软肋——房地产市场。然后以房地产市场为中介，狂抛泰国货币换取美元。当然，索罗斯深知，单凭他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完成这次攻击的。他的信心来自于泰铢必将贬值的必然趋势。另外，就是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整个市场的“随潮”行为，而当市场一旦形成气候，局势就难以逆转了。

他筹集资金，组织盟友，利用各种渠道收购泰铢，再大量抛出。泰国货币在受到狂抛的情况下，又出现美元缺乏，泰国货币直线下落，美元升值，泰国房地产市场一蹶不振，有关公司纷纷倒闭，信贷公司和银行受到打击。由于美元升值又影响了泰国出口的平衡，引起工业

和股市的混乱。然而，泰国政府开始的抵抗还是比较有力的。政府加强了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不让泰铢轻易流失，使索罗斯和其他国际基金的两次攻击均未奏效，损失达好几亿美元。

索罗斯从来就不是一个轻易会认输的人。他认定，由于美元的不断升值，泰铢的贬值只是迟早的事，他要做的只是让这一天早一点到来，并且牢牢抓住这个发财机会。情况也正如他所预料。早在1997年初，泰铢就已受到抛售压力，其后发生的泰国多家财务机构的挤提泰铢情况，令泰铢地位更加虚弱。现在，经过两次冲击后，泰铢地位更是岌岌可危。瞄准这一时机，索罗斯及其盟友再次发起对泰铢的攻击。5月14日和15日两天，泰铢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虽然泰国中央银行在新加坡等国央行的配合下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使泰铢汇率暂时稳定下来，但泰国政府已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外汇储备大幅下降，并于7月2日宣布改变已维系了13年的主要与美元挂钩的一揽子货币联合汇率制，对泰铢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一决定宣布的当天，泰铢对美元的汇率就下跌了18%。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后的一个多月中，泰铢对美元汇率一直呈现跌势。8月22日一度跌至34.60铢兑1美元，创下历史最低点。在这一危机的猛烈冲击下，7月29日，泰国中央银行行长宣布辞职。而此前，泰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已经辞职。

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就这样砰然倒下。

第一块骨牌倒下后，其余的骨牌相继倒下就成为必然。因为东南亚诸国都属于同一个联汇体系，其经济和金融体制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成功狙击泰铢之后，索罗斯继续对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的货币发起攻击，迫使菲律宾比索、印尼盾和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在7月11日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制。连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8月11日泰国政府决定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援助，将取消有双重外汇市场。这一消息对东南亚各国货币又形成了新一轮冲击。8月14日，印尼央行宣布取消盾汇率的波动幅度限制，允许盾自由浮动，盾汇率当即从上一日的1美元兑2657.5盾下跌到2787.5盾，15日再跌到2960盾的历史低点。受印尼盾大幅下跌的影响，马来西亚林吉特在14日从1美元兑2.5林吉特下跌至2.765林吉特，15日再跌到2.825林吉特的历史低点。

至此，这场风波愈演愈烈，乃至已经成为一场绝不亚于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金融风暴。

在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中，乔治·索罗斯再次成为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关注的焦点和议论中心。

当然，被这场金融风暴波及和深受危害的国家政府反应最为强烈。早在今年7月26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

蒂尔就指名道姓地对索罗斯进行指责，他说：“我们努力了近40年才发展起来的经济，突然被人凭着数十亿美元的投机和见不得人的手法，在短短几个星期便毁于一旦。”他说：“索罗斯的行为已伤害了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贫民百姓。……而世界上并没有把索罗斯视为罪犯。”马哈蒂尔的指责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他们均把索罗斯的行为视为“投机”，是“见不得人”的“损人利己”，特别是损害了若干个国家的穷人，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泰国代总理甚至扬言，如果索罗斯一旦踏上泰国的土地，就派黑手党杀掉他。然而也有不少人认为，索罗斯的行为无可指责，因为在国际货币汇率体制存在的前提下，外汇买卖或证券交易均是合法的，也就是说，索罗斯并没有违反游戏规则。在这场危机中，有问题而应当反省的是东南亚国家自己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不是索罗斯。而有意思的是，索罗斯自己在公开场合完全否认他参与了对东南亚货币的攻击，他只承认“我们在6月16日出售了一笔价值1000万美元的泰铢”。按说这笔买卖对泰国的货币体系并无大碍。对马来西亚林吉特，索罗斯说他不仅没有抛售，反而还在买进。

如果索罗斯要为自己辩护，他也有充足的理由，因为他早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生中为了不少追求奋斗过，我也不特别喜欢为货币投机辩护，我只把它视为一种必要的罪恶。我想货币投机比货币限制好一点，但最好的还是货币统一。我的自辩是我的运作循规蹈矩，假

如规范失灵，表示我的错，我只是一个守法的市场参与者，错是订立规范者的错。我想这立场很妥当、很合理的，别人只管把我叫作投机者，我不会因此感到良心不安。不过，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也不会发起一项运动为投机辩护，我还有更重要的仗要打。我想当局有责任设计不让投机者得到好处的制度，投机者得到好处，那就表示当局有了疏失的地方，问题是他们不愿意认错，他们宁可大声疾呼要吊死投机者，也不愿意多反省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错。”

早在英镑危机过后，他就申明过自己的立场：“这个嘛，首先，英国的行动是站不住脚的，原因是假如它是对的话，我们的‘搅局’就不会把英镑挤出汇率机制之外。第二，也不只有我们在玩这场游戏，即使世上没有我这个人，这个过程还是会按照原来的样子进行，我们可能在整个事件到了最后英格兰银行调高利率时才起一点作用，原因是到了那一点的时候，有些市场参与者可能开始犹豫了，我们的果断行动可能又使整群人继续放手一搏。我们也许加快了整个过程的步伐，但我认为不论有没有我们，这件事总会发生的。”

这次，只不过是英国变成了东南亚，英镑变成了东南亚诸国的货币。

最精彩的争吵出现于今年9月份在香港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年会上。马哈蒂尔和索罗斯均出席了这次会议，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介都企盼着这一对冤

家对头能够对簿公堂，当面过招，结果这两人并未会面。然而，他们都在属于自己的场合向对方发动了攻击。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是9月20日到香港参加世界银行与国际基金组织举办的研讨会的，在会上他再次抨击外汇投机。“货币买卖是没有必要、不具生产力和不道德的，应该禁止，使之成为非法。我们不需要货币交易。”马哈蒂尔说，买卖货币用于支付国际贸易是正常的，但将货币单纯作为商品来买卖则是不可以接受的。国际上货币买卖的交易额比商品与服务贸易额多了20倍，但有关交易既没有创造就业机会也没有让一般老百姓享用到什么产品或服务，真正获利的只是外汇炒家，他们一年的平均回报率高达35%。而且，无论指数升降，这些足以通过巨额买卖影响汇率的炒家都是稳操胜券，而他们是通过使穷人变得更穷而盈利的。马哈蒂尔说，这些亿万富翁其实并不需要更多的钱，但他们却仅仅因为不愿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繁荣而进行极不道德的破坏。他称，最近外汇投机者对马来西亚货币的打击使“我们倒退了10年”，这是对马来西亚市场的“强暴”。他还说，东南亚一向以为外资是来帮助他们繁荣起来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当然，马来西亚还将会继续鼓励外资进入本国的金融与股票市场，但将分辨诚恳投资者和热线操纵者，对后者绝不欢迎。他说，他相信，部分媒体及别有用心的人并不希望看到东南亚走向繁荣，他们短浅地认为别国的发展会削弱他们的财富。在回答听众提问时，马哈

蒂尔争辩说，世上没有绝对自由的市场，民选政府有权控管市场，因为如果做得不好，选民将会让政府下台，但他们却没办法赶走外来的金融炒家，他说：“我在这里连他的名字都不能说出来！”这番话引起哄堂大笑。

而在9月21日，被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为近期东南亚金融动荡的投机者索罗斯，在世行的另一场名为“朝着全球性开放社会迈进”的研讨会上，反唇相讥，称马哈蒂尔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危险。对于马哈蒂尔表示将限制外汇买卖，索罗斯说，这种言论实在太不恰当，根本不值得认真考虑。若他禁止外汇买卖，马来西亚市场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索罗斯说，实际上，近两个月来，他并没有参与抛售林吉特，甚至还在买进，可是林吉特仍在急泻——所以，他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样能够左右汇市的升降，他还举出了一大堆马来西亚的经济数据来支持他对马币下跌原因的看法（这同时也表明他是有备而来），比如，马来西亚近年来借贷扩展太快等等造成了不少问题，马哈蒂尔及其政府当然要为此负责。而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他需要一只替罪羊，而自己当然地就被当成了这只羊。

索罗斯说，这次货币动荡应当让人们注意到东南亚固定汇率制、泡沫经济、银行缺乏监管等问题。

不过，索罗斯说，这次东南亚金融动荡还不足以令亚洲经济奇迹消失，因为亚洲国家的经济很有活力。相信他们在充分吸取教训之后，一定会复原。

索罗斯还在会上向受东南亚货币动荡打击的“穷人”表示同情，但强调也不同意马哈蒂尔，因为他是责任人之一。

索罗斯的话，立即引起在场的 650 名银行家和政府官员的捧腹大笑。

尽管类似的争论永远不会有完结，人们还是热心地关注着一切，而其中最为关切的莫过于这个问题：在东南亚的这场金融风暴中，乔治·索罗斯究竟赚了多少钱？

根据美国《商业周刊》杂志最近一期的报道，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会去年的业绩并不理想。1997 年头 6 个月的业绩也只是平平，直到 7 月份，量子基金会才大步跨前，将头 6 个月来的盈利翻了一翻。

97 年上半年，量子基金会盈利 14%，但这一数字与同期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 20.6% 相比，依然十分逊色。

然而，从今年 6 月底到 7 月底这一个月内，量子基金会的盈利却由 14% 急剧增加到 27.1%，几乎使上半年的盈利倍增。据报道，量子基金会在 6 月底（即东南亚金融动荡前）总资产为 150 亿美元，到 7 月底则上升到 170 亿美元，这表明，自泰铢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 7 月初发生以来，量子基金会仅在一个月时间内就赚取了 20 亿美元。事实上，20 亿美元只不过是索罗斯量子基金会一个月的盈利。东南亚金融风暴已持续了两个多月，至今还未完全平息，索罗斯从中获取的利润也许仍在增加，究竟有多少，也许要到将来才会完全知晓。

以泰铢贬值为导火线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震动了全世界。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仅强烈地冲击了东南亚一些国家，而且波及到了整个亚洲地区以及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诸如巴西、希腊、捷克、波兰、南非等国家的金融市场。香港股市巨烈波动，台湾股市、汇市应声而倒，韩国行情迅速下滑，日本市场人心惶惶……以台湾的金融证券市场为例，从中可以看出这场风暴影响的剧烈。

正当东南亚各国金融动荡余波正劲之际，台湾的金融市场在这场风波和台“中央银行”政策失误的影响之下，也遭受了重创。

由于 1997 年以来台湾贸易出超的表现远远低于 1996 年，岛内外普遍看贬新台币，行家推断将贬至 30 元兑 1 美元。而国际美元的强势、东南亚货币危机、厂商意欲规避风险及出现汇市投机客等因素更加深了市场的预期心理。一开始，“央行”就决定要坚守汇市、捍卫新台币，并不惜动用外汇储备，进行长期抗战。这期间，“央行”在明，投机客在暗，相互较力，难分胜负。10 月 3 日，在部分外商银行的带领下，汇市突然出现厂商狂买美元局面，为守住新台币汇率，“央行”无限量供应美元，其中 8 成以上是用外汇储备支给。结果当日汇市 15.39

亿美元的巨额成交量，几乎是平日交易量的 5 倍，而新台币汇率则依然维持在 28.6 元兑 1 美元左右的正常水平。次日起，“央行”开始反守为攻，除了开始，拉升新台币汇率外，隔了一个周日后，“央行”容忍短斯利率走高，并对持有美元的外商银行采取选择性高拆款利率，迫使其吐出美元。然而，此举也产生了副作用：由于“央行”大量卖汇买回新台币，导致新台币严重缺货，使得隔夜拆款利率一度涨到 19.75% 的天价，创下历史最高；银行纷纷调高存款利率吸引资金；企业界则面临贷款利率上扬及无处可贷的局面；而股市则由于大量新台币资金流向外汇市场，造成资金的进一步短缺，股价连番下跌。

相比于“央行”在汇市上的强力作为，当局对于股市的跌落显得软弱无力。从去年起一路上涨的台股，今年 7 月下旬曾一度升到了 10256 点的高位。然而，近两个月来，台湾股市却如水银泻地一般，狂挫不止，重挫至 2000 多点，崩盘阴影笼罩在投资人心上，尤其是除电子股以外的传统类股几乎是一蹶不振而且至今仍似无回升迹象。然而，在这期间，当局始终坚持“汇市第一”的政策，顾此失彼，对股市的救助不够有力。在汇市保卫战，资金大量流向汇市，“央行”面临来自股市持续大跌的巨大压力。10 月 8 日，“行政院院长”萧万长召开上任以来第一次“财经首长高层会谈”，肯定了“央行”稳定汇率的政策，但同时也指示相关单位，“要在利率、汇率及股市间寻得均衡点”。10 月 16 日，台湾股市再次出现

大幅重挫，股市加权指数下跌 264.59 点，跌至 7997.81 点，跌破 8000 点大关。同日，在新加坡交易的台湾 10 月份股市期货指数也下跌了 15.2 点，与现货差价扩大到 3.02%。由此，显示出国际游资正在看空台湾股市。一时间，市场谣言四起，甚至传出曾在东南亚金融动荡中兴风作浪的国际金融炒作高手索罗斯也在放空台湾股市指数期货，这更进一步加剧了台湾股民的危机意识。

为了挽救股市，“央行”政策大转弯。当日下午，宣布大幅降低存款准备率，降幅为 7 年来最大，预计释出资金 960 亿元，并决定从次日起，“央行”全面弃守汇市，以避免资金的进一步收缩，加速股市跌势。17 日，“央行”便以“外汇市场不正常预期心理已经消除”，“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为由，宣布汇率“未来交由市场机能决定”。当日汇价即告直线跌落，大贬 9.81 角，以 29.5 元兑 1 美元作收，创下 10 年来最低点。

“央行”政策的大转弯，不仅使坚守了 3 个多月的汇市功亏一篑，而且股市也并未领情，仍然难止跌势。17、18 日两天股市连跌一二百点，20 日周一开市，再度大跌 301.67 点，跌至 731.78 点。同时，汇市也在银行与厂商的一轰而上中，20 日再度大跌 6.91 角，以 30.451 元兑 1 美元作收。回顾这段时间以来台湾当局的作为，岛内舆论一致认为，汇市、股市的双双失守，实际意味着当局近几个月来所采取的金融政策失败。台湾当局在这场风暴中已至少损失了 50 亿元新台币，让放空台币的外

国游资大大捞了一笔，尝到了7月以来曾经让东南亚各国遍尝的汇价保卫战的苦果。

现在，市场金融风暴的严重影响正以迅速波及到世界其他地区，有报道说：7月份以来，首先从泰国爆发的这场风暴席卷东南亚，导致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市场动荡，各国货币大幅度贬值，股市下泻，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困难。直到10月下旬，东南亚金融风暴对世界各地股市的影响仍在加大。近两天来，世界各国股市纷纷大幅下跌，纽约股市道·琼斯指数27日狂泻了7.2%，跌破了法定550点的限度，为此纽约股市中断了交易。这是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以来华尔街股市首次中断交易。这一天的实际跌幅达到554.26点，从点数看甚至超过了1987年10月的那个“黑色星期一”，创纽约股市历史上跌幅之最。接着，东京股市28日下滑了4.3%；香港股市恒生指数在27日下挫5.8%的基础上，28日又暴跌了13.7%；新加坡股市指数下降了7.6%；欧洲的法兰克福、米兰、巴黎和苏黎世股市连续两天下跌，其中28日的跌幅分别达到65.8%、6.03%、4.7%和4.8%。马德里股市28日因狂泻了10%而不得不中断交易。

受到股市冲击波的影响，世界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也出现动荡。游资从股市撤出后纷纷进入证券市场，证券市场因而交易量猛增，各国政府债券等有价值证券因抢手而变得红火。与此同时，连续上扬了数月的美元汇率下滑，28日美元与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的比价一下子跌

到今年年初以来的最低点。这一连串剧烈的动荡在世界上引起了某种惊恐和不安。

数日来,世界股市风暴成为欧洲媒体的主要话题。一般认为,目前还在继续发展的东南亚金融风波是这次世界股市动荡的“直接导火线”。

这场风暴对素有“金元帝国”之称的美国的影响,该报道对它作了如此分析:

“与此同时,东南亚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也产生很多不利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对美国向该地区的出口不利,对电脑芯片等电子产品出口商的打击更大。目前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以年率计已高达 1900 亿美元,其中对东南亚的贸易赤字占 11%。而此次的金融危机将使美国对该地区的贸易赤字继续增长。此外,对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拥有企业的公司来说,未来的经营利润也将大大减少。”

“从间接的方面来说,如果日本难以承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打击转而在美国寻找出路,那将对美国经济带来较为不利的影响。日本经济主要依赖出口,其中对东南亚市场的出口约占 40%。金融危机将严重影响日本出口,使本已极为困难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如果不少坏帐累累濒临破产的日本金融公司,为了获取资金而抛售它们所拥有的巨额美国政府债券,这对美国经济将会带来严重的影响。”

拉美的其他国家受这种株连也绝不是意外的,阿根廷《号角报》早在 7 月份就做过这种预测:“泰铢的崩溃

对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造成了巨大影响。但是，在遥远的太平洋的另一头——西半球也立即产生了反响：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感到了地震，它们的股市普遍出现下跌，并且风传巴西货币雷亚尔将会贬值。”

这场风暴，对受影响的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而暂时未受波及的国家也产生了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每个人都在问：我们怎么样？能安然无恙吗？

同处东亚的中国，至今安然无恙。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里兹不久前在香港说，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类似的危机，是因为中国经常项目盈利，资本流入是以直接投资的形式，当然也由于中国的货币还没有成为全球可兑换货币的缘故。

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充足，朱镕基副总理在世界银行年会上宣布，中国的外汇储备充足。而股票市场却显得资金不足。

然而在中国许多大城市，似乎也有曼谷的影子在游动。

有西方投资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尽管中国实行治理整顿四年多，上海的写字楼空置率仍然远远超过曼谷；北京的办公楼空置率高于雅加达和马尼拉。预计在1998年，北京的新增办公楼面积将是雅加达、曼谷的两倍，是马尼拉的五倍以上；大型商厦倒闭的消息时有所闻。

如果从1992年起，中国政府一直放手让房地产的过

热开发到今天，听任银行把钱投向房地产业，听任投资者从香港把大量资金转到内地的“大手笔”项目上来，而不及时进行治理整顿，那么在今天，香港早已成为第二个曼谷；而内地的银行即使不破产，也一定会引起高通货膨胀。斯蒂格里兹说，中国银行的呆帐影响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最终将动摇金融体系。在目前这种情形下，一旦中国放开资本市场，一定会给国际金融投机家们开辟一个长袖善舞的天地。

统计显示，中国现在利用的 3200 亿美元投资中，64% 来自外商直接投资。目前中国外债余额约 1200 亿美元，但是中长期贷款就占了 85% 以上，短期外债仅为 10%。中国的外债结构没有给国际游资留下多少套利投机的余地。而致使泰国经济大厦轰然倒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量短期资本突然撤走。

这一次金融动荡，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万恶的金融投机者“使我们倒退了 10 年”。很显然，东南亚人要过一段苦日子了。

那么中国呢？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说：中国从东南亚国家货币波动中得到启发，今后将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力图保持经济适度快速增长，并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 5% 以内。同时，中国将继续坚持正确的利用外资政策，防止借用过多外债及过分依赖外债，杜绝由房地产、股票市场过热产生泡沫经济的可能。1993 年以来的实践

证明，中国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

1994年，中国人民币汇率大幅度下调。此后的三年中，中国年出口额增加了650亿美元，仅增加的数额就比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去年全年出口总额还多。所以西方舆论一致认为，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产品极大地冲击了东南亚的出口，导致他们的经常项目的逆差。

但是接下来大概要上演一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大戏。此次东南亚货币贬值，他们的东西在国际市场上就更便宜了，所以在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上，他们将比中国有价格优势。

专家指出，中国的产业及出口产品结构 with 东南亚尤其是泰国十分相似，中国与泰国的皮尔逊指数为0.91，对国际市场，中国与东南亚是有他没我，有我没它的关系。大概在今年年底或明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企业就将感受到这股来自东南亚的压力。

对这一前景，中国的企业应该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在中国，东南亚金融风暴引起了金融界、经济界和有关各方的广泛关注，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并已初步得到了一些宝贵的启示。

第一，必须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增强抵御金融投机活动的实力。从根本上说，东南亚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是经济失调，特别是经常项目赤字过大，使投机商有机可乘。现在，中国对外贸易迅速

发展，利用外资数额不断扩大，进出口结构中对外依赖性很强的加工贸易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经很高。加上中国将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资本市场和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也是必然的趋势，这就使中国经济越来越受到他国和世界经济变化的影响。中国必须及时根据国内国际市场的变化，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保持经济的协调、平衡发展。要防止过分依赖出口，并且要努力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和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以分散风险和增强出口竞争力。要着力提高制造业的水平和增强金融业的实力，以减少开放国内市场所带来的冲击。

第二，必须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把金融开放和金融监管紧密结合起来。据资料，到今年6月底，泰国金融机构的风险债权数额为4680亿铢，占贷款总额的31.5%，民间企业则高达1.6万亿铢，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不可避免地要陷入财政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对15个发展中国家和5个工业化国家1970~1995年间发生的76次货币危机进行调查，发现危机发生前几个月，主要经济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增幅、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货币发行量、外汇储备、经常项目等）都已程度不同地发出警报，但有关国家当局并未予以重视。去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过热等问题提出了紧缩建议，有关国家亦拒绝接受。它们对开放金融场所带来的风险缺乏警惕，监控和管理薄弱，外

资流入过猛，短期贷款过多，外汇储备不足，在一旦外资为谋求更高的回报而撤出，造成支付危机和本国货币大贬值时往往就无法驾驭局势。正如法国《解放报》8月15日撰文所说：“这些国家正在饱尝盲目金融自由化带来的苦果。”中国的情况比较好，外汇储备相当宽容（1997年上半年已达1200多亿美元），拥有可靠的对外支付能力；对资本的进出管理严格，对外资涉及房地产业和证券业从严限制；外债中短期的只占10%左右。但中国也应注意金融市场的大门要谨慎地随金融改革的深入而逐步打开，打开的程度决定于能够监管、调控的程度；利用外资中要防止重数量轻质量、重引进轻管理、重投资轻导向的现象；要适时调整汇率政策，使之适应市场供求的变化；还要加强对金融市场信息收集、走势分析、风险预测工作、建立防范机制，使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消灭于萌芽之中。

第三，必须认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影响，加强区域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这场金融风暴不仅波及东南亚各国，而且波及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说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正在形成。国家之间，尤其是同一区域的国家之间，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既互相竞争，又共荣共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罗斯教授认为，货币危机通常向两种国家蔓延：一是与受冲击国贸易关系十分密切的国家，常见于工业化国家之间；二是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极为相近的国家，这在新兴市场化国家之间比较普遍。

这一分析值得中国重视，如何建立区域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机制是要研究的新课题。

第四，必须警惕“泡沫经济”，加强对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的规范与管理。在发展中国家，炒房地产、炒股票等投机活动比较普遍，往往造成迷惑人的表面繁荣，引发危机。泰国等国这次就尝尽了苦头。中国前几年也出现过房地产过热，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至今全国仍约有 1000 多亿元资金被占压在房地产上，而且每年还要继续投入资金以维持，教训非常深刻。在证券市场上也存在不少问题，许多银行资金、企事业单位的资金利用市场的不规范和政策漏洞，炒买炒卖，牟求暴利，搞乱金融秩序，破坏国家经济正常运行，必须从严治理，防患于未然。

关于这次风暴带给人的经验教训，世界各国的分析性意见纷纷推出，有关媒体曾总结过这样几条：

其一：

遗憾的是，由于金融危机不可避免，花大笔钱解救也是不可避免的。国际金融界的官员们认为，防止因为混乱之中贬值、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和担心银行破产或者政府丧失偿还能力而引起危机是好的，但是不可能的。捷克总理克劳斯说：“一些动荡是必然的，无法避免。”克劳斯的自由市场的观点使他成为各国中央银行行长心目中的英雄。

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富国的政府将会再次紧急

贷款，就像他们对泰国和墨西哥所做的那样。但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说，“这种金融大难保险……应该仅仅用于最罕见的灾难”。如果投资者和金融机构能指望政府解救，他们就会“不顾后果、不负责任地冒险”。

其二：

给市场更多的信息可能防止一些危机，但是还不够。

在1995年墨西哥近乎失去偿还能力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盟友要求一些国家公开有关金融情况，希望投资者早有警惕，从而使政府比较难继续奉行无法持久的政策，但是没有作用。

所以应该提供更多信息，特别是有关银行状况的信息。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说：“我不知道公布多少情况合适，但是就墨西哥和泰国而言，显然是不够的。”他的话使墨西哥股市8月29日出现下跌，迫使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向世界保证他们上司指的是1994年，不是今天。此事表明世界股票市场多么紧张不安。然而克劳斯说，问题不是“缺少信息”，而是“缺少分析”。

其三：

像泰国那样的固定汇率可能是有害的。

就在几年前，一些专家认为固定一国货币与通货膨胀率低的国家的货币的汇率对通货容易膨胀的发展中国家是一项有吸引力的战略。这些专家现在不那么热衷于这种看法了。一些国家固定汇率的时间往往太长，渐渐削弱了他们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前日本银行的经济学家、现国会议员铃木说，东南亚政策中“最大的弱点”是不允许他们的货币自由浮动。哈佛大学的萨克斯指出欧洲货币对美元比价的下跌幅度比东南亚的货币最近下跌幅度还大，但是造成的影响小得多，因为欧洲货币的下跌是通过市场力量逐渐下跌的。

其四：

软弱的银行造成巨大的问题。并非所有货币贬值都会造成全球金融危机。泰国出现危机的一个原因在于它的银行和金融公司——他们中许多现在已经因为破产而关闭。政府花巨额开支保护银行的储户和债权人，迫使税收提高和其他地方的开支减少。

另外，银行的脆弱使政府难以提高利率，使货币贬值或者改变其他政策，这些做法从长远看是可取的，但是可能给银行造成很大影响。

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莫里斯·戈尔茨坦警告，给泰国紧急贷款的条件可能发出错误的信息。尽管泰国银行的股东会损失很多钱，但是银行的债权人不会损失很多。

如果大投资者把钱投入软弱的银行或者购买银行债券但从不赔钱，那他们将来就没有什么理由谨慎从事；这些使未来解救的钱更多。

现在，人们最担心的还有这样一个问题：谁会成为索罗斯的下一个目标？有报道说，现在乔治·索罗斯对俄罗斯颇感兴趣。他在7月29日也证实了俄罗斯报界的消息。这些消息说，他向俄罗斯电信投资公司投资了9.8

亿美元（约 61.5 亿法郎）。这家公司是穆斯特财团的成员，它以 18.7 亿美元赢得了拍卖，获得了穆斯特财团 25% 的股份。

索罗斯可能还准备在俄罗斯石油领域投资。俄罗斯的《今日报》说，他可能将向莫斯科出 10 亿美元以控制俄罗斯石油公司，这是俄罗斯第九大石油公司，目前它仍属国家所有。

据说，在地球的另一端，索罗斯瞄准了阿根廷。他在那里已是第一大地产主，他还想成为那里的最大银行家之一。他在当地的机构伊尔萨公司最近宣布，希望在对国家抵押银行实行私有化时成为购买的竞争者。索罗斯已经在阿根廷的农业和不动产方面投资了 4 亿美元。他在潘帕斯草原拥有 40 万公顷土地和 1.7 万头牲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富有地区，他还购买了一些商业中心和办公大楼。最近几周，他又获得了原属美国人斯威夫特·阿穆尔的 5 万公顷土地。这块地位于拉普拉塔河畔，如果布宜诺斯艾利斯能够赢得 2004 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届时将在这里修建奥运村。如果他买下国家抵押银行（资产总额为 43 亿美元）的话，这将是他在阿根廷最大的一笔投资。

也许要不了多久，我们又能目睹到乔治·索罗斯在当今世界上为我们制造的又一场纷争，或又一个金融神话，从而为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再续写上为世人瞩目的一章。

第六章

世界上最成功的基金

完美竞争理论声称在某种特定的前提下，不受限制的自我利益追求可导致最有效的资源分配。我无意推翻经济学，我认为它是十分优雅的理论建构。但我的确怀疑它在真实世界的适用性，我也怀疑它是否能够通过金融市场的考验。我相信单是量子基金的表现，就足以证明这些理论是错误的。

——乔治·索罗斯

“量子基金”是索罗斯于 1979 年正式定名的一个投资基金，它恐怕是自本世纪以来世界上最有名，也是效

益最好的基金。它的前身是“索罗斯基金”，在“索罗斯基金”之前是一个成立于1969年的名叫“双鹰基金”的小型投资基金。

如果从1969年“双鹰基金”算起，到1997年为止，在短短的28年时间内，它就从最初的400万美元的经营资产规模扩展到了120亿美元的规模。自“量子基金”成立以来，除了1981年赔钱和1994年稍有亏欠以外，其余26年都为投资者赚进了大把大把的钞票，平均每年的回报率达35%，其投资功力普获好评，令世人瞩目。

“量子基金”是美国最早那批海外基金的一个，它主要适用于国外的投资家。当时，绝大多数其它海外基金都受到美国法律的限制，最多只能容纳99个成员，并且一般要求投资金额至少要在100万美元以上。它同时又是一种赌注基金，它让有钱的富人来合伙投资，这些人愿意用他们的钱来冒那些难以估料的风险，以便获得可观的回报。索罗斯基金的债券出售时间很短，购买时需办理非常复杂的金融文件，且购买金额巨大——这种方法不适于一般的投资者。

索罗斯和一部分其他基金会的头头打破了一般投资的常规，把这种策略运用到美国之外的股票市场。让资金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不仅在股票，而且在期货、外汇方面。这样一来，就使得金融市场的总体方面大为改观。据一个交易日的平均统计，索罗斯的基金每日卖出买进的有价证券就达7.5亿美元之多。

他取得的成果无法不使世人感到吃惊。如果某人在1969年当索罗斯建立“量子基金”时投了10万美元,并且把红利又继续用来投资,那么,到1994年他或她就可能使其资产达到1.3亿美元。每年的回报率高达35%。靠一笔非常小的资金就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回报,人们肯定会认为这超乎常规。如此巨大的金额变化必定会震惊华尔街,震惊全世界。

索罗斯“量子基金”的股票每股在1969年的售价是41.25美元,到1993年年初它就达到21543.55美元。同时,“量子基金”一直都支付巨额资金来进行现款分红。到1994年6月,它每一股股票的价值已达22600美元。要想成为量子基金会的一名成员,一个人必须得投资至少100万美元。按照可靠的统计资料,索罗斯个人至少拥有“量子基金”1/3的股份。

索罗斯并不是靠“传统古老的方式”来获得这笔钱的。19世纪美国的工业巨子,像洛克菲勒和卡耐基这样的实业家,他们是靠开办实体,通过制造钢铁或石油来赢得他们的财富的。乔治·索罗斯既不拥有,也没有管理这样的公司。他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势力基础。他的特长是利用巨额资本在金融市场上灵活运用来赚取大量的金钱。

为什么索罗斯在1979年要把他的“索罗斯基金”改名为“量子基金”呢?他本人当时的解释与以后的解释有所不同。他当时的解释是,由于基金规模的扩大,基

金原班人马需要充实，公司需要改组。在基金的经营管理上，他和当时的合伙人吉米·罗杰斯存在分歧。他向罗杰斯提出了一套三步骤的改革方案。第一步就是他和罗杰斯一起建立一支团队，假如这一点办不到，第二步就是他来独立建立一支团队；假如这样也行不通，就由别人来建立团队，他不插手。这就是他们当时实行的做法。他首先把基金的名称改为“量子基金”，以做准备。他说之所以要改为“量子基金”，是为了庆祝基金规模的大幅成长，同时他正好迷上量子力学中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这一原理认为：在量子力学里，要预见亚原子粒子的行为是不可能的，这刚好吻合了索罗斯的信念——市场总是处于不稳定的波动状态。他相信，通过预测明显的行为来赚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资本交易只能靠赌。后来，在他老朋友拜伦·韦恩对他的一次访谈中，他又承认当时之所以要更名为“量子基金”，主要目的是想把他的名字去掉。他不想太引人注目，因为树大招风。

按照拜伦·韦恩的说法，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六个发展阶段。

1. 1969~1978 年的对抗时期。在这段时间中，索罗斯和吉米·罗杰斯联手与整个金融世界对抗。一般由吉米·罗杰斯进行市场分析，由索罗斯提出修改意见并拍板。罗杰斯是位优秀的分析师，此人工作勤奋，并且能领会索罗斯的思想架构和投资哲学，他们合作很默契，所以，投资效益非常可喜。这一时期是“量子基金”奠定

雄厚基础，寻求稳步发展的时期。

2. 1979~1981 年的大起大落时期。这是一个“量子基金”出现高速成长，同时也出现危机的时期。1978 年“量子基金”实施了第一步的改组计划，索罗斯准备与罗杰斯联手，一起建立一支高效率的管理队伍，但到了 1980 年，这个计划也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于是，他和罗杰斯分手。“量子基金”由索罗斯独立经营。分手之后，索罗斯有意放松了以前进行投资操作时所采取的制约机制，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基金的表现竟然好得惊人，此后两年，“量子基金”的资本几乎每年增加一倍。在这两年内，基金从 1 亿美元激增至 4 亿美元。

由于基金规模的扩大，责任也随之增大，索罗斯辛劳备至，又缺少人手，索罗斯想自己组建一支团队，即实施他入组“量子基金”的第二种方案。这第二种方案触发了 1981 年的危机。1981 年 9 月，索罗斯从第一线退下来，把“量子基金”的资金交由别的代理人经营。

3. 1982~1984 年的空白时期。1981 年 9 月，索罗斯把基金的资产套现，成立所谓“综合基金”。他打算把基金的部分资金交由代理人经营，他只负监督之责，不再积极参与经营。在这段时间中，索罗斯找了一些经营代理人，但情况都不令他满意。从 1982 年至 1984 年，索罗斯采取的这种经营方式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量子基金”业绩平平，是一段最没有生气的时期，所以拜伦·韦恩把这段时期称为空白时期。

4. 1985~1986 年的“即时实验”时期。为了从学术立场重新投入投资，索罗斯决定撰写一本关于他个人投资方法的专著，于是他开始进行他所谓的“即时实验”。他的想法是在决策进行过程中就把其中详情即时记录下来。由于他把投资视为一种历史性的过程，因此他觉得这种实验非常恰当。这可以称为一种科学实验，也许可称这为“炼金术”实验，原因是他希望进行实验这个事实可以影响实验结果，也希望这种影响是积极的，结果他的希望如愿以偿。之后，“量子基金”又有另一个爆炸性的成长时期。所以，虽然这实验不能根据科学的标准证明他的理论，但根据理论本身提出的标准而言，这理论是合理的。索罗斯的重要看法之一是理论和实验足以影响它们涉及的主题。于是，他在 1985 年展开了他的即时实验。

这一时期也可以被称为索罗斯单独重返金融战场的时期。

说明“即时实验”的最好例子恐怕是 1985 年 9 月的广场饭店协议。这项协议对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来说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这项实验的结果使“量子基金”在短短的 15 个月内增值了 114%，这对著书立说的乔治·索罗斯来说也是一个最高的殊荣。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广场饭店协议的情况。当年 9 月 22 日是个星期天，五大工业国家财政部长（编者注：即美国、日本、西德、英国和法国五大工业化国家）在广

场饭店会晤,由于1980年代初期非常强势的美元已经强过了头,于是五国达成协议,决定让美元贬值。广场饭店协议显示,汇率自由浮动制度已经走到尽头,取而代之的是所谓“肮脏浮动”(即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原来的模式既然已经被打破,新游戏规则于是登场。索罗斯当时觉得,他们采取的是必要的步骤,也察觉到这件事的重要性。虽然当时他超买了日元和西德马克,但他继续跟进,更大规模地超买。然后他停手,之后又再买进。他本来已经有投资部位,但还能够有本钱继续增加投资以便发出最致命的一击。结果他的部位变得非常大,得到的报酬也相当可观。

5. 1987~1988年的股市崩盘时期。1987年10月,索罗斯发现日本股市的利率达到了48.5点,而与此同时英国只有17.3点,美国为19.7点。但在索罗斯看来,这却是东京股市的不祥之兆,他知道东京地价在狂涨,货币与房地产已失去了平衡,同时他也坚信高利率与低红利难以维持下去。

他还了解到许多日本公司,尤其是银行和保险行业的公司,把大部分资金都用于购买日本其他公司的股票,有些公司甚至借债来增购股票。虽然由于东京股市的繁荣,这些公司的财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但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一旦出现风吹草动,一场大的灾难就会降临。参照自己的反应理论,索罗斯敏锐地感觉投资者的狂热已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他感觉到日本股市将要

崩溃。由于日本股市的成交量占了全世界成交量的36%，这种灾难必将波及整个世界。索罗斯对东京股市越来越悲观了：“东京股市不可能再有转机了，人们对市场的估价已远远高于它本身的价值，即使是缓慢的回落也已不可能了。一场大崩溃很可能就要降临了。”

不过，据索罗斯估计，如果日本股市崩溃，对美国股市的影响不会太大，因为公众对美国股市的估价还没有达到象对日本的那种离奇地步，他也看到过华尔街的一些举动有发展成为日本股市效应的势头，但他并不为此过份担心，不久，他就将他在东京股市的几十亿美元的资金转入了华尔街，对于美国股市，他始终很乐观，他说：“美国股市只是近期才出现盲目乐观的势头，它仍能够以一种温和的、合理的方式遏止住这种势头。”

索罗斯当时认为，日本经济完全笼罩在一种泡沫经济中，他觉得问题首先会出现在日本，所以，他在市场上抛空日本股票，而在美国市场超买。

然而，受到打击的是美国市场，日本市场得到政府当局的支撑，所以没有崩盘。因此他在日本的空头部位就成了沉重的负担，他被迫结清他的超卖部位，以免要增收押金。于是他很快脱身，原因是他的原则是先求生，再谈赚钱，结果“量子基金”在几天之内亏了不少钱。

事实归事实，这场灾难的确使索罗斯1987年的利润消耗殆尽，灾难过后一星期，“量子基金”的资产净值下降了26.2%，跌至每股价格10432.72美元，这个数字比

美国股市的 17% 跌幅还要大。还有报道称自 10 月 8 日以来，量子基金会资产净值下降了 31.9%，而索罗斯本人则损失了 1 亿美元。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到 1987 年底，“量子基金”的资产净值仍增加了 14.7%，达到了 18 亿美元以上。的确，10 月份的这场灾难对于索罗斯在华尔街的领头羊地位只不过如碧波里泛起的一点涟漪而已。

1988 年 9 月，索罗斯找到了新的资金管理人，斯坦利·德拉肯米勒进入“量子基金”，“量子基金”进入新的调整和稳步发展时期。

6. 1989～现在的斯坦利·德拉肯米勒主政时期。从 1988 年开始，索罗斯把大部分精力转移到了前苏联和东欧事务上。由于当时欧洲革命开始升温，他无法仍留在第一线进行实际操作，他把“量子基金”的日常经营工作交给了德拉肯米勒和他在 1988 年新组建的经营班子。新班子负责排选股票，德拉肯米勒负责客观投资，但乔治·索罗斯仍是老板。

德拉肯米勒在“量子基金”的头一年，表现不如他预期的理想，他觉得这都怪索罗斯常常在公司出现，使他觉得受到掣肘，也让他觉得不自在，以致无法施展，他开始觉得沮丧。但他和索罗斯之间并无冲突，只是他对自己不满意，他也不隐瞒他的感觉。因此到了索罗斯因为东欧事务分身不暇，不能常到公司时，索罗斯就让他全权负责。事实上索罗斯本来就有此打算，但索罗斯还

是比较正式地向他授权。这一点对他很有帮助，在此以前，当他表现好时他才会觉得他在名正言顺地管事，表现欠佳时，就不认为是他的责任了。到了德拉肯米勒真正接管后，他们建立了一种类似教练和球员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都非常成功。索罗斯是教练，德拉肯米勒和其他球员可以去找索罗斯听听他的建议，并让他了解他们的看法。

这样一来，他们不再觉得索罗斯会干预他们，更不会认为他从他们手上把球抢走然后自己带着球跑。索罗斯认为这是一种很有用的作业方式。他也负责分发他们红利，公司盈利保留给这支经营团队，由索罗斯来决定每人应得多少。这也很重要，因为这可以使他们明白，索罗斯仍很关心公司的长远发展。他们觉得索罗斯是一个公正的裁判，立场不偏不倚，他们就可以创造很好的团体精神。索罗斯也负责公司的全盘策略，包括决定是否成立新基金，取消现有基金，或进入新的经营领域等。

“量子基金”在德拉肯米勒的主政下，除了1992年在英镑危机中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外，从1991年至1993年连续三年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可以说这是“量子基金”的另一个巅峰期。

1994年是量子基金成立以来表现次差的一年，但量子基金仍有不错的盈利，经过三年大涨的情势之后，这样的成绩已算不俗。往往在重要的一击后，不免要把部分既得的成果回吐出来，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只是回

吐的部分远不如 1982 年和 1987 年那两次大。1995 年事实上比 1994 年艰难多了,1995 年刚开始,“量子基金”亏损了 10%,但在 1995 年之后,又有明显的回升。目前,由于“量子基金”在索罗斯的统领下,全体人员通力合作,“量子基金”的经营业绩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令人满意。

“量子基金”资产增长情况:

1973 年(当时名为“索罗斯基金”):资本额为 1200 万美元,年底结算,增长 8.4%,资金额为 1300 多万美元;

1974 年:基金增长了 17.5%,资本总额达 1529 万美元;

1975 年:基金增长了 57.9%;

1977 年:基金资本增长了 31.2%;

1978 年:资金回报率达 55.1%,基金总额达 1.03 亿美元;

1979 年:基金正式更名为“量子基金”,年底基金增加 59.1%,基金资本达 1.78 亿美元;

1980 年:资本增加 102.6%,基金资本达 3.81 亿美元;

1981 年:“量子基金”资产下跌 26%,从近 4 亿美元下降到 2 亿美元;

1982~1984 年:属于“量子基金”的空白时期,“量

子基金”进行管理模式的改革。“量子基金”的资产略有上升，但业绩平平；

1985年：“量子基金”总投资额达25亿美元。与1984年相比，这是非凡的一年，“量子基金”增长了122.2%，总资产从1984年的4.489亿美元增至10.03亿美元；

1986年：基金资产增了42.1%，达到15亿美元的规模；

1987年：经过灾难的“黑色星期一”，索罗斯在日本股市受挫，“量子基金”净资产下降了26.2%，但年终结算仍增长了14.7%，总资产达18亿美元以上；

1988年：“量子基金”资产净值增长30%；

1989年：“量子基金”资产净值增长31.6%；

1990年：“量子基金”资产净值增长29.6%；

1991年：基金资产猛增了53.4%；

1992年：基金总投资额达37亿美元，年增长68.6%；

1993年：资金增长率为18%；

1994年：基金资产达110亿美元；

1995年：“量子基金”经营略有下跌，上半年损失10%左右；

1996年：“量子基金”总资产已超出120亿美元。

1997年：“量子基金”在6月底（即东南亚金融动荡前）总资产为150亿美元，到7月底则上升到170亿美元。

第七章

并肩作战的人们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品，只有那些我可以信任的人才会成为我的工作伙伴。有些人很会赚钱，但未必值得信任，自然也就不是我挑选的对象。

——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自 1969 年设立“双鹰基金”以来，在这个基金以及在后来演变而成的“量子基金”中与他并肩合作过的人不计其数，有些人显得平庸，而有些人则显示出重要作用。

在索罗斯基金会的发展过程中，第一个值得提到的合作者是阿瑟·勒纳。

勒纳是纽约银行的分析家，阿恩哈德公司曾在1967年和1968年两度表示聘用他，但都被他拒绝。到1969年初，他最终应聘了。他在阿恩哈德公司最初是当索罗斯的助手，帮助他管理那两个基金会。以后两年多。他跟索罗斯并肩作战。

为索罗斯工作是紧张的，也很有趣。那两年中，市场起伏震荡，增加了市场交易的紧张性和戏剧性。勒纳回想当时的情景说：“乔治是我们的工头，他让你致力于工作。他具有控制世界的权力，这对我非常有趣。他能在A处搞事情，很快让你在B处看到结果。我没有他的水平，所以不明白他的逻辑。他也许是我见到的最大的投机商。当投资规模非常小时，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也不会干好它。”

除了是工作上的助手，勒纳还成为了索罗斯的好朋友。索罗斯甚至将他写的《金融炼金术》一书让勒纳在工作之余阅读。但勒纳读后表示他一个字也弄不懂。

作为索罗斯的朋友，勒纳经常给索罗斯提出一些忠告和好的建议。

如果索罗斯能听进他的忠告，这将对他人大有裨益。他是没有索罗斯聪明，但是，不可避免，他是索罗斯想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勒纳最想告诉索罗斯的话，就是要增强语言表达能力，必须使他的理论表达得更清晰明了，但索罗斯说：“我正把钱放到嘴边，我不能割断我与投资决定之间的关系。我必须充分利用我的智力资源，使

我非惊讶的是，我发现我的这些抽象理论迟早会有用。夸张一点说，这些抽象的理论是我成功的原因所在。毫无疑问，这些理论使我具有了优势。”

如果说勒纳更多地像是索罗斯生活中的朋友，那么对索罗斯基金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是吉米·罗杰斯。

1970年，索罗斯开始跟吉米·罗杰斯合作，罗杰斯曾在著名的英国牛津大学读书，并在196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在陆军服役的两年中，曾获炒股专家的称号，他甚至曾负责他司令官的股票业务，这给索罗斯留下了深刻印象。

罗杰斯曾在华尔街为贝克公司干事。1968年，只有600美元的罗杰斯开始在股票市场搞起了交易。两年后，他开始在阿恩哈德公司为索罗斯工作。但是后来新的经纪人公司规则开始生效，这个新规则不允许索罗斯和罗杰斯从他们公司的股票销售中提成利润。阿恩哈德公司也不想让索罗斯和罗杰斯离开。索罗斯和罗杰斯渴望成为独立金融投资人。他们离开了。随后他们各自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公司和基金会，这是在1973年。

索罗斯在回忆罗杰斯时说：“他最初是华尔街一家小公司的分析师。后来加入阿恩哈德公司和我合作，两人

西北的山丘为阵地,三队兵力相助,再加上使用一个炮队,定是取而不难。”^①

(三)搜罗和收买甘心为日人侵华效劳的汉奸。据曾根俊虎自述,他的侦察活动多靠贿赂打通关节,买通有关人员为之奔走。如前述之大沽人赵某,名玉章,不仅为曾根窃取了《大沽炮台全图》,而且还介绍多人曾为曾根的调查提供帮助。再如登州人迟相书,亦为收买。1875年,曾根抵达登州,调查府城人口、物产、位置、边界及水城炮台,多受迟的帮助。迟的儿子曾随伯父在凤凰城经商,既通晓朝鲜语,又熟悉鸭绿江两岸情况,曾根见之甚喜,决定送到日本培养,“如果在朝鲜一旦发生变故,就让他儿子做向导”。^②后到188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迟还为日人探听旅顺口情况。^③1884年秋,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进驻福州,曾根竟然通过驻福州的日本中尉小泽豁郎买通湘军失意军官黄竹斋,窃到了左军在全闽的部署名册,当即呈送日本参谋本部。^④仅据曾根本人所撰游记,即可见其在收买奸细方面下功夫之深了。

(四)联络江湖豪杰和会党首领,伺机发动暴乱。曾根俊虎认为:“清国气运已衰,政道不治,官民不睦,恰如一国两体”,到处皆有“草莽悲歌不满之徒”。“若与之联合,采取适当策略,必定不需我陆海两军,就能完成有利于我日本国之伟业,以建立今后之基础,实现兴亚之大目标。”^⑤

应该看到,曾根俊虎在中国从事侦察活动,从来都不是被动地执行任务,而是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自豪感。因此,尽管为此辛苦备尝,仍然甘之如饴。自称:“清国内地旅行之苦境,实在难于道尽。即便如此,如果虎穴含辛,龙额茹苦,是上天赋予我辈之职责,那就决不推辞。”他每次行动都是激情满怀,曾写有《客窗漫吟》诗两首。其一称:“目涉蛮烟又瘴云,豪游何敢叹

① [日]曾根俊虎著,范建明译:《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第103、274、88、188、258、150—151页。

② [日]曾根俊虎著,范建明译:《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第103、274、88、188、258、150—151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116页。

④ [日]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316页。

⑤ [日]曾根俊虎:《陈情书》(1886年5月),见[日]黑木彬文、罇泽彰夫编:《兴亚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第2卷,第292—293页。

快撒手。”

在那段时间，他们工作得非常勤奋，也非常紧张。他们除掌握贸易外，还把基金公司的所有资本都投入股市交易生意。他们甚至有时利用期货交易或借贷来从事商品和货币交易。他们最大限度地发展拓宽他们的业务范围。他们的基金从事各种市场里的各种交易，包括货币、商品、债券和股票。从1970年他们开始合作，到1980年他们分开，10年间他们竟奇迹般从未输过一场。华尔街上的其他经营者对他们的崇敬之情与日俱增。他们俩人似乎比任何人都明白经济的走向。

索罗斯和罗杰斯配合得非常好。“通常情况下，如果我们意见不一致，”罗杰斯解释说，“我们就什么也不做。”并不总是这样。如果说某个人强烈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他就自行其事。罗杰斯说：“一旦我们全力干某事，那么显然这项交易要么对要么错，必须干出个结果，当我们彻底思考一个交易时，那么肯定会达成一致。我不喜欢用‘一致’这个词，因为意见一致的投资是个灾难。但是我们似乎总是走在一块。”

在索罗斯和罗杰斯的合作中，他们经常都有得意之作，这令索罗斯感到很自豪。他回忆过这样几项投资行动。

“其中一项是关于抵押贷款保证保险公司的，也就是所谓的魔术公司。当时加州的住宅市场崩盘，市场人士认为该公司会破产，不料这家公司竟然熬了过去，使我

们赚了不少钱。那我就定下这样的原则——假如股票可以安然度过困难时期，这些股票就应该持有，但千万不能在困难时期持有。这原则说起来容易，但往往大家都不容易照着办。”

“之后又有所谓‘房地产投资信托’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还在地图上做了标记。在这方面，我们不论买也好、卖也好。都做得很好。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这方面的生意最初是“自我加强”，但到最后是‘自败’的。换言之，这种生意到最后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大部分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都会倒霉。但这种生意还有约三年时间才会崩盘，因此当时可以买进他们的股票。我们在买超方面做得不错，这些股票股价升至顶点前我们已顺利脱手。过了几年后，这些股票股价开始下滑，我觉得那时卖空已经太迟，于是我把预测这个行业崩盘的备忘录拿出来看看，我发觉这种事永远都不会太迟的。这是我首次在购买方面得到百分之百的利润。我当时的做法是股价下跌时，才不断补进。我只花了100万美元，但那时对我的避险基金来说，100万美金是很可观的一笔钱。”

“当时，吉米最重要的想法大概是投资国防工业，当时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种生意。那时大概只有一二位经历过前一次国防工业蓬勃发展时期的分析师留意国防工业。吉米发现了E系统公司和桑德士公司等企业的股票。结果大大地赚了一笔。”

索罗斯接着回忆说：“大概在 1978 年或 1979 年间，我摸准了科技股的行情，那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当时吉米的想法是，全世界都在从类比科技转到数位科技的过程中，因此他想抛空类比科技公司的股票，但我却有意超买。当时科技公司的股票已失宠，虽然资料处理的代理业务像野火般兴盛，但这些公司的股票只能以很低的本益比出售，原因是市场规模扩充得太快，供应商很难维持原有的市场占有率。一方面，投资者也很担心大公司户中途杀人，把这些羽翼未丰的公司彻底打垮。因此之故，这些公司都无法向外筹措资金，而必须依靠本身的现金寻求成长。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公司应付不了市场需求，以致让电脑业的大型公司随时有机可乘，可以进入市场。说是最糟糕的一种预言，假如投资者的心理扭转，赚大钱的机会就会出现。

“吉米和我到蒙特雷出席美国电子协会的会议，花了一周时间和业者会面，每天大概和八至十家公司的人谈，结果我们掌握了这个难以掌握的行业。我们选择了五个最看好的领域，每个领域选择一种以上的股票。这是我和吉米最合作无间的时候，此后一两年，我们坐享这番努力的成果。当时基金的表现比起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好，但我们的关系却开始紧张得令人窒息，原因是基金成长很快，但经营的人手却原封不动。”

在公司的人手问题上，索罗斯和罗杰斯产生了分歧。索罗斯后来说：“吉米·罗杰斯不要增加人手，他很喜欢

我们的伙伴关系，因此不要外人加入。但我们的业务规模一天比一天大，所以我必须要雇用新人，吉米一直抗拒，但最后我们还是找了些新手来，由吉米负责从头训练。这种做法完全悖离华尔街传统，因为我们觉得任何人只要有点华尔街经纪商的背景，这个人就已经完全无可救药了。”

除人手问题外，他们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意见也不统一。

“我们当时的预设立场是市场总是错的。事实上，吉米·罗杰斯和我之间的最大分别在于吉米认为：流行的观点总是有错的，而我则认为：我们也可能有错。所谓‘华尔街智慧’其实就是所谓传统智慧、常理。事实上我们与华尔街传统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怀着传统智慧到我们公司来的人根本无法适应我们的业务。吉米·罗杰斯对这一点非常坚持，我就比较不那么冥顽不化，我愿意接受从华尔街来的人，但碍于他的观点，而且业务由他一手包办，我只好听他的。”

“后来”，索罗斯说，“我们找来一批很聪明能干的人，他们起初都是门外汉，最了不起也只有一点点经验。但是当他们开始受训，并陆续向吉米提出反对意见时，吉米却无法忍受，他受不了下属对他的批评。他一向都很能接受我的批评，我批评他，他从来不觉得不愉快，但他不能接受他的门生批评他或和他意见相左。所以这些人逐渐上路，越来越能干以后，他总千方百计对付他们，

使公司的气氛变得很不愉快。为了这缘故，我们总是留不住开始自立的人，于是公司出现了真空。我们的生意愈做愈大，却还得事必躬亲。对我们来说，成功只给我们带来更多工作、更多责任，而这种情形发展下去，最后终于迫使我们分手。”

索罗斯和罗杰斯都是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们也为自己的独立思想而自豪。但这也是导致他们最后分手的原因。他们的思想都如此独立，以致于他们最终发现在许多事情上并不能相互妥协。

1980年5月，罗杰斯离开了公司，带走了价值1400万美元的利息，占20%，索罗斯分得80%，共5600万美元。

根据某些记录记载，罗杰斯对于他们的分手是这样解释的：“基金太大了，职员太多了，他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来考虑他们的假期和工资。”索罗斯和罗杰斯都从未公开地详细讲述他们分手的真正原因。在一次简短的谈话中，罗杰斯对于评论过去极没兴趣。但是从语调中，显示出他对这事的记忆是深刻生动，痛苦铭心。

吉米·罗杰斯在公司工作期间，为基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1969年12月31日到1980年12月31日，索罗斯基金增长了33.65倍，基金总价值达3.81亿美元。

吉姆·马克斯被索罗斯选中作为他合作伙伴的人选是在1982年。马克斯当时33岁，曾经营过一家基金，并使基金增至1.5亿美元，上升了69%，处于1982年共同基金中的第一号位置。这说明了索罗斯的眼力。但在正式决定前他们还是差不多见了15次面，而且每次见面索罗斯都要用“智力体育”的方法对这位年青的基金经理进行测验。

1983年元月，马克斯开始工作。索罗斯把基金共用的1/2转交给他，把另一半转给国外10位一般经理。除了处理所有的国内交易以外，马克斯还协助索罗斯负责国际投资。所以说，现在的索罗斯是个背后的指挥者，马克斯是前台的扮演者，而其他三位则在交易所里呐喊助威。

马克斯在索罗斯基金会的工作是很有条理的。每天早晨准备全天的工作，他都要经历一种考验，有时是冒雨上班，更有时还是骑自行车上班。他必须把当天资本金融市场可能发生的情况筹划出来。他称这是“预料的框架”，以框架为基础，他可以决定购买什么股票。一旦纽约股市结束之后，他和马克斯就开始沉醉于生动的总结检讨会议中，有时这种会议还要持续到晚上。马克斯说：“这种会议往往是激烈活跃的，但也使人十分紧张。索罗斯擅长的事情就是当你解释一个问题，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你，并且他甚至可以分辨出你在为自己辩解，

或说你正是自圆其说。”

1983 年的前四个月，对马克斯来说，有点“文化冲击”的味道。这一时间里，这位新的人物逐渐认识到，索罗斯“这位可敬的投资商真正地给我自治权和权威——并且还有钱——并且还有拴我自己的绳子。”

索罗斯和马克斯看起来似乎能相互协调一致。索罗斯主要进行宏观分析，着眼于大的情况：国际政治，全球金融政策，通货膨胀的变化情况，利率和货币；马克斯却研究如何寻找一个可以获利的工厂或公司，而从中获取最大的利润。

但是，在公司的工作留给马克斯的并不全是美好的回忆。马克斯认为索罗斯对人过于严厉，他说：“索罗斯始终想发现，市场的真正表现是否跟你预料的的一致。比如说，我预料银行的股票要上升，但如果在某个时刻银行的股票反而是下跌的，他就会说‘我们再检查一下我们的设想。让我们再思考一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你会感觉到应该发生这种情况，然后，你应该跟市场一致起来’”。

像这种思考为什么马克斯会判断失误，马克斯都把那些检讨会当作是折磨人的痛苦经历：因为他不断地找出你的薄弱部位，他想发现你出错的真正原因所在。

“索罗斯这个人很容易发脾气。他习惯于用如此犀利的眼光看你，使你感到你处于他的激光枪之下，毛骨耸然。他会直勾勾地盯着你。他总是感觉到他想让你明白

他的意思，但他从未认为他也应该很正确地把握他的意思，他只会折磨你。好像你只是个小人物。”

这种状况逐步地引起了马克斯的紧张、讨厌情绪，“因为你老是感到你是个事后遭批评的人，你要不断地忍受别人对你小错的挑剔。我不应该说小错，是挑骨头。后来，这事就很令人烦恼。很令人烦恼。”

“许多时候，你觉得他让你那样干，你就去那样干，结果是发现他回来后，像教师教训小学生那样说，‘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那不是我的意思’。然后，你就会心烦意乱，十分失望，因为你曾以为你已经完全理解了他的意思，其实他不是这样想的。”

马克斯还是承认，跟索罗斯在一起工作也是令人陶醉的，对于马克斯这种 30 多岁的人来说，索罗斯的引导显得异常宝贵。但马克斯同时也感到自卑。一个人也许认为跟如此天才在一起工作是令人神往的事，其实危险就在于此。马克斯断言：“他的智力如此具有支配力，你可能被他镇住。如果他成为一个惟命是从的人，显然对他没有多少好处，对你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

“如果你说，我想成为小索罗斯，我想成为世界级思想家，去思考重大理论，成为一个伟大的证券经营者，我将像他那样行事，那么他显然不需要此类人。也许现在他需要这种人，但当时他不需要。要想成为这样的人，那真是一种迷人的诱惑，但当你意识到他是商界的典范时，你就会迅速认识到你不具备这样的素质。”

尽管 1983 年是个好的年头，1984 年却并不是这样。基金虽然上升了，但仅仅是 9.4%，从而达到 448998187 美元。

低利润使索罗斯遭到来自董事会的压力，他们要求索罗斯全力以赴搞好投资工作。他同意了。1984 年的晚夏，索罗斯向马克斯透露了这个消息。

后来，索罗斯宣布了他再雇佣两个人的计划。对索罗斯来说，理想的组织要有 4、5 个专家。如果马克斯愿意的话，他可以留下来，担任更低一些的职务，分管一个分部门。马克斯相信自己已被撤到一边，并受到了冷落，他决定离开这个公司。

在马克斯所在的 1983 年，他们还是享受到了一个好年景，基金会拥有的资产近 3.9 亿美元，比 1982 年上升了 24.9%。

阿伦·拉斐尔的名字是后来索罗斯就补充新鲜血液问题在基金内部征求意见时出现的，当时，他是第一个被提名的人。后来拉斐尔成了索罗斯新的合作伙伴。

从 1980 年到 1984 年，拉斐尔曾任阿恩哈德公司的研究室副主任，实际上，索罗斯在 60 年代到 70 年代初也受雇于这个公司。1992 年，拉斐尔又回到希莱克瑞德公司任高级副总经理，负责全球战略研究，并且是高级

证券经理。1984年8月的早些时候，索罗斯决定寻找并聘用拉斐尔。这两个人从未见过面，尽管拉斐尔早就听说过索罗斯的大名。他的公关经理给拉斐尔打电话，告诉他说他们已经向索罗斯推荐他为量子基金会的第二号人物的候选人。他在全球经济研究方面的背景使他很自然成为了这一职务的候选人。

1984年9月初，拉斐尔跟索罗斯正式签约受雇，成为量子基金会的第二把手。拉斐尔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88年。

1988年9月，量子基金会仅次于索罗斯的职位上又出现了一位新人。对量子基金所做的贡献来说，这个人恐怕可以与当年的吉米·罗杰斯媲美。要是没有他，量子基金恐怕不会达到今天的规模，至少在1992年对英镑的冲击中不会表现得那样出色。

这个人名叫斯坦利·德拉肯米勒。

德拉肯米勒于1977年开始他的事业，那时他是匹兹堡国家银行的一名股票分析家。当时他的年薪是10800美元。不久被提升为股票研究部主任的时候，他的工资已升到年薪23000美元。在成为部门主管后不到一年时间里，他的年薪便涨到了48000美元。两年后，即1980年，在他28岁的时候，他离开这家银行，开始创办自己

的金融管理公司。促成他采取如此行动的是一个来自一家保险公司行政主管的电话，这位主管仅仅和他一起谈谈投资方面的事，便每月付给他 10000 美元的报酬。德拉肯米勒给他的基金起名叫迪凯纳资本管理基金。

6 年后的 1986 年，德拉肯米勒被德雷福斯征召，成为一名基金经理，同时，他还被允许继续管理他的迪凯纳基金。在德雷福斯，他经管股票、债券和货币，不断地进出市场，多头、空头的他都做。他的管理天才极大地发挥了出来，德拉肯米勒很快肩负起经管数家基金的重担。其中建立于 1987 年 3 月的战略进攻投资基金是最有影响的一个。以后的 17 个月中，它是工业领域运作最好的基金。

德拉肯米勒经营战略基金的成功引起了乔治·索罗斯的注意。据索罗斯说，德拉肯米勒选中他是在被后者《金融炼金术》激发兴趣以后。索罗斯在寻找最优秀的继任者，而德拉肯米勒好像正是索罗斯要物色的最佳人选。虽然德拉肯米勒在思忖要回去专职管理他自己基金的事情，但索罗斯毕竟是他崇拜的偶像：“他仿佛早于我 20 年去实践我过去接受的经商哲学。”这个哲学就是：以多头方式买进大部分股票，再卖空这些股票的最重要部分，然后利用举债经营的方式去做普尔期货、债券以及货币生意。

索罗斯选中德拉肯米勒作为合伙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他的慈善事业。随着把全部身心投注到东欧

和苏联，乔治·索罗斯越来越倾向于不去关注量子基金的日常经营。他能够应付各种变化。到80年代中期，这项基金的净资产达到10亿美元。索罗斯正在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期望用其大半生光阴来促进欧洲社会的开放，从而使他挣一笔钱不那么劳神费力。

1988年秋季，索罗斯决心选择一个不仅能主管基金的日常运作，而且在将来某一天可以担负该基金全面经营工作的人，这个人还要能在投资领域里从多种选择机会当中做出决断。发现那个人并且把他放在掌舵的集团中，这将是乔治·索罗斯不得不做的最为重要的决定之一。

1988年9月，索罗斯把大权交给了德拉肯米勒，德拉肯米勒欣然接过了索罗斯的大印。索罗斯的接替者已经找到了。现在德拉肯米勒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烧起自己的三把火。

正如德拉肯米勒所担心的，最初的6个月是相当严酷的。这两个人也许有着近似的经商哲学，但两人在实践经商哲学的战略上不相苟同。德拉肯米勒想独立地操作整台机器，他不愿让乔治凌驾在自己头上，对他的每一项措施猜来猜去。而对于索罗斯来说，他不打算从一开始就赋予德拉肯米勒太多的自由。

1989年8月，在德拉肯米勒加盟量子基金将近一年的时候，这两个人发生了第一次公开争吵。

德拉肯米勒按照自己的方法行事，在债券交易领域

已占据一席之地。索罗斯在没有同他商量的情况下，卖出了基金的债券。这是索罗斯第一次背着德拉肯米勒做事。

德拉肯米勒大发雷霆。两人互相把愤怒发泄给对方。最后，索罗斯平静了下来，答应他将保持距离。

索罗斯承认他和德拉肯米勒早期合作中曾发生过不快之事。“刚开始的时候，他发现和我一起工作很困难。尽管我给予他很多的权力，可他由于受到我的存在的约束，感到没有比在进入我公司之前干得漂亮。”

索罗斯后来回忆过这段时期的情况：“1987年，德雷富斯公司一位名叫斯坦利·德拉肯米勒的基金经理人注意到我的书，他看过之后来拜访我，他觉得这本书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刺激。此后我们就开始熟悉起来，我叫他到我们公司来。但他对德雷富斯忠心耿耿，而且那一年是相当艰难的一年，他为德雷富斯赚了不少钱，他认为德雷富斯会给他丰厚的酬劳。事实上，他在股市崩盘时的应变手法的确比我高明。到了年底，他指望的报酬并没有发下来，于是，他表示愿意随时加入我们的公司。”

“结果斯坦利在1988年9月到我们公司任职。他负责宏观投资，但我还是老板，只不过我不在的时间逐渐多了，那时我开始把很多精力投入俄罗斯和东欧事务。在1987年成立的团队则负责挑选股票。”

“斯坦利在我们公司的头一年，表现不如他预期的理想，他觉得这都怪我常常在公司出现，使他觉得受到掣

老子曾言道德經 人清天地悉歸心 天地既歸心地上 多人撐住復何能
少年正好辦前程 切莫因循又路行 一鼓精神回頭早 掉身不顧卽時傾
異類狐狸聽法音 螺絲曾護金剛經 蟒聞皇懺生天上 龍將聽法悟禪心
糧雖辦就少資財 資糧無缺進方前 若待糧空錢用盡 途中多阻命難全
妾身謂是女人倫 四德三從謹慎行 賢淑貞操無懈點 再加愛佛子孫興
御道皇車唧軋聲 路途內外少行人 赫赫威風承輦輿 萬人低首謝深恩
績紡棉絨作線紗 布成不漏水泥沙 綿密工夫無缺點 禪心若織細無加
紡棉織布女人多 莫謂尋常事太苛 裸體寸絲能不挂 大家一樣看如何
侍奉尊嚴孝必真 陸沉賤役用心勤 執爨負舂無恨怨 擎天大柱許斯人
巾瓶不奉敬全虧 空在人間走一回 試問中心說得過 好將禮貌視如歸
帷帳宜寒只溫衾 夏天蚊虱莫傷生 大孝好生天必喜 身家發達宦留名
房舍殘污一大堆 不生蟲蟻便生蛆 外清內必從心潔 殷勤洒掃頓忘疲
紈綾絲緞貴雖珍 世務人情轉見新 佛制比丘將色染 灰衣粗布道人身
扇趕蚊蟲死更多 好將身肉供他啄 修成忍辱波羅密 可來末世度沉疴
圓滿菩提無所歸 衆生未了少心回 接物同塵隨類逐 慈航倒駕頓忘歸
潔淨身心致世違 世人多喜愛花魁 代謝不時成過去 何如身掛衲衣灰

我们的工作状况改善了。……”

刚刚赢得的独立是对德拉肯米勒及时的恩赐。由于索罗斯不在身边，他为量子基金做了第一笔大宗交易，因为他坚信柏林墙倒塌之后，德国马克将会变得坚挺。尽管看不到索罗斯，然而在德拉肯米勒的心目中，索罗斯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这位年轻的基金主管想起了《金融炼金术》这本书，尤其想起了索罗斯关于货币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其中一部分是：如果赤字随着膨胀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巨幅上升，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将会升值。现在似乎正是赌一赌德国马克的时候。

实践证明索罗斯的理论正好与事实相吻合。在柏林墙倒下的头两天里，马克随之跌落。人们相信赤字将会增长，而赤字的增长将会伤及德国的货币。然而，德拉肯米勒采纳了导师的建议，在后来的短短数天便立起一个价值 20 亿美元的头寸，很快就获得了巨大利润。

以后的业务几乎都是以进展顺利告终。

1991 年初，斯坦利·德拉肯米勒在美日两国市场上做了 30 亿美元的空头，他还在美国及世界债券市场上做了几个大的空头。在该年度头两周内，随着美国向伊拉克发出战争恫吓，市场曾一度与突然爆发的战争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一次不同，德拉肯米勒将量子基金的普尔期货由空头改为多头。而在股票方面，尤其是在银行股票和不动产股票上，他则保留了大量的空头。战争爆发的时候，

量子基金整个地增长起来。当情势转变之时，德拉肯米勒猜测对了，尽管 1991 年元月他也做错了一系列头寸：全球各地 30 亿美元的普通股空头，美元对马克 空头 30 亿美元，再加上日美债券的 30 亿美元空头。因此，量子基金在 1991 年元月底以资金扩大而告成功。

德拉肯米勒在 1991 年所做的最大、最为成功的一笔交易，是他在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债券及货币市场上投下的 120 亿美元的赌注。在这一年的 8、9 月份，已有经济萎缩的迹象出现，这时债券行情上涨，量子基金购进了数亿美元的债券。量子基金的生物工艺学股票也做得很好，还买进了 2 亿美元的墨西哥电话及其他股票。德拉肯米勒为他的老板干得很漂亮，索罗斯因此成为全美 1991 年收入最高的个人，年收入 1.17 亿美元。

德拉肯米勒的出色表现赢得了索罗斯极高的赞誉。索罗斯称他为自己的“知己”。而德拉肯米勒的最大贡献正是 1992 年对英镑发动的攻击，他在这次行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几乎完成了所有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工作，并做出了正确判断。当然，下命令的是索罗斯。像往常那样，索罗斯给了他极大的自信，鼓励他敢于下更大的赌注，促使这次行动以净赚 20 亿美元而大获全胜。

之后，德拉肯米勒表现得异常谦虚。在他所参与的为数很少的接见中，均把他了不起的记录归功于乔治·索罗斯。他说他只不过是实践了索罗斯关于如何建立长期回报的哲学，并且十分奏效。

在基金会，德拉肯米勒掌管着全部的经营工作。这是怎样的一种经营状况啊！自德拉肯米勒加盟量子基金以后，基金净产值便以平均每年 40% 的幅度上升，高于索罗斯 1969 年到 1988 年期间平均 30% 的增长记录。1989 年，即德拉肯米勒领导下的第一个完整的年度，量子基金增长了 31.6%；1990 年增长 29.6%；1991 年增长 53.4%；1992 年 68.6%；1993 年则增长 72%。

鉴于量子基金扩大迅猛，索罗斯和德拉肯米勒相信，该把量子基金分成几个小一些的基金了。于是，1991 年和 1992 年，索罗斯扩大了经营。像量子基金那样，由索罗斯于 1991 年创建的类星体基金在从货币到商品的所有领域都进行了投资。类星体基金由 15 个外部经理进行营运，索罗斯专为基金管理货币交易。

1992 年，量子新兴增长基金和配额基金建立起来。前者主要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新兴的股票市场上投资，当然，它也可以在美国和欧洲的货币及债券市场进行经营。配额基金被誉为“基金的基金”。它的投资由 10 名外部经理控制。合在一块儿，到 1993 年初，这些基金掌握的有价证券达 500 亿美元。德拉肯米勒直接控制着量子基金，并且对其他基金进行监督。

第八章

花掉该花的钱

通过慈善活动，我终于可以摆脱孤独的境地，使我和世界连成一体。

对于慈善事业，我的观点是到钱花光为止。但我希望他们尽快花钱。

——乔治·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不单纯是一个经商赚钱的投资家，他有东欧匈牙利的犹太人背景，有从小就有的“自视为神”的救世情结，还有极不平凡的个人经历，比如二战的磨难，战后在他周围的窒息氛围。另外，还有伦敦经济学院的求学生涯。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求学期间，他有幸结识了竭力提倡“开放社会”观念的哲学大师卡尔

·波普尔。在校期间，他读了大量的哲学和社会学著作。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有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论知识和无知的根源》和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都对他以后投资成功之后所从事的慈善救助事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乔治·索罗斯不仅仅是一名举世瞩目的成功的投资家，而且是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大慈善家。在整个漫长的20世纪历史中，我们还不曾发现在世界上有哪一个人、机构、团体，甚至政府比索罗斯更乐意慷慨解囊，把大把大把的钱花在公益事业上。福特基金会没有，洛克菲勒基金会没有，甚至比他富有的电脑大王比尔·盖茨也没有。

这位有哲学功底和背景的金融投资家与一般的生意人不一样，也与一般的亿万富翁截然不同。除了痴迷于商战的风云突变、奇妙诡谲，他更倾心于心智和知性层面的生活。他比他们更多一份对于整个世界和生活的严肃的思考。生活的磨难给了他追求自由的憧憬，独立的思索和波普尔的哲学著作为他开启了一道通向理性的智慧之门。索罗斯坚信，人生活在世界上，最可贵的是觉悟和境界，有了觉悟和境界，人才有可能、有条件、有方向去成就一番事业，并且理解自己所做一切的意义以及后果。

80年代末期，索罗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从

事他慈善基金会的建立。他不畏辛劳，四处奔走，一会儿去匈牙利，一会儿去苏联，整个东欧和前苏联地区都留下了他频繁出访的足迹。有些事情真令人难以忘怀，如被罗马尼亚的持不同政见者艾林·提欧德瑞斯库误解，再如主动打电话给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珊卓·布拉隆，问她是否愿意担任罗马尼亚“开放社会基金会”的第一任执行主席。他的行为风格的确是人们始料未及的。由于他对社会事务的热心和投入，以致于有一段时间，人们真弄不明白，他究竟是一位职业投资家，还是真正的政治家。

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他在世界的25个国家（主要是前苏联和东欧地区）都建立有他的慈善机构。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实属罕见。难怪1994年春，美国的《新闻周刊》要做如此评论：“他的慈善项目堪称另一个‘马歇尔计划’。”但要知道筹划及实施第一个“马歇尔计划”的是实力雄厚、国土辽阔的美国，可这次仅仅是乔治·索罗斯一个人。《商业周刊》也评论说：“他是当今世界，从莱茵河流域到乌拉尔山脉之间最具影响力的个体公民。”有人认为他似乎是一个想改变21世纪世界新布局的金融政治家，即他用他特有的手段，用一般政治家所不具有的优势，通过投资、捐款、赞助等多种方式来无形促进单一封闭社会的变革。与其他犹太人一样，除了他在生意场上的绝招，他始终还怀有一种建立一个“无种族偏见，无强权压迫”的“大同理想世

界”的梦。

其实，在索罗斯的投资生涯刚开始的时候，慈善活动对他来说是件很遥远的事。对于“慈善”这一概念，他其实并不欣赏。1993年，他告诉一位记者说：“慈善事业实际上就是鼓励别人不劳而获的代名词。因为我们的文明是建立在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之上，而不是占有其他人的劳动成果。”他周围的人没有谁能记得索罗斯曾说过救济穷人是很重要的这样的话。他其实很愿意对社会慷慨解囊，但不是给个人。他希望慈善活动能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他的目标是一个完整的群体，甚至是整个社会。从这个方面讲，他想的要比一般人深远得多。

也许，早年在伦敦时的那段经历给他以后对慈善事业的总态度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当时，索罗斯作为一名贫困的学生，向伦敦犹太人管理协会提出申请，要求该组织提供救助，但协会对他百般刁难，给了他种种不公正待遇，至今仍令他耿耿于怀。有一次，他告诉记者说：“你知道，我对成立慈善基金会实际上是持反对态度的，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其实是一种腐化堕落的表现。如果说它还有什么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在基金会内，存在着一些超越基金会本身的问题。”在索罗斯看来，一切组织机构，包括他的，都很容易受到“腐蚀”，因为身处其中的人往往只知道去追求财富，追求权力与享乐。

索罗斯经常向周围的人提起他以前曾成立过一个名

叫“中央公园救济基金会”的小团体，目的是为了重新整修纽约市的中央公园。当时，还有一个名为“保护中央公园”的组织，与他们的目的相同，但结果却远比他们成功。后来，索罗斯发现他的基金会有人开始攻击“保护中央公园”，他为此感到很震惊，并很快停止了基金会的活动，用他的话说，他“消灭”了一个救济基金会。索罗斯事后回忆说，他亲手解散那个基金会时的感觉比当初成立它的感觉要好得多。

其实，索罗斯也明白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目的只是为了以后能做得更好。如果以后还建立这样的基金会，他就可以确保它能真正有效地运转。

现在的问题是，他如何分配他的这些慈善基金呢？由于索罗斯是名犹太人，他会不会因此而侧重于救济他的犹太人同胞？

索罗斯从未否认或掩盖他的犹太背景，他也从不过多地考虑这一点。出于各方面的原因，在1986年以前，他没有向以色列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直到那一年，在他认识以色列国际关系评论家丹尼尔·多龙之后，他才向多龙的耶路撒冷评论家协会资助了一笔数目不大的资金。此后，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戈·欧弗曾试着希望索罗斯能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基金会，专门援助当时涌入以色列的5万名前苏联犹太人。他的建议遭到了索罗斯的坚决拒绝。不久，索罗斯终止了与欧弗的接触。

为什么索罗斯如此反对资助以色列？欧弗回忆说：“因为他认为以色列如果不首先从自身进行改革，任何外来力量都拯救不了它。在他内心，他对犹太复国主义深恶痛绝，他认为犹太人应该在他们所在的地区安分守己。”

索罗斯周围有一些人对他的有些做法并不赞成，批评他常常轻率地动用资金，事实并非如此。杰弗里·萨克斯定，哈佛大学国际贸易学教授，同时还分别兼任着波兰、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经济顾问，他说：“乔治·索罗斯看事情十分精确，从那些表面看起来不怎么吸引人的事情中，他也能判断出它潜在的能量。他的基金会投资方向就是一个例证。至今，政府领袖们对他的努力的回报要比那些犹太极端主义者及犹太人内部的排外集团的反应要积极得多。”

索罗斯在世界各地建立慈善基金会，刚开始时，遇到了不少的误解和障碍，甚至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罗马尼亚人讨厌他，因为他是匈牙利人；匈牙利人看不起他，因为他是犹太人；在斯洛文尼亚，更因为他是匈牙利籍的犹太人而面临双重的歧视。

即便是在西方社会，索罗斯也常常遭到各种刁难。一些人指控他是现代鲁宾·胡德，认为他把西方的财富转移给了贫穷的东方。1992年9月，索罗斯在对英镑交易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时便有人开始攻击他，恶毒地宣扬说他平均从每个英国人手中掠夺了12.5英镑。对于

这些攻击，索罗斯很平静地说：“我始终认为西方应该更多地为东方做些什么，我很高兴我替他们做了这一切。”

当然，也并不是每一个英国人都对索罗斯的慈善行动持反感态度。花旗银行在伦敦的首席经济学家纳尔·马克金南就是其中之一，当他被问及有关指控索罗斯从每个英国人手里掠夺 12.5 英镑的传言时，他回答说：“这是为自由而付出的最便宜的价钱。”

索罗斯最早的慈善活动是从南非开始的。那是在 1979 年，他发现开普顿大学是一个致力于民主社会改革的地方。后来，他开始向那里的黑人学生提供奖学金，不幸的是，事与愿违，索罗斯不久就发现他的钱绝大部分被用到一小部分刚入学的白人学生身上。他感到非常失望，毅然撤出了对该学校的资助。索罗斯后来说：“南非是一个独裁与种族主义横行的地方，如果你不能成为它的社会体制的一部分，你就别想做成任何事。”在东欧，他反倒感到比较顺利，他说：“在那里采取的任何一项措施都是冒险而令人兴奋的。结果往往富有成效，令人感到振奋。”

南非是他第一次实施大规模资助活动的地方，因为南非当时是一个建立在种族隔离制度上的封闭社会，而索罗斯一生最深恶痛绝的就是封闭社会的不公正和不人

道。他打算资助南非的黑人教育，使将来有更多优秀的黑人人才去开发南非，使南非社会来一个彻底的变革。他有一位南非祖鲁族朋友，此人是纽约一家大学的讲师，后来返回南非，索罗斯在 1980 年到南非拜访他。通过他的介绍，索罗斯认识了好几位南非黑人，而且和他们成为朋友。他也跑到开普敦大学参观，开普敦大学校长史德瓦·桑德斯是一位投身黑人教育的开明人士，他让索罗斯倍受感动。他当时认为，开普敦大学是一所建立在开放社会、以平等原则对待所有人的大学，学生的学费一概由国家支付。他当时的想法是，假如他帮助黑人学生进入开普敦大学读书，就等于说他使南非当局花钱教育他们，也就是占了南非政府的便宜。

但实际情形却不是这样，原因是该大学本身没有校长的开放心态。他开始捐赠用于 80 个黑人的奖学金，但增加的黑人学生人数不足 80 人，显然校方在他捐款之后把自己的一些钱移做他用。第二年，他再到南非时和部分学生会面，他们显得很不高兴，充满敌意。于是他决定把第一批 80 名学生帮到底，但这项计划就到此为止。他觉得这非常可惜，原因是假如计划继续进行，现在就有比较多合格的黑人领导者来促进南非的发展。索罗斯在南非也试办其他活动，但他的结论却是他占不了种族隔离政权的便宜，倒是他们占有了他的便宜。于是，他只好停止了某种资助项目，只保留了一些人权资助项目和训练南非新闻工作者的计划。当时，在南非的资助活

动受挫，使他非常惋惜。后来，他在南非也成立了一个“开放社会基金会”，但时机已显得太迟。

80年代末期，他把主要的资助对象定在了东欧。这和他在匈牙利出生，并且会讲匈牙利语肯定不无关系。正如他所说，他的根在匈牙利，并且他最好的个人关系也在匈牙利。

在决定把目标定在东欧之后，索罗斯意识到是自己拿出点真本事的时候了。他选择了自己的出生地匈牙利作为成立第一个慈善基金会的地点。很巧的是，当时卡达尔政权里的一些富有改革精神的重要人物也正把目光对准索罗斯，他们希望能借助索罗斯手中的美元来帮助已满目疮痍的匈牙利政府。

这其中便有弗伦纳克·巴萨，他当时主管匈牙利经济贸易。1984年，索罗斯与巴萨见了面。索罗斯告诉巴萨，他很有兴趣在匈牙利建立一个慈善基金会。随后，双方进行了正式磋商。匈牙利政府方面负责谈判的是乔治·阿卡泽尔，他是匈牙利非官方文化界的领袖人物，深得卡达尔的信任。

索罗斯请出了匈牙利的克劳斯·瓦萨尔伊，当时他已成了索罗斯在匈牙利的私人代表。索罗斯与瓦萨尔伊第一次见面是在1983年。当时，瓦萨尔伊在纽约哥伦比

亚大学国际贸易学院任教。他是1956年著名的布达佩斯事件期间的匈牙利总理伊米尔·纳吉的重要助手和忠实拥护者。

瓦萨尔伊对在匈牙利建立慈善基金会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他认为成功率最多只能在50%左右。对索罗斯有利的条件是匈牙利政府急于改善自己在外国人眼中的形象，以吸引外国资金进入匈牙利。

即便是匈牙利同意索罗斯在匈牙利建立基金会，也不意味着它会给索罗斯更多的自主权，而索罗斯，从他个人的出发点来说，强调最多的恰恰是独立自主性。索罗斯告诉匈牙利当局：“基金会成立以后，我只把我的钱交给我认为值得给的人。”匈牙利方面的回答是：“索罗斯，请把你的钱拿来，我们会替你发下去。”

这次磋商持续了足有一年多的时间。开始双方的分歧很大，在数额上，索罗斯只愿意拿出200到300万美元。而在匈牙利政府眼中，这个数目太微不足道了。匈牙利方面提出把资金主要用于科学研究方面，而索罗斯坚持要求用于资助那些从事写作、艺术创作或出国留学的个人。匈牙利政府希望把资金用于购买设备，索罗斯却希望用到人的身上。

最后，经过激烈的讨价之后，索罗斯和巴萨终于克服了众多的困难，双方似乎已达成了共识，并开始签署合作协议。就在匈牙利人签署了协议之后，他们竟然出尔反尔，提出了无理的要求。其中的一个人当时说：“好

极了，以后您想做什么，只要让你的秘书通知我们的对外文化交流部门，我们会照办不误。”另外，匈牙利政府还提出另外一个要求，即新的索罗斯基金会必须接受匈牙利文化部的管理。索罗斯对匈牙利谈判官员的这种行为感到十分震惊，他拒绝签署协议，他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向门外走去。

当索罗斯走到门口，手已碰到了门把柄，这时，那些匈牙利人退让了，他们同意给予索罗斯基金会更多的独立权。

“如果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结果却一无所成，那不也是很可惜？”索罗斯后来说。这件事也证明了他是一名出色的谈判高手。

在对手终于做出让步之后，索罗斯签署了协议。他答应以后每年为基金会提供 100 万美元资金。到 1993 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下一年 900 万美元。

很显然，卡达尔政府希望通过索罗斯基金会的力量，加强科技研究的水平，消除国内科学界的争论，统一他们的思想。

索罗斯基金会在匈牙利获得突破性进展是借助于一次照相复制设备事件。

在此之前，匈牙利官方对一切可能用于地下印刷的设备都有严格的控制。他们担心这些设备会被用于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活动中去。因此，在匈牙利，照相印刷设备是很新奇的东西。索罗斯决定向匈牙利图书馆、博物

馆、大学以及其他的科学机构赠送 400 套这种设备。同时他向官方申明，匈牙利不得干涉这些设备的利用。经过一番努力，匈牙利官方居然批准了这一计划，事情得到了顺利的解决。结果有点出乎索罗斯的意料。这也许是匈牙利政府急需硬通货的缘故吧。

总的来说，索罗斯和他的基金会面临着来自政府方面越来越多的不信任。刚开始的 4 年，即从 1984 年到 1988 年，基金会禁止在绝大部分匈牙利新闻媒体中做宣传，甚至在发行的宣传品中不准提及乔治·索罗斯的名字，或“索罗斯基金会”的字样。匈牙利政府想方设法阻碍索罗斯和他的基金会在社会上发生影响。1987 年，双方的争执达到了顶点。

当时，基金会决定向一个年青的新闻工作者提供出国留学的奖学金。他当时正准备写一本 50 年代初匈牙利总理马塔埃斯·拉考茨的个人传记。后来，《世界经济》，这本惟一被允许刊登索罗斯基金会广告的杂志提到了他和他要写的传记。不幸，这条消息被当时的总理雅洛斯·卡达尔看到了，他心中开始盘算：“或许明天索罗斯就会给另外一个人奖学金来写我的个人传记，这绝对不允许。”卡达尔下令禁止《世界经济》的出版发行。

看来，匈牙利官方仍然在坚持顽固的保守立场，上层人物的思想仍显僵化、死板。由于乔治·索罗斯受到了匈牙利政府的不公待遇，他出于一片好心，却遭到如此令人沮丧的后果，索罗斯感到非常气愤。他威胁匈牙

利政府说，他将关闭索罗斯基金会。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星期内，双方僵持不下，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不过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基于各方面的考虑，匈牙利官方又一次被迫做出了让步，同意《世界经济》杂志重新在国内发行。另外，拉考茨的传记也获准在匈牙利出版。

1988年，新的领导人、党的总书记卡洛里·格劳斯接管权力之后不久，他就会见了索罗斯。这是索罗斯和他的基金会的待遇出现转机的一個很好的兆头。因为在此之前的领导人还没有哪个单独会见过索罗斯。

然而，这种改善了的待遇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1989年，匈牙利政府中出现了很明显的反犹太人倾向。基金会在匈牙利发展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在东欧，没有哪个国家的右翼组织对索罗斯的敌视如此严重。1992年9月3日，一份长达8页的文章发表了，标题上赫然写道：“索罗斯帝国正在像白蚁群一样吞食我们的国家。”对此，索罗斯表示他绝不会被某些民族主义分子恫吓住。他说：“这些人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在种族差别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封闭的社会，与这样的人做斗争，我感到很荣耀。”

面对这些困难，到1994年，位于布达佩斯的索罗斯基金会的规模反而越来越大。它同时进行着40项计划，包括援助图书馆、健康教育、提供奖学金等。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支持年青人到外国留学。

1984年，他在匈牙利创立基金会以后，取得了明显

的效果。各项资助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他感觉到即使是长期生活在单一强权社会里的人们，其渴望改变生活的决心也是非常明显的。单调压抑的生活，并没有泯灭他们内心中蕴藏的巨大的热情。慈善基金会在匈牙利的表现给了他莫大的鼓舞。他信心倍增，决心进一步扩大他的慈善公益活动。

1986年，他把目标转向了中国，试图在这里建立起基金会。他的投入资金很少，只有几百万美元。三年中，他一直努力揭开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的面纱。但他说他根本无法进入到中国古老的文化中去。他认为：“孔夫子的伦理道德观念在那里根深蒂固，甚至基督教思想都无立足之地。如果你给某个人某种救济，他会对你感激不尽，不过从此他就会很忠实地跟上你，认为你照顾他一辈子是天经地义的事。而这和开放社会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显然，他想进入中国大陆的意图并没有获得成功。由于在中国遭到挫败，他便把精力转向东欧和前苏联地区。

早在1987年，他就在前苏联采取了行动。之后在许多东欧国家陆续成立了他的基金会。

1988年，扩展到波兰；1989年，扩展到保加尼亚和捷克；1990年，又扩展到罗马尼亚。

下面我们介绍他在苏联成立基金会的情况。他在1987年着手筹备俄罗斯基金会，或者说是苏联基金会，开始时索罗斯以观光客的身分前往莫斯科，企图说服沙卡洛夫领导计划中的基金会，卡洛夫强烈建议他不要按计划进行，原因是卡洛夫深信他的钱最后会落入国家安全局（KGB）的手中。但索罗斯不为所动，勉强组成了一个理事会。这个理事会怪怪的，其中有些人平常根本互不理睬，包括历史学家艾凡纳塞耶夫、社会学家札斯拉芙斯卡雅和后来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作家拉斯普汀，这样的组合今天根本不可能出现。

这个所谓文化倡导基金会——也就是该基金会的名称——结果交由苏联共青团的一群改革派官员管理。他们接手后就马上着手组成一个封闭的群体，希望由此促进开放的社会力量，但他们毕竟无法摆脱原有的苏联心态。索罗斯察觉到这种情形时，他发动一次改组把这些人赶走，这次改组发生的时间正好在苏联的1991年8月政变之前。策划这次基金会改组的人是索罗斯在莫斯科的律师代表，但此人马上把基金会变为个人的据点，于是索罗斯又发动了另一次改组免掉他。此后基金会可说是花果凋零，直至索罗斯着手进行所谓“变换工程”为止。

“变换工程”是一项充满憧憬的计划，目的在取消一般学校和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课程。基金会得到各部委的通力合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很有进展。基金会订购了接近 1000 种新教科书，训练校长推行新的经济学课程，还赞助了“年轻人成就”计划。这项计划非常成功，于是索罗斯打算投入巨额捐款，但这却成了另一场危机发生的导因。

当时是 1994 年上半年，正值所谓“强盗资本家”事件的高潮，俄罗斯正实施大规模的企业私有化计划，公开让国民持有企业股票，但这些企业的股票交换凭单几乎一文不值。在银行方面，由于货币供应短缺，名声比较差的银行以月息 10 厘的利率吸引美元存款，手头有点钱的人都赚了大钱。这种诱惑对基金会的负责人变得相当大，索罗斯发现一笔 1200 万美元的巨款存在一家不知第几流的银行里。虽然索罗斯让他们把钱提了出来，而且也没有什么损失，他们还是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核账，最后把主要的工作人员辞退，但到现在基金会还是元气未复。为了这三次重组，索罗斯的基金会平白浪费了五年宝贵时间。从这些痛苦的经验中，他终于了解到在革命的环境中管理一个基金会是一件多困难的事。

索罗斯是国际科学基金的负责人，这个基金会的宗

旨之一是保护苏联最先进的科学遗产。1992年12月，索罗斯向外界宣布了他迄今最大的一项援助计划，他将为前苏联的科学家和他们的科学研究提供1亿美元的无偿资助。他说：“我希望能实行一些大规模的计划，这样才能有更大的影响。”他希望他这笔资金能重振前苏联的科技力量。当时，约5万名科学家离开了前苏联，为了在像利比亚、伊拉克这样的国家获得高薪水的工作而放弃了他们的科学研究。他为3万多名苏联科学家每人提供了500美元的紧急奖助金，这500美元足够他们使用一年。他按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模式创立了一项奖助计划，并通过这项计划发放大部分的钱。资助的方式主要是提供旅费补贴、供应期刊，现在除了俄罗斯的科学界外，还帮助学校、大学、图书馆、医院、传播媒体和一般使用者使用国际网络。另外，索罗斯也是国际科学教育计划的负责人。国际科学教育计划每年的预算为2000万美元，受惠的人更多，他们所有的工作都要按明确的规定进行，工作效率极高，在整个科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索罗斯要资助苏联的科学和科学家呢？他认为若要证明西方的援助是卓有成效的，那就应该从资助自然科学入手。因为俄罗斯科学代表了人类智慧的杰出成就，俄罗斯科学和西方科学有点不同，它是值得保存的。科学可以站在争取建立开放社会的第一线，而且过去的确也是如此。索罗斯在这方面努力成功的机会也很

不错，原因是他在这方面有评估得失的可靠标准，他也可以动员国际科学界在选择保存对象方面助他一臂之力。

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他推行的各项计划都很成功。前些年俄罗斯反情报机构攻击索罗斯，有关机构也下令调查，结果整个科学界挺身而出为索罗斯及其基金会辩护，反情报机构的攻击反而给索罗斯带来了胜利。

1989年，索罗斯在前苏联的乌克兰建立了他的“乌克兰文化复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的效果非常好。尽管在前苏联各共和国设立的基金会都很成功，但乌克兰的这个基金会是以上所有基金会中办得最好的一个。他希望俄罗斯基金会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大作用，可俄罗斯基金会没有做到，乌克兰的基金会却做到了。当时的乌克兰基金会周围有一大群其他机构随着成长，各有各的目标，当时它们已经成了一个网络。这些机构或多或少都和基金会有关，但它们本身却是独立的。这些机构包括一所公务人员训练学院、一所私立大学、一个促进法治文化的基金会、一个传媒中心、一个现代艺术中心、一个经济研究所和一所私立学院。索罗斯认为，乌克兰基金会当时正在帮助乌克兰建立现代国家和开放社会必须的基本设施，假如乌克兰能够继续以独立国家的身分

存在，基金会对乌克兰的成就是功不可没的。

为什么索罗斯会非常重视乌克兰的发展呢？原因有以下几点。他认为一个民主独立的乌克兰，其存在的意义非常重要。只要乌克兰国运昌隆，帝国主义的俄罗斯就不会成为事实。另外，他有一些很可靠的合作伙伴，所以他才有办法帮助乌克兰，这些人包括日内瓦一家商学院的退休院长郝维利辛，他退休的目的就是要在凯尔夫设立一所商学院；另一人则是从加拿大跑到乌克兰做研究的克拉成柯教授。索罗斯让他们全权负责，他们果然把基金会创办起来。索罗斯早在1989年就成立了“乌克兰文化复兴基金会”，甚至比乌克兰在1991年的独立还早了两年，最后乌克兰独立时，索罗斯决定全速推行，订立明确的目标，这就为日后的西方援助做了开路先锋，结果索罗斯的目标达到了。

话又说回来，当初索罗斯对乌克兰的感觉有点矛盾。二次大战时被遣送到乌克兰的犹太人命运如何他很清楚，原因是其中一人逃回来了，还在他13岁左右时教他拳击，他告诉索罗斯的一切让他毕生难忘。后来作家出身的乌克兰文化部长德祖伯要求索罗斯在乌克兰成立开放社会基金会，索罗斯就把听来的故事拿来质问他。德祖伯回答说，基金会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乌克兰，使这些暴行不再发生，索罗斯接受了这个观点，觉得这个目标意义甚大，所以他同意在乌克兰成立基金会。

索罗斯在波兰建立基金会却不那么顺利，当然，原因也许在他身上。因为他当时想把匈牙利的成功模式复制过来，他觉得他在波兰的地位很稳，因为有波兰团结工会和与团结工会有联系的文化组织“窗”两个非法组织支持他。索罗斯将匈牙利的模式带过去的时候，依仗的是“窗”的人，并认为他们应该懂得怎样经营一个基金会。他以为只要和波兰达成协议，然后付钱，其余的他们就会自行发挥。但事情不如预期中顺利，“窗”的人不知道从何入手，甚至连装设一条电话线也办不了。经过1989年的革命后，索罗斯把基金会交给团结工会的英雄巴雅克，但结果也不是很好，最后他找到了执行董事的理想人选，但那时他已经和基金会发生了严重矛盾，他还是希望波兰的基金会像匈牙利的基金会一样运作，是一个对所有人开放，提供财力，使人们得以遂行其目标的奖助组织，也是公民社会的支柱之一。但涉及基金会事务的人也有他们的憧憬，他们希望基金会有其缓急轻重的次序，也有自己的计划。后来发现他们的想法是对的，可索罗斯错了。以后几年，波兰的基金会——只泰芬·巴托利——成了网络中的最佳基金会之一。

保加利亚基金会的情形和波兰基金会很相似，但他设立这个基金会时并未遭遇同样的困难。这个基金会一开始就已经准备妥当，精神焕发，有如希腊女神雅典娜一样。当时他得到美国文化参赞约翰·曼兹斯的帮助，曼兹斯曾在匈牙利工作，也了解基金会的宗旨，他把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他的同意。但也不能说他一点也没有碰到困难，例如一位人权组织首脑出身的董事原来竟是一位反土耳其、反吉普赛人的激烈民族主义分子，这完全出乎索罗斯的预料。

在捷克成立基金会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从1980年开始，他通过瑞典的基金会赞助宪章七七的持不同政见者，总共捐赠了300万美元。到了捷克所谓的“天鹅绒革命”时，他向瑞典的基金会负责人简诺克及维也纳国际赫尔辛基人权联盟的舒瓦赞堡亲王建议，在捷克境内成立一个基金会，随后他们在布拉格碰面。索罗斯说，那时维也纳的捷克大使馆还未能完全适应新环境，因此曾是过去捷克王室成员的舒瓦赞堡亲王几乎还拿不到捷克的入境签证。当时捷克弥漫着安详喜乐的圣诞节气氛，让人毕生难忘。但基金会却不是妥善地建立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上，一开始，那些人就对外来的资助人很有疑心，通过简诺克得到支持的人发出不少怨言，得不到的人抱怨更甚。他们并不知道索罗斯在革命之前已经长期资助宪章七七，也没有人知道他这个来自美国的陌生人希望有怎样的成就。问题的起因是索罗斯的资助是透过移民国

外的人送达的，当时捷克人对这些人很不信任。积怨不断发生，他们根本不想生活在现在，他们关心的是如何算过去的旧账。

基金会和宪章七七之间也有摩擦，宪章七七老是认为基金会应该属于宪章七七，结果这些争端耗尽了基金会的元气。他多次警告简诺克，要他忘却过去，回到现在，但这并没有效果，于是索罗斯就切断了对布拉格基金会的支持，这是他慈善事业中最使他失望的经历。

在东欧国家建立基金会的过程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是罗马尼亚。他在罗马尼亚建立慈善基金会，表现得最为主动和积极，但遇到的挑战也最大。

1989年12月，罗马尼亚发生事变，从开始到结束，仅用了6天。罗马尼亚人把它称为“事件”。在与纽约人权观察委员会的官员交谈时，索罗斯坚持认为：“我们应尽早在那里采取行动，否则流血事件将会蔓延到无法遏止的地步。”

当时，武装冲突在罗马尼亚尚未爆发，但索罗斯感觉到了战争灾难的迫临。

不出他所料，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保安部队在蒂米索拉向示威群众开枪，导致了数百人的死亡。当示威活动发展到其他城市时，齐奥塞斯库下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5天以后，即12月21日，布加勒斯特发生示威活动。保安部队再次向示威群众开枪。第二天，部队加入

了反叛的行列，一个名为“全国拯救委员会”的组织宣布已推翻了齐奥塞斯库政府。

齐奥塞斯库逃走了。忠于他的保安部队与新政府支持下的军队又开始了新的计划。12月23日，逃亡中的齐奥塞斯库被抓住。2天以后，在经过一次短促的审判以后，他和他的妻子被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

看起来索罗斯进入罗马尼亚的时刻到了。

1月1日，位于赫尔辛基的观察组织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罗马尼亚，桑德拉·巴赫朗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兼任翻译。她出生于罗马尼亚，1974年，当她年仅15岁时就离开罗马尼亚，到了瑞士，后来在波士顿塔弗茨大学的弗莱切外交学院学习。毕业以后即在纽约国际人权观察组织工作。在她即将离开纽约前往罗马尼亚之前，她收到了乔治·索罗斯的电话。索罗斯告诉她，他已决定通过总部设于费城的“兄弟会”组织向罗马尼亚运送医疗救济品。索罗斯说：“我将负责运送医疗品的一切费用，但我不希望这些医疗品落入其他人的手中。”索罗斯请她届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监督，以保证这些救济物资能直接分发给真正急需救助的人。巴赫朗答应将尽最大的努力。

不久，索罗斯决定到罗马尼亚去走一趟，并打算在那里建立一个基金会。对于基金会负责人的人选，他想起了罗马尼亚39岁的埃兰·蒂奥托罗斯库。

蒂奥托罗斯库从来没听说过乔治·索罗斯，也不知

道基金会为何物，这也就难怪1990年1月6日他与索罗斯的第一次会晤进行得并不很顺利。而且，索罗斯事先并没有和他预约，陪同他的是他在匈牙利的私人代表米克劳斯·瓦萨尔伊。

蒂奥托罗斯库当时正忙于会见一批又一批的客人。他的一位朋友告诉他：“有两位美国人在外面等着见你，其中的一个说他是亿万富翁。”他对此很反感：“去他妈的美国人。”

两个小时以后，蒂奥托罗斯库的秘书走进办公室告诉他那两位美国人还在门外等着。

“让他们进来吧。”

著名的亿万富翁和他的助手终于获准进来了。

“你好，我是乔治·索罗斯。”

“你好。”蒂奥托罗斯库面无表情地说。

接着索罗斯向他介绍了瓦萨尔伊。

对于瓦萨尔伊，蒂奥托罗斯库倒是久闻大名。他的在场，使蒂奥托罗斯库对乔治·索罗斯增加了几分信任。他决定给索罗斯一些时间。

第二天，三人在布加勒斯特国际饭店共进午餐。瓦萨尔伊与蒂奥托罗斯库进行了大约半个小时的单独会谈。

半小时后，索罗斯加入了会谈。

“我是个亿万富翁。”索罗斯说。

“那很好。”蒂奥托罗斯库也只能这么回答。

“我想在罗马尼亚建立一个基金会。”

“什么是基金会？”蒂奥托罗斯库很诚恳地问。

索罗斯耐心地向他解释：“你从我这里拿到钱，然后由你组建一个董事会，向外界宣传说你有钱，准备向社会提供救济，之后人们就会到你这里申请救济款，你把钱给他们就行了。”

索罗斯告诉蒂奥托罗斯库他打算让他出马主管这个基金会，为此他将会向他提供 100 万美元供他支配。蒂奥托罗斯库有些犹豫，因为他预感到向他的同胞介绍外国基金会这种奇怪的事物将会很困难。

一个月以后，索罗斯又一次来到罗马尼亚。他急切希望了解蒂奥托罗斯库为什么对这项建议如此犹豫不决。

索罗斯问道：“你是不是还需要其他帮助？”

“是的，我根本不知道如何成立一个基金会。”

“好吧，”索罗斯回答。他想起了另外一个人，桑德拉·巴赫朗，“你应该去见见她，她是我所见到的最富有创造力的人，不过有一点神经质。”

回到纽约以后，索罗斯给桑德拉·巴赫朗打了电话。

“你对我的基金会有什么看法？”

“哪个基金会？”巴赫朗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索罗斯在说些什么。

“你想去罗马尼亚帮我在那里建立一个基金会吗？”

能有一个这么好的工作，桑德拉·巴赫朗当然很高

兴。索罗斯请她出任基金会总经理。

4 月份，索罗斯与蒂奥托罗斯库再次会面，最后决定由蒂奥托罗斯库出任基金会董事长，桑德拉·巴赫朗任总经理。

现在，基金会最重要的两个人员已确定，基金会基本上可以运转了。

6 月份，基金会正式开始工作，取名为“开放社会基金会”。9 月份，桑德拉·巴赫朗在罗马尼亚走马上任。

对于蒂奥托罗斯库来说，与索罗斯一起工作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索罗斯特别强调工作效率，他希望基金会能以最快的速度走上正常轨道，之后他还要向其他国家拓展，进行其他的计划。而蒂奥托罗斯库则习惯于经过缜密的磋商之后再做出决定。蒂奥托罗斯库回忆说：“当我第一次遇到他时，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老板。”说到“老板”两个字，他语气中不无贬低的味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蒂奥托罗斯库对这位投机商开始有一种敬畏感，他对索罗斯有一个很生动的描绘：“他是精神上高居人上的恺撒。”他认为要想了解索罗斯，只能把自己与索罗斯进行比较时，才会发现他的特点。

白手起家建立一个基金会的过程中充满了坎坷，倒是在报纸上登广告招聘基金会工作人员进行得很顺利。接下来是向合适的人提供出国留学的奖学金。

对罗马尼亚，索罗斯深有感触地说：“它仍是一个封

闭的社会，对什么事情都怀有猜疑。”1991年1月3日，当第一批受惠于索罗斯奖学金，准备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的60人到达布加勒斯特火车站时，其中一个人忍不住哭了起来。她承认当她看到报纸登的广告时，她本来以为只是一个骗局，因为出国留学对他们太遥远了，当时惟一留学归来的罗马尼亚人早已深居高位，可是没想到这却是真的，这就是她为什么哭的原因。

1993年，安卡·哈拉希姆接替桑德拉·巴赫朗任基金会总经理，她是一名高大、富有魅力并极具有责任感的人。她1990年10月才开始在基金会工作，不到3年的时间，已成为基金会的最高负责人。她上任的第一年，基金会的预算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600万美元。

刚开始时，哈拉希姆有点顾虑，不久她就越来越喜欢上了这个工作。她曾说：“基金会的工作氛围使我倍受鼓舞。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東西，有些甚至可以影响我的私人生活。我现在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我将代表整个基金会，对我来说，责任更大，困难也就更大了。”在哈拉希姆的建议下，基金会成立了一个中央机构，专门负责为每项计划做最后的决定。

索罗斯在东欧，尤其是罗马尼亚常常会遇到一些让他无论如何也避不开的问题。当时，罗马尼亚的人口为2310万，其中匈牙利人为240万。这会使一些罗马尼亚人认为他企图让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掌握政府大权。

基金会成立不久，对索罗斯的人身攻击便开始了。一

些报纸指责他正试图把 180 万匈牙利人居住的特拉西瓦尼亚“出售”给匈牙利。

索罗斯和他的基金会时刻注意对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平等对待，做到既不偏爱也不歧视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然而这显然不容易做到。例如，在布拉格市，匈牙利人要占绝大多数，在进行救济工作时，基金会根本无法做到一碗水端平。

索罗斯本人对这些攻击是不怎么太在意的，但基金会还是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以前，基金会从没有公开过奖学金获得者的名单，现在不得不这么做了。安卡·哈拉希姆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措施，让人们明白我们没把特拉西瓦尼亚出售给匈牙利，我们只是在为社会做贡献。”

另外，基金会准备改变名字，因为基金会的名字——开放社会基金会被一些人认定基金会暗地里在偷偷地做些别的事。不久，在经过索罗斯的同意之后，基金会正式改名为“索罗斯基金会”。他们希望索罗斯名字的出现能让人们相信，基金会并不是什么用匈牙利人的钱支持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的地下组织。

基金会内部的人对索罗斯还是很尊敬的，没有人私下里谈论他，更没有人会拿他开玩笑，他的名字在一般人的谈话中每隔 4 到 5 句话就会出现一次。基金会里每个人都知道，只要他们能提出有利于基金会的建议，索罗斯都会全力支持。他们从来没有担心过，哪怕一时的

念头，索罗斯会关掉这个基金会，他们对他充分信任。哈拉希姆说她从不由于索罗斯受到损失而大惊小怪，也不担心索罗斯会因此而关掉基金会。损失只不过是索罗斯游戏节目中的一部分，人总有运气坏的时候。

1990年，索罗斯的援助计划又有新的突破。在他的资助下，一所新型的大学——中欧大学（CEU）分别在布达佩斯和布拉格成立。总部设在布达佩斯，布拉格设立分校。第一期开学就有来自世界各地22个不同国家的400名学生就读。

中欧大学可以说是20世纪教育史上的一项独创，它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方式创立起来的大学。成立之前既无预算也无计划，也没有适当的法律程序。仅在做出决定之后几个月内，中欧大学便马上于1991年9月开学，秩序也在混乱中建立起来，现在中欧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很像样的学府。大学的教授阵容很强，包括知名的学者和成名在即的学者，校长是第一流的人选，校董会也是第一流的。

大学草创初期，索罗斯非常活跃，亲自制订决策，后来才逐渐把权力移交给校董会。纽约州立大学承认他们颁授的学位，教学质量也很高，所以中欧大学决定第一届毕业生都授予硕士学位。索罗斯认为这是教育史上一

项独特的成就，他们只花了6个月时间就把得到认可的硕士课程办起来。中欧大学在20年内每年至少得到他捐献2000万美元作为经费，1995年秋天，中欧大学在布达佩斯一幢新建的宏伟建筑物里开课，并把此处作为中欧大学的校本部。

当初，索罗斯并不想急于在匈牙利建立分校，因为他是匈牙利人，如果在匈牙利设立分校，那么分校很快就会成为一所匈牙利学府，而违背创建时的初衷。由于捷克政府主动提供教学场地，索罗斯才欣然接受在布拉格设立分校。但经过1991年的选举后，捷克新政府拒绝履行旧政府所做的承诺，这可能也要怪他当初没有看清楚有关的法律文件。当时有人强烈反对中欧大学，包括捷克新任总理克拉斯在内，而支持的人却不够，所以他决定关闭布拉格的分校。这不是钱的问题，事实上布达佩斯分校反而更花钱，他只是觉得布拉格分校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原则上，他不希望他的慈善事业受到鞭挞，他希望别人也培养一种奉献精神，同时也要培养自立的能力。不需要别人支持，那你们就自己来干吧。

为什么克拉斯要反对办中欧大学呢？因为这所大学是由前任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分子发起的，这在克拉斯心目中都是不切实际的，他很厌恶这些人。前任政府给索罗斯一幢房子，克拉斯就是不肯履行前任政府的承诺。他不喜欢在布拉格设立一个专为东欧人而设的思想中心，原因是他想向西方靠拢，他宁可东欧沉到海

底，原因是假如东欧沉下去，西方可能会比较急着把它救起来。此外，个中还有别的原因，他对索罗斯本人始终存在敌意，索罗斯很为这件事犯难，他根本不想树立这个敌人。

克拉斯当时指责索罗斯主张的是新社会主义。他崇尚个人的自身利益，而索罗斯的开放社会构想主张为公共利益作出牺牲，因此他讨厌索罗斯的构想。后来，索罗斯才弄明白了克拉斯何以会处处与他作对。在索罗斯看来，克拉斯所代表的并不是什么西方传统的进步思想。相反，他代表的是西方民主的糟粕。

但当时索罗斯并没有放弃在布拉格办学的念头。拉维总统向索罗斯提出建议，想让他在总统府内办大学。索罗斯接受了这个建议。结果最终说明，在布拉格办中欧大学并不是完全没有人支持的。索罗斯当时打算在布拉格实施一项大规模的计划，设立一个把国际和种族关系结合起来的科系。他们把欧洲自由电台以前的研究所搬到了布拉格，准备让它和中欧大学连为一体。

中欧大学接受东方和西方的研究生，但主要还是东欧的学生，东欧学生可以享有全额奖学金，大学里开设各种人文科学课程，皆采用英语教学。目前许多教授都来自西方大学，索罗斯希望这一点日后会有所改变。中欧大学的课程和传统大学有区别，中欧大学有比较多从事创新研究的空间，教学、研究和对实际计划的参与是相辅相成的。它注重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因为当初建中

欧大学的目的，并不在于侧重纯理论问题的研究，而是为了满足东欧地区知识界积极投入到改革洪流中去的需要。正如索罗斯所说：“中欧大学的宗旨不在弘扬开放社会的概念，而在实现此一概念，我们不但要造就一批精英分子，也要成就一种新的理解、新的现实，造就一个与以前相比更为民主、合理的社会。”中欧大学明显具有它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特色，这使它与一般官方大学截然不同。

索罗斯在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如此热衷于建立他的基金会，在短短几年之内，他就在世界各地（主要是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 26 个国家设立了慈善基金会，截止 1994 年春，他基金会的办事机构已达 90 个之多。仅 1993 年至 1994 年一年之内，他就为此支出了 5 亿美元。

那么他设立基金会的目的又何在呢？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为了打开封闭的社会，使开放社会更加稳定，以及培养人独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关于什么叫“开放社会”，他并没有加以界定。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告诉他，概念不应该被界定，概念是要说明的。根据波普尔的哲学，人的理解是不完整的，开放社会就是建立在对这一点的体认上。任何人都无法掌握最终的真理，于是我们都需要具备批判性的思考。我们需要民

主政治，以确保权力井然有序地移交；我们也需要缺席和利益，以便和平共存；我们需要可以提供富有，并允许失误得到纠正的市场经济；我们要保护少数民族并尊重少数民族的意见，最重要的还是我们需要法治。国家服务的原则是所谓代表最后真理的教条。在这种社会里，根本没有自由。

索罗斯说：“开放社会是一个能够提供机会给像我一样的个人在其中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社会。我是犹太人，在匈牙利纳粹分子搜捕我，我也尝过匈牙利共产主义的滋味，所以我绝对不是言之无物的。我 17 岁就移民伦敦，我在伦敦经济学读书时才开始了解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差别。所以，我十分看重社会的公正。”

尽管索罗斯在慈善基金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还是遭到了人们的误解。他们认为索罗斯这么做惟一目标就是为了摸清情况，以确保他投资的精确度。有人甚至说，索罗斯每次在欧洲召开基金会会议，每次都有他基金会所在国的内阁部长列席会议。甚至蒂奥托罗斯库也相信索罗斯的慈善活动怀有双重目的，他断言，索罗斯通过基金会签订的各项合同使他能及时、全面地了解世界经济的运转情况，他说：“索罗斯的基金会运转以后，他的投机活动更加成功了，这不能说是一种偶然。”

索罗斯 1992 年 9 月在英镑交易中的大获全胜吸引了公众的关注，新闻界急切想了解他的投资风格，为了打消记者们穷追不舍的念头，他邀请部分记者与他一起

在东欧共渡一段时间，让新闻界明白现在他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投机上，而是基金会工作。

1992年12月3日，在索罗斯飞往布拉格途中，一家英国电视台采访小组问他在实施援助计划期间有多少时间用于投资活动，索罗斯说：“我的80%到90%的精力都放在基金会工作上。每天我都保持与我的办公室联系，但是我不会再做出任何决定，我手下有一个小组负责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我发现赚钱要比花钱容易多了。”说罢，索罗斯大笑起来。

飞机在布拉格机场降落，索罗斯走出飞机，一位捷克电视台记者问他是哪一类资本家。索罗斯回答：“其实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名真正的生意人，我只是投资于别人操纵的生意，因此，确切地说，我应该是一名评论家。你可以把我称为是世界上薪水最高的评论家。”索罗斯的微笑再次成为摄像机的聚焦点。

在布拉格，当他视察他的基金会和中欧大学时，他表示：“我已经赚足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财富，现在我希望它能利用它来开展我的慈善活动。现在我正准备再次投资2.5亿美元用于这些活动。”

2.5亿美元？

很少有人能像索罗斯这样不动声色地抛出这么一大笔钱。

他不愿意把资助的每一个机构置于显著的位置，也不同意通过他的基金会传播他的思想和理论。索罗斯曾

说过：“我并不想自己在死后能永垂不朽，我只希望能对现在发生的事情有点影响。”

作为援助者的索罗斯要远比赚钱时的他心情愉快得多。他的生活似乎有了新的目标，如果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有人把他比做是圣诞老人，这将是最高兴的时候。当某些人对他的做法进行攻击时，他不屑一顾，仿佛他们只是一群围绕着他嗡嗡叫的苍蝇。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负有重要使命的人，他与这个社会有着扯不断的联系，他将改变旧的一些现状，以不枉此生。提及基金会工作，索罗斯兴奋地说：“赚太多的钱也无法使我如此切实地感到满足。”

索罗斯的帝国版图越来越大，在各地也越来越活跃，他恨不得自己能有分身术，亲自处理各地的事务。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行程安排很难按既定的计划进行，有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都会使他在最后一分钟改变原来的计划。他的这一习惯常常使那些为他制定详细计划的人措手不及，狼狈不堪。1992年底，当时他正计划从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飞往维也纳。就在他已经登上飞机时，他突然改变主意。他告诉飞机驾驶员：“改飞伦敦。”

驾驶员面面相觑，他们已为这次维也纳之行整整准备了两个小时。

“索罗斯先生，”驾驶员说：“您是我们所遇到过的最难伺候的客人。”

索罗斯哈哈大笑。

一个计划接着一个计划，索罗斯似乎在挽回已失去的时间，在他眼中所注重的只是那些规模大的计划。小规模计划，无论多么重要，也不会引起他过分的在意，他只希望他的计划能产生影响，而且越快越好。

米克劳斯·瓦萨尔伊说：“他总是喜欢开始新的计划，新的方案。当一些计划已走上轨道开始运转时，他就对它不再感兴趣了。他的决定并非都十全十美，但他能谦虚地承认错误，并及时地修正。”

迪伯·瓦奥斯是索罗斯在匈牙利的一名得力助手，他对索罗斯的这种性格深有体会。他说：“他有一副典型的股票交易思维方式，说话间就会改变主意。早上9点30分，他让你买进纺织工业股票。15分钟后，他会让你全部抛出，再买进截然相反的股票。如果我们向他讲述长期效应时，他总是感到很不耐烦。”

一系列的援助计划给索罗斯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欧洲和美国许多家大报对他都赞美有加。

表面上，索罗斯声称他希望有朝一日西方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能够代替他现在的工作，其实内心里，他从不相信还有什么人能替代他的作用。对于政府方面的援助，索罗斯根本就不屑一顾，他认为这种援助很虚伪，因为最终受益的是捐献一方，而不是接受方。他在斯特拉

斯堡对一位欧共体人员说：“你们帮不了忙，因为你们的能力不足以改变整个欧洲。”

作为个人，索罗斯有他的优势，他可以自主地做出决定，而无需把他的计划提交给别人请求批准。身为波兰、俄罗斯政府经济改革顾问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杰里·萨克斯说：“乔治·索罗斯采取了灵活的战略，他的计划并非全部以金钱为动力，他知道如何用最少的钱制造最大的影响。世界银行花费2年时间才能做到的事，索罗斯往往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

面对90年代初这些蜂拥而至的赞誉，索罗斯没有飘飘然，他对援助计划的进展速度仍感到不满意。按他的设想，一切只需要他轻轻拨动一下，轰轰烈烈的活动就应该展开。他说：“我很不满意，我怀疑它是不是有点精疲力竭了。”

目前，索罗斯已不再为基金会的具体琐事操心了，他把一切和组织有关的事情都交给了那些他认为信得过的人去办。他只保留制订大政方针的权利。他想继续留住基金会的精神，让基金会确实能为促进开放社会的建设和稳定出力。

第九章

财富的递增

炼金术士设法以念咒的方法把低级的金属变成黄金，当然是缘木求鱼的事。对于化学元素，炼金术可能起不了作用，但在金融市场则可能行得通。咒语能够影响左右事情发展的人的决定。

——乔治·索罗斯

以下是根据可靠资料，逐年记录的乔治·索罗斯个人及其掌管的基金会的财富增长情况：

1956年：索罗斯自己带了 5000 美元去纽约。一个亲戚给了他 1000 英镑，要索罗斯代表他投资这笔钱。在这次投资中，那 5000 美元代表索罗斯的利润份额。

1969年：开始设立双鹰基金。这个基金设立的方式使索罗斯能利用股票和债券作为附属担保品来购买包括股票、债券和货币在内的各种金融证券。在基金刚设立时，他只有自己的 25 万美元，后来有一些索罗斯认识的富有的欧洲人把 600 万美元投入到他的基金里。

1971年：基金拥有 1250 万美元，一年后，增加到 2010 万美元。

1973年：1973 年至 1974 年间，一些大的公共机构绝望地看着它们的股票降了一半。然而，索罗斯却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光景。1973 年，他的利润上涨 8.4%，1974 年 17.5%。从 1969 年 1 月到 1974 年 12 月，他基金的股值几乎增长到了三倍，从 610 万美元到 1800 万美元。对这些年的每一年来说，都有积极的良好的记录。

1976年：索罗斯基金又上升了 61.9%。1977 年，道·琼斯指数下降了 13%，而索罗斯基金还是上升了 31.2%。

1978年：他的基金获得 55.1% 的复利资本，拥有资金达 1.03 亿美元。

1979年：基金的资本又增加了 59.1%，达到 1.78 亿美元。他的高技术战略仍然是非常起作用，并没有任何过时的迹象。

1979 年，他把他的基金改名为“量子基金”，以纪念在量子力学中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这一原理坚持认为：在量子力学里，要预料亚原子粒子的行为是不可能的，这一理论直接吻合了索罗斯的信念——市场总是处于不确定的波动状态，通过预料明显的行为来赚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资本交易只能靠赌。

1980年：1980 年，也就是索罗斯基金开始运营 10 年以后，它度过了一个令人置信的丰收年，资本增加 102.6%；到这个时候，基金的资本已达到 3.81 亿美元。到 1980 年底，他的个人财产也达到了 1 亿美元。

1982年：尽管索罗斯在 1982 年经历诸多麻烦，但他的基金会仍然做得很优秀。那年底，量子基金又上升了 56.9%，增加了 1.933 亿美元，从而使净资产额达到了 3.028 亿美元。索罗斯又回到了他 1980 年时的水平（3.812 亿美元）。

1983年：索罗斯在 1983 年享受到了一个好的年景。

基金会现在拥有的资产为 385532688 美元，1983 年净增了 75410714 美元，比 1982 年上升了 24.9%。

1985 年：1985 年对索罗斯来讲的确是了不起的一年。

与 1984 年相比，量子基金会的资产净值奇迹般地增加了 122.2%，从 1984 年底的 4.489 亿美元一下子增加到 1985 年底的 10.03 亿美元，这个增涨幅度相当于 Don 在 1985 年所增长的 34%（包括红利）的 4 倍。

人们对索罗斯取得的成就叹为观止。

如果你在 1969 年索罗斯初创量子基金会时投资 1 美元，到 1985 年底，除去一切费用和支出，已相当于 164 美元，同一时期，投资于普尔股票的 1 美元只能增加为 4.57 美元。

据估算，索罗斯拥有量子基金会 15% 到 30% 的股份。1985 年，量子基金会的利润为 5.98 亿美元，那么，索罗斯在这一年里所赚的钱应在 8300 万美元到 1.66 亿美元之间。

《金融世界》把他列为当年华尔街 100 名收入最高者的第 2 位。据这本杂志估计，1985 年索罗斯的总收入为 9350 万美元，其中包括：量子基金会利润个人分成 6600 万美元，酬金 1750 万美元，红利 100 万美元。

1986 年：量子基金会总资产增加了 42.1%，达到了

15 亿美元。同年，索罗斯本人从基金会所获得的收入是 2 亿美元。

1985 年和 1986 年，他为自己和他身边的国外投资者积聚了令人震惊的 25 亿美元。

1987 年：到 1987 年底，量子基金会的资产净值增加了 14.7%，达到 18 亿美元以上。

1989 年：量子基金累计获利 53.4%，总资产达到 3157259730 美元。该基金的发言人这样说：“我们今年很幸运：我们不光是靠这点来赢利。我们在股票、货币、债券方面都赚了很多钱，像这样全面红的情况是非同寻常的。”

1992 年：由于对英镑交易的成功，1992 年对于乔治·索罗斯和量子基金来讲，效益非常好。

索罗斯又被列为华尔街收入最高的人。1992 年，他的收入是 6.5 亿美元，是 1991 年 5 倍。记录已不再属于迈克尔·米尔肯——一个被判刑的股票交易商，1987 年他收入了 5.5 亿美元。

据《金融世界》的报道——它编列了华尔街收入排行榜——索罗斯的收入中有 4 亿美元来自其基金的实际利润，2.5 亿美元来自管理报酬。排行榜上落后索罗斯 4 位的是他 39 岁的首席助手斯坦利·德拉肯米勒，他

1992 年的收入是 1.1 亿美元。

到年底，量子基金成为世界领先的海外投资基金，总资本达 37 亿美元，年增长 68.6%。如果 1969 年该基金创建时有人投资 1 万美元，并且在以后把所有股息红利都再投入基金，到 1992 年底，此人拥有的资产将达 12982827.62 美元。

令人瞩目的是，6 个效益最佳基金中有 4 个属于索罗斯：量子初始基金占第 3，增长了 57%；类星体国际基金是第四，增长了 56%；量额基金第六，增长 37%。索罗斯的 4 个海外投资集团拥有 60 亿美元的资金。

在 1992 年里，投机性投资基金的平均回报率相当于“普尔 500 种”股票的 3 倍。1992 年几家最有名的投资集团的回报率都在 25%~68% 之间，远高于美国股票指数基金的 7%~8%，索罗斯基金这一年增长了 68.6%。

1993 年：《金融世界》编列的 1993 年个人收入排名榜充分表明了投机性投资集团的经营状况。名单上大约一半的人或者经营投机性投资基金，或者为之工作。投资基金管理人员占据了前 5 位——乔治·索罗斯以 11 亿美元名列榜首，这是美国历史第一个年收入超过 10 亿美元的人。这些管理人员占据了名单前 10 名中的 8 个人位置，名单上 100 人中管理人员占了 46 人。斯坦利·德拉肯米勒以 2.1 亿美元名列第四。名单上 100 人中，有 9 人为索罗斯基金工作。

无论怎样,1993 年对于量子基金来说都是高利润的一年,其资产上升了 61.5%。1969 年投入量子基金的 1 万美元现在的价值是 2100 万美元。而同样的 1 万美元如果投入到标准的“普尔 500 种”股票中,经过同样时期的升值现在也只是可怜的 12.2 万美元。

索罗斯的每种基金收益都非常好。最好的是量子初始发展基金,交税前的增长率是 109%,随后是量子基金和量额基金,增长率都超过了 72%。从 1969 年以来,索罗斯的基金取得了以复利计算年增长率 35% 的喜人成绩。而普尔 500 股票的年增长率仅为 10.5%。根据《金融世界》的统计,6 月底,索罗斯成为 1993 年华尔街收入最多的人。该杂志说,1993 年索罗斯收进了 11 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一年里能收入如此之多的个人。他相当于排在第二位的朱利安·罗伯逊的两倍。

《金融世界》开了个小玩笑。它这样形容索罗斯在 1993 年的 11 亿美元收入:“如果索罗斯是一家公司的话,他在年利润方面排第 37 位,处于第一银行公司和麦当劳之间。他的收入超过了联合国至少 42 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大致与乍得、瓜达卢佩和布隆迪这样的国家相当。换一种比较,他可以以 19 万美元的单价购买 5790 部劳斯莱斯轿车。或者他可以支付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全部学生至少三年的学费。有家长可能会这样说,如果真能这样做的话,就太好了。”

该杂志还指出,1993 年索罗斯个人收入相当于麦当

劳 169600 名员工的全部收入。索罗斯的各个基金也都收入不菲：量子初始发展基金增长 109%（交税前）；量子 and 量额基金的增长也都在 72% 以上。

1994 年：索罗斯基金的资产达 110 亿美元，罗伯逊为 60 亿美元，斯坦哈利是 40 多亿。后两人收取这些资产 1% 的管理费，再加上股票升值 20% 的所得。索罗斯收取 15%。

他取得的成果无法不使世人感到吃惊。如果某人在 1969 年当索罗斯建立量子基金会时投了 10 万美元，并且把红利又继续用来投资，那么，到 1994 年春他或她就可能使其资产达到 1.3 亿美元。它每年的利率达到 35%。靠一笔非常小的资金（比如说 5000 万美元或 1 亿美元）就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回报，人们肯定会认为这超乎常规。如此巨大的金额变化必定会震惊华尔街。

索罗斯量子基金会的股票每股在 1969 年的售价是 41.25 美元，到 1993 年年初它就达到 21543.55 美元。同时，基金会一直都支付巨额资金来进行现款分红。到 1994 年 6 月，它每一股股票的价值已达 22600 美元。要想成为量子基金会的一名成员，一个人必须得投资至少 100 万美元。按照可靠的统计资料，索罗斯个人至少拥有量子基金会 1/3 的股份。

1997 年：1997 年 2 月，索罗斯赚的钱依然保持丰厚

的利润。其旗手量子基金——49.3 亿美元资本——加上其他量子集团的基金，其投资总额达到了 150 亿美元。索罗斯自豪地宣称，在 27 年的发展历史中，量子基金依然保持着投资基金世界的最佳经营记录。

1997 年初，《福布斯》杂志称索罗斯的资产有 25 亿美元。从 1997 年初到 6 月，东南亚金融风暴由酝酿到爆发，6 月底到 7 月底这一个月內，量子基金会的盈利便由 14% 急剧增加到 27.1%，几乎使上半年的盈利倍增。据报道，量子基金会在 6 月底（即东南亚金融动荡前）总资产为 150 亿美元，到 7 月底则上升到 170 亿美元，这表明，自泰铢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 7 月初发生以来，量子基金会仅在一个月时间内就赚取了 20 亿美元。事实上，20 亿美元只不过是索罗斯量子基金会一个月的盈利。东南亚金融风暴已持续了两个多月，至今还未完全平息，索罗斯从中获取的利润也许仍在增加，究竟有多少，也许要到将来才会完全知晓。

附 录

乔治·索罗斯年表

1930 年：索罗斯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

1939 年：苏联军队进入芬兰，当地报纸呼吁人们援助芬兰。9 岁的索罗斯跑到报社要求响应，报社发表关于小乔治来访的通讯报道。

1940 年：10 岁的索罗斯自办一份名叫《罗帕号角》的小报，并在当地发行。

1941 年：进入匈牙利一所专为中上层家庭而设的国立小学。

1942 年：由于二战原因而中途辍学。

1943~1944 年：改名贾纳斯·基斯，躲藏在布达佩斯的地下室逃避纳粹的追捕。

1945 年：重返学校。

1947 年：独自一人离开匈牙利。先去瑞士的伯尔尼，

不久前往英国伦敦。

1948 年：索罗斯在伦敦西区上流社会住宅区的奎杰里罗馆舍做侍者。夏天，在英国一家农场工作，参加“徒手救土地运动”，并组织了一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运动。

1949 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深受卡尔·波普尔、哈耶克的影响。

1952 年：被一大堆哲学问题所困扰，坚信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有扭曲，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扭曲对事件的影响方面。著《意识的负担》。

1953 年：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

1954 年：在英国辛格弗里德兰德证券公司任黄金类股票交易员。

1956 年：离开英国，前往美国纽约。

1957~1958 年：为美国金融机构提供欧洲证券的咨询服务，成为金融分析师。

1959 年：跳槽到沃特海姆公司，成为华尔街屈指可数的代理伦敦和纽约业务的交易员之一。

1960 年：建议投资德国阿莱慈保险公司，大获成功。这是索罗斯第一次对外国金融市场的成功冲击。

1961 年：与德国出生的安娜莉丝结婚。重写《意识的负担》。12 月 18 日，成为美国公民。

1963 年：开始在阿恩哈德和 S. 布莱切尔公司任职。把《思想的负担》手稿交由卡尔·波普尔审阅。

1964年：与阿瑟·勒纳相识。勒纳于1969年成为其助手。

1967年：成为公司研究部门主管。索罗斯说服公司总裁创立第一个境外基金，取名“首鹰基金”。

1969年：在阿恩哈德公司创立第二个避险基金，取名“双鹰基金”，并负责基金的工作。

1970年：与吉米·罗杰斯开始长达10年的合作。到1980年，10年间他们奇迹般地未输一场。

1971年：与安娜莉丝关系紧张，婚姻出现危机。

1973年：索罗斯与罗杰斯成立“索罗斯基金”（SFM公司）。

1977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索罗斯控制股市，进行了民事欺骗，违反《联邦债券法》。索罗斯为自己进行了成功辩护。

1978年：与第一任妻子安娜莉丝分居。结识年仅22岁的苏珊·韦伯。

1979年：把“索罗斯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以纪念量子力学中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这一理论与索罗斯的信念相吻合。

同年，在南非从事慈善公益活动，在开普敦大学成立助学基金，资助黑人学生。这是索罗斯最早的慈善活动。

1981年：与安娜莉丝离婚。6月，以“全球最杰出的基金经理人”之名成为《机构投资者》封面人物。同年，“量子基金”遭受挫折，成为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没

有赢利的年景。

1982 年：与吉米·马克斯相识。马克斯于 1983 年参加基金会，成为基金会的重要管理者。

1983 年：与苏姗·韦伯相识 5 年后结婚。

1984 年：拜伦·拉斐尔进入“量子基金”。同年，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成立“索罗斯慈善基金会”。

1985 年：索罗斯对美元贬值的准确预测被五国财长公布的“广场协议”印证，在外汇投资中取得辉煌成绩，被《金融世界》列为华尔街 100 名收入最高者中的第 2 位。

同年与苏姗生下第一个儿子，取名格里高利。

1987 年：在苏联成立慈善基金会。完成并出版《金融炼金术》。9 月成为《幸福》杂志的封面人物。

同年与苏姗生下第二个儿子，取名亚历山大。

1988 年：在波兰设立慈善基金。同时，把目标转向中国，试图在那里建立慈善基金。

同年，斯坦利·德拉肯米勒加盟“量子基金”，并主持基金日常工作。

1989 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慈善基金。

1990 年：在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建立了开放社会基金。至 1990 年春，索罗斯已在 26 个国家设立 89 个机构。

同年，在他的资助下，中欧大学（CEU）分别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成立。

1991~1992年：鉴于量子基金迅速扩大，索罗斯创建类星体基金、量子新兴基金和配额基金。

1992年：向前苏联提供1亿美元捐款，资助前苏联科学家和科学研究。

9月，趁英镑贬值，出击英国银行，一夜之间净赚10亿美元。

同年秋天，成为英国牛津大学资助人董事会成员，并作为牛津大学的主要资助人而载入校史。

1993年：被称为“一个能改变市场的人”，成为《商业月刊》封面人物。

同年，建立房地产基金。

1994年：1月，首次以公开身份访问以色列。4月，出席美国众议院银行及金融委员会听证会，为投资性集团辩护。6月，被《华尔街日报》称为“全球金融界的坏孩子”。7月，被称为“华尔街的顶尖玩家”，成为《金融世界》的封面人物。

同年，索罗斯投资于德国马克和日元遭受挫折。

1995年：在母校伦敦经济学院发表演说。

1997年2月：索罗斯对西方资本主义展开攻击，指责它未同穷国分享财富。

9月：在泰国大量抛售泰铢，引起世人瞩目的东南亚金融风暴。

9月：在香港参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对自己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中的活动做出解说。

下 篇

乔治·索罗斯和他的三十条 秘密商规

“与华伦·巴菲特不一样，索罗斯似乎乐意在一切领域中投资。”

——美国《纽约时报》

“恰如一位当代赛船赌徒，索罗斯常常表现得异常冷静，即使奖金很高也是如此。”

——美国《投资商报》

秘密商规之一

——正确认识世界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的现实观点，常常来自于他的哲学观点，更不用说当面对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金融投资市场，需要一颗坚定而睿智的心灵来驾驭操作了。索罗斯早年曾梦想过当一名哲学家，并为此进行过许多精心的准备。所以他的金融操作方式和理论有充分的理由从他的哲学世界里获得有力的支持。

从 50 年代早期索罗斯还在伦敦经济学院做学生的时候开始，他就一直对哲学问题怀有浓厚兴趣：世界如何运转？我们怎样才能了解它的运转方式？人生是什么？为什么能在这里？世上万物怎样运作——如宇宙、大脑、人类等？这样一些课题的解决肯定会造福人类，如果它能在世界范围内得以认可。然而，大多数人对此类问题只是稍加考虑，然后便去从事其他诸如谋生、养家等实际事务了。他们把这些大的问题都留给哲学家去解答，并

且相信他们很难对这些问题进行明确解答。

索罗斯也不例外，他曾经认真思索，并在伦敦做学生时就准备开始写一本名叫《意识的负担》的书，试图解答这些问题，后来又放弃了，因为他明显感到了生存压力，必须首先解决生计问题。然而十年后当他在纽约开始了投资事业时，他仍然想重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后来他仍然放弃，这种反复思索探究的结果就是让他开始看出神秘的哲学世界与现实的金融世界之间的种种联系。这使他获益匪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金融投资方式。他很快就把他自己对存在的理解确认为获取人类自身现实生存的方式方法的前提和条件。

索罗斯曾经这样描述他的哲学观点：“我的中心概念是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本来就是有欠完整的。有些状况是我们必须先理解，而后才能做出某些决定，但事实上这些状况往往受到我们做决定时的影响。当人们参与某些事时，他们所怀着的期望本来就是会和这些事的实际情形不一致，只是有时差距很小，可以不必理会。但有时差距很大，足以构成影响这些事情发展过程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不是很容易传达的一个概念。”

“我可以把其中心概念归纳成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理解欠完整。这句话虽然简单，但却能完全表达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原因是这句话表达的意思不仅仅是我们的理解欠完整，也表示我们要置身其中处理及要了解的现实，也都是不完整的。现实是一个不断在移动

的目标，因为我们的理解是可以影响现实的。”

在索罗斯进行深层研究之前，他得出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结论：要去阐明人生的奥秘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要想去研究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及我们怎样了解关于存在的全部内涵？我们必须客观地去看待我们自己。问题就在于我们做不到这一点。

其实原因是再简单不过的：实际上，我们要研究“我们是谁”或者“我们是什么”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客观地审视我们自己。然而，问题就在于“让我们客观地看待自己是无法做到的”。对索罗斯来说，有一个理论使他记忆尤为深刻：“一个人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只是其对该事物理性认识的一个部分。所以说，一个人的思想往往缺少判断它正确与否的独立参照物——它的客观性。”

由于未能有这些个独立参照物，人们就无法冲破自我思想禁锢，也无法用一个未变形的棱镜来认识世界。于是，也就是从那时起，他研究的焦点就集中在对“客观事物的扭曲认识是如何指导人们行动”的问题之上。

索罗斯认为，一旦不能获得这种独立的参照点，人们实际上就不可能超越自己，也不可能通过未扭曲的棱镜去观察这个世界。这样一来，要获得完美认识可就大有问题了。如索罗斯所言，一个人无论何时想理解他自己所处的境况时，那种理解并不意味着就是认识。50年代早期，索罗斯断定实际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所有感性

认识——也就是我们所探讨的“存在”的全部内涵——都是残缺不全的，都是被扭曲了的。索罗斯断言：如果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那么他们所要做的惟一切实可行的事就是把力量集中于这些对世间万物残缺而又被扭曲的感性认识的重要方面，即要突出重点。这个推断是索罗斯的金融战略的中心所在。

要想了解索罗斯是怎样在金融市场上操作的，你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哲学观点。因为这是他对整个世界——当然是包括金融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并必然会支配和左右他的思想和行动。

秘密商规之二

——市场价格总是错误的

有些人认为资本市场总是正确的。正是这种感觉，他们相信，市场时价会导致看低或看高未来的发展潜力，即使是这种发展趋势还处在不清晰的时候。

而对索罗斯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对他来说，任何对未来市场是何样子进行解释的观点都带有偏见，而且是片面的。他并不是想说事实及信仰都独立地存在。相反，他在阐述反射理论时所倡导的就是“信仰要做的就是改变事实”。

实际上，市场价格将不会是正确的，因为人们总是忽略了它在未来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市场价格将总是“错误的”，因为它向人们所提供的并不是对未来的合理的情况，而是带有偏见的情况。

“但是曲解总是在正反两方面同时起作用。”索罗斯强调说，“并不仅仅是市场参与者在操纵市场交易时带有

片面性，同时，他们的片面性也反过来会影响交易过程的未来发展，他们互为作用与反作用。这也许可能使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市场能先期预料未来的发展，并且相当准确。然而事实却是：并不是眼前的期望符合未来的事件，而是未来的事件为眼前的期望所影响。从本质上讲，市场交易者的感觉本来就是曲解的、错误的，同时，在交易者曲解错误的感觉和实际事物的过程之间有一个双向的联系，这个双向的联系导致了它们之间缺乏一致性。”根据索罗斯的观点，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片面认识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将导致股市的涨跌。而这种片面性凭“自我强化因素”起作用，它与“潜在的趋势”相互作用影响投资者的期望值。因之而产生的价格波动可能引导投资者去购回股票或者购买全部股权，这又反过来影响股市。

股价并不是由人们对可得到的信息的敏锐反应所左右。相反，它却是感觉的结果。在产生这结果的条件中，人们的情感和冰冷的数据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正像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一书中所写的：“当（股票）活动拥有能用头脑思想的人时，那么交易活动的主要内容就不只在事实的范围内，而且还包括交易活动参与者的感觉。那么这一活动的因果链也不是直接地从事实到事实，而是从事实到感觉，从感觉到事实。”

在索罗斯的理论中包含着一种概念性的论点：投资者所开付的价格并不仅仅是对价值的被动反映；相反，这

些价格却是对股市价值进行估价的积极因素。

错觉——他有时这么叫——就是指参与者的想法与活动实际状态的间接偏差，在整个交易中，这种偏差像一个幽灵，无时无刻不在。

他通常是抱着对一些事物只能有不完整的了解这样一个念头去了解事物的。传统经济是建立在均衡理论的基础之上，在这里，供给与需求是均等的。但如果你了解到我们对事物的不完整认识这种论断是多么重要时，你就会认识到你所从事的是非均衡经济活动。

索罗斯还坚持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买卖股票或其他任何东西的决定都不是基于金融市场上的均衡论做出的，而是基于市场是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的论断做出的。索罗斯对均衡论提出疑问：如果存在均衡，人们在还没有感觉到市场的条理性的同时，市场价格为什么会波动？因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都带有偏见，所以就不可能存在均衡。在索罗斯看来，一个人不可能设想出均衡，因为在他向均衡努力接近时，他的偏见也附带其中了。而且在他的努力过程中，偏见也可能会转嫁，所以他就不可能把他的努力集中到一个“目标”之上。

金融市场是在一种非均衡的状态下运行的，而且在市场参与者的感觉与实际活动之间总存在着差异。当这种差异微不足道时，不必去担忧什么，因为它不会改变市场参与者的感觉。当这种差异很大时，就需对之加以考虑了，因为它的确会改变那些市场参与者的感觉。

秘密商规之三

——高效市场并不存在

很多人认为，金融和股票市场是一个“高效市场”，即只要遵守规则就可获得效益。“高效市场”理论的支持者，倾向性地认为市场操作上有其逻辑性和条理性。他们在自己的思想上受到了传统经济的鼓舞，传统经济教给他们的是金融市场向均衡状态运动。因为当市场达到均衡时，他们就可能臆断完美的认识与完美的竞争是可以达到的。

“高效市场”理论的支持者相信如果以正确的分析方式的渠道获取正确信息，他们就可能对将要上扬的市场做出预测。他们的理论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方面，人们在任何规定的时间内都能对金融市场有一个完美的了解；另一方面，股票价格反映所有可获得的信息。

这些人乐于相信市场是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运行的。在这样的市场上交易时，要去想一想，人们总会觉得太

不平静，太令人不安，更不用说危险重重了。相信通过艰苦的工作，恰当的分析，及获取正确的信息，人们能精确地预测股市行情。

这些唯理论者争论说因为投资者可以很好地了解一个公司，每一股份都能精确标价。也就是说，如果操作正确，定出“正确的”价格，像人们去解决数学上的问题一样去解决股市上的问题，那么每一股份的价格将是一系列合理推算的结果。坚持“高效市场”的人们断言当人们碰到要对股票做出选择之类的事情时，只要遵循这些原则，就能选出最好的股票。股票价格仍将和对一个公司未来赢利的估价紧密相联。

这种“高效市场”假说看来很简单。正因它非常简单，它成了股票市场怎样运作的最为流行的理论之一。但对索罗斯来说，这种理论不只是太简单了，它明显是错误的。

索罗斯认为“高效市场”假说的错误在于忽视了参与者主动性的不确定。他认为：假如一个人参与某一件事又进行思考，则他的处境就会变得很困难，因为他要了解的是他参加演出的那件事情。传统的想法是，了解是一种被动过程，而参与则是一种主动过程。事实上，这两种角色彼此影响，所以对参与任何一件事的人都不可能根据纯粹或完整的知识做出任何决定。

古典经济理论假设参与市场的人是根据完整的知识行事，这个假定显然是错误的。参与市场者的知觉已经

足以影响他们所参与的市场，但市场的动向足以影响他们的知觉，他们无法得到市场的完整知识，因为他们的思考也不断影响市场，而市场也回过头来影响他们的思考。假如关于完整知识的假定是对的，市场分析就容易多了。

经济理论必须重新从根本上反思，原因是经济过程中还有诸多不肯定因素，至今仍未得到解释。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科学永远得不到像自然科学那么肯定的结果，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我们必须对思考在影响事情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彻底重新评估。

我们习惯把事情视为一连串的事实：一个事实接着另一堆，永无休止。但假如某一情境是有人参与的，事实与事实之间不必然是直接衔接的。在这种处境中，事实首先和参与者的思考接上，然后参与者的思考又和别的事实接上。他认为：我们必须先了解的一点是参与者的思考并不再只是囿于事实，我们也要考虑其他人和他自己的思考。如此就会出现不肯定因素。换句话说，此时参与者的思考就不再和事实完全相符，但却可以在影响和塑造事实方面起某种作用。思考和事实不但不符，而且参与者的知觉和实际情况之间总会有差距，参与者的盘算和实际结果也会有出入。这种出入，就是了解历史过程以及金融市场动力的关键所在。他个人的看法是，错误观念和错误在人事方面扮演的角色，犹如变异在生物学扮演的角色。

他说这就是他的核心概念，这概念也产生了不少影响，这些影响对他人未必重要，对他却很重要，他的一切都源自这一点。他也察觉到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流行的看法，在很多方面都很不一样。

流行的看法之一是，金融市场是在均衡的状态中。但这其中必然有分歧，原因是市场是不完善的，它们的性质有如随意散步一样，终究会受到其他随意事件的调节。这种错误看法的来源在于错误地引用牛顿物理学来比拟。

他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认为，分歧的地方本来就是来自我们不完整的理论，金融市场的物质之一就是参与市场者的知觉本来就 and 实际情况不相符，有时这种分歧是可以不予理会的，但有时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种分歧，我们才会明白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在使人们接受一种金融市场运作方式的相反观点时，索罗斯希望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所深信的观点：这个世界几乎不是理性的，而且不可能获得对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任何事情的完美认识。总之，所有那些分析家所提出的股票为何起落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秘密商规之四

——期望决定市场

基于人对客观世界解释得出正确全面和完整认识的错误的观点，大部分曾竭力分析股市交易行情的人们得出结论：逻辑性在股价的确定中起主导作用。在股市交易中必有逻辑性。他们认为要考虑何时投资于股市交易是件令人极其不安的事，更不用说股市交易本身就充满风险。

那些唯理主义的虔诚信徒们顽固地坚持：因为投资者对一个公司的状况有“相当完美”的认识与了解，所以每种股票都应是准确地根据其正确的价值来排价的。在这种唯理主义的支配下，投资者面对多种多样、门类齐全的股票进行选择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按所谓的“理性”来办事，选出最好的。同时，股价一直与对上市公司的未来的利润状况成“理性”的联系。这就是风靡一时的作为股市交易运行理论的高效市场假说。它假想了

一个完美的理性世界，同时也假想“所有的股价都反映了所得信息”。

但是，在经典经济学鼓吹均衡论并假想“完美的竞争和完美的认识是可以达到”的时候，索罗斯则对这些现代理论提出了质疑。他也对这些经济学家的需求与供给曲线的形态的臆断提出了质疑。这种臆断称那些估计会根据自己的喜好程度进行选择的消费者们知道什么更好，选择的余地是什么。而索罗斯则坚持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索罗斯称：供求曲线的形态不会有人提供，因为这两者把消费者对待商品市场的期望具体化了。

索罗斯相信在此方面他认识得更深，也最有发言权。他强调，在现实世界中任何假想完全认识论的理论都是荒诞的；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对买卖的决定是建立在期待的基础上，而并非基于经典经济学的理想之上；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只能达到对事物的不完全认识的程度。

“一般来说，我认识事物的洞察力就是非完美认识论在行动中的作用。传统的经济学建立在均衡论基础之上，他们认为供求均衡相等。但是，如果你发现我们的非完美认识论在我们认识世界这一行动中的重要作用时，你就会发现你所做的恰恰是不平衡的。”

索罗斯这样解释他的观点：许多投资者都已开始相信他们能“预料”未来市场的状况，也就是说他们能在市场的未来发展来临之前就开始考虑到未来的市场行情与发展状况。但是，对于索罗斯来说，他认为这是“胡

说八道”、“无稽之谈”。他认为，“对于未来状况的任何幻想都是有偏见的，并且是不完全的。我不认为事实和信念是自发独立存在的。相反，我在阐述反射论时就强调‘片面是改变了的事实’。”

时价常是“错误”的，因为它提供的不是对未来的理性认识，而是一个片面的认识。

对于那些推崇传统经济理论的人来说，要让他们去接受市场活动将影响供求这种观念未免显得有些荒唐，因为那些学习传统经济理论的人所接受的概念是供求曲线的形态将影响市场价格。但索罗斯却相信供给与需求要受市场的影响，而这会导致价格波动，却不是均衡。

索罗斯称这种有悖常规的现象成为了所有金融市场的特征，它将为贴现机制的未来发展所用。股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且外汇交易市场、银行及任何形式的信贷都存在这种现象。总而言之，索罗斯说：“市场发展支配着供给与需求状况的演进，而不是其他方式。”

索罗斯说：“任何在价格不断变化的市场上经商的人，都知道市场参与者深受市场发展的影响。”不仅是以正在上涨的价格来吸引买主，购买本身也推动着价格上涨，这样可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趋势。如果供求是基于与市场价格毫不相干的因素，那么就不会有任何自我强化的趋势出现了。

当投资者观察金融市场时，应该了解到人们的期望在市场上发挥着很大作用。买卖商品的决定是基于该商

品价格将来会在怎样的期望之上做出的，而将来的价格还依赖于目前做出的买卖决定。所以，索罗斯称，人们不能去臆断供求只取决于参与市场者的期望毫不相干的外部力量。

与人们所持的理性和逻辑性决定市场的观点相反，索罗斯坚定地认为人们的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市场。

秘密商规之五

——超前掌握趋势

许多人都在关心，索罗斯成功的秘密在何处呢？

应该说首先，是他那无穷的耐心。

其次，他对在股市中何处能淘金具有超级灵感。每个人都寻找“金子”，并且每个人对何处寻金都有自己的理论。但是，索罗斯对把握股市的风云变幻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某事正在进行的迹象。

当他搜集到这个迹象后，他储存、分析、验证，但他从来不对别人说他为什么这样做而不那样做。

他知道，他是对的。

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年复一年地盯着主要的情况，去分析。

索罗斯的投资技巧就在于他能在别人还没有预料到这种突变时，他就判断出来了。如索罗斯的合作伙伴吉米·罗杰斯所称：“我们对一个公司下个季度去靠什么赚

钱，或 1975 年铝运量是多少并不十分感兴趣，我们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广阔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因素在时机成熟时怎样去改变一个行业的命运。如果在我们所看到的与股票的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那就好了，因为接下来我们就有钱赚了。”

索罗斯不断地在寻求着股市突变。例如，投资者曾一度拒绝购买某一行业证券集团的证券，但随后却突然决定大量购买这些证券，在这种情形之下，市场突变就发生了。当人们开始对突变有所警觉时，这些证券的自我强化动向就开始了。索罗斯总是很积极地在这些证券上检验他的理论，去寻求这些自我强化动向。

一旦这种自我强化机制占了主导，股票价格就急剧攀升。这对证券集团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因为此时它的公司将买入更多，获得的股票越多，其赢利就越高。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状况仅仅持续一段时间，而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及市场的饱和，股票就显得标价过高了。股价随后就跌落下来，那些空头股票的抛售者可就大赚一笔了。

为了向前迈进一大步，索罗斯开始研究外国经济，试图在国外股市中投资。他开始琢磨：哪些国家的股票市场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哪些国家正为经济的稳定出台新政策？那些国家正致力于市场改革？

索罗斯企望自己能够通过涉足大规模投资，赢得更大好处。一位以前的同僚曾说：“和任何一位投资者一样，

他也试图买 25 美分的股，去赚 5 美元。”如果有不成熟的市场，例如在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索罗斯总是对它们严加注意。他希望自己能比其他投资者提前 6 到 18 个月发现投资机会。

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购买了日本、加拿大、荷兰和法国的债券。在 1971 年，他曾一度把索罗斯基金里 1/4 的财产投入到日本股市，当时，这一下使他的钱翻了一番。

索罗斯和罗杰斯总是对股票进行精明地选择，并做出极为敏锐的举动。1972 年一次机会来了，一位老熟人给索罗斯提供消息说，财政部的一个秘密报告显示出美国的发展将高度依赖国外能源。鉴于此，索罗斯购买了大量的石油开采和勘探公司方面股票，同时还购买了煤炭公司的股票。一年后，即 1973 年，阿拉伯国家联合拒绝对美出口石油，这使得能源股市大幅度上涨。

1972 年，索罗斯和罗杰斯又预见到食品危机，于是他们又购买化肥、农机设备、食品加工公司的股票，又捞了一大笔。

下面，胜利一个接一个。这段时期，索罗斯和罗杰斯机灵地感到美国的国防工业是投资者的潜在获利源泉。

1973 年 10 月，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爆发了“赎罪日战争”即第四次中东战争。在战争刚开始时，以色列处于防御态势，伤亡大量

人员，损坏众多飞机和坦克。这表明，以色列的军事技术已经过时。但对索罗斯来说，美国军事技术也必然进行淘汰更新。他认为，美国军事技术的硬件已经陈旧过时，国防部将不得不花费大量资金去革新这些硬件。

可惜，当时这一观点并未引起其他投资者的注意。自从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军工企业亏了许多，这使得资本分析人士不想再听到对军工企业前景的评论。

但是，在1974年早期，罗杰斯一直特别关注这一行业。军工企业的巨大潜力极大地鼓舞了罗杰斯开始行动。他去华盛顿跟国防部的官员讨论，并且跟美国各地的军火承包商们也讨论此事。这使索罗斯和罗杰斯越来越相信他们是正确的，这意味着其他的投资会失去某些大的成功机会。

在1974年中期，乔治·索罗斯开始大量购买军工企业的股票。

他购买了诺斯罗普公司、联合飞机制造公司、格鲁曼公司的股票。尽管当时洛克希德公司正受到破产的威胁，索罗斯仍然把赌注往它身上押，于1974年对该公司进行投资。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索罗斯和罗杰斯已经得到了一个有关这些飞机公司的重要情报。它们手中都握有大量的合同，或者正在续签合同，这必将使它们大量获利。

1975年的早些时候，索罗斯又开始对那些生产电子战装备的公司投资。在“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空军损

失惨重，这很大程度是因为以色列缺乏高级电子干扰装备以对付阿拉伯手中拥有苏联制造的武器。

索罗斯和罗杰斯注意到了这个事实。

他们同时也注意到现代战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由现代装备组成的全新的武器库已经开始发展：传感器、激光制导炮弹和“灵巧炸弹”，等等。

所以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索罗斯和罗杰斯是正确的，结果他们又赚了一大笔。

秘密商规之六

——寻找市场感觉

作为一个普遍规律，索罗斯认为无论在何时何地，用投资者的想象构筑起来的假说都将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假说是构筑在投资者的一些残缺不全的感觉之上的。

索罗斯想要了解的就是是否一种趋势已发展过渡了。他一直在寻找着这种趋势的感染点。因为这是惟一能与大众唱反调的安全时机。在其他任何时候去这么做都是在冒巨大的风险。一旦索罗斯确信他已找到了感染点，他接下去就开始撤掉他原来的投资项目，从众人中脱离出来。到那时，他就基于大家都错了的这种信念，提出一种新的投资论。索罗斯平日总爱说大众都在追逐错误的潮流，但由于他有时也愿意去随大流，所以他似乎在暗示在追逐某一潮流时，大家都会各就各位。

有些时候，弄清某一趋势存在的基础是很耗时的。这对索罗斯来说可成了一个问题，因为到他通过对趋势的

判断而得出一个新理论时，这种趋势可能已被市场颠倒过来。

索罗斯把寻找诸多投资中的缺陷视为他的主要任务。如果他有时还真得是众多投资者中的一员，并按照市场趋势进行投资，他便能从中发现一些能对他的事业造成致命打击的缺陷。当索罗斯没能从中找到缺陷时，他会感到非常不安。从中我们可知道缺陷可在市场上给索罗斯提供一种高于其他投资者的重要优势，它能让索罗斯去寻一种一旦得到验证，就意味着某一市场趋势走向终结的市场信号。

索罗斯的目标就是使他的假说得到证实。如果它得到证实，他会进一步扩大投资，他的自信度将决定他投资规模的大小。如果他的假说得不到验证，他就不再耽搁下去，他会从中脱出身来。他总是在寻找一种他从中能发展一项假说的局势。

只要索罗斯坚信他最初的理论是正确的，他就不会主动放弃他的投资项目，哪怕他在这个项目上已开始赔钱。他甚至可能还会增加该项目的投资。当然了，他将会设法搞清为什么他在赔钱。

索罗斯与罗杰斯创立“量子基金”之后，他们在业务上就进行了分工。索罗斯负责市场分析，罗杰斯则负责做出决定。他们所运用的策略是投资在先，调查随后。索罗斯负责投资，而罗杰斯负责调查。

有的时候，当索罗斯要进行投资，罗杰斯就开始了

调查工作，并发现索罗斯起初的想法是错误的。然而，索罗斯仍坚持进行他的项目投资。他喜欢那些局势，因为他知道其中的缺陷是什么，这可帮助他了解何时需要脱身而出。知道了其中存在缺陷，并不意味着索罗斯必须主动从该投资项目中撤出来。它只意味着索罗斯必须对该项目慎重观察。如果这种投资意向看来是错误的，那么他所要做的就是尽快脱身。

这就是索罗斯独特的投资风格，这种风格融合了勇气、智力、淡泊与直觉。他的反应论是他的盖勒计数器，告诉他关注何处。它并没有精确地告诉索罗斯瞄准什么以及最为重要的出击时机，但这个理论却能给他的市场经营建立一个框架结构。当索罗斯的投资风格得到应用时，他便能做出准确的判断，适时地把握住机会。

索罗斯首先会瞄准目标，随后采取行动。他经营上从不采用华而不实的方式，而是通过验证、探索，努力去断定他所想的是否正确。他提出了一种假说，在此基础上他进行投资。发展一种假说就意味着做出了一种金融市场上已呈现出某种趋势的论断。

这种性格为人普遍接受，指导他达到准确的目标。

索罗斯然后就开始了他的行动。他刚开始干时，决不是大刀阔斧，而是试探，验证，努力地去确定他的想法是否正确。他甚至要设计一个假设，并且以该假设为基础去搞一个投资交易，再下去就是等待观察他的假设是否成立。如果假设是成立的，他就会做一个更大的交

易，他自信的程度完全决定他投资交易的规模。如果他发现假设不成立，那么他将毫不犹豫地撤回他的投资交易。所以说，索罗斯一直在努力地寻找能验证他假设的投资空间。

正像马科斯后来回忆的：“乔治常常说，‘投资在先，调查在后’。这句话的意义是：先做出一个假设，再以此为立足点进行小的交易，去检验假设的可行性，然后就平心静气地等待市场去证明它正确还是错误。”

实质上，索罗斯的这一为人称道的战略可以称为“寻找市场的感觉”。索罗斯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利用这个技巧，当马科斯在 80 年代和他一起共事时，他甚至很少告诉马科斯。

经过反复的讨论后，他们二人才决定采取断然的行动。

然后，马科斯将设计一个舞台效果，为这一即将出台的交易拨出一定数量的资金。

“好吧。”索罗斯说，“我想买 3 亿美元的债券，但要先卖 5000 万美元的债券作为试探。”

马科斯会提醒索罗斯：“我只想买 3 亿美元。”

“是的，”索罗斯回答说，“但是我想了解一下此时市场的感觉是什么。我想看一看作为卖方我有什么感觉。如果我能达到这一目标，我如果能轻而易举地抛掉这些债券的话，那么我甚至更想成为一个买方。但是，如果那些债券很难抛售的话，我没把握是否做一个买方。”

秘密商规之七

——不在交易中掺杂感情

正是因为索罗斯的理论并没有为他的成就提供一切保证，所以有人很想说：“索罗斯的成功就在于他极好的运气。”但是，很少有分析家特别是负责的分析家会把这作为凭证。实际上，搞资本交易要远比掷骰子赌博复杂得多。就乔治·索罗斯的理论而言，也只是揭示了他投资秘诀的一部分，这仅仅是解释他如何进行资本市场运行规律的框架，而缺少其他更深入的内在分析。

但是，这其中还有另外的因素。索罗斯自己也这样说过：“作为一个商人，我有相当好的记录，但是我同样也具有我的理论。所以说，这里有某种联系。我并不认为我作为商人取得的成功会证明我的理论。这不是科学的证据。我想这其中肯定还有别的因素。”

这种因素应该是智力或心理方面的。这其中有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不在资本市场交易中掺杂感情。

有这样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1974 年的一天，索罗斯正在跟一位老熟人打网球，电话铃突然响了。

电话是东京的代理人打来的，他要告诉索罗斯一个秘密：那一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陷入到水门事件的丑闻当中，并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这位代理人告诉索罗斯“日本人对尼克松的麻烦反应很糟糕。”

由于索罗斯在日本股市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比例也极大，他必须做出决定到底怎么办——留还是抛。

当时，他的网球伙伴注意到：在打球时都未出汗的索罗斯此时也出了冷汗。

当时当地，索罗斯做出了抛的决定。丝毫没有犹豫，也没想到在做出如此大的决定之前跟别人商量一下对策。

这个决定只花了几秒钟，足见他的理智和冷静。

关于这一点，摩根集团的拜伦·威恩这样说过：“乔治的天才就是他具有一定的素养。他非常实际地洞察市场，他能领悟影响股价的力量。他懂得市场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非理性的一面。并且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他不可能总是正确的。当他认为他正确时，他就采取颇具魄力的行动，抓住机会，赢得利润。当他错误时，他能尽力地去减少损失。……当他确信自己是正确的时候，他具有极大的信心，像 1992 年英镑危机时他的表现一样。”

索罗斯的部分性格体现在他在股票市场上运用某种

方法的洞察力。这种本事在学校是学不到的，也不是伦敦经济学院的课程中所具有的。这种才智是很少人所能具备的。但是，索罗斯却具备。索罗斯在伦敦的伙伴埃德加·阿斯泰尔毫不费力地指出了索罗斯成功的根源：“他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他的心理学。他懂得动物的本能。他懂得大多数人何时像好的市场交易者一样努力获得利益。”

所以，在资本投资市场上，索罗斯常常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内刚性格。“当他决定投资数亿美元时，我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凡尼尔·多龙说。多龙是一位公共事务评论员，现任驻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社会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多龙又说：“我看到如此大数额的投资，吓得发抖，晚上不能入睡。对这种交易真需要胆识。也许索罗斯对此已经习惯了。”

人们常常拿索罗斯跟华尔街另外一位超级投资商华伦·巴菲特相比较，但比较的结果却表明二人迥然不同。

巴菲特专攻一项事情，而且仅仅一项——那就是用低价购买实力雄厚的公司——索罗斯却更加灵活，他根据资本市场的变化出入其中，抓住时机捞一把。巴菲特购售股票，而索罗斯从事货币业务和利率。巴菲特集中精力于某个公司，索罗斯却紧随全球金融市场的大趋势。这需要更杰出的胆识和超人的意志。

秘密商规之八

——重视人们的态度

金融和股票市场是不稳定的，但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种不稳定？索罗斯认为是人们的感觉。是人们的带有某种倾向和缺陷的感觉造成了市场的不稳定。

感觉包括人们对股票的“积极”或“消极”的态度，这种态度是股票价格上涨或下跌的主要原因。这种感觉在市场上很容易形成“自我强化因素”和“优先倾向”，两者相互作用对人们的期望产生影响，进而又影响股票价格。然而，人们对所获信息采取的反应并不完全左右股票价格，而需要对多种确切数据的综合反映做一种积累。股价的变动将直接影响到股民的态度，由于决定他们的吸取或套现行为，整个市场也因此而大受影响。

为了发展一个健全的理论，人们需要弄清“事实”。然而，如索罗斯所指出：“当市场活动的参与者是有自己思想的人的时候，活动的主题就不再局限于事实了，而

且还包括参与者的感觉。这所产生的效果并不是直接从事实到事实，而是从事实到感觉，并从感觉到事实。”实际上，价格是人们对股市做出评价的积极因素。这种感觉与现实之间的双向反馈成为他理论的一个要点。

人的感觉不可能全然正确，必然包括误解和偏见。在市场状态中，人们感觉中的误解和偏见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谓误解，即是市场参与者的感觉与市场状况之间的差异。这也和偏见一样，是人对市场感觉中的客观存在。市场参与者不可能把他们的感觉和思想仅仅局限于事实，他们有理想、推测或期望。还得顾及其他参与者的思想。这就产生了与事实的差距和不确定性。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人的感觉与市场状况之间常常不是一致的。问题只在于，有时候这种差异较小，而且双方均能自我修正，有时差异较大，直接影响到市场的发展进而对人的感觉也造成影响。

甚至有一种极端情况，这就是市场处于极度不稳定，而且市场活动进展迅速，市场参与者的感觉和观念都跟不上这种发展，这就是索罗斯最感兴趣的地方。而反之，即使感觉与市场状态差异很大，市场仍很稳定，索罗斯认为这对他的投资操作毫无意义。

秘密商规之九

——混乱是取胜的福音

金融和股票市场是混乱的，缺乏逻辑性的，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片面的，有缺陷的，这是索罗斯投资哲学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为此，他解雇了那些坚持认为金融市场是有条理的，股票价格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的投资者。他嘲笑他们竟然对“一个人所要做的就是领悟这种逻辑，这样一来他就能致富”的论调深信不疑。对索罗斯来讲，金融市场是不稳定的，混乱的。窍门就是领悟混乱；只有这样，人才能致富。这里没有数学公式，让你一旦推导出来了，就可解释股票价格将表现如何。索罗斯暗示：股市是基于心理而运作，并非基于逻辑。说得更精确点，是基于群居本能。

对索罗斯来说，他要想验证一下他的理论是否能在市场上任何特定情况之下助他一臂之力，他首先必须弄清“市场走向”。这就是说，人们将何时、怎样去支付某

一股票、货币或商品。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把他的这种理论运用到欧洲的金融世界，平时他显得很放松，而实际上他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着最佳的出击时间，等待着群居本能取得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当它真的来临时，他会迅速做出反应，并及时抓住机会。

索罗斯利用混乱，领悟混乱的理论最终得到了有力的验证。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推倒时，其他人都相信，或者至少他们希望随着柏林墙的拆除及东西德的最终合并，一个新的统一的德国将重新崛起，繁荣壮大。而索罗斯则一如继往，想法与众不同。他意识到德国人在致力于把两个国家统一为一个大的德国的同时，其经济上将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他还意识到德国人将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去解决它自己的经济问题，而不会去着重帮助其他西欧国家摆脱经济萧条。

索罗斯坚信一个关注国内事务的德国将广泛地与西欧其他国家的经济及货币息息相关。他观察着，等待着。在1990年，他看到英国迈出了加盟新的货币体系的致命的一步，这种新的货币体系是为西欧国家设立的汇率机制。索罗斯认为英国人这么做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会员太局限了，太受约束了。它束缚了英国人的手脚，使英国人不能大刀阔斧地解决他们自己的经济问题。

英国的经济力量并不强，加入汇率机制之后，它实质上已把自己同西欧经济强国——新统一的德国接起轨

来。这种接轨会使英国最终依赖德国；而对于德国来说，因为它是该地区的经济力量最强的国家，它实际上可对欧洲其他国家是否能够，以及何时能够提高或降低利率，使货币贬值等起到支配作用。

索罗斯认为，英国对德国的这种依赖，将最终证明对英国是致命的。英国可能想改变它的货币政策，但它却不能付诸行动。它必须把那些政策与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德国的货币政策接轨。

不出索罗斯所料，1992年西欧爆发了金融危机。经济萧条的英国及其他西欧国家想降低它们的利率。然而，德国由于其国内自身的原因，却不愿意削减利率：他们十分害怕再发生通货膨胀。他们一想起20年代所发生的事，就感到不寒而栗，当时德国的通货膨胀使其经济崩溃。如果德国人不降低他们的利率，那么欧洲其他国家降低利率所带来的利益将受到损失。其他欧洲国家降低了利率，将会使其货币面临贬值的危险，而贬值的货币将成为投机者的牺牲品。所以英国渐渐步入困境。

英国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糕。居高不下的英镑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为扭转这种经济状况，英国需要削减英镑的价值，这样可以促进出口业。但汇率机制的规定迫使英国把英镑保持在2.95英镑兑换1个德国马克的水平上。1992年的整个夏季，英国的政治领袖们都坚持认为他们将能够度过这次危机，英镑不会贬值。英国将不会破坏汇率机制所定下来的规矩。

他们想应付过去这个困难时期。而索罗斯认为，天知道英国的经济处于多么可怕的境地。英国没法再遵循汇率机制了。他们将不得不退出来了。他领悟到这种局势下的混乱。他想发财了。

这次危机从9月中旬开始。有关意大利里拉将要贬值的谣言风传各地。纽约的商人出于害怕里拉贬值，开始抛售里拉。在星期日，9月13日，里拉贬值7%——这在汇率机制所定的范围之内。贸易公司因此而大赚一笔，并称欧洲中央银行将信守把它们货币汇率保持在汇率机制所规定的范围内的承诺。

把赌注押在超越汇率机制规定所允许范围内的汇率机制重新调整上似乎是错误的。如果意大利原来所称不会贬值的里拉实际上都贬值的话，这难道不类似于“皇帝的新装”吗？也许会出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局面，到了开始抛售英镑的时候了吗？骤然间，在世界各地，投资者立刻对西欧国家的政府愿意让汇率机制去决定汇率的承诺失去了信心。投机者们在热衷于抛售疲软的货币，其中包括英镑。索罗斯对英国将使英镑退出汇率机制这一点深信不疑。

索罗斯决定向英镑发起攻击，而且鼓励他的主管德拉肯米勒去投下比他原来设想的还要多的资金进行赌博。德拉肯米勒遵照索罗斯的指示，卖掉相当于100亿美元的英镑。如果索罗斯关于英镑必将贬值的论断正确的话，他可净赚一大笔钱。在前往他在第五大街的公寓

时，索罗斯看来信心十足。

1992年9月15日晚他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上午7点钟，索罗斯家中的电话铃响了，是斯坦利·德拉肯米勒报告惊人消息。索罗斯在电话中听到他兴奋地说一切进展顺利，乔治·索罗斯一下可净赚9.58亿美元。

把索罗斯在汇率机制危机期间与别的领域的赢利统计进来，他的利润高达近20亿美元。英国人把9月16日——这一天他们被迫将英镑退出汇率机制——称为“黑色星期三”。而索罗斯则把这一天称为“白色星期三”。正是这次把100亿美元赌注下在英国将使英镑贬值上，让索罗斯举世闻名。这是索罗斯作为一位投资家的最成功之举。

他正确地认识到了欧洲金融制度的不稳定，当大多数人否认混乱的存在时，混乱已占了上风。而利用混乱，乱中取胜，则是索罗斯成功的关键所在。

秘密商规之十

——在市场的转折处取得成功

感觉与现实之间有一条鸿沟，因为活动失去控制之后，资本市场就会出现一种暴涨暴跌交替现象。索罗斯认为这是股市疯狂现象，他说：“交易过程在初期是自我强化的，但这个情况只是昙花一现，逝之即然，所以最终只有颠倒过来。”

潜在的投机就存在于这种暴涨暴跌的交替之中。索罗斯的投资哲学主张：由于市场总是处于波动无常的状态中，暴涨暴跌交替现象就易于发生，成为资本市场中司空见惯的现象。那么赚钱的途径就在于寻找时机并在不稳定的市场中投资、投机，去达到意想不到的发展。

市场总是处于波动无常的状态中，使得暴涨暴跌交替现象在资本交易中司空见惯。一个投资者一旦认识到“市场”在思考着什么时，那么朝另一个方向逆转跳跃就成为可能，在出乎大众意料的发展中下赌注，赌一赌暴

涨暴跌循环将要发生或者已经发生。

当然，鉴别一种暴涨暴跌交替是困难的事。要鉴别这种现象，投资者必须去了解其他同行是如何洞察经济规律的，以达到知己知彼，取长补短的目的。要知道，市场是投资者的总和，要确定市场在特定的时刻的思想是生死攸关的，这是乔治·索罗斯投资技巧的精髓。

如何把握暴涨暴跌交替现象呢？

1994年4月13日，索罗斯出现在国会银行委员会的金融与城市事务部。他向该委员会提供了一个简短的解释，他声明他不同意目前所谓的“盛行看法”。尽管大多数人都相信资本市场趋于均衡，并能精确无误地预计到将来发生的事，但索罗斯却一鸣惊人，他臆断地认为“资本市场由于它不可能预计未来发生什么事，而是去塑造影响未来，所以它不可能准确地预计未来的事。”

他说，尽管资本市场只是反映经济规律，可是有些时候也可以去影响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市场就会进入一个动态的不平衡状态之中，它的表现跟高效市场理论所标榜的正常现象极不一样。”

但是，这种暴涨暴跌交替现象绝不会频繁地发生。因为这种暴涨暴跌交替会直接影响经济的基础，所以它一旦发生，会带来灾难性的破坏。然而，事实是只有市场被一种“随趋势”行为支配时才会发生这种暴涨暴跌交替现象。“所谓‘随趋势’行为，是指人们发现价格上涨就去大量进股，而发现下跌时又去大量抛出。”

“不对称或一边倒式的随趋势行为对于产生一个激烈的市场冲突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导致这种结果来讲是不合算的。”

正像索罗斯解释的一样：“市场越不稳定，越多的人们被这种趋势影响；这种随趋势投机的影响越大，市场形势就越不稳定。”当一个趋势继续时，投机交易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再者，片面认识随趋势应运而生，于是趋势发展更快，更加明显，那么片面变得更强烈。最终，趋势固定之后，最终进入了相反过程中。

所以，投资成功的关键在于确认市场开始进入转折点，当这个点被确定之后投资者就可以知道一个暴涨暴跌交替的市场阶段即将开始或者已经开始了，从而以此为依据采取自己的正确行动。

秘密商规之十一

——宏观投资

量子基金获利丰厚，经营成功，除其他投资技巧外，还归功于其结构上有特殊之处。这种非比寻常的结构索罗斯称之为“宏观投资。”

他说：“我们挑选个别投票和不同的股票组合顺势操作，所以我们的作业有不同的层次。要理解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一般的投资组合设想为只有两维空间的平面体。我们的投资组合则比较像一幢建筑物，运用杠杆原理，有结构地操作。我们股东资本为基础，建立一个三维空间的立体结构，而支持这个主体结构的则是证券的抵押价值。举例来说，我们以自有资金去买股票，其中五成用现金支付，其余半数以贷款方式筹资。”

将资金投放在不同的资产里，不但投资货币，也投资其他金融商品，并且做多或做空不同的资产以获取最大效益，这便是“宏观投资”的具体内涵。

在具体投资时，索罗斯总是设法使事情变得简单，而不是愈变愈复杂。他常常把资金规划成三个主轴投资，包括股票、利率和货币，风险则在+100%和-100%之间。但这些投资的风险互相弥补，因此他很少把资本集中在一个投资主轴上冒风险。

但是，索罗斯偶尔也会加入第四个投资主轴，即建立商品期货部位，也曾增加过第五次，设立了一个“量子工业控股”基金。这个基金主要目的在投资工业，成为基业的东主或股东，这个量子工业控股基金保留二成的资产进行和量子基金同样性质的投资。事实上，这二成的资产已经有足够的抵押价值或购买力，可以涵盖整个基金的宏观结构。其余八成资产则供投资工业之用。但完全未经动用的资金——即原来供投资工业之用，但事实上分毫未动的资金，则暂时投资在量子集团的股票上。

这是一个簇新的操作概念，日后可能会比起量子基金更有效率地运用资金。因为它相当于三维空间的资产规划。宏观投资的效率转变，原因在于平面的投资组合中，某一投资概念只能分配到一部分资本，但宏观投资却可以分配到超过百分之百的资产。

就宏观投资而言，在当时还没有任何一种基金与索罗斯所使用的方法一模一样。比如，有许多基金不使用宏观投资方法。而或许他们也使用宏观投资法，但应用的方式却不同；也有部分基金只使用宏观投资工具，但并不投资个别股票。而在索罗斯立体结构的投资策略下，

订有不同层次的决策。量子基金所采取的宏观决策可说是一种布局，在布局之内，做成买入或售出股票以及使用何种金融工具的决定。一般而言，只要能够使用客观工具实行宏观的投资策略，索罗斯都不会采取其他特殊的投资方法。

秘密商规之十二

——不采用科学的量化方法

操作金融投资事务的人往往采用很复杂的风险计算方式，而索罗斯对此持否定和批判态度。他说，“相比之下，我们只是玩票性质，我们还处在投资的‘石器时代’，我们故意这么做”。

索罗斯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不相信这些方法。一般而言，这些方法是基于效率市场理论来假设的，这种理论和他提出的“不完整理解及反射理论”互相冲突。他认为，这些方法固然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候有效，只有百分之一的时间行不通。但他更关心的是这种百分之一。这些理论一般是根据一个连续市场做假设，根本无法涵盖他使用的系统风险。他说：“我最感兴趣的操作方式并不连贯，所以他们的计算方式对我没什么用处。”

这种玩票性质和不连贯的操作方式在很多时候却比那种很复杂的风险计算方式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秘密商规之十三

——四两拨千斤

索罗斯创立的“量子基金”是有史以来经营最成功的基金之一。有人做过统计，例如投资分红又重新投资，在1969年投资的1000美元现在就可积累成400多万美元。除了其他的投资技巧，索罗斯最成功之处就是使用了“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操作原理”。所谓“杠杆操作原理”，即是在多层次多块面建构基金投资组合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证券的抵押价值，以极少的自有资金去吸引更多的贷款和投资，加以合理运作而且赚取最大利润。

例如买债券，这是基金运作之中的一种方式，其贷款比率可以更高，只要有1000元钱，就至少可以买入价值5万元的长期债券。而不论股票或债券，都可以卖空的方式操作：融券而来的股票日后以更低廉的价钱把它们买回来，赚取其中的利差；同时也建立贷款或期货部位，不论是做多或做空，这些部位互相支援呼应，创造

了此一立体的风险和机会结构。一般只要两天——一天走高，一天走低——就可以看出基金的效益形势。

在其他的投资种类和方式中也是同样。索罗斯这样说过：“在我们的投资组合中，衍生性金融商品所扮演的角色，其实不如外人所想的重要。为了规避风险，有时我们操作期货，不论做多或做空，目的只是希望能在市场上多多曝光。我们不常利用期权，原因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将期权控制在我们能够接受的风险中。通常在买期权时，投资人必须向专业人士付出一大笔费用，而其所能得到的优势我们用贷款买入股票也可以得到，而且所付出的代价更低。当然，用贷款建立股票部位比买进期权的风险大，但当面对的是实际风险时，我们也比较容易轧平随之而来的风险。事实上，出售期权是靠承担风险赚钱。这也可以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但这和利用杠杆原理的投资组合格格不入，因此我们很少出售期权。在这里，期权就好像伸出窗外要拖垮建筑物的东西，它和我们的立体结构背道而驰，这也是我们很少利用期权的原因。”

照索罗斯的理解，资金规模扩大，贷款比例增加，所承担风险不是大了，反而小了，其重要原因就是将“杠杆原理”发挥到了极点。他这样说过：“假如我们没有运用杠杆原理，量子基金的表现可能和现在大不相同，假如不能运用杠杆原理，量子基金也就不会做那样的投资。比起平面的投资组合，杠杆原理可以让我们有较大的弹

性。对债券基金经理人来说，假如其对利率长期看涨，他们可以把投资组合的期限延长至 15 年，假如对利率看跌，他们也可以把平均期限降至很短，如此一来就有很大的回旋空间。行情看跌时，我们可以买空，但假如行情看好时，我们也不必购入长期票券，而可以充分应用杠杆原理购入短期票券。”索罗斯说：“我可以用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为例，1995 年年初，假如你像我们一样对利率看好，换言之，假如你认为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停止收紧货币供应，你就可以在短期票券上大有斩获。但在长期票券方面，获利就会比较差，原因是短期的表现比长期的好得多。那是因为收益率曲线改变了。有时我们也来一点所谓‘收益率曲线’交易，就像许多想降低风险的专业人士一样，用长期和短期的票券对冲。但我们并不常做这种‘收益率曲线’交易，原因是我们通常只对利率的一般走势有把握，而在债券市场上运作，只是锦上添花的技巧而已。不过的确有专业人士只进行不同期限票券的对冲交易。”从这些表白中，你的确可以看出“杠杆原理”的精妙之处。

秘密商规之十四

——没有特定的投资作风

索罗斯一贯认为，金融投资领域是个人态度和作风发生作用的地方。

而在金融投资中，索罗斯的特长就是没有特定的投资作风。说得更清楚一点，他往往改变作风以迁就环境。如果观察量子基金的历史就可以发现，量子基金的投资策略一直在不断改变。在基金成立的前十年，宏观工具几乎完全排除在外。此后，宏观投资就成了投资主调，甚至后来又开始投资工业资产。应该这么说，他并不按照既定的原则行事，但却留意游戏规则的改变。

在实际操作中，直觉常常成为影响索罗斯决定的重要因素，也成为他投资成功的主因之一。他常常从假设入手，对于日后可能发生的事，首先建立一套构想，再一一从现实中求证，以建立一套用以衡量这些假说的准则。

但索罗斯又说：“我不觉得直觉的作用那么大，原因在于我也运用理论架构。我着手投资时，总会选择可以纳入这个理论架构内的方式。我留意不平衡的情况，因为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使我亢奋而无法解决。因此我做的决定，其中有理论成分，也有本钱在里头；你也可以说这就是直觉。”

秘密商规之十五

——双面下注的秘密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有限合伙投资基金成为投资圈中的宠儿，这是由于最负盛名的有限基金管理者赢得了巨大利润的缘故。最令人瞩目的便是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其他人尽管没有索罗斯那样出色，但业绩也非常不错。这其中包括史坦因哈特合伙公司的米切尔·史坦因哈特、老虎基金的朱利安·罗伯森和欧米加有限顾问公司的里昂·古伯曼。

有限合伙投资基金一词对不同的人来说其意味是不同的，但什么是有限合伙投资基金呢？

艾弗西奥拉多争辩说它应被称作“套期保值基金”，但很少有人这么称呼它。有限合伙投资基金是 1949 年亚历山大·温斯洛·琼斯创立的。注意到某些地方经济很好，而其他地方则经济很差，琼斯就设计了一种投资模式。一名牛市投资者可能投资其 80%，而短缺 20%。而

熊市投资者可能短缺 75%，而投资 25%。对投资者来说，重要的是变动投资风险的级别。

琼斯默默地进行着，在有限合伙投资基金领域 15 年内不显山不显水。然而，在 1957 年，华伦·巴菲特开始建立了他自己极其成功的有限合伙投资基金。起初，有限合伙投资基金只投资于股市收购，出售类似的抵押金，希望能有一个总体收益。然后到一定时间，幸存下来的有限合伙投资基金将寻找另外的机会。最终，他们找到了。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传播媒介注意到一些有限合伙投资基金，但随着 1970 年的到来，兴趣也随之消失，许多投资者在 1973~1974 年的熊市上彻底失败。

有限合伙投资基金——被《华尔街日报》称为“华尔街最新的卡西诺大赌场”——在金融市场上势力最强，也最没有规律，占有很多资金，大约有 5000 亿之多的美元投资于近 1000 种有限合伙投资基金中（索罗斯的基金有时多达 130 亿美元）。这是投入金融市场中 35 万亿美元资金中相当大的部分。每天，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的成交额达到 750 亿美元，是纽约股票交易市场股票总值的 8 倍。

在 1971 年做出决定允许汇率浮动以后，投资者的机会大大增加。80 年代中期人们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的兴趣又普遍高涨起来。在 1985 年前，工业国家的央行对外汇汇率采取不干预政策。对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的刺激——尤其是在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初期——以及世界级投

资形象乔治·索罗斯的崛起，是1985年欧洲银行为增加美国出口而降低美元的价值。美元贬值的结果是，对贸易货币的刺激增长。索罗斯和其他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的合伙人捞足了好处。在1985年以后，全球的货币贸易加强。在1986年及1989年间，它每天成倍增长至400亿美元，这是国际安居银行的统计数字。这可与美国的长期国库券相比较，它的数目只是300亿美元；与美国的股票相比，其股票数额实际不超过100亿美元。

当世界货币贸易人员盯住欧洲中央银行并在1992年9月对英镑进行发难时，它首次显示了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的强大力量。并非股票交易人员或投资银行家，而是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王国的成员赢得巨利。

在有限合伙投资基金中存在很多秘密。他们将秘密深埋心中，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们的功能。索罗斯的大多数活动甚至不为他的股票持有人所知，因为他的基金会并没有向他们汇报的义务。

到1994年，那些经营基金的人成为他们国家中最有实力，获利最多的商人。他们的实力可与华尔街的贸易权威——那些最重要的公司抗衡。引用《商业周刊》的话来说，他们是“投资界的职业杀手——毫无组织，任意发挥，但作为投资者远比他们的常规对手出色。”

自1987年至1990年，中位数的有限合伙投资基金每年上升75.1%——而中位数的共同基金仅为35.1%，普尔股票为56.2%。仅1992年，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的平

均收益为普尔股票的三倍。索罗斯、朱利安·罗伯森、米切尔·斯坦因哈特表现更为出色。有限合伙投资基金表现的最好见证是1993年《金融世界》上所列的收益最多的人员名单。

这些名单上人员累积所挣的钱比前一份名单上人员的多得多。名单上有一半人曾经为有限合伙投资基金工作。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管理人员占据了名单的前5名；索罗斯在名单上居首位，每年的收入是11亿美元，是第一位每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人。在名单的前10名中，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管理人员占了8个席位，100个席位中占了46位。

在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的运作中，索罗斯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罗伯特·米勒是阿诺德·S·莱莱克诺伊德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在那段时期他与乔治·索罗斯一起合作过。他回忆起那时索罗斯的运作方法：

“如果乔治投资于德国股，因为它是由美元控制的，一般采用两种方法进行。第一是购买德国马克来支付你购买的股份。这就意味着你的货币的曝光，因为你将长期拥有用于兑换马克的德国证券，而你早已购买了马克。另一种方式是进行双面投资，可以通过借入德国马克以便不出现货币曝光；或者进行交汇交换，这样一来，你可以出售德国马克以消除德国马克的曝光。这被称为双面投资。

在这方面，有限合伙投资基金使用非常频繁的技巧

便是空头交易，或者下注某件资产将贬值。一名贸易商空头出售他或她并不拥有的证券，希望到以后，当证券不得不抛给购买者的时候，可以用较低的价购进。索罗斯在黑色周三的晚上有效地使用了这一技巧，他在1992年9月成功地买空了英镑。”

听起来这似乎是一种毫无损伤的技巧。但对某些人来说，这有不爱国之嫌。一个人怎么能将赌注下在这个公司的经营状况会变得惨淡呢？咨询空头专家。那么，什么样的美国人会这样做呢？这个人对经济没有信心吗？什么样的人试图曝光别人的坏运气呢？

索罗斯并不关心这类批评。对他而言，空头交易充满了十足的魅力，可以在美国及海外市场获取巨大的利润。他也通过举债经营购进股票。量子基金的股利特点小型化和不受官方限制。和大公司相比，它更易于自由地出入股市。

索罗斯在艾冯郡的经营就是他通过空头交易获取利润的一个成功例子。这在艾冯郡的赢利骤然下跌之前，他敏锐的直觉告诉他老龄化的人口意味着表面赢利的企业将会以很低的价格出售。

索罗斯非常高兴地解释说：“在艾冯郡的例子中，银行没有能够理解到二战后表面的经济繁荣已经结束了，整个市场已经饱和，孩子们并没有使用钞票，这是一个他们恰好没有理解的重要的变化。”在进行空头股票交易中，量子基金以市场价每股120美元的价值借进了1万

股艾冯郡股票。然后股市骤然下跌。两年后，索罗斯以每股 20 美元的价格吃进了这些股票。每股 100 美元利润的买卖使得基金会净赚 100 万美元。

这是双面投资最常见的方式。“内部收入服务”中所谓的空头交易规则规定：禁止通过空头进行公共基金交易，并规定公共基金公司在抛售不到三个月的投资时，不能接受超过 30% 的总收入。空头交易被认为是短期交易。即便如此，一些公共基金经营者在证券与外汇委员会许可的前提下也进行空头交易。

一名类似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的经营者描述了大肆举债经营的残酷性：

这确实让人牵肠挂肚，非常紧张。你必须有一种类似索罗斯或米切尔·斯坦因哈特进行举债经营的能力。三名最出色的举债经营人员是乔治·索罗斯、老虎（朱利安·罗伯森）和米切尔·斯坦因哈特。在举债经营时，一个人的能力中必须包含精神能力和自信，因为一些小的挫折会更加影响你的投资后果。在 1994 年 2 月，美元与日元比价每日都有 4~5 个百分点的涨落变化，使得索罗斯损失了 6 亿美元。我们生存的世界中，股市涨落 4~5 个百分点并非是不常见的事。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利率提高 1.25 点，道琼斯股市下跌 97 点。人需要一定精神能力和一定的胆量进行冒险，但必须明智地去进行。

华尔街一名领头的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经营者要求进行匿名交易。他注意到证券分析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

提出了固定价值的概念：在某种特定环境中，考虑到利率、经济状况及公司利益等情形，某一证券实质上有它的固有价值。“分析家及金钱管理人员的工作就是对那种高于其固有价值的证券做出说明。所以一名常规投资者将抛售证券而有限合伙投资基金将进行空头交易。当股票低于其固有价值，它的证券价值被低估时，他就会购进证券。一名常规投资商与一个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的投资商的一个区别就是因前者可以为兑现而购买它，而后者可能举债购买并又进行超过 100% 的投资。”

华伦·巴菲特并不涉足举债经营。他是一名以现钞为基础的投资者。他将大量赌注下于某个单一证券，但他使用现钞。乔治·索罗斯是一名举债经营者，你可以设想这需要勇气，对赌注具有一定程度的信心和一种基本的金融控制手段；你必须确保自己永远能够控制举债经营。

有限合伙投资基金不像公共基金那样仅仅是追随和空头交易。它们同样也进行期权、期货或其他衍生种类的经营。有限合伙投资基金更注重于财务状况，它比公共基金的贸易更加频繁。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的不利方面便是风险值的增加。如果一切进行顺利，它的优势在于能获取暴利。因为大多数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的投资人员必须将他们的钱留在基金内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收入通常用于重新进行投资。所以他们的利润也不断增加。

有限合伙投资基金向投资者提供机会，让他们能涉

足全球的金融市场。公共基金经营试图依靠他们在某一领域的专长，只是依靠一个市场。更有甚者，公共基金经营者发现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太无常，太复杂，风险太大，对他们来讲，无吸引力可言。

有限合伙投资基金进行了大量的交易。1988年，索罗斯的投资资金达到了原有的18倍；一年以后，也就是1992年，又翻了四倍。

在1992年，这些有限合伙投资基金中，最著名的基金利润累计达到25%~68%。这比一名在美国股票市场投资的一般投资者所能获得的每年7%~8%的利润要高得多。在1992年，索罗斯的基金增长达到了67.5%，史坦因哈特的基金大约增加了50%，罗伯森的是27.7%。

无论一位平庸的投资者如何受到吸引，他或她都不能简简单单地出去雇用一位乔治·索罗斯或米切尔·史坦因哈特，然后就回到家里，坐等大笔大笔的钱进账。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确实是一个经过筛选的俱乐部，俱乐部内成员都有大把大把的钱用于冒险。

到了1994年，有限合伙投资基金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政治家们都在谈论是否需要制定一些新的规章制度来加以控制。他们都是秘密的，任何机构都在任何时候神秘地赚钱，总有人要提出问题。人们害怕由于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经营者投入金融系统运行的大笔资金会影响金融市场。当债券在1994年早期受到挫折时，人们进一步

坚信有限合伙投资基金是元凶。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经营者反驳了这种宣传，他们声称他们投入运行的资金远比投资银行或商业银行少得多。

至于乔治·索罗斯，他对新规章制度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有任何理由反对规章制度。不管怎么说，在没有规章制度的情况下，他也赚到了钱。索罗斯称自己是乱中取胜的专家，一个远离金融混沌状态的人。但他为何又需要新的规章制度呢？也许他仍然希望能为全球的金融团体建立一个中央银行系统。这就是自相矛盾。“我并没有迟疑不决地思索金融市场——即使我说货币市场应该是稳定的，”他指出，“我们必须对参与者与公民有所区别。对于参与者，你根据规则办事。作为一名公民，如果制度有问题，你便有责任进行修改。”

1992年，证券与外汇委员会推出一份500页的有关海外基金会的报告。当时人们正在怀疑包括量子基金在内的三个有限合伙投资基金会在拍卖会中大量购进美国财政部债券，其中纽约的所罗门兄弟公司被起诉试图采取非法的市场挤压手段。后来，政府调查人员最终还是给了这三个基金会清白的名声。证券与外汇委员会报告得出结论有限合伙投资基金会不需要更进一步的规划。到那时起，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看起来将继续在相对不规则的状态下运行下去。

秘密商规之十六

——工作量和成功恰好成反比

有人对索罗斯基金何以成功做了不少分析，结果发现投资组合的盈亏，约有八成是由资产规划决定的，对股票的选择和其他因素只能决定二成左右。而索罗斯本人认为，管理投资组合与一般性的工作是两回事，工作量和成功恰好成反比。

他说，假如你从事的是一般性的工作，像推销员或工匠之类，你的成就和你的工作量成正比：你愈努力工作，所生产的产品就愈多；你和客户接触愈多，才愈有可能接到更多的订单，这就是所谓正比。但假如从事的是冒风险的工作，只要看得准，眼光够好，你根本不必很勤奋地工作。不过，假如你出错，或者你的假设和现实不符，那就要切切实实认真研究究竟哪里出错。换句话说，愈是不成功，就愈要花时间纠正错误。也就是说，如果投资组合的表现不俗，你就不怎么需要工作，这就

是所谓反比。

在很多场合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工作的人。他说：“我只做在做出决定之前起码所需的工作。有些人很喜欢工作，收集了成篇累牍的资料，但其实对完成结论不一定派得上用场。于是他们就抱紧某类投资标的不放，原因是他们只对这些投资项目了如指掌。”而索罗斯和这些人不同，他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重点上，假如非工作不可，他会狠狠地做。他发狠的原因是“我竟然要工作”。假如不必工作，他就不做，这就是他作风的重要特色之一。

秘密商规之十七

——技巧是置身于整个过程之外

以一个思考者的角度参与投资，是索罗斯成功的方式之一。思考的意思就是置身于思考的对象之外，这对他来说很容易，因为他具有抽象思考的头脑，也喜欢超然地看事物，其中也包括看他自己。

索罗斯认为，立场超然是成功投资的必要条件，但自制力却不属于这一范围。亏钱他也会心痛，赢了也会觉得高兴，压抑感觉是最严重的自残。只是一个人了解自己的感觉后，未必有必要在大众面前尽情吐露自己的感受。但有时候，特别是压力大的时候，如果压抑情绪，压力就会变得更难承受。他说：“记得我初出道时，有一次我的个人户头几乎完全被亏空，但我还得若无其事地继续工作，那压力简直教我窒息，午饭后我几乎没有勇气回办公室。所以日后我总鼓励一起共事的人把烦恼讲出来，只要他们愿意承认出了问题，我会支持他们。”

由于独立性思考和超然的立场，索罗斯很容易被认为是—个孤僻的人和爱抬杠的人。然而他说：“我选择‘逆流而上’时，往往都是经过一番评估的。因为潮流很容易反过来把我淹没了。根据我‘始于自助，终于自败’的潮流理论。潮流大部分时间都是一股助力，不过追随者到了潮流发生转折或改变时就会受到伤害，大部分时间能追潮流，但我自始至终都了解自己也是‘众生’之一，也有可能受到伤害，因此我随时留意转折的出现。”

秘密商规之十八

——看到整个森林

当别的投资者都千方百计地跟踪研究某个股票、某个企业集团、某种商品时，索罗斯却在特定的时间中专心致志地研究跟全球贸易有关的复杂的方案。

和其他投资者不同，索罗斯洞察了解由国际金融领导人的公开声明和决定引起的市场趋势、行动以及波动。索罗斯比大多数人的更深刻之处就在于了解世界经济中的因果连锁关系。如果发生了甲事件，那么乙事件随之而生，丙事件又因乙而产生。这种思想也无需担心被窃用。但是，它却是索罗斯成功的秘诀。

这也是索罗斯最与众不同的特点，或者说最能解释他投资天才的性格。例如他能获得国际金融界领导人俱乐部的会员资格这件事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一俱乐部是不轻易吸收新成员的。

这个俱乐部中绝大多数会员都是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政

治和经济领导人：政府总理、财政部长、中央银行的行长。很难想象这个总数不足 2000 人的俱乐部成员竟分布全世界各地。

因为索罗斯不是当选的领导人，他没有跟其他成员相同的地位。但是随着经济权力从政治家手中转移，像索罗斯这样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起的影响越来越大，于是索罗斯在这些领导人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他们想认识索罗斯，听一听他对世界经济的高见。最重要的是，他们想知道索罗斯下一步干什么。当然，索罗斯也有兴趣去了解不同国家的领导人将要做出的决策。

很少有投资者能像索罗斯这样能获得加入该俱乐部的资格。其他的投资者只能读一读有关领导人的消息，而索罗斯却很容易就接近这些领导人：他能跟某个财政部长共进早餐，跟某个中央银行行长共进午餐，或者对某位总理进行礼节上的访问。

例如，1980 年早些时候的一天，索罗斯应邀出现在英格兰银行，想通过货币管制来挽救金融市场危机。在 1980 年，他购买了价值 10 亿美元的英国债券，为此引起银行家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当时投资使人得益很大。

索罗斯之所以能进入国际金融领导人的圈子，并不仅仅因为他在资本交易方面的敏锐头脑。从 80 年代中期以来，他就开始认真地着手在东欧建立基金会。后来，作为对开放的社会鼓励，他又着手在苏联建立基金会，这使得他更有理由跟世界上特别是欧洲的政治和经济领导

人交往。

让一个内阁部长出席他的基金会的一个会议并非寻常，对于他来说，能拜访一位参加他的基金会理事会会议的政要也不寻常。1993年11月，迈克尔·刘易斯对他的基金会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索罗斯在上午会见了摩尔多瓦总统，晚上又会见了保加利亚的总统，之后他对迈克尔吹嘘说：“你看看，我跟一个总统一块吃早餐，跟另一位总统一块吃晚餐。”

这些会见显然使索罗斯跟其他投资者相比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然，跟政府官员一块进早餐不会使索罗斯得知某国使货币贬值或调高利率的确切日子。这些金融界的领导人绝不会因为一顿饭就把这消息泄露出去，更确切的是，尤其不会泄露给索罗斯。

但是，经常接近领导人，使得索罗斯具有别人不能也无法具有的对事物的灵敏感觉。要从一个会议上得到某种信息，他也许要等上三个月；但是，往往是某位领导吃饭时的一个无意的笑话，会使索罗斯提前三个月得知某一个重要消息。现在的关键是，当别人还在阅读有关领导言论的报纸时，他已经把领导的谈话储存在脑子里了，以便他所用。

正像伦敦 S·G·Warburg 债券公司的高级国际经济师乔治·马格努劳斯说的：“索罗斯确实具有对世界活动和世界变化过程极好的洞察力。他的欧洲背景使他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这也使对世界的搭配形式，尤其是

德国统一以及各种欧洲思想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看法。他具有被德国人称为世界观的东西，这种世界观一直没有为他国内复杂的事物所影响。他所做的是加大建筑物，使它成为对他有利的机会。”

具备如此世界观，索罗斯更显得具有极大的自信。

“他不是那种整天为成功而洋洋得意的人”，从80年代一直是索罗斯同事的詹姆斯·马科斯指出，“他反对说，‘先生，事物应该是按如此情况发生’。”他又说：“你常常听他这样说：‘很显然’或者是‘显然将会发生什么事’，或者是‘导致这样的因素是非常简单的。’他看到的是整个森林；其他人只能看到个别的树木。”

其实，其他投资者不仅仅缺少那种进入世界领导人俱乐部的名片。即使是他们也拥有一张此类的名片，也很少有人能像索罗斯那样花那么多时间跟世界各国领导人在一起。

如果索罗斯在欧洲发展，那么他今天也许只是个目光犀利、头脑精明的金融高手，根本不会是如此杰出的投机专家，充其量也只是在资本市场中拼命赚钱的投资商之一。但是，在美国，情况就大不相同，他是个罕见的怪才，他对欧洲资本市场认识得一目了然，这对他极为有利。他的巨大优势就在于他对欧洲和其他地方有多种多样的资料，像欣赏一幅巨大的动画，判断发生在那些地方的金融和政治事件对全世界不同的资本市场的影响。

阿瑟·勒纳曾在 60 年代晚期跟随索罗斯。他解释说：“索罗斯有一个观点：你必须在思想中洞察全球，而不应该只局限一个狭隘的地方。他是最早提出此观点的人之一。你必须知道这儿发生的事件对那儿产生什么影响。当时货币没有今天如此重要。他所要的是通过各个来源所得到的基本信息，并把它们储存在脑子里。然后，他就会依此来提出他的观点，并且在多数情况下，证明都是正确的。”

还有人否认索罗斯拥有某种神奇的直觉。他们坚持认为，他不过是在从事一些更加邪恶的事而已，这个家伙有许多朋友。但他们马上说，确切地说，这并不是一种犯罪，但这些朋友身居高位。但他们马上又承认，这种行为并不能把人送进监牢。但是，在这些老朋友关系网后面似乎隐藏着某种邪恶的东西。

例如，《观察家》杂志这样评论索罗斯与杰米·戈德史密斯及尼尔斯·陶布的密切关系：“这些关系，这种圈内人的小团体行为，经常使那些更加主流派的投资家对索罗斯很不满意。他的助手可能会谈论什么第六感觉，但是，他们自己的一些评论也谈到索罗斯为自己编织了一个收集信息的复杂网络，这是十分有益的。”

但是，交朋友——恰巧处于某种位置的朋友——有什么错吗？

索罗斯基金管理董事会的商业经理加里·格莱斯坦在谈论索罗斯广泛交友时很不愿讲述这位领袖人物的行

为。他说，索罗斯能抓住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宏观经济趋势。“乔治的许多朋友都是各界名流，在全世界形成一个广泛的接触网。他会走进办公室，说‘我对某国有兴趣，打电话给某某了解一下情况。……’他的整个事业都离不开世界各地的顾问。这一点，你只需看看他的通讯录就知道了。”

秘密商规之十九

——重要的并不在于你对或错

斯坦利·德拉肯米勒曾这样说，索罗斯给他上的最重要的一课是“重要的是并不在于你对或错，而是在于当你正确时，你赚了多少钱；当你错误时，你赔了多少钱。索罗斯对我的仅有的几次批评，都是发生在正确地把握了市场，却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机会之时。”

斯坦利·德拉肯米勒在1988年开始在量子基金工作，他工作没多久，索罗斯就对他比较欣赏。德拉肯米勒为索罗斯负责每日市场操作，他一直对做美元市场不太热心，他做了大量的德国马克空头股票。空头开始对他有利了，他喜不自禁。

索罗斯走进他的办公室，与他谈起这笔投资。“你的投资有多少？”索罗斯问他。

“10亿美元。”德拉肯米勒回答说。

“这也能称为一项投资？”索罗斯反问他。索罗斯的

这句问话成了华尔街人的一句口头禅。索罗斯劝说德拉肯米勒再增加一倍投资。正如索罗斯所料，更多的利润流入到“量子基金”。

德拉肯米勒称：“索罗斯教我的就是，当你对一项投资有绝对把握时，你必须去封杀对手。成为大的赢家这需要的是勇气。举债经营需要的是勇气。只要索罗斯对这笔投资比较感兴趣，而且你确实做得对，那么你手中有多少钱投进去都显得不够。”

当索罗斯看准某项投资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在他眼里没有大生意。退缩是懦弱的表现。在索罗斯的书本中，最大的错误不是莽撞，而是保守。“为什么这么小？”是他的口头禅。

投资者对市场趋势的观察时常是正确的，但因为他们缺乏索罗斯的这种自信，到了一定时候，他们就开始担心自己的投资会受到损失。他们在股市投入一笔资金，看着一连几天，或一连几周股票价格涨了又涨——随后他们就止步不前了。“情况好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会说，“我必须在情况变化，我失去全部赢利之前就赶快从中撤出。”

索罗斯总爱嘲笑这种想法。在他看来，一个投资家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并不是胆子太大了，而是太保守了。当有人告诉索罗斯他或她在股市上投入了多少资金时，索罗斯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你对股市上扬有信心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索罗斯接着会问：“那么为什么

你投入这么少的资金呢？”

1984年12月，索罗斯的目光对准了英格兰。在那里，正在开展着一场规模宏大的私有化浪潮。首当其冲的是3家英国国营企业，它们是英国电讯公司、英国天然气公司和英国豹牌汽车公司。索罗斯明白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最终目的是让每一位英国公民都能在股市上拥有自己的股份。那么如何实现这一计划呢？只有降低证券价格。

索罗斯嘱咐助手阿伦·拉斐尔要密切注意豹牌公司和英国电讯公司的情况。拉斐尔的研究使索罗斯确信豹牌公司董事长约翰·伊格恩爵士正在积极设法让豹牌汽车打进美国市场。他果断决定让量子基金会以每股160便士的价格，买进豹牌公司全部4.49亿美元股票的5%，约合2000万美元。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已是惊世骇俗的大手笔。但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只能算是刚开始，他的目标远不限于此。

拉斐尔和索罗斯曾就这件事进行过一次交谈。

“我已对豹牌公司进行了调查。”拉斐尔说。

“你怎么看？”

“我对这个公司目前运转情况很满意。我们做得很不错。”

令拉斐尔惊讶的是，索罗斯拿起了电话，命令交易人：“再替我购进豹牌公司25万股。”

拉斐尔不想败索罗斯的兴头，不过他觉得自己有责

任向索罗斯表明他的意见，“对不起，也许刚才我没有向您汇报清楚，我是说我们目前为止已做得很不错了。”

很不错，对于拉斐尔和索罗斯显然具有不同概念。对阿伦·拉斐尔来说意思是，“我们目前为止所做的已经很多了，在形势明朗化之前，不能过分地陷在里面。”对于索罗斯就不一样了，它意味着如果你对目前的状况很满意，那么为什么不依循你自己的感觉，全力以赴呢？索罗斯向他的助手阐明他的道理。

“阿伦，你刚才告诉我豹牌公司正在努力向海外拓展，而且现在的情况表明他们此举是卓有成效的，我们就可以断定他们的资金流动在加快，公司股票价格会上涨。国际投机商，包括美国的投机商，毫无疑问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股市的全面繁荣。在这个时候，我们又何必犹豫呢？”

对于索罗斯来说，这将是 he 又一次淋漓尽致地发挥他本能反应的好机会。他敏锐地嗅到了股市价格将大幅度上扬的气味。他断定，疯狂的投资者决不会放过这一机会，从而推动股市的进一步高涨。

对于索罗斯的分析，拉斐尔感到无可挑剔。

“你分析得没错，可以肯定股市会上涨。”

“那么，大量购进。”

拉斐尔答应了，但他内心对于索罗斯是否真的很清楚他自己在做些什么深感疑问。

索罗斯接着说：“如果股票上涨，你就应该多投入。

只要你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就不要介意你购进了多少，不要介意你在全部股票中占了多大的份额。”

“下一个问题。”他说，他觉得已没有必要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争论。

索罗斯对自己在豹牌公司和英国电讯公司所下的赌注充满信心，他知道这些公司正在进行改革的幅度远不止资产负债表上所说的。而其中最关键的，同时也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所竭力争取的，是英国的私有化运动能在低价位下进行。

对于索罗斯的所做所为，拉斐尔深感震惊，他怀疑索罗斯是否在孤注一掷。

事实证明他的忧虑是多余的。量子基金会最终仅在豹牌公司就净赚了 2500 万美元。

在这种风险极大的赌博中，索罗斯还有一招赚钱的有效武器——空头交易。这方面，在 80 年代中期，索罗斯做得最成功的是在西方联合公司。

那是在 1985 年。当时，传真机开始在美国流行，而在此之前的几年，西方联合公司的股票曾达到很高的价格，当时的价位仍在大约每股 20 美元左右。然而，索罗斯和他的助手们注意到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仍包括了大量的已贬值的电报设备。这些设置都早已成为过时产品，在市场上正逐渐被淘汰。此外，他们还注意到西方联合公司那时已负债累累。

索罗斯怀疑西方联合公司是否有能力偿还这些债

务，也就由此怀疑西方联合公司的股票能否反弹到最高点。

阿伦·拉斐尔说：“当时，我们私下认为，传真机给西方联合公司带来的灭顶之灾就如当初西方联合公司的成立结束了马递邮政的使命一样。”

那时候，许多著名的经济评论家在评价西方联合公司时，都忽视了这一重要的数据，即它的事实资产额远远低于该公司对外宣传的数额。然而，索罗斯没有，他察觉到了这一点。

索罗斯在西方联合公司共进行了 100 万股的空头交易，赚了多少？按阿伦·拉斐尔的话说，“好几百万美元。”

索罗斯大胆投资的另一个例子是 1985 年 9 月 2 日所发生的事情。那天 5 人小组（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及法国、联邦德国、日本与英国四国的财政部长）在纽约的广场饭店聚会，他们一致认为美元（它在 80 年代早期一直非常坚挺）价位太高，需要降价。索罗斯认识到了这项主张的重要性。“广场协定”意味着汇率自由浮动时代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为操纵的”浮动。索罗斯在日元及马克上做的是多头。索罗斯相信“广场协定”将对他的投资产生积极效果，所以他增加了投资，利润随之滚滚而来。

秘密商规之二十

——学会死里逃生

索罗斯办事谨慎。他自己从来就否认他具有太多的能力。他曾断言投资的关键是知道如何生存。懂得如何生存就意味着保守地从事资本交易活动，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他喜欢对人说：“如果你做得很糟糕。第一个行动就应该是退缩。不要老想着捞回来。当你重新开始时，数额要小。”

对于索罗斯而言，他在投资方面的成功秘诀是他死里逃生的能力。也许把死里逃生视为一种实际技能显得有些难以理解，但对于索罗斯来讲，这有助于解释他的成就。例如，在他的《金融炼金术》这本书中，他写道：“当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给了我死里逃生艺术的经验，父亲在俄国革命时期就曾死里逃生。”

后来，在同一本书里，他指出经济套头交易基金很大程度上检验了他的死里逃生方面的训练：“乘情况有利

时用杠杆作用可以产生较大的效果，但是在事情跟你的预料不一致时，杠杆作用会给你打击和破坏。一个非常难判断的事情就是：什么样的风险最安全，还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标准，每个交易都要根据它自身的特点来判断。最终的分析是，你必须依赖你的本能求得死里逃生。”

当其他的人被问及索罗斯的投资特征是什么时，他们用稍有差别的话语，道出了同样的特征。在80年代与索罗斯共事的阿伦·拉斐尔称：“索罗斯与众不同的是他认为每个人都必须知道自己的局限。”实际上，生存艺术对索罗斯来讲并不总意味着知道何时自己对股票的选择是正确的，以及承认自己何时错了。它意味着宁早勿晚地在形势不利时撤出投资，而且当自己的行为在别人看来很怪异时，自己别太在意。

对吉姆·马克斯——与索罗斯及米切尔·斯坦因哈特共事过的一位投资家来说，索罗斯的生存本能迫使他采取那种怪异行动。“他会是第一个让你领略到市场上的怪异行为的人，有时他的行为……看来是最外行、最古怪、最错误的，低价卖出，而且高价买进。就像在1987年的股市上他低价卖出期货。但一旦你了解了坦率承认的用意所在时，你就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了：为了明天的卷土重来，继续战斗。索罗斯说：‘我可不想一觉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已身无分文了。’”

在1987年发生股市崩溃时，有一个死里逃生的实例反应了这个问题。事后，这件事显示索罗斯撤回资本金

早了些。但是对于吉姆·马克斯来讲，那才是典型的索罗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即保存实力，以求来日再战。正当他由于撤资过早而遭受损失时，索罗斯却没有在交易中遭到更大的侵害。马科斯说：“大多数人都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之所以索罗斯敢这样做，是因为他有充分的自信——他将来还能回来再战。当然他做了，在1987年后期，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认为这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个信息。”

此后，索罗斯具有了一个复杂的性格——聪慧、毅力、禁欲主义、天资的结合体——这种性格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思想。他的反射论是他的盖勒计数器。这个理论并没有精确地告诉他以何事为目标，或者说，也没有告诉他以何时为目标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一理论告诉他把“枪”指向何方，并为他提供了寻找潜在机会的办法。

在黑色星期一（1987年10月19日）之前的那个星期三，索罗斯在位于哈佛的约翰·肯尼迪州立学校演讲时，谈到了他的繁荣——萧条理论。当索罗斯出席会议时，他发觉市场上已大量地廉价卖股票。他预见到灾难将至，但他认为灾难会先发生在日本，所以他在日本的金融市场上做了空头。但他一直在做多头的美国股市却首先崩溃。他在日本金融市场上的空头做得很艰难，这迫使他放弃在美国股市所做的多头。他不想去挣最低限度的利润，于是便从日本的金融市场上迅速撤了出来。索

罗斯坚持着他的不可违背的原则中的一条：首先确保你能在市场上的生存，之后再考虑赚钱（1987年年终时，他的赢利仍比上年增长14%）。

事后看来，索罗斯在市场萧条期间有些项目的投资撤走太早了。但吉姆·马克斯却认为这正是乔治·索罗斯的典型做法：放弃一场战斗，以便他能生存下来，去为明天而战。索罗斯撤资后肯定会遭受严重损失，但他通过撤资，能够防止所投资金的更为严重的流失。“许多人都难以接受那种结局，”马克斯称，“然而索罗斯却能接受，因为他十分坚信他将能够卷土重来。当然，他卷土重来了，1987年之后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想这里有值得我们大家都去学习的东西。”

所有这些关于索罗斯生存理论的谈论，很容易使人们把他看成是金融市场经济上的保守派的一员。如果索罗斯真是那样谨小慎微的话，那么人们怎么能使这种谨慎与他的冒险家之名联系起来呢？最伟大的冒险家平时看似狂热、鲁莽，而实际上来说，他们都是我们周围最深谋远虑、最慎重行事的人。为了在市场上站住脚他们不得不如此。

索罗斯投资成功的一个关键所在就是他作为一个投资家，在金融市场上的生存技巧。市场生存是每一位投资者的投资战略中重要的一部分，再提它未免给人一种老生常谈的感觉。但特别关注一下索罗斯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仍然显得很有必要，因为它似乎给人的初步印象，

是索罗斯商业生涯中的一项伟大的悖论。难道索罗斯不是典型的冒险家吗？难道他不是在鼓励别人投入更多更多的资金吗？难道他不是举债经营之王吗？然而，首先必须学会生存，站住脚跟，才谈得上赚钱。

秘密商规之二十一

——觉察自己的错误是一件自豪的事

一般人都坚信索罗斯的理论是无可挑剔的。他们看了索罗斯的投资记录后指出：任何人达到索罗斯的程度都会不犯错误。

索罗斯却不这样认为，他说：“人们往往认为我从不犯错误，他们为此所误导，但我却不是这样——恰恰相反，我也跟其他人一样犯了许多错误。但我认为我的超人之处就在于我承认错误。并且，那就是我成功的秘诀。我现在所具备的洞察力就是：我承认人生来是要犯错误的这一真理。”

其他投资者都允许在市场决定中掺入自尊心，索罗斯却认为：一位明智的投资者对所有情况都应心平气和，即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也没有什么。当一个很看好的股票突然下跌许多，此时最好还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尽管这很难堪，但是索罗斯却常常能这样做。

在80年代一直跟随索罗斯的阿伦·拉斐尔相信：虽然索罗斯的禁欲主义在投资者中是极其少见的性格，但却使他用来得心应手，非常自然。他说：“你可以算一下，当乔治错的时候，他会坦率地承认。他从未说‘我是对的，他们是错的’。他会说‘我错了’。你需要做的是思考错误——在夜里，在你的家里。这当然会消耗你许多精力。资本交易是个很难做的生意。如果很容易的话，那么连女交警都会去做这种交易。这里面有许多不规则的规律，需要自信心，主要是要抛开七情六欲。干这种交易，非常耗神，你必须完全忘记舞会等娱乐活动。”

索罗斯自己也这样说：“我知道自己可能会出错的心态让我缺乏安全感，缺乏安全感使我随时处于备战状态，因而随时提高警觉以应对错误。我在两个层面上实行这一点：在抽象层面，我把可能出错的这种信念纳入一套复杂的哲学系统基础之内；在个人层面，我是一个很挑剔的人，不断在自己和别人身上找缺点。但话说回来。我虽然挑剔，却也是一个讲恕道的人。假如我不能原谅自己，就无法察觉自己的错误。对别人来说，错误带来耻辱。但对我来说，察觉自己的错误是一个足以自豪的事。”

“只要我们明白，人生于世，理解不尽完整是常态，就不会把错误引以为耻，但闻过而不改却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

“我是一个运用投资假设的人，我留意观察事情的进展是否符合预期，假如不合，我就知道自己走错了路。但

有时有些事情会出轨一下子，随后又重新走向正轨。”

索罗斯总爱夸耀自己与其他投资家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大多时候他是正确的，而别人是错误的，而是在于他比别人更擅长察觉自己何时犯了错误。的确，他最喜欢采用的投资策略之一就是不断检查他是否在某一项目投资上出了错。他时常创立一种投资假说，然后进行验证，并希望能从中发现市场的真正进程与他所期望的市场发展方式是否相吻合。如果事实与他所期望的并不相符，他就会认识到他犯了个错误。基于他的调查，他会设法找出他的推断错在哪儿。一旦他认为他也知道问题所在，他可能会被迫修改他的论断，或把它全盘抛弃，尽管他不太乐意仅因情况有变就去改变他的论断。况且，那些情况只是暂时的，而且可能不会真正有变。索罗斯将设法找出可能会影响他投资的新的因素，如果真有这种因素的话。他并不热衷于仅仅因为情况出乎他的意料，就去撤掉一项投资。他最不主张的做法就是坐守不动，对情况的逆转不管不问。关键在于不断观望，不断监测，不断检验，以便在影响金融市场的情况的确发生变化时，他能够觉察到，能够全力以赴，去弄清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

索罗斯承认对客观事件不完美的理解是人性中的一部分，他不会消极对待失败或所犯错误。他认为，真正让人丢脸的并不是做错了，而是在自己所犯错误已很明显时，却仍不去加以纠正。

乔治·索罗斯说当他认识到在某些投资项目上可能要出错时，他会感到不安，同时这也会让他保持警觉，去做好改正错误的准备。一些人认为在把握金融市场发展方向上出了错是丢脸的一件事。对索罗斯来说，它不会是骄傲的资本，但它却是市场经营中不可避免的，当然也就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在这方面，他很欣赏棒球运动员的做法。一位棒球运动员打到 300 分时，就会对他的成绩很满意，尽管每 10 次挥棒击球时，有 7 次他都没有击中。索罗斯也很赞赏一位科学家的观点，这位科学家称：“在通往重大发现的道路上总是布满了失败。”

秘密商规之二十二

——痛苦也是财富

索罗斯这样说过：“事情出了乱子我会觉得痛，我很相信自己的动物本能。在我直接管理基金时，常常会觉得痛，只要我一开始痛，我就知道自己投资组合出了问题。背痛并不能告诉我什么地方出错，比方痛的地方接近腰部就是买超出了问题，或左肩痛就是货币方面有麻烦等。但痛楚会促使我看看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假如我不痛，我就不会这样做。但这不是管理投资的科学方法。”

索罗斯这里所说的“痛”当然不只是生理问题，而主要是精神负担。这种负担有时是非常沉重的。

7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索罗斯发现与投资相关的痛苦太厉害了。这阵痛来源于经营的投资基金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同是在投资行业内历时太长，焦心于第一笔投资也使他感到痛苦。

每天你都在冒险。这是痛苦的一部分，因为在某种

意义上你会遭受严重的损失。但索罗斯认为，如果你对这种痛苦毫无准备的话，就不要参加这样的游戏。从长远来看，人也不会从中得到快乐。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玩家，你就必须保持镇静。

乔治·索罗斯承认他痛恨赔钱。赔钱导致一个人最坏的情形是心情压抑，伴之而来的是尴尬和愤怒。你想隐瞒你的错误，不让它们公开。在你的名誉受到威胁的同时，你的代理人的资金额日渐减少。

索罗斯认为，将这种赔钱的感觉埋在心中，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你必须懂得如何去忍受由这些损失所带来的痛苦，否则，你干什么事都不能持久。简而言之，你必须冷静并超然地对待亏损，不必害怕与别人谈这事。当你发现其他人已经承受住痛苦并保持镇定时会感到很开心。

索罗斯的痛苦首先是来自于他的投资经营领域，而承受痛苦的能力则是他赚钱的可靠保证。

索罗斯是一位典型的恬淡寡欲的人，他值得人们学习。作为一名有勇气的斯多噶派人，如何能解释他在购买与抛出时那种不靠想象、不带偏见的行为呢？他本人否认比别人更有勇气，因为他说投资的关键在于如何生存。生存也就意味着保守地参加游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只用小部分资产参加游戏。

其他涉及上亿美元的生意决策也常使他不安和失眠，但靠着他的钢铁意志，索罗斯在游戏中下入了很大

赌注。

当其他人有时由于自负而影响了他们做出明智的市场决断时，索罗斯明白一个聪明的投资商应不带任何偏见。声称自己永不会犯错误则毫无意义，由于错误决断导致资金转移而责备自己也没有好处，最好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且从错误的阴影中走出来。

在 1974 年的一天，当索罗斯与一名熟人在打网球时，电话铃响了。这是东京的一位经纪人打来的，他告诉了索罗斯一个秘密。当时尼克松总统卷入水门事件，该事件又导致他后来辞职。那位经纪人告诉索罗斯日本人对尼克松的困境反应很糟糕。

由于在日本金融市场涉足很深，索罗斯不得不做出抉择——退出还是继续？他的伙伴注意到在比赛中没出现的汗珠现在在索罗斯的额上形成。但是，索罗斯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做出决断，他下令抛售。在做出这样重大抉择之前，他并没有犹豫或觉得有必要咨询别人。由于对自己的极其自信，索罗斯从未对自己的决断后悔过。他可能确实出了一身汗，但也许那是由于网球运动所致，而不是由于他刚才做出的投资决策。

阿伦·拉斐尔在 80 年代与索罗斯共过事。他认为索罗斯的斯多噶主义思想对这位投资者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这是很少有人具有的特点。“你可以用一只手数清他们。当乔治错了的时候，他就退出来。他不说‘我是对的，他们错了。’他说‘我错了’然后就出去，因为

如果你坚持错误立场你就会尸骨无存，你要做的是反思——在晚上，在家里，它会消耗你的精力。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事业。如果很简单的话，那么处理违章停车的女警察也可以做。它需要极度的磨炼、自信，并且不感情用事。”虽然长得瘦小，索罗斯看起来很粗犷和强壮。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有一头修剪整齐的卷发。有人说他看起来像一位经济学教授或一名冲浪教练。他的英语非常出色，带有一些匈牙利口音。一名作者将他描述成为“体形健壮，棱角分明，满是皱纹的额头，尖尖的下巴，小巧的嘴巴，平顶式的头发，声音平直，略带沙哑。”也有人说：“他闲适的神情及匈牙利口音使他有一种欧洲大公的形象。他额头的皱纹表明了他对世界状况的思索——一副急忙获取奖学金的形象。”在一名《观察家》的作者看来，索罗斯完全符合欧洲人的模式。“他是一位奥匈帝国时代上流社会中举止优雅的成员，带有一种不可磨灭的宫廷气派和含而不露的讥讽神情。在早期，人们很容易想象到他在维也纳的旧咖啡馆中与托洛茨基分子边下棋边喝咖啡的情景。”

英国的《独立报》这样总结他的外表：“这是一位不浮华的戈登·杰科，一位华尔街80年代电影中非正统派主角的典范。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十岁，这或许缘于他不间断的网球运动或者对纽约向巨富们提供的奢靡生活方式不感兴趣之故。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他对食物的口味不挑剔。他看上去像是一位真诚的，一丝

不苟的中世纪欧洲教授。”

事实表明，金钱是惟一对乔治·索罗斯有引力的东西。

他并不刻意追求成为一名具有巨大资产的世界级投资商。相反，他渴望成为一名有思想的人，他发现理智的世界比金融世界更具吸引力，他还是能轻而易举地挣到很多钱。他认为投资既非邪恶，不仅仅简单是另一种形式的赌博。对于那些攻击他垄断金融市场的说法，索罗斯对他自己不可思议的金融纪录没有做出任何辩解。他喜欢说如果他不大把捞钱的话，别人也会。在这一意义上，他做出决定要拥有比舒心生活更多的钱。

他并非是完全憎恶金钱，相反，他承认自己身上有一种贪婪的特性：“我仍然认为我自己是自私和贪婪的。我并不想把自己变成圣人。我的胃口很好，我总是将自己放在首位。”

一旦他决定了花钱的方式，他会毫无顾忌地花掉这笔钱，他没必要和董事会成员或家庭成员去协商。有了这种自由，他便想确保自己做出明智的抉择。

索罗斯忍受痛苦的能力来自于他生活经历中的磨炼。他是一名幸存者。他从他父亲手中学到了技巧，并在二战期间用实践进行了检验，在1944年成功地躲过了纳粹的迫害。在金融界的幸存有时意味着完成一次紧急撤退。这是索罗斯在20世纪80年代所做的事情。他采取了较低的姿态，让其他人来负责基金，他主要决策。他

需要一些比投资更具生活气息的东西，他想做一些让他的钱发挥作用的事情。他渴望做出贡献——不是指任何贡献，而是让世人记住的贡献。事实证明，他对待痛苦的态度和忍受能力在这个领域中已经受住了考验。

他将故乡匈牙利及东欧国家，以及后来前苏联，集中作为他慈善活动对象。索罗斯在早年就离开了匈牙利，因为他不能忍受那儿流行的某些东西——例如二战时的纳粹主义。对他而言，理想的生活方式便是最大程度的政治及经济自由。

在过去，他曾遭到形象受损的挑战。他的目标是在这一广阔区域内表达他的慷慨，以便形成一种区别。有其他因素——经常是西方政府，有时是私人基金会——也试图去影响他人，让他们接受西方的理想及价值观。然而，从来没有一位来自西方的个人独自想西化这些国家。索罗斯明白他处于挑战的边缘。正当他学会如何合理进行投资时，他决定放慢进程，细心监控他工作的进展程度，并且对支付的金钱做细致打算。要想有所影响而不引起疑心这很困难；要赢得政治当局对他行为首肯几乎毫无可能，然而，他却想放胆一试。

尽管受到这些国家的怀疑和敌视，在其中一些国家获取立足点也是一种成功。然而，索罗斯基金会在大多数的东欧国家及前苏联国家有时像鲜花一样开放。在90年代中期，索罗斯捐出成万上亿美元的资金，成为多瑙河及乌拉尔山之间最重要的西方私人捐助者。人们对此

褒贬不一。有人将他褒扬成一位圣人，愤世疾俗者认为他是一名入侵者，但索罗斯最终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方法，赢得了尊重，在华尔街及伦敦市周围成功地完成了一些杰作。他打开封闭社会的慈善义举带给他的不仅仅是资金积累，更重要的是带给了他一种满足感，他的知名度由此也很快得到提高。

他喜欢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事实上，他对此刻意追求，因为他让整个世界知道的不仅仅是他“整垮了英国银行”。他也相信，名声也可以帮助他援助事业的成功。但他并没有完全满足，他感觉到人们期望他在整个投资过程中尽更大的努力。

他需要公众注意，他渴望成为《纽约时报》杂志的封面人物，但不是作为一名受人怀疑，公众褒贬不一，在金融世界毫无影响力的人物。如果他喜欢成为一名幕后人物，这已经不再成为必要。他的形象已受人注目，他的事业功成名就，他的影响力非常广。其他人很想知道他更多的情况，但很多事情他并不想说。而这一方面也给他带来麻烦，乃至痛苦，却需要他正确地等待和解决。

秘密商规之二十三

——最重要的是人品

量子基金的成功操作基金经理人才和业务骨干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索罗斯一般只管战略性大事，而且许多投资策略和举措都来自于合作伙伴，如1992年对英镑的攻击，其战略就是由索罗斯的合作人德拉肯米勒率先提出的。对此索罗斯有很深的认识，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合作，他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资深合伙人、很好的老板，原因是我很能理解基金经理人遭遇的困难。当他们遇到麻烦时，我很支持他们，这也是公司内部气氛融洽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他又说：“对人我看不准，看人方面，我的确很糟糕，所以出过不少差错。整整花了五年时间，经历过不少痛苦的经验才凑合出一支理想的经理队伍。眼看队伍逐渐形成气候，让我感到很高兴，但我在挑选人才上的确没有比做投资来得高明。”

这是索罗斯的自谦之词。实际上，他在挑选人才方

面不仅精明，而且有严格的标准，其中他最看重的是人的道德素质。关于基金经理人和合伙人，他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品，只有那些我可以信任的人才会成为我的工作伙伴。有些人很会赚我，但未必值得信任，自然也就不是我挑选的对象。迈克尔·米尔肯停业时，垃圾债券投资方面出现真空状态，我很想乘虚而入，因为那是个很赚钱的生意。我面试了许多曾经在那儿工作过的人，看看他们是否可以胜任基金经理人和成为工作伙伴。不过，我觉得他们的态度有点不道德，但这可能是垃圾债券交易（这一点和投资银行业不同）的通病之一。他们积极进取、有能力又聪明，但他们这种不道德的态度只会教借钱给他们的人更加小心。我当然不愿意借钱给他们，总觉得不放心。”

在这方面索罗斯有很多经验和收获，他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曾有一段时间市场波动起伏很大，当时初出茅庐的我非常坚持在做任何投资之前必须先拿定主意，但要为市场趋势找到合理的解释很费时间，所以有时在我建构出一套理论架构之前，市场趋势早已转向了。假如这种情形不断发生，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要有本事像鹰一样搏击扶摇而直上，而龙游浅水就非常糟糕了。”

8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水不扬波，只有一点涟漪。索罗斯找到一位商品基金经理人，名叫维多·内达荷法，他研究出一套在风平浪静时赚钱的办法。维多·内达荷法对“随机漫步理论”很有研究，他把市场

视为一个赌场，在市场上一般人的行为有如赌客，因此，想要了解他们，可以从赌徒身上看出端倪。举例说，赌客的行为星期一和星期五不同，早上和下午也不一样。内达荷法就靠这样的理论经常赚点小钱，积少成多。索罗斯把钱交给他处理，他总能赚回不少钱，但这种手法有一个弱点，就是只能在市场看不到大趋势的时候发挥作用，假如出现历史性的大潮流，这种由赌徒行为引起的涟漪就会立即消失，内达荷法就很可能吃大亏，因为这种手法缺乏万全的应变之策。索罗斯提起内达荷法，是因为他的作风和他完全相反，但有时却刚好抓住契机。索罗斯认为，从此人身上他学会了包容，他愿意任用作风完全不同的人，只要他们的人品可靠就可以了。

对于合作人，哪怕有时产生意见不一，但都以最终结果为裁决。索罗斯在这方面表现得雍容大度，因为这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他对此深有感触：“投资最让人赞叹的地方是，同样一件事情，竟然有许多不同的做法。我们可以被称为动能投资人，但也有混得不错的所谓价格投资人。价值投资人在我们这里通常不会有什么发展。查特基是我的投资顾问之一，我有一次和他一起经历了一件颇有趣的事，把科技公司视为资产丰富的企业，这些资产也包括爱憎分明在内。他认为，假如某家公司的客户很多，即使该公司经营不善，也没生产什么产品，这家公司还是很有价值的。他觉得只要略施小技，这价值就会显露出来。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果然是对的。”

举例来说，他买进不少帕拉迪恩公司的股票。离开时，他很失望，很后悔他们竟然持有那么多该公司的股票，不知如何脱身是好。但几个礼拜之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竟然以他们付出价钱两倍的代价收购了这家公司。查特基对客户价值的看法果然没错，但他对企业的看法和索罗斯的想法格格不入。

秘密商规之二十四

——利润比资金规模更重要

比起其他的基金经理人，索罗斯和投资人有着一一种比较不同的默契，这使他在投资时采取一些独到的方式。他说，“我们的基金注重绩效。我们所得到的报酬和投资的利润成正比，而不是依管理的金钱数额多寡而定。”

一般情况下，大部分基金经理人总是尽量募集资金，然后以相当负责的方式经营，以免让投资者失望而打退堂鼓。换言之，他们总设法把基金的规模弄得愈大愈好，如此得到的报酬也会随着经营的金钱数额增加。而索罗斯则设法把基金的利润提到最高。原因是利润是以绝对值计算，而不是根据某些指数计算，这样才能更科学地表示基金的绩效，才会更大程度地产生对人的吸引力。

另外，索罗斯基金与其他基金的另一个重大差别是：他也把自己的钱投资在基金内，也成为基金的主要股东之一。他说：“由于我们把靠表现得来的报酬继续投资在

基金之内，只要基金存在的时间愈长且愈成功，经理人所管基金单位就愈大。换言之，我们不但和客户同安乐，也和他们共患难，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和投资者之间的默契是，他们坐车，我们开车，但双方要去的是同一个目的地。这种默契是伙伴性质的默契，而非托管责任的契约。当然，我们也同时履行我们的托管责任。”

秘密商规之二十五

——最好和最坏的股票都能赢利

索罗斯投资策略中有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选择最好和最坏的股票进行投资，如果利率将上升，那么他就去寻找那些预测中受挫的行业。如果行业被证实会在通货膨胀中受益，他也马上跟随。

一旦最好及最差的两个公司被确定以后，就没有必要在该行业中的其他公司进行投资。例如，在计算机行业中，索罗斯在购买IBM公司电脑股票的同时购进通用数据公司的股票。从长远来看，IBM公司自然是电脑行业中最成功的计算机公司。通用数据公司涉足这一行也有很长时间，但并没有挣到该行业中其他公司那么多的钱，尤其在80年代，计算机行业充斥了全球。然而通用数据公司是值得看中的，因为一旦它从该行业中其他公司的经验中获益，它会很快恢复元气。通用数据公司的利润增长与其他公司如IBM相比，将会很快。所以通用数据公司的股票最终走势将非常好，这是索罗斯的想法。

他在医药行业中采取了相同的经营方式，他同时购

买了墨克的股票和辛泰克斯的股票，辛泰克斯公司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规模比墨克公司小得多，但它以更大的步子向前发展。辛泰克斯在加州的帕洛阿尔托，由于避孕药而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以后几年，也就是 1976 年，该公司向市场推出治疗关节痛的一种叫那普罗辛的药。到了 80 年代末期，辛泰克斯公司一半以上的收入和利润来自那普罗辛和另外一种类似的合成药。自然，辛泰克斯公司就面临很大的风险。如果事情进行顺利，并且辛泰克斯公司能发明一些新药，该公司将获利，它的利润将比其他更大的公司增长都快。作为一个单一品种的公司，它与同行的其他公司相比，它出售的股票价值就小得多。

在投资中，索罗斯坚持寻找该行业中的两个公司，并不多，只是两家。其中一家必须是该行业中最好的公司。作为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公司，该公司的股票其他人都想首先购买。这些购买将促进股市行情看涨，索罗斯将跟随这一股票。

另外一家公司就是对投资而言，则是该行业中最差的，大部分是举债经营，收支极不平衡。它的债券价值完全受到低估，所以当它的股票最终升值时，人们可以挣很多钱。索罗斯也将跟随这一股票。

他相信最坏与最好的股票都能让人获利。这就是为何他单选这两种而不是该行业中任何其他公司的缘故。

秘密商规之二十六

——必须严密注意某一部分股票的价格

索罗斯曾经这样说：“假如我的预期和事情的实际进展情况有出入，我也不会马上抛弃手上的股票。我会反复研究这些假设，设法找出错误并调整想法，或许我会发现有些外力作祟，但结果是我可能增加持股，而非抛弃手上的持股。但肯定的是我不会坐视不理，而是仔细研究。在一般情形下，我不轻易改变想法以迁就改变了局势，但我也不敢轻言完全不会。”当然，索罗斯如此加以重视的绝不是一般的股票，而是那些会影响市场基础的种类。当然，股票的市场价格遭受市场参与者的倾向影响，有时这种货币不仅影响市场价格，而且影响所谓的市场基础。当市场价格影响到市场基础时，他的反应论就是显得尤为重要了。这种现象——市场价格影响市场基础——并不经常出现。但是，当它的确出现时，市场价格就不单纯反映市场基础了；它们本身也成为了一种

影响价格波动的市场基础。

乔治·索罗斯并不按照传统规律去经营金融市场。那是别人去做的事，那些认为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金融世界是基于理性世界的人，才会按传统规律去经营金融市场。索罗斯对游戏规则是感兴趣的，但他所努力去了解的确是那些游戏规则何时会改变。

这是因为当那些规则发生变化时，就开始出现逆反现象，而这种逆反现象能够引起一次繁荣——萧条续发事件的发生。乔治·索罗斯为探索繁荣——萧条续发事件何时发生，一刻不停地监测着金融市场的最新动向。一旦抓住了金融市场的逆反现象占了主导地位的时机，索罗斯就意识到他比其他投资团体捷足先登。

乔治·索罗斯曾发现美国的银行系统经历了一个繁荣——萧条过程。早在 30 年代，伴随着经济危机带来的创伤，美国银行也处于萧条阶段。由于管理较严，它们无法拓展业务，从而使一些投资者忽略了银行所发证券。它成了一个没有繁荣景象的停滞行业。

然而，到了 70 年代早期，新一代的银行家成长起来了，他们感兴趣的是赢利，他们逐步走上了高层领导岗位。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在纽约第一国民城市银行。新成立的银行纷纷创立了新的金融机制，更加积极地经营他们的资本；所有这些行为都给他们带来了较高的利润，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种兴隆局面并没有给华尔街带来什么影响，那里的银行证券销量很低，有时甚至没

有销量。索罗斯是首先认识到银行证券行业有着巨大商机的人员之一。他意识到许多人都对银行存有误解，认为银行没有大的发展前途。索罗斯在他 1972 年所写的报告中，建议购买一些经营良好、富有活力的银行的证券。在 1972 年银行证券开始上扬时，索罗斯的投资回报率为 50%。此时正是繁荣—萧条周期中的繁荣阶段。

索罗斯知道人们对银行股份的激情将会消退，但他无法预料会在何时发生这种事情。在 1973 年，这种事情发生了。当时油价上升，通货膨胀加剧，利率上浮，使得银行证券的投资回报率仅为 13%，投资者在卖其股份时，银行的贴现率太低了。此时繁荣—萧条周期中的萧条阶段开始了。在此之前，索罗斯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使他不仅没有遭受损失，反而有大笔赢利。

在 80 年代国际借贷盛行期间，情况也是如此。银行家们深信他们用于确定债务国借债数量的借债比率是与他们的借贷行为毫不相关的。然而事实上，他们的借贷行为是基于他们对借债国偿还债务能力的估计之上的。一些国家把这些借款比率当作固定量。实际上，借债比率要受到这些国家自身行为的影响——如果他们停止借贷，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会下降。这里就存在着误解，这些领袖们并不明白基本价值并非与价值取向毫不相干。这种误解可为繁荣——萧条的发生创造条件。

基础（在这件事上，指的是借债比率）与附加在那些基础之上的价值（受借债国自身行为的影响）之间的

联系导致了繁荣——萧条整个过程的发生，该过程开始呈现自我强化趋势——繁荣阶段，然后跌落到自我失败状态之中——萧条阶段。

这种情况在 60 年代晚期联合大企业的繁荣阶段发生过。索罗斯在繁荣和萧条时期都赚了钱。他发现一些高科技公司正在用它们的被估价过高，而且可以像货币那样去使用的股份来谋取暴利。公共机构的投资者开始关注联合大企业。联合大企业股票价格的高涨激励着这些联合大企业去收购更多的公司。公共机构的投资者对此存在着误解，他们并不清楚每股利润的增长可能是被所获的总利润虚构出来的。索罗斯相信他们这些“投机基金管理者”的误解或“偏见”将会影响联合大企业的股票价格。在价格确实上涨之时，索罗斯大量买进。后来，当股市下跌接踵而至时，索罗斯卖掉了空头股，而且赢利丰厚。

联合大企业的繁荣阶段为一个繁荣——萧条过程提供了好的例证，因为它揭示出股票主要价值的一个缺陷。这个缺陷就是价值并不纯粹建立于市场规律之上，它还建立于违反规律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当每股利润并不是独立于该股票的市场价值之外时，投资者却相信每股利润都独立于该股票的市场价值之外。

在联合大企业及国际借款这两个活生生的例子中，索罗斯发现残缺不全的感觉可致使市场以它为指导，最终使参与市场者陷入一种盲目狂热之中。市场参与者形

成一个群体，容易做出过火反应，易走极端，最终导致繁荣——萧条的发生。

索罗斯坚定地认为，要准确掌握市场的节奏，就必须严密注意那些会影响市场基础的股票价格。

秘密商规之二十七

——永远要留有余地

勇猛出击是索罗斯的一贯风格，他认为赚钱在于抓住机会，永远不要在有钱可赚时坐守观望，但同时他也认为留有余地是非常重要的，永远不要孤注一掷，因为这常常会使你前功尽弃。

“我非常看重生存需求”，索罗斯在1992年事业上获得了极大成功时告诉电视采访记者，“而且我不会去冒那种可能使我一败涂地的风险。”

优秀的投资家是不会走极端的。索罗斯的任何一位从事大输赢赌注的雇员都会立即被勒马止步。然而索罗斯也承认大输赢赌注能让人集中精力。它有助于人们去考虑清楚金融市场运行如何。索罗斯甚至称冒险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它能让他兴奋起来。危险可带给他刺激。并不是他热爱危机。但他需要感觉到他正全身心地投入市场，去把他的工作做得干脆漂亮。但这也并不是说要孤

注一掷。索罗斯所学的生存艺术的一部分就是从不把所有的东西都拿来去冒风险。这是索罗斯从他父亲那儿学到的关键一课，并来源于他的生存经历：冒险可以，但当你冒险时，不要孤注一掷。

在1944年的整个一年内，乔治·索罗斯一直在躲避着纳粹的搜捕，他别无选择，只能孤注一掷。在他使用假身份证时，他知道一旦被查出是假的，他就会被处死。后来，在他的商业生涯中，他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他不必再做出生死选择了。他可以去冒险，但他再也用不着去担心万一失败，他就没命了。有时冒次险倒让他觉得很过瘾——只要他给自己留有回旋的余地。

他曾经这样表述自己的观点：

“冒风险是一件痛苦的事，不论是要自己承担或是转嫁给别人。从事高风险生意的人，假如不能承担后果，就称不上是好人。同样聪明的人操作可能不一样。其中有些人会冒险但从不会过头；有些则难免冲过了头，很难事先防范。但我不希望帮我做事的人冒险过了头。我偶尔也会冒险，毕竟我赌的是一生累积起来的所有财富，但我不愿别人拿我的钱去冒险。我曾经有一个很能干的货币交易员，竟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了一回风险很大的货币交易。事后这笔交易赚了很多钱，但我马上请他走路，和他结束宾主关系。我记得有人曾向我提出这样的警告：假如有什么让人出乎意料的亏损，除了责怪自己，谁都不能怪罪。”

“我曾经说过，不论什么投资主意，我都设法找出它的缺点，找到缺点，我就安心了。相反地，假如只看到好的一面，我就会担心。但也不要误解，我不会就此因噎废食，因为找不到该投资方案的缺点就放弃它，只是我会随时留心。另一方面，我认为对市场不愿意接受的投资概念往往最强而有力，市场之所以攀升，靠的是挡在前面的顾虑这说法。”

秘密商规之二十八

——低调总有好处

量子基金无论从规模还是投资效益都是很庞大和出众的。但在早期，为了自己的利益，索罗斯一直让金融社团相信他仅仅是另外一名投资者。我们都知道，并且他也知道自己不是。但是他一直努力去说服其他人，他仅仅是一名短期的投资商，他的少量资金对整个投资世界并不会造成真正的伤害。

同样地，索罗斯也成为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的某种代言人。对于其他人来说，如此急于隐藏自己的战略看起来有些古怪。但当他们记住索罗斯几乎不公开他的秘密时，这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仅仅是为有限合伙投资基金擂鼓助威，他甚至敦促为有限合伙投资基金设立更多的规则。

例如，1994年3月2日在索罗斯的宣称：中央银行重新考虑规划有限合伙投资基金将是合法的。“我感觉到

不受控制的市场面临不稳定的威胁。”索罗斯告诉记者：“我认为很有必要让规划者进行规划。”

“我确实相信不经规划的市场将面临垮掉的威胁，因此让中央银行着手调查是合理的，我们将与他们一起协作。我只是希望他们推出的规划不会带来危害。”

当有人让他就有限合伙投资基金增加市场易变性和不稳定性发表评论时，索罗斯回答：“我认为市场有一个超越目标的倾向，我一点也不相信一个完美的市场。因此，我也不认为有限合伙投资基金是完美的，否则他们就不会每天损失5%。”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很显然，华尔街经常充斥着将理想变为现实的人，他们似乎能抓住经济运行的命脉。在过去是摩根或斯坦利，古尔德或巴鲁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由乔治·索罗斯或其他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的杰出人物唱主角。

量子基金会的投资者，更多的不可能是美国的公民或居民，这是因为基金是指定在荷兰的安列斯和不列颠维尔京群岛支付，它们并未在美国的证券及外汇委员会注册。这就是给他们更多的经营灵活性及自由，而不受美国公布的规则限制。远离本土意味着虽然这些基金可能会影响整个市场，但他们可以避免美国政府的很多限制。

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的一个神秘之处是其完全地不受控制。但情形并非如此，如《1934年的证券与外汇法

案》就要求资金超过 1 亿美元的投资管理需要向证券及外汇管理委员会申报。有限合伙投资基金同样也受反欺骗立法的限制。有限合伙投资基金可避免作为一个投资公司。具体的措施是你可以将投资者的数目限制在 100 名之内，并将他们的产品作为私人财产来处理。索罗斯的海外基金与美国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的一个主要区别是税收。海外基金的股东们只要他们中的大部分不是美国人，他们不必为他们的收入上缴税收。

在一些情形中，美国人可以投资于这些海外基金，但是他们不属于受惠税收待遇之列。简而言之，大多数的海外基金的禁令，或最起码，使得美国的投资者灰心。

至于乔治·索罗斯，他研究发现自己作为一名 1961 年才加入美国籍的美国公民，在各种规则之外。尽管是一名美国公民，但他有资格建立自己的海外基金，因为索罗斯大多数的投资者是欧洲人。

根据詹姆斯·格兰特（纽约《格兰特利率观察》杂志的编辑）的说法，这些华尔街的巨人往往远不如人们描述的那样具有如此大的金融力量，但是华尔街似乎更愿意相信某人或某个机构可以控制事情，能够将一件事变成现实。他认为索罗斯便是其中一员，一部分充满着神秘，一部分又是那样实实在在。格兰特观察说：“人们不得不将他们的焦虑、仇视或妒嫉倾注于一个具有生命的存在上。他们认为某人可以主宰市场，他们不能相信是供应和需求的关系在起作用，市场自身减损期货进程。

他们愿意相信那儿有一个索罗斯。”“……在熊市，那个人可能亏损，但我认为人们确实相信有人已经成功，有人在负责任，你可以通过电话找到他，你可以传唤到他。”

“我认为有限合伙投资基金在今天‘他们’，人们经常谈论的‘他们’是今天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的操作者。他们以光速来转移大量的资金。他们以一种大无畏精神进行着，一直到近日获取巨大的成功。乔治·索罗斯、朱利安·罗伯林、里昂·库普曼、保罗·图德·琼斯，他们一起创造了‘他们’。”

要成为“他们”其中一员是很不容易的，参加有限合伙投资基金集团尤其不容易。

这一点都不简单。而且对许多投资者来说也不是一件很明智的事，因为有限合伙投资基金集团要承担巨大的风险，需要很大一笔资金。

监督美国金融市场的证券及外汇委员会规定，参加美国的有限合伙投资基金集体需要有 100 万美元的资产，或者连续两年，每年收入至少在 20 万美元，或两口子收入为 30 万美元的条件。许多基金管理人员坚持认为他们的投资者更加富裕。要成为量子基金会中合格的一员，必须拥有 100 万美元的资金。

那个月在巴塞尔的会议上，十国工业集团的银行总裁们无端地提出为有限合伙投资基金或使用自己资金在全球市场进行贸易的银行制定新的规定。在经历早些年的动乱以后，市场已经恢复了元气，没有必要害怕更进

一步的麻烦。

在1994年4月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前作证以后，索罗斯向委员会传达这样的想法：有限合伙投资基金不应为这一年早些时候的股市和债券价格的陡然直落而受到指责。“我反对任何断言或暗示认为我们的行为有害或造成不稳。”

当索罗斯被问及类似他的一位私人投资商是否有可能聚集大量资金而操纵类似意大利里拉或英国英镑这样的货币时，他回答说：“不，我不相信任何市场参与者会做到这一步，除非在短期内，由于主要货币与市场精神相违背时，可以成功地影响货币……与全球的货币市场相比，有限合伙投资基金仅是其中相对较小的部分。市场上由于小国货币缺乏透明度，也防止了投资者的成功影响小国货币。由于小国货币缺乏透明度，任何试图通过购进大量这种货币来影响它的做法，在货币抛出以后，将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事实与此可能会有很大出入，但索罗斯认为，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低调，对事情的发展总有好处。

一些首次听到“有限合伙投资基金”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些基金是保守的，然而，这些基金除了保守之外，还可以代表其他意义。有限合伙投资基金采用这样一种下注战略：其中的一些投资会增值而其他的会贬值——事实上，“两面下注”不喜欢较大的市场动荡。

在20世纪90年代，围绕着有限合伙投资基金引发

了人们极大的热情，普通的投资商寻求有限合伙投资基金，希望能够加入进去。然而，他们未能如愿以偿，只参加了其中很少部分。但是，个体投资商仍可以从像索罗斯经营有限合伙投资基金那样的方式中学到很多东西。当他们实际投资的金钱数量比大多数个人投资者高的时候，他们的战略可以为任何涉足金融市场的人们提供宝贵的教训。

秘密商规之二十九

——不要忘记同大众唱反调

众多的研究资料表明，金融或证券投资市场上赢利的总占少数，大多数人都不得不面对亏损的局面。也就是说，赢利的少数人在很多时候都处在大多数人的对立面。索罗斯理所当然地经常被人们视为反对派的一员。但他承认他对与大众意见相左非常慎重。在大多数时候他都是跟着潮流走。然而与此同时，他总是在寻找着这种潮流的感染点（潮流发生“病变”之处），因为这是他惟一同大众唱反调的时机。

索罗斯这样说：“作为一个挑剔的人，人们往往视我为一个爱抬杠的人，但我选择‘逆流而上’时，往往都是经过一番评估的，因为潮流很容易反过来把我淹没。根据我‘始于自助，终于自败’的潮流理论。潮流大部分时间都是一股助力，不过追随者到了潮流转折或改变时就会受到伤害。大部分时间我追随潮流，但我自始至终

都了解自己也是‘众生’之一，也有可能受到伤害，因此我随时留意转折的出现。”

“现在最时髦的说法是市场总是对的，我的立场刚好相反。我假定市场往往都是错的，即使我的假设确实有误，我也会利用这些假定作为业务假设。我们不敢说人人都应该对抗潮流，相反地，潮流大部分时间都能主导大局，但若偶尔出现缺失，整个市场反而懵然不知。我走在指数曲线的前面，小心留意潮流快要走不下去的征兆。然后和其他随波逐流者分道扬镳，再寻找新的投资主意。当我觉得潮流走过了头时，就会考虑逆流而走，但只有在转折出现时，才会得到好处。”

然而潮流又是怎样一回事？潮流改变是由什么引起的？索罗斯认为潮流的发生在于单个投资者残缺不全的感觉使得市场以他们为导向。“以他们为导向”则意味着投资者已把自己陷入盲目狂热之中，或陷入一种从众心态，从而形成市场潮流。而且，受他们的狂热左右的市场总是出现过火反应，并总会走向极端。这种过火反应——向极端推进——引起繁荣——萧条续发事件的发生。反应过程呈现一种辩证方式的原因可在广义上得到解释：市场越不稳定，就有越多的人受市场趋势的影响，追逐潮流的投机行为带来的影响越大，局势就越发不稳定。因此，投资成功的关键就是要鉴别出市场开始受他们自己倾向左右的紧要时刻，因为当投资者鉴别出这种紧要时刻时，他就能知道繁荣——萧条的续发事件是将

要发生，或是已在进行之中。

一个典型的繁荣——萧条续发事件的主要特征是：

1. 市场趋势还没被识别出来。

2. 一旦这种趋势被识别出来了，这种识别却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使得一个自我强化过程拉开了帷幕，如同流行的趋势与普遍的偏见相互推动，这种趋势越来越多地建立在这种偏见之上，而这种偏见也越来越脱离实际情况。随着这个过程的发展，远离均衡的情况就出现了。

3. 市场的发展方向顺利地得到验证：偏见及趋势可能要被外部的各种动荡情况一遍又一遍地验证。

4. 信心得到增强：如果这种偏见及趋势能在诸多动荡中得以存在，用索罗斯的话说，它们是“不可动摇的”。索罗斯把它称为积累时期。

5. 现实与感觉间的差异：当人们的信仰与现实出现巨大偏差时，才认识到了是带着一种偏见去参与市场活动的。这个时候一切都发展到了顶峰状态。

6. 最终，如同镜中影像的自我强化，续发事件开始向相反方向发展。

这种趋势仅靠惯性就能持续下去。但一旦人们的信仰不再对这种趋势推波助澜的话，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停滞下来。信念动摇会使趋势逆转，这时它就到了索罗斯所称的一个转折点。然后它就开始向相反方向发展，导致索罗斯所称的一次灾难性的积累，或经济崩溃。

总之，索罗斯认为，当这种趋势持续时，投机交易的机会就增多了。人们的偏见同这种趋势相互作用，只要这种趋势存在，人们的这种偏见就越发强烈。一旦这种趋势得以确立，一切只能听其自然。

索罗斯的探索，用句较为简单的话来说，是在探索繁荣——萧条的续发事实。他在房地产信托行业找到了一个例证。

索罗斯曾写过一份广泛发行的研究报告，在该报告中，他讲述了投资于被称做房地产信托投资的新行业的优势。由于他感觉要发生繁荣——萧条续发事件，他形象地把房地产信托投资的一个周期比喻为三幕剧，正确地预测出房地产信托投资将首先经历一个繁荣阶段，然后就呈现过热发展，最终走向萧条。索罗斯可谓先知先觉，他总结说：“因为该剧的第3幕3年之后才能上演，现在我倒可以很放心地买它的股份。”

相当一段时间里，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投资不景气状态，萧条开始于80年代，那时发展商们进行超额建造。现在，该领域正处于危机之中。但这并没有吓跑索罗斯。他忽然对房地产产生了兴趣。他把这次危机视为另一次购买机遇的征兆。但人们仍然对索罗斯进军房地产市场感到奇怪。但更令他们奇怪的是，他竟然选中保罗·赖克曼作为合作伙伴。

1993年2月8日，索罗斯宣布他将建立起2.25亿美元的房地产基金，并交与赖克曼管理。

这个被称为量子房地产基金的新基金代表了索罗斯所下的赌注，他认为萧条的房地产市场将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兴旺起来。

当房地产市场崩溃时，赖克曼兄弟——保罗、艾伯特和拉尔夫陷入了严重困境，在此之前，家族拥有的加拿大、纽约和伦敦和房地产股票价值几十亿美元。但是，当他们的奥林匹亚和约克公司由于开发被称为金丝雀码头的伦敦金融中心而遭受巨大损失时，赖克曼公司的这个主要组成部分就进入了破产程序。保罗·赖克曼拥有奥林匹亚和约克公司的控股股份。

但乔治·索罗斯并不在乎这一切。他对《纽约时报》说：“他们（赖克曼兄弟）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房地产发展商。我想投资我的钱，我想找到最好的合作。”索罗斯和赖克曼分别押了 7500 万和 1 亿美元到新基金中；大部分资金将来自现在的量子基金股东。

当年 9 月，新成立的索罗斯—赖克曼基金进行了第一笔投资：购买旅行者公司——一家巨型保险公司的即将取消赎回权的房地产并偿还陷于困境的抵押贷款，共需 6.34 亿美元。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交易之一。紧接着，11 月，索罗斯和赖克曼宣布了在墨西哥城建造三个房地产项目的计划，总费用高达 15 亿美元。

索罗斯在做多头这一方面干得很出色，他在房地产信托投资市场达到最高水平之前，就卖掉多头。几年之后，恰如索罗斯所料，房地产信托投资市场开始滑坡。索

罗斯起初认为已来不及做空头证券了，但他重新研究了调查结果后，却觉得时间还来得及。索罗斯的判断是正确的，由此赢得了一笔可观的利润。他把100%的资金都用来做空头证券，这可是他头一次这么做，因为随着证券市场的下滑，他不断提高他的空头证券的价格。那一次索罗斯动用了100万美元，在当时这可是让他去做风险投资的一大笔钱。这一次检验索罗斯市场理论的实践使他大受鼓舞。

索罗斯在探测证券及证券集团的“自我强化”动向方面获益匪浅。投资者突然间改变了他们对一家证券集团的态度，并且开始猛购其证券。因为该集团内各公司是依靠更多的借贷、证券、销售以及证券为基础的业务赢利来增加收入的，所以随着人们对该集团证券购买力的增长，该集团的经济实力会得以加强。这就是一种自我强化的现象。

繁荣——萧条续发事件的繁荣阶段也由此而开始了。

当市场呈现饱和，日益激烈的竞争破坏了集团和繁荣局面且证券被估价过高之时，繁荣——萧条续发事件就走向终结。这个过程未被揭示出来之时，正是空头证券抛售者大显身手的机会。

秘密商规之三十

——需要闲暇时间

在市场上，其他的交易者都习惯于交易所的那种狂乱的脚步声。许多人认为跟索罗斯这种人闲逛是有病，是浪费时间。但是，索罗斯却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既理解在交易所里的需要，但他也看到了走出工作室的价值所在，这不仅可以会见决策者，又可以抽出时间去思考。正像索罗斯所说的：“要想成功，你需要闲暇。你需要空闲散漫的时光。”

索罗斯的朋友拜伦·威恩就曾感觉到了索罗斯在生活中和资本交易中的空闲时光。

威恩说：“他感到他不应该依赖别人。有一些人整天跟经纪人谈话。他不认为这是消磨时间的办法。相反，他喜爱跟一些对他有帮助的人谈话，也喜爱思考、阅读。他经常寻觅有哲学头脑的人，对那些不用头脑赚钱的人不感兴趣。他不认为赚钱要必须呆在办公室里。”

“他曾经跟我说过一些极其有用的事情：‘拜伦，你的问题就是你每天都去工作，去干些事。我并不每天都

工作。……我只有在觉得需要干些事情时才去上班，并且在那天我肯定要干些事情。但是，因为你天天上班，天天做事情，所以你不会感到哪一天对你来说是特殊的日子。’”

索罗斯有自信心，但这不仅仅是源于他的本能。他也要知道其他人在想什么。据阿伦·拉斐尔回忆：“他总是想让你听听争论的另一方面。如果你喜欢某件物品，他要让你和一位不喜欢这物品的人谈一谈，做一次智力摩擦，让你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你总是不得不重新考虑再考虑。事情总是在变化，价格也在变化，条件也在变化。这得由你——作为一名基金管理人员来不停地重新考虑你的立场。”

索罗斯和拉斐尔之间的典型对话是经常性的，比如：

拉斐尔：“这一立场已经决定了。”

索罗斯：“你认为应该在这儿出售一些吗？”

拉斐尔：“不。”

索罗斯：“你想买进更多的？”

前前后后，不断检查各种决定。

拉斐尔说：“索罗斯有一个恰如其分提出问题的不可思议的能力。然后他会看看图表，表示OK。”他从来不超过15分钟做出决断。

像拉斐尔那样的基金管理人员办事有一定灵活性——并非所有事都得经过索罗斯。一些小的投资意向，如500万美元，可以不通过索罗斯首肯。但是拉斐尔强调，

“但是和他谈一谈，对你有好处，因为他很机敏。”

对于金融市场，索罗斯具有一种很少有人拥有的实际态度。他同时有一定的纪律性。正如摩根斯坦利公司的美国投资战略家拜伦·维西所记述：

“他了解影响金融价格的力量，也明白市场合理与不合理的一面。他知道自己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是对的。当他是正确的时候，他会真正利用好每一次机会，并为之采取有力的行动，在错误的时候，他会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这是很多人并不具有的特点。很多时候，我们许多人都是正确的，但由于我们内心的害怕，我们对自己下的赌注并不信任。在 1992 年的英镑危机中，他坚决相信他是正确的。”

当股票市场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动荡时，他的部分天性就会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是人们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这是他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在伦敦经济学院时经济课程中没有的。这是一种心理天赋，索罗斯就具备它。

他的伦敦合伙人艾德加·爱斯塔尔对他这种禀性了如指掌：“他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他的心理学。他了解家畜的本能，他像一名好的市场专家一样了解何时人们会寻找某种东西。”